

# 目 录

序言	1
----	---

## 第 一 部

第一章	搜查令与拘票	3
第二章	宣布法国共产党为非法	14
第三章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在下議院	30
第四章	从議會到法庭	39
第五章	桑台監獄里的普通罪犯牢間	47
第六章	預审推事馬沙克上尉	60
第七章	非法撤銷共产党議員	81
第八章	移送軍事法庭	101

## 第 二 部

第九章	卑怯的原告达拉第和龐納	108
第十章	反对秘密审判的激烈战斗	127
第十一章	共产党人对党与祖国的忠誠	164
第十二章	慕尼黑分子的罪惡政策	172
第十三章	反苏政策的階級根源	214
第十四章	动人的見証	223
第十五章	破产了的原告的招供	229
第十六章	五年徒刑和褫夺公权	239

### 第三部

第十七章	翁热的獄中生活·····	256
第十八章	从監獄到監獄——走遍法国的旅行·····	266
第十九章	勒浦監獄中飢寒交迫的生活·····	280
第二十章	流放途中的艰苦生活·····	306

### 第四部

第二十一章	非洲的麦宗·加萊苦役營·····	316
第二十二章	希特勒杀害了我們的三个孩子·····	326
第二十三章	爭取釋放的頑強斗争·····	337
第二十四章	欢呼自由·····	353
譯后記	·····	360

## 序 言

每本書都要有一篇序言。本書也不例外，這就是多列士的來信。這封信是一九四四年八月我在阿爾及爾收到的，那時我們正一同站在為自由而奮鬥的戰士們的最前列。原信如下：

“親愛的弗洛里蒙：

現在我終於有了寫信給你的機會，謹借此再一次向你表達兄弟般的情誼。你知道，當年你在議會里那些瘋狗般的慕尼黑分子和賣國賊中間的突然出現，以及你在法庭面前的態度是多麼令人滿意啊！你和你的同志們在弗朗索瓦<sup>①</sup>的領導下，證明了自己無愧於我們偉大的傳統。那時你們真不愧為布爾什維克，而你們後來在阿爾及利亞的活動也同樣得到了成功與良好的效果。我早就盼望着能很快地見到你們。因此一旦見面時，我們將會擁抱得更加親切。

“親愛的弗洛里蒙，請特別向我們勇敢的馬戴爾和莫蓋致敬，說我分擔着他們的痛苦。我跟你以及大多數我們的朋友一樣，正擔心着那些處身於德國鬼子和賣國賊魔爪下的伙伴們；他們也正跟你們一樣，其目的只是為了要盡一切可能去和這批匪徒們作更激烈的鬥爭。

“因此，請代向布塔勒、麥爾西埃以及其他同志問好。讓

---

① 指弗朗索瓦·皮佈。——蘇聯編者注

納特<sup>⊖</sup>和我衷心地擁抱你。再見。

多列士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我一直珍藏着這封充滿着友情的信。這是黨和祖國對我的表揚。毫不隱瞞地說，我因此而感到驕傲。但這封信並不是寫給我一個人的，而是寫給所有法國與阿爾及利亞的共產黨員，寫給所有我們的戰友，寫給所有為自由、民主和民族獨立而奮鬥的戰士們的。

正是為了紀念這些為自由而奮鬥的英雄，紀念這些為祖國的事業而犧牲了的烈士，我才寫這本小冊子，以期能對於工人階級的、人民的、共和國的和法蘭西的偉大的黨——法國共產黨的历史有一點微薄的貢獻。

---

<sup>⊖</sup> 指多列士之妻讓納特·維美徐，——蘇聯編者注

# 第一部

## 第一章

### 搜查令与拘票

一九三九年十月五日，星期四早上四点半，太陽还没有升上来，还看不见一点黎明的曙光的时候，便有人在按电铃并且敲门了。

“我依法命令你开门！”

我妻子并不惊慌，她预料到内政部的“使者”就要到来。

“来了，谁呀？”

“警察。开门，我依法命令你！”

门开了。

“先生们。”

“太太”，警官说话了，“我带来了逮捕巴黎市下院議員邦特先生的拘票和搜查令。”

“非常遺憾，先生，我丈夫不在家。我想昨晚他到舍尔省去了，那兒有很多第一区<sup>①</sup>的避难的孩子。”

“没关系，咱們瞧吧。”

警官扭过头去对十八名站在楼梯口的警察命令道：“把房子看守起来。”警察們照作了。我女兒正恬靜地睡着，嘈杂声把她鬧醒了。她起床穿好衣服。警察开始盤問我妻子。外面，

<sup>①</sup>邦特的家就住在巴黎第一区，当时法国已向德国宣战。——譯者

馬路上布滿了大隊警察，好幾輛警察局的車子停放着。整個區都已圍得水洩不通，逃跑是不可能的。

“太太，你說你丈夫到舍爾省去了，很好。那麼請告訴我怎樣去的？”

“乘汽車。”

“甚麼號碼？”

“不知道，是朋友的車子。”

“對，我知道你甚麼也不會說。好，咱們等着瞧吧。現在，我要進行搜查了。”

我妻子回答道：

“我沒辦法阻止你那樣做，但是請注意我的抗議。根據法律，我的住宅是不可侵犯的，因為我丈夫是國民議會議員，是享有議員特權的。無論如何，我完全不承認你們搜出的所謂證據，因為你的警察布滿了各個房間，我看不見他們在搗些甚麼鬼。”

警官開始搜查。他翻遍所有的抽屜，找到了一份文件。他仔細看了看：

“啊，很重要！”

這是我寫給下院議長赫里歐的信件的副本，是用鉛筆寫的。信的全文如下：

“議長先生：

“擺在法國面前的是將如何處理和平建議的問題。

“我國人民正被一個殘酷的長期戰爭的陰影所苦惱着。這場戰爭將使人類文化寶藏埋葬於瓦礫之中，並將使千百萬男女老幼在戰爭屠殺中犧牲生命。因之只要一想到最近的將來有獲得和平的可能，我國人民就被一種無比的期望所鼓舞着。

“當人們剛剛開始談到這些由蘇聯外交當局所倡導的和

平建議時，受人指使的新聞界便同聲唱和地回答說：‘不要談甚么和平。’

“難道新聞記者們可能在沒有得到國家的指使前，便敢于公開主張繼續作戰到底嗎？”

“難道能夠甚至在關於和平建議的內容都沒有搞清，也沒有經過國家最高代議機關討論之前，就加以拒絕嗎？”

“至於我們，我們的看法並不這樣；我們希望您能以下院議長的身分，向政府提出下面的要求：

一、召集兩院開會，公開討論和平問題；

二、已經应征入伍的議員應當也能參加這一重大的有關千百万法國人民生死問題的討論。

“每個法國人都希望和平，因為他們知道一個長期的戰爭對我們的國家說來將是非常可怕的，它可以使我們的未來和民主自由同時遭到毀滅。

“必須絕對阻止任何在未經考慮之前就拒絕和平建議的可能性，以免因此把我們引向冒險和不幸的災難。

“我們傾全力擁護一個公正而持久的和平，而我們也相信這種和平很快就可以得到。因為在充滿了內部矛盾的帝國主義戰爭挑撥者和希特勒德國面前，還有蘇聯的存在，它能夠使集體安全政策得以實現，這種政策足以保障和平並維護法國的獨立。

“因此我們認為正是為了祖國的利益，我們才提出：必須以儘速建立公正、光榮而持久的和平的願望來考慮最近向法國提出的和平建議。而這種公正、光榮而持久的和平是法國全體公民所衷心擁護的。

“此致……

法國工農議員團主席

議員阿爾圖爾·拉麥特

## 总書記

議員弗洛里蒙·邦特

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于巴黎”

警官以为这是一个重大的收穫。

但我妻子毫不遲疑地告訴他我曾經因为能够代表工农議員团起草这封信而感到驕傲；此外，他还可以拿这份副本和現存于下院議長手中的原本加以比較而不至發現任何差別。警官把信放进口袋，繼續进行搜查。書架上書籍相当多，一本又一本拿来逐頁找尋有没有任何东西隱藏在里面，是一椿很單調而易于使人厭倦的工作。警官困倦了。他停止翻閱，到各个房間穿来穿去，形式主义地把所有的抽屜都翻它一下。呀！一扇窗子开着，也許是从这里逃跑的。他向院子里望去，沿牆角有些鉄管向下垂着。他做了一个表示怀疑的手势，繼續搜查，前后已經搞了四个钟头。沒有找到任何引人注意的东西。

呀！找到了。壁炉架上敞放着一份文件，警官居然这时才發現它。

这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法国工农議員团按照議會組織法第十二条第四十八款的規定交給下院秘書处的政綱。工农議員团是在解散法国共产党的命令頒布之后，为代替共产党議會党团而組織起来的。

該政綱的緒言如下：

“下面签名的議員宣布組成‘法国工农議員团’，并确定以解放劳动群众为自己的任务，采用一八八〇年法国工人党領袖儒勒·盖德所起草的綱領中的指导原則。該綱領之基本精神为：

“鑑于：

“生产階級<sup>(1)</sup>的解放就是無分性别与种族的全人类的



解放；

“而当生产者尚未占有生产资料(土地、工厂、船只、銀行、信託机关以及其他)的时候,他們就不能成为自由的人；

“只有在两种形式之下,生产者才能占有生产资料：

(一)个体经济：这种占有形式从来没有普遍存在过，而且現在正被工業發展所逐漸淘汰；

(二)集体所有制：这种占有形式已經由資本主义社会發展本身創造了物質的和精神的条件。

“鑑于：

“这种集体所有制除了依靠組織有独立政党的生产阶级——或無产阶级——的革命行动之外,是不会到来的；

“無产阶级应该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从事这种組織工作,包括利用普遍选举权的方法在內,以便使这种迄今还是欺騙手段的东西变成謀取解放的工具；

“因此,法国社会主义劳动者应按照符合于目前要求的綱領中政治与經濟部分之規定,以剝夺资产阶级的政治与經濟权利并将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公有为其奋斗目标。”

一陣欢乐使警官眉飞色舞,但我妻子立即使他清醒过来：

“你的上級早已得到这份文件,因为报上已經公布过。这是一紙公文,原本存在下院議長手中。”

警官噁咕道：

“很好,很好！”

九点了,警官要抽身回去,他的任务已經完成了。

“請原諒,太太,我要走了,一会儿再来。我讓同伴們留在这兒等着。”

---

① 按即指無产阶级。——譯者

“那么，我变成了囚犯？”

“絲毫沒有，你不过被監視而已。”

“要买东西怎么办？”

“等等吧，太太。我忠告你：請不要打电话；而且你也沒有这种可能。我已經命令警察們不許你在十点鐘以前打电话。”

我妻子反駁道：

“如果我被監視起来了，或者說如果事实上我已經成了你們的囚犯，我想我的女兒总可去买些东西吧？”

“可以，不过要派人跟她一道去。”

警官走了。十一点时，我妻子先后請求打电话到市政府和下議院，兩次都遭到了拒絕。她对此表示抗議，然后打定主意請求給警察局長通話，这回被允許了。是局長秘書接的电话。我妻子告以被搜查的事情，并对警察占住我的住宅提出强烈的抗議：

“你們說你們在跟希特勒作战，而你們迫害的却是那些反对希特勒的人們。真無恥！”

秘書回答說：

“太太，这事情我管不着。”

于是我妻子提請他注意：

“假如你不能作主，讓我和你們局長談好了。你們說我沒有成为囚犯，这全是假的，因为我已經不能自由行动了。”

“我記下了，太太。等等再打电话給你。”

兩边都挂上了話筒。

电鈴响了。

我妻子去开門。原来是加斯东·蒙慕梭，他是到布列塔尼探望馬賽尔·加香后回来的。

“早！”

“早！”

略使眼色蒙慕梭就明白了。他三脚两步奔下楼去，溜得正是时候！

第二次铃响了。这回是警察去开门的。来的是“观察报”的编辑诺埃尔。我妻子站在过厅上不知怎么办好。

“进来！”警察说。

诺埃尔向前走了几步。

“喂，有甚么事情吗？有需要我为您效劳的地方吗？”我妻子问他说。

他很快地回答道：

“太太，我要上前线去了，特来向您告别的。”

我妻子转身对警察们说道：

“你们看，这是我的一个朋友，他特地来告诉我他就要上前线去了。多叫人难受啊！人们可以知道自己甚么时候上战场去，但却永远不能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够从前线上回来。”

警察们随机应变，装出同情的样子。但是他们自己并不需要上战场。他们有另外一种很细致但很不光荣的工作要做。而且他们也丝毫没有上前线去的打算，因为躲在后方要安全得多。他们对诺埃尔表示怜悯。诺埃尔走了，再也没有回来。他后来在慢性死亡营里牺牲了。

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过去了，房子继续被看守着。下午四点钟来了一个警察。

他交给我妻子一封信，叫她到司法警察局长那兒去。我妻子去了。说她有自由吗？有是有的，但只限于楼梯口以内。儒勒-瓦莱斯街布满了警察，居民们都拥挤在他们的窗口，向她挥手表示友爱的敬礼。我女儿马格丽特伴随着她。第一步先到市政府。第十一区市参议员共产党员莫里斯·加戴特在

那兒，他陪我妻子辦理手續。在“守護使者”們的監視下，走向司法警察局。

局長在那兒。用不着等待，我妻子立即被接見了。他很溫文有禮。

“請坐，太太，今天的事情請原諒，我是執行政府的命令。您一定知道您丈夫因為犯了重大案件而受到通緝。他重新組織了共產黨議會黨團，並且在致赫里歐先生的一封信中散布第三國際的口號。他應該親自到法庭上去解釋，這對他會要好些。我奉勸您要為他的切身利益着想，促使他前來自首。”

我妻子回答道：“很遺憾，我丈夫不在巴黎，他到舍爾省去親自了解第十一區避難的孩子們的住宿情況去了。此外我甚麼也不知道。我不知道如何和在什麼地方才能找着他；而且，我丈夫也用不着我的勸告，他很了解自己的義務，他將不惜任何代價去履行自己的義務，實現選舉區的人民對他的委託。”

局長繼續追問：

“毫無疑問，邦特先生把他的企圖都告訴過您，是嗎？”

我妻子反駁道：“那麼你，你是不是把一切都向你妻子說過呢？難道你對她毫無保留嗎？”

司法警察局局長默不作聲。

“我可以告退了嗎？”

“可以。”

我妻子走回家去。街上，過廳里，樓梯口，門口，到處都是警察。

“請讓一讓，先生們！”我妻子到家了。

她終於獲得了所謂的自由。警察們繼續留在樓梯口。

至於我，我當時是在離家五百米處、伏爾泰路一位朋友家裏。頭一天晚上我就到了那兒。我應該承認自己太不小心，

因为从下院归来时，在还没有去这位大胆收留我的朋友家之前，我竟冒险回家去了一趟。

我回家是为了取些衣服和几本书，因此就差点儿不能到达上述的藏身之所而自投罗网。当我正在家里作逃亡的准备时，外面防空哨的头子们的刺耳的哨音震动了全区。难道是我们这儿来的吗？但我们的窗子并不漏光，因此不会是我们。我们很放心。

可是听！楼梯上有响声，有人在上楼。停在楼梯口了。这是来找我们的。电铃响后，开门了。

进来了一位穿雨衣的先生。他自我介绍说：

“我是安戴尔同志，您不认识我吗？”

一阵沉默。

“您知道，我住在洛开特街。我曾经在您的办公处见过您。我有一辆小卡车，如果您有甚么文件或传单要分发给各团体的话，我可以把它供给您使用。”

大家很不自然。

我听着，很少讲话，我想起来了。对，我曾经在游行、集会、广场这一类场合见过这个家伙，但我记得似乎他是和好些同伙在一起的。我避免正面回答。这位仁兄值得怀疑，他是不是以侦察、暗探、告密者或特务身份来的呢？但最好还是拿他当同志、朋友、老相识一样看待，以免引起他的怀疑。

“你要喝杯开胃酒吗？”

他毫不拒绝。斟酒，碰杯，喝完了。谈话没精打采地拖延着。绝不能把他关走，这样做并不是好办法。最后，这位不速之客告辞了。我们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

另两位要跟我一块走的同志，听到电铃响后就到寝室里躲藏了起来，现在他们出来了。他们深深吸了两口气。对，室

內“空气”实在太不好。一秒鐘也不能錯過，應該馬上离开。我擁抱了我的妻子和女兒。

我們下樓。沒有開燈，摸索着梯級走下來，到了過廳里，大門還關着。我們很快地安排好出去的办法：我們輕輕打開大門，萊塞爾和我向右边香醉街走去，另一位同志在門口等待兩分鐘，然後急劇地再把門关上，使它發出響聲，自己則在門口待下來開始燃着烟斗。

外面一团漆黑，簡直不可能辨別路上迎面有沒有人。我們穿着便鞋，拚命向前跑。但是，門剛关上便來了三個人，原來他們在鄰近十五米遠的一家大門的牆角里守候着。他們立即離開原地，奔向我的房子門口，以為可以抓住我。他們打開電筒。

但我們那位同志毫不惊慌，他安靜地吸着烟斗。

“這不是他！”

來人非常驚訝。接着是一陣失望的咒罵聲。來的原來是三名警察。他們當中有一個人沿儒勒—瓦萊斯街上行，向夏洛納街走去；另外一個沿同一條街下行向香醉街走去，第三個人留在原地。但是，兩頭都沒有發現人影。警察們無所適從。往那邊去好呢？伏爾泰路？狄通街？保羅·拜爾街？香醉街？還是讓·馬塞街呢？我們已經走遠了，我們已經到達了費德布街萬救世軍“婦女大廈”不遠的預定歇腳的地方。我們在那里停留了很久。

再走很短的一程，我們便到達了伏爾泰路一個商人的家里，誰也料想不到他會同情共產黨。我在这兒停了兩天，住在二樓，可以看到馬路上所發生的一切。

瞧！這是怎麼回事？兩個穿便服的傢伙在房子前面人行道上來回踱着。

問題很严重，主人感到不安了。幸喜这兒有好几个出口。十月七日晚八时，有人敲门，是第四区的共产党議員亞尔培·李加尔。

“走，快点！”

“等等，我去拿皮包。”

“不，別管了，以后再說，跟我来！”

我从后門到达了与伏尔泰路垂直的一条街上，那兒停着一輛汽車。馬达發动了，我們就此离开。警察来这儿瞎跑了一趟，甚么都沒有發現。

我們到达了巴黎郊区一个僻靜的小別墅。主人正等着我。經過介紹后，我被帶进餐厅。主人打开收音机，这是巴黎的新聞广播，我听着：

“頃悉弗洛里蒙·邦特已在莫城被捕。”

我們大笑一陣，并好好地喝了一陣“柏諾”酒。如果無線电只有这类捕人的消息向我們广播的話，那倒很好，甚至是非常之好！我就在这兒安頓下来。从第三天起，我便和党的領導取得了联系。我將在这兒停留一个月。

一天晚上快九点鐘的时候，乔治埃特·卡德拉斯来找我，党已决定要我回巴黎去。卡德拉斯和我，加上一位巴黎某中学的女教員，由后者任司机，坐上了一輛“西姆卡”牌小轎車。我們需要穿过梵塞納叢林。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辨不清方向，也看不清道路。每逢三岔口都得向警察問路。我帶着几份假証件，冒充市政府的職員，嘴里不断唸着我的假名字，以便一被詢問就能断然回答而不出岔子。一切都很順利。

晚十点，我到达了新的避難所。第二天早晨，我头天晚上离开的那所房子从地窖到屋頂都被搜查了一番。警察們来得太晚了，党的領導根据風声搶了他們的先。

## 第二章

### 宣布法国共产党为非法

在八天中，四十名共产党議員由于預审推事馬沙克上尉的命令而被逮捕了，他們被囚禁在桑台監獄的牢房里，受着普通罪犯的待遇。

內閣总理爱德华·达拉第为了趁他們正履行議員职务时出其不意地逮捕他們，为了給予这一專橫的逮捕以一种似是而非的法律根据，他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手段。

他沒有按照習慣在下院的公开會議上宣讀閉会令而只是在“政府公报”上簡單地發表一紙命令，宣布議會閉会。

这样共产党議員就因而突然地失去了他們的議員特权。因为按法律这种特权是只有在下院开会时才享有的。这样他們便可以立即被逮捕和囚禁起来了。

如果使用通常的合法手續，共产党議員就有可能抵抗政府的攻击，击败其陰謀，有效地反对針對他們的迫害措施并及时采取各种办法以避免非法的通緝。

这便是为甚么政府沒有使用通常手續的原因。

而且，整个报界在論及达拉第所使用的这种違反習慣的手續时，都指出这完全是为了便于迫害共产党議員。

事实上也不可能有其他的原因。

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替这种粗暴地歪曲議會組織法的行为作辯护。



希特勒匪軍還沒有來到巴黎城下，因此議會仍然可以而且也應該繼續進行工作。

然而事實上並沒有這樣辦。

內閣總理無論如何也不肯讓共產黨議員在議會講台上指責他的叛國政策，指責他的違反法國利益的行為；決不肯給予共產黨議員以戒備的時間，從而逃避政府無恥的警察措施並成功地轉入地下，以繼續領導法國人民進行正義的鬥爭。

這就是為甚么他採取了在“政府公報”上發表閉會令的專橫手段的原因。达拉第宣布閉會令是為了逃避議會那一点点微小得可憐的監督；是為了加強對國內那些最反對希特勒和最反對法西斯的人民代表所進行的野蠻迫害，而不是為了加強對敵人和通敵分子——被亞貝茲所豢養的第五縱隊的鬥爭。

达拉第及其政府的政綱，獲得了從勃魯姆的社會黨到拉羅克的法蘭西社會黨的所有議會黨團的支持，這是一場主要在於反對法國那些最活躍、最積極、最有力量的分子的激烈的戰鬥。

而且，达拉第沒等到一九三九年十月五日<sup>⊖</sup>、沒等到下院議長赫里歐收到我們十月一日的信、也沒等到工农議員團組成的時候，就開始了對法國共產黨、對工人階級和法國人民的各种組織的迫害。

事實上，早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為抗議保羅·雷諾的災難性法令而舉行總罷工的時候，达拉第政府就在反動派和納粹代理人狂熱的喝采聲中，征調鐵路工人和公用事業的勞動者，並動員軍隊，對罷工者施行殘酷的報復，命令大批

⊖ 一九三九年十月五日，达拉第政府下令逮捕與審判共產黨議員。——  
蘇聯編者注

开除工人，大事进行逮捕，并且把许多活动分子处以重刑。

所有这些手段都是用来扼杀工人运动的。

达拉第政府的部长、希特勒分子孟济甚至引用一八四五年七月的铁路交通法第十六与十八条来威吓铁路工人工会的领导人皮埃尔·瑟马，也就是说要处他以死刑。

纳粹匪徒后来实现了他们的走卒孟济的这种恐吓，以爱国罪把瑟马枪毙了。

因此可以说，这种对共产党、对民主、对工人阶级和对人民的迫害已经进行了很长的时日。

现在那个应当由达拉第本人及其同谋者张伯伦负主要责任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又被政府用来当作新的可憐的借口，以加强其反对法国人民及其政党——法国共产党的罪恶斗争。

然而，在这个时期，正如在其他时候一样，只有法国共产党才保卫了祖国的神圣利益。

我们当时曾经指出，对巴黎和伦敦讲来，还来得及与苏联取得一致行动，以巩固我们的安全，并在不损害国家荣誉的条件下捍衛和平。

在这种情形下，一个真正爱国的法国政府，其不可推诿的责任是重新考虑它那违反民族利益的罪恶态度，并派遣最优秀的全权代表到苏联去。我们曾经对达拉第说：

“每天上午八点都有班机去莫斯科，如果你爱法国的话，请乘飞机去吧。

“去亲自向你的军事代表团宣布你所给他们的那些浪费与拖长谈判时间以便使其失败的训令完全无效；到莫斯科去和苏联建立一个维护安全、反对侵略以及保障各国人民利益的常设机构。

“如果你想弥补你在希特勒侵略势力面前接二连三地投降、可耻地接受慕尼黑协定和有计划地破坏一九三九年夏秋两季的英法苏谈判的罪恶政策所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并迫使侵略者或梦想进行侵略的人们尊敬你的话，这是唯一的办法。”

我们的谴责，我们的请求，都被当成了耳边风。

在此以前，达拉第曾经坐飞机到慕尼黑去替法国造好坟墓，然而他却拒绝对法国共产党的公正而明智的建议作肯定的答复。

的确，时间还来得及，直到最后一分一秒钟，都还来得及签订一个英法苏同盟条约，从而改变世界的面貌。只要派遣一个重要的官方代表团，给予它为了谈判建立坚强而牢不可破的欧洲集体安全体系所必需的一切指示和权力就行了。

但是，达拉第拒绝了。

他断然作了决定性的回答。

他下令封闭“人道报”与“今晚报”，致使我们完全无法令人知晓我们的建议。

他禁止我们发布任何足以使舆论界弄清是非的消息。

他单独对我们实施新闻封锁。

而其他的人，那些希特勒分子，亚贝兹与布里农的僚属们，则能够毫无阻碍地继续其反法蘭西的卑鄙行为。

至于我们共产党人，却被人扼住了脖子。

莫里斯·多列士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共产党议会党团的一次重要会议上曾经指出：

“在慕尼黑会议一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又重新面临着随时可以把人民拖入战争的局势。

“永远贪得无厌的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是人类安全的经常

威胁。

“怎样才能制止一切新的侵略呢？”

“苏联是忠实于和平政策的，它采取了瓦解侵略者集团的政策。这些侵略者是在反对共产国际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

“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已经挫败了慕尼黑计划。

“如果希特勒不顾一切发动战争，那么他就会知道，站在他面前的将是以共产党人为首的为了保卫祖国安全、保卫人类自由与独立的团结无间的法国人民。

“这便是为甚么我们党赞同政府所采取的保卫边界的措施，赞同在必要时给予可能被侵略的国家和与我们缔结同盟条约的国家以必要的援助的缘故。

“正因为我们关怀和平，关怀法国的安全，所以我们拥护订立法英苏同盟条约，而这是完全可能与必要的。

“一个这样的同盟条约将有力地补充目前仍然有效的法苏互助条约<sup>⊖</sup>并使之更具体化。

“在这种严重的局势下，共产党人号召全体法国人民团结一致，由于这种团结，法西斯战争挑拨者将不得不让步。”

共产党议会党团同意多列士的分析，并且明确表示了它顽强反抗任何侵略的意志。

共产党议会党团根据多列士的建议宣称：

“为了保卫自由、民族独立、民主和文明的原则，所有共产党人将坚决站在抵抗希特勒法西斯侵略的最前线”。它向“所有应征入伍的劳动者，以及那些被动员起来武装保卫祖国、保卫祖国的荣誉和自由的共产党员致以兄弟般的敬礼”。

在横蛮无耻的法西斯侵略面前，共产党议会党团各成员，

---

⊖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签订于巴黎。——译者

过去和現在始終是最有遠見、最堅決的反對者。共產黨議會黨團宣布：“共產黨人將是祖國安全與獨立的最好的捍衛者。”

但是，达拉第政府使用一切手段阻止多列士的聲明及共產黨動人的愛國主義號召的發表，並對我們發動了一個造謠誣蔑的可恥運動。

在他們御用下的整個新聞界——因為“人道報”、“今晚報”和所有的共產黨報紙終於都被勒令停刊了——從來沒有用過有力的字句去攻擊希特勒匪徒。對新聞界講來，敵人是我們的盟友蘇聯。

第五縱隊的代理人，未來的合作分子和貝當的走卒們，可以不受制裁地繼續進行其卑鄙的叛國勾當，而共產黨人，也就是說那些一貫堅持不渝的反希特勒反法西斯的人們則被追捕、陷害、審訊、判罪並投入監牢。

甚至還在戰爭發生以前，达拉第政府即在巴黎與各省下令搜查法國共產黨的一切機關，並在各地開始了大規模的逮捕。

那些替政府服務的報紙，從“人民報”、“巴黎時報”、“每日報”到“晨報”，一致認為政府是太溫和、太怯弱、太仁慈了。它們每天都催促政府對它們所謂的“共產黨的陰謀活動”進行更凶狠的迫害。

达拉第和他的政府聽從了他們。

一位社會黨議員甘松在其致內閣總理的一封信中表示了他強烈的不滿，他認為达拉第太軟弱了。他寫道：

“我請求您，內閣總理先生，立即禁止共產黨的一切活動。”

那些反動透頂的家伙們立即竟起附和贊成這位社會民主黨人，慕尼黑分子與不干涉主義者甘松的請求。

雷納·杜莽齊、夏爾·伊斯納這兩個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法西斯暴動的參加者，代表所謂“共和聯盟黨議員團”表示欣然同意議員甘松的倡議。他們向下院提出一個決議草案，請求政府立即解散法國共產黨。而對於希特勒這個強盜和他的同謀犯戈林與戈培爾則反而一字不提。

按照這些未來的通敵分子、這些不久將要成為竊國大盜貝當的走卒的風雲人物的看法，非法的是忠誠正直的法國共產黨的鬥士。

然而，法國共產黨卻正在履行其對祖國的義務，履行其作為工人階級與法國人民代表的義務。

它正使用一切辦法，以求把法國從政府禍國殃民的政策所招來的慘禍中拯救出來。它指出了救亡的道路。

但是，政府所要迫害的卻正是而且僅僅是法國共產黨。

同樣，我們願意再一次強調地指出，在宣戰之前，甚至在宣布戒嚴令之前，加來海峽省的共產黨議員西普連·基奈便被捕下獄了。政府事先並未向議會作任何撤銷其議員特權的請求，並未召集依照議會組織法所規定的專門委員會加以討論裁決，也沒有經過下院公開會議的討論。此後基奈便未從獄中出來。希特勒的黨衛軍在獄中找到了他，把他帶到了德國的一個集中營，並使他在極端殘酷的磨折下慢慢死去了。

與此同時，加來海峽省里耶凡市長共產黨員梯波爾也被捕下獄了。

全國有幾百人被逮捕，他們的罪名、唯一的罪名是：他們是共產黨人。每一次有人被捕，報紙上便大聲叫喊：“勝利！”

資本主義社會的忠實代理人勃魯姆在“人民報”“阿拉斯新聞”的標題下寫道：

“阿拉斯市預審推事德瓦特先生已將下院議員共產黨員

基奈和里耶凡市長梯波爾先生依法收監，並且已將阿拉斯共產黨支部書記雷納·康帆交給軍事當局處理。”

那麼“人民報”所指的那個“名叫康帆”的人究竟是誰呢？他是一位被排山倒海的信心所鼓舞着、被不可形容的熱情所激動着、隨時準備為保衛本階級、黨和祖國而犧牲一切的熱情的共產黨員。他就是後來游擊隊里的包杜安上校。他的兩個兄弟也在艱苦的解放鬥爭中英勇犧牲——被希特勒野獸們槍殺了。

达拉第政府奪去了法國許多年輕、熱情、聰明和積極的優秀戰士。反動派則大捧其場，向政府高聲叫“好！”與此同時，依照格倫巴哈社會黨議員和其他集團的議員的請求，共產黨議員被排斥於議會各委員會之外，而這是對議會組織法的蔑視和對憲法的破壞。

然而，法國共產黨並不肯任人擺布，它不低頭、不屈服、不動搖，一直堅持其明智而有遠見的政策。

無論暴風雨般的誹謗也好，驚濤駭浪似的迫害也好，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使它改變它的行動路線。

因此，當九月初政府為了國防問題舉行信任投票時，共產黨議會黨團全體出席並投了信任票；並且利用這一機會要求停止非法迫害，結束專制統治，恢復共和國的各种民主自由，尤其是出版自由，並團結全國一切有生力量。

法國共產黨遭受着迫害，但是它的戰士們卻站在戰爭的最前線，成為同胞們在愛國主義與忠勇無私方面的輝煌表率。

以多列士為首的应征入伍的法共議員在部隊里履行着他們作為法國公民的義務，他們共同為祖國增光。但是，頑固、仇視和挑釁性的瘋狂迫害却仍然有加無已。

希特勒發動了侵略。他侵入了被貝克上校及其黨羽所出賣了的不設防的波蘭。他像阿梯拉<sup>①</sup>一樣，毀滅了進軍途中的一切。但張伯倫與达拉第却毫無反應。他們放任不管，連向魯爾區的克虜伯工廠扔一枚炸彈都不干。

因此，希特勒得以摧毀波蘭，並進而準備用其摩托化師團進攻荷蘭、比利時和法國，而張伯倫和达拉第依然毫無動靜。的確，达拉第這時也在進行戰爭，只不過他是向法國人民開火而已。

达拉第抓到了很多俘虜，但這是些法國人。他們的罪名只有一個，那就是永遠不變地忠實於他們的黨與祖國。這些人不是曾經勇敢地指出過，除了聯合偉大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以外，再沒有其他保衛法國的方法嗎？但他們所得到的卻是嘲笑、詆罵和死亡的威脅。

賴伐爾、陶里奧、布里農、龐納之流及其走卒們，盡都大權在手，高視闊步，受到人們的逢迎。

而另一方面，報紙上則要求用囚車、斷頭台和槍斃來對付共產黨人。

达拉第在作戰，但不是對希特勒作戰，而是對法國人民和法國共產黨——一個代表將近一百五十萬選民的政黨作戰。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五日，达拉第下令宣布解散法國共產黨。所有的反動派都手舞足蹈地歡呼：“勝利！”“勝利！”达拉第終於也獲得了一個偉大的“勝利”。

在那群搖旗吶喊之徒的前列裡面，當然有勃魯姆。他在“人民報”中恬不知恥地寫道：

“我認為我們黨的大多數人都將感到解散法國共產黨是

---

① 匈奴人的首領，五世紀時曾侵略歐洲多數國家。——譯者



很自然而且合法的。”

但是，他比他的党羽走得更远一些。他煽动迫害，以他特有的狡猾而伪善的态度要求杀害共产党人。

正如惯常一样，他替人民的敌人和纳粹匪徒磨礪武器。

然而，我們依然毫不屈服，毫不动摇。

对于政府禁止我們党的非法手段，我們党提出了严正的抗議。

它宣布：“我們以祖国的旗帜所象征着的自由与人类尊严的理想的名义，对政府的决定提出严重抗議。这一决定違反了共和国的精神，違反了法国的民主傳統，違反了今年七月十四日我們还在紀念它的一百五十周年的法国一七八九年大革命时的‘人权宣言’。

“与对待二月六日的暴动者、‘法德委员会’的委員和亞貝茲的代理人的仁慈成为鮮明的对比，这是第一次采取如此專橫的手段，来对待一个贏得大部分工人階級和法国人民的尊敬与信任的政党。

“解散法国共产党必將被所有反对民主的敌人所利用，以便試圖把遭受法西斯奴役的人民維持在奴隶的状态和阻挡社会的进步。

“我們以法国人民代表的身份，坚决表示我們的滿腔憤慨，我們深信这种憤慨是全国人民所共有的。”

与此同时，我們永不疲倦地大声疾呼，明确指出法国和苏联結成真正联盟的必要性。

至于慕尼黑分子与未来的維希分子則盛怒無边，他們一見到理直气壯的共产党人始終坚持斗争就感到惱火。

当然，法国共产党是被解散了，被禁止活动了。但是，內閣总理的一紙簡單命令是不能摧毀一个在法蘭西民族中根深

蒂固的政党的。

法国共产党繼續存在、繼續活动和战斗着；“人道报”以一种秘密的形式繼續出版，共产党議會党团改組成了“工农議員团”。

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我受工农議員团的委托，以其总書記的身份，写了一封此后成了历史文件的信給下院議長赫里欧，要求他召开議會，以便討論严重的和平問題。我們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不可推諉的义务这样作。

于是，这便激起了潮水一般的辱罵。

勃魯姆在他的报纸上写道：

“当一位朋友从电话中把共产党議員致赫里欧的信件念給我听时，我在听过兩句之后便制止了他。我感到噁心、不能再听下去。”但是，当他贊同灾难性的“羅馬协定”、貽害世界的干涉主义以及出卖友邦的慕尼黑协定时，这位社会党的領袖却没有这般噁心，那时他的胃口比現在好多了。

在勃魯姆的示意之下，所有的报纸一致环繞着反动政府所出的反共这一題目，开始驚張地大做其令人作嘔的文章。

在政府各部的接待室中，在編輯室內，在二百家族的客厅里，到处都重复着同样的叫声：“应该对共产党議員加以法律制裁！”

几天以后，达拉第命令議會閉会，并着手逮捕共产党議員。

然而，在这种迫害势力进攻的面前，我們难道会像逃兵与胆小鬼一样，殭蚕、沉默、毫不反抗嗎？决不会这样！

假如我們的态度是如此怯弱，那么我們將辜負人民的信任，我們將引起所有公正人士的鄙視、憤慨和忿怒。

我們不能这样作。

我們的任務正是要排除萬難去堅持鬥爭；而為了做到這一點，就應該尽可能保全黨的組織，使它能在反抗侵略者和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中盡它作為一個政黨所應盡的頭等作用。

我們的任務正是要採取一切足以保證法國共產黨領導的安全和繼續其活動的辦法，並保證負主要責任的同志的自由與生命。

因此，當議會閉會和逮捕共產黨議員的命令在“政府公報”上發表了的時候，法國共產黨的領導就作出了英明的決定，使黨的總書記多列士轉入地下活動。

假如沒有採取這一及時而正當的決定，法國將會失去一位偉大的爭取自由民主的戰士，因為他將會同其餘的共產黨議員們一樣被投入監獄，因而無法參加爭取法國獨立的戰鬥。

正如雅克·杜克洛和貝諾瓦·弗拉商一樣，多列士從此走上了黨所交給他的困難而光榮的崗位，領導了法國的抵抗運動。

他工作得不愧為工人階級的、法國人民的和共和國的偉大的黨的領袖。

那些在敵人面前曾經溜之大吉並出賣法國的慕尼黑分子、維希分子和其他的合作分子們，居然敢說甚么“一個領袖不應該在其部下遭受危難的時候溜走。”

這些偽君子想以此中傷我們作為一個法國人的榮譽。但是，這種意見並不足以難倒我們，我們認為這種意見是正確的，這正是我們的主張。多列士一生是堅定和不動搖的，為了民主、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反對人民的敵人、反對法西斯主義及其同謀者，他始終堅守他的戰鬥崗位；假如多列士不曾冒着自由與生命的危險，站在那些被陷害和被追捕的同志們的前

面，并机智地指导反对慕尼黑分子和卖国贼的残酷斗争，他倒真会成为逃兵和胆小鬼；而那些慕尼黑分子和卖国贼在把法国引入深渊之后，却把国家手足并缚地交给了希特勒野兽。

就这样，多列士不愿那些祖国的葬送者枉费心机的诽谤，勇敢地完成了他的任务。他没有逃亡，他继续在战斗。

至于其他的人，那些慕尼黑分子，未来的维希分子，却作了逃兵。法国人民看透了这些逃兵们的罪恶勾当。谁是逃兵？是那些想尽方法宣传宁愿做奴隶而不愿死亡的主张、并以其卑鄙齷齪的反苏反共战争、以其祸国殃民的政策替法国人民准备了奴役和死亡的人们；是那些与张伯伦、达拉第一道在慕尼黑制造了可鄙的反民主和平的阴谋并助长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人们；是那些此后听任希特勒侵略军队任意横行，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给予希特勒以欧洲堡垒底钥匙的人们；是那些从一九三九年三月到九月破坏了英法苏谈判和苏联关于建立和平阵线的建议的人们；是那些以其罪恶性的顽固态度坚决拒绝了苏联军事代表团所提出的战略上的合理要求的人们，因为这些人希望把希特勒德国导向反苏反民主的战争；是那些不向希特勒作战却反而向法国人民作战、破坏法国经过百余英勇斗争所获得的传统的共和国自由和民主的人们。这些人、这些家伙才是真正的逃兵。

至于共产党人，他们继续坚持斗争。但也知道应当经常防范，保持高度的警惕。

警察别动队四处巡逻，企图发现并逮捕共产党人。他们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四处搜寻着；但我们却在巴黎，在巴黎市的中心区。

通过卡德拉斯和达黎代，我与党的领导保持着正常的联系。卡德拉斯后来在执行一项任务时的某一天被希特勒的秘

密警察捕获送到德国苦难营去了。达黎代则在受尽苦刑之后牺牲在纳粹匪军的枪弹之下。

通过他们两人，我与弗拉商起草并讨论了将由我在十一月三十日召开的下院特别会议第一次大会上发表的发言提纲。

为了把这一困难任务的每一细节最后安排妥当，来回往返费了整整一星期的时间。

在我去议会的前夕快八点钟的时候，卡德拉斯来看我了。她开头第一句话就是：

“我们出去散散步。”

“呵！干吗？我没时间。明天的講演有几段还要复看一下。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可能发表它，我同样不知道在到达波旁宫<sup>⊖</sup>以前我是否会被逮捕。不过这没有甚么关系，我愿意准备得周到些！”

“同意，同意，但是等你回来再搞吧！走，我们出去。这是一樁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包你满意。但是等一下。”

卡德拉斯走出去，几分钟后她回来了：

“一切都很好，没甚么引人怀疑的跡象，馬路上沒有人。”

于是我们出去。在街的尽头我们向右轉，一百多公尺远以后又向左轉，从桥下经过，左轉弯然后笔直走。

我们一共三个人，手挽手走着，誰也不講話。在一座別墅前停了下来。卡德拉斯以約好了的方式按电鈴。門輕輕地半开了，露出一綫光亮和一副女人的面孔来。

“是你嗎？”

我們走进去。我听到一个人在說：

---

⊖ 即法国议会所在地。——譯者

“是你嗎，弗洛里蒙？”

有一个人从房間里走出来，伸出双手。原来是蒙慕梭。我們互相擁抱着，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我們用手拍着彼此的肩膀。最後，我們終於克制住了這強烈的感情。多少回憶從這溫暖的兄弟般會見的一剎那湧上心來啊！

“跟我來。”

餐廳里桌子已擺好，這是告別的晚餐，是戰鬥前夜的團聚。我們挑起了共同的回憶：回想起諾爾省和加來海峽省的大罷工，黨代表大會，中央委員會會議以及我的銘言：“大丈夫要能屈能伸。”

不久以前，我們在都爾共同舉行過一次盛大的聚會。我們又怎能不想起都林省美好的白葡萄酒呢？那時我們圍坐在第埃爾著名的葡萄農員納爾老伯的餐桌旁邊，首先舉杯欣賞鑑別一番，然後一滴滴地品味着。

明天，對，明天，這將是一個戰鬥的日子。

但是那些處於地下的諾爾省和加來海峽省的孩子們，那些巴黎、聖安東尼區與整個法蘭西的孩子們，他們不也在戰鬥嗎？他們不永遠是在戰鬥嗎？

餐桌上很活躍，充滿了愉快。我唱了一支“小甘甘”歌，每人都講述着自己的故事。蒙慕梭也講了。

我們開始吃咖啡，喝布哥涅酒。而二十年前，當多列士和我，每逢星期三把諾爾省和加來海峽省的共產黨周刊“囚徒”編排好以後，走出“北方的覺醒報”印刷所時，便只能喝喝阿茫梯耶出產的蹩腳酒。晚餐結束了，絲毫沒有淒涼之感。在我們每個人腦子裡只有一個思想，那便是每個人應當在自己的崗位上為人民、為法蘭西進行戰鬥。明天，有人將出發履行他的義務。他還能回來嗎？而出發的是誰呢？人們不能確切地知

道。但這沒有多大關係，反正要出發的是一個共產黨員。

分別的時刻到了。還沒有，首先還有一樁細致的工作要做。一位女同志站起來。她叫路易絲·馬家杜，布列塔尼人，後來也嘗盡了流放的苦楚。她向蒙慕梭說道：

“請坐在这把椅子上。”

他坐上去了。一條毛巾圍在他的脖子上，於是一、二、三、四、五，几下子這位女理髮師便完成了任務。蒙慕梭長長的鬍鬚沒有了，全部落在地上。這真是一個犧牲！

蒙慕梭笑了笑，他是絕對不會被人認出來的了。從此他可以在法蘭西的首都散步，周遊各省，執行法蘭西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各種任務。誰還能認識他呢？沒有任何人。

我們互相告別。在過廳里待了一會兒。這是沉重的時刻。我和兩位主人握手並擁抱蒙慕梭。

在戶外的黑夜里，現在只剩下我們三人：卡德拉斯，馬家杜和我了。我們從原路走回。我們沉思着。

我想起了我妻子，我女兒馬格麗特和我的兒子塞爾吉與皮埃爾，他們兩人已經應征入伍，正在前綫履行他們的義務。明天，我就要履行我的義務了。

### 第三章

##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在下議院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下午七时，我被关在桑台監獄了。

我之所以被非法地監禁起来是由于我在議會中的言論和行动，这种言論和行动是受議員特权的保障的，因而这是对共和国宪法的當場破坏。

我不仅既無恐惧也無怨言，而且我还因为卓越而勇敢地履行了作为一个議員、作为一个共和国公民和法国人，以及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而感到驕傲。

当天早晨我到議會去履行的这项义务，同时也是我的不可侵犯的权利。

事实經過是这样的：“政府公报”上發表了召集議会的命令，議會特別會議開幕了，議程包括外交政策方面的重要問題，預算方面的困难以及各种內政問題。

由于我是被光荣的聖安东尼区(从民族廣場起到巴士底廣場止)九千多选民所选举出来的，我有权利参加一切公开或秘密的辯論并發表意見；有权利对于內閣总理宣讀的內閣宣言，对于法律草案，对于各种性質的外交活动，对于已經締結的各种条約、公約与协定，也就是說对于政府一切政治措施上的大小問題表示我和我的朋友們的意見；最后我还有权利参加一切投票并运用表决权裁决一切辯論。



然而，他們竟不顧憲法所規定的人民的最基本的權利，破壞議會組織法，用粗暴的驅逐與非法逮捕的手段，橫蠻地阻止我行使這種權利。

一八七五年七月十六日頒布的憲法第十三條中明明白白地規定有：

“上下兩院議員在行使其職權時不得因發表言論或進行投票而受到控告或追究。”

同樣，在議會組織法中也曾規定：

“議員在議會範圍內不論犯任何罪行，倘未經議會議長或議會調查委員向總檢察官告發，不得被控訴。”

但是，我並沒有犯任何罪行，議會調查委員也沒有依法提出控告，因而我是享有議員特權的。

所以從會場中被驅逐與被逮捕這樁事情，事實上是對法律的當場破壞，對議員特權的無恥侵犯。

無論任何個人或團體，誰也沒有權力剝奪我由普選所得來的出席議會並為我的政綱和信念作辯護的權利。更無權決定將我逐出議會並加以逮捕。

十一月三十日，法國已經不復有民主制度存在，所有的只不過是專制政治和獨裁意志而已，而御用議會却俯首貼耳地順從着這種獨裁的意志。

刑法第一百二十一條規定：

“所有司法警察人員，高等和初等檢察官、代理檢察官以及審判官，倘不經國家法定之批准程序，竟對政府部長或議員提出、發布或簽署對其個人進行控告之判決書、命令或傳票時；或除因現行罪及激起公憤之行為外，不經上述批准程序，即對一個或幾個政府部長或議員發布或簽署逮捕令與拘票時，均將以瀆職論罪而受降職處分。”

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并規定：

“凡政府公務員、辦事員、專員命令他人或親自作出有損一個或數個公民之自由與公民權或有損憲法之專橫行為者，均將受降職處分。”

法律的規定是絕對清楚的，毫無任何含混之處。然而被控告、逮捕和下獄的並不是那些罪犯，不是那些破壞憲法、法律和議會組織法的人，而是我——一個正在合法地履行他的選民的委託的議員。我居然被逐出議會、被拘捕下獄，此後還被處五年徒刑和五千法郎的罰金，并被剝奪了公權。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召開議會的命令中規定開會時間為上午九時半。

頭天晚上，我與達黎代和卡德拉斯最後一次估計了一切可能發生的事情並作出最完善的準備，以便能成功地完成我的任務。我曾經想到，如果我在議會開會時準時到達，我將在議會的走廊上碰到議員、議會辦事人員和維持秩序的首都警備部隊，並且我將立即被他們包圍、抓住而落入警察的手中。

因此我決定到得晚些，準備在九點四十五分闖進波旁宮。

我設想這時內閣總理早已登上議會講台，而那些渴望聽他的發言的議員們也已經全都坐好了。

但是，當我到達議會附近時，迎面碰到了一大隊警察。

我坐在車上，滿布街頭絡繹不絕的警察崗哨在車前閃開了，沒有一個人向我要證件。

但是，我們愈接近波旁宮，崗哨就愈多愈密，布哥涅街的入口處名叫諾瓦爾門的地方，有三十來個司法警察把守着。如果我把車停下，他們一定會在我下車時“迎接”我。車繼續開往布哥涅廣場。議會大門口聚集着無法穿過的黑壓壓一大群警察；大學街一百三十八號議長辦公室入口處也是同樣幽

暗的情景。

簡直沒有辦法，只得繼續開往安伐麗德街和外交部街。打從正門進去是不必妄想了，那兒為我安排好了一切警察措施，成群結隊的警察和便衣等在那兒。

怎麼辦好呢？再兜一個圈子來找一條門路吧——找一條不是為了逃跑而是為了深入重圍的門路。一切努力都失敗了。時間飛快地滑了過去，已經十點鐘了，議長赫里歐宣布開會已半小時，然而我仍然得等待時機。

難道我竟不能完成黨領導所交給我的光榮任務而被迫還家嗎？不能夠，我應該作最後的努力。

不管怎樣，在無法進入波旁宮的情況下，我決定在正門前面下車，向那些正在旁聽入口處排隊希望在議會旁聽席和走廊里找到一個位置的來賓們發表演說。

幸運的是警察們的注意力隨着時間的過去而減弱了，當我第三次經過布哥涅街和大學街時便完全看出了這一點。警察們不再成群地塞在各個進口，他們分成很多小組，很興奮地高聲談論着。

現在是十點零五分，時間已經很晚了。他不會來了，沒有人會來了。這個“他”，這個“人”，是指共產黨的代表。白白動員了一場。警察們是否這樣想我可不知道。不管怎樣，反正我要抓住這個機會。

我命令司機杜開諾瓦——由於他年紀很老，我們常叫他“老伯”——重新開往波旁宮去。我叫他再一次經過布哥涅街，沿着人行道走並且開得慢一點。

我叮囑他不要停車，並且告訴他如果入口處沒有人把守，我要在車子行進中下車。

情形果然這樣，警察們在門的左右方分成兩組。在車子

行进时下车的动作非常成功。我迅速地闖进了議會內部，大踏步走上樓去。在走廊上以及小組會議室里一个办事員或議員也沒有。

我脫掉大衣，把它挂在衣架上；然后进入會場，走向我所在的那一排，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我的座位旁边是加斯东·高納凡，他是在几天以前，由于法医保罗的建議才从獄中被暂时釋放出来的。

这时那般胆小如鼠的狐群狗党——从那些反动透頂的派別到加普隆的叛徒小集团底狼狽情形，我留待讀者自己去想像吧。

我的到来使全場大为哄动，这簡直是一樁既奇怪又使人惊駭的事情。內閣总理在講台上，他在宣讀他的声明。

但已經沒人听他的發言了。台下發生了習慣所謂的“自由活动”。發言人因此感到很狼狽，他問發生了甚么事，为甚么喧嚷。議員們互相觀望，做着手势，彼此詢問。有的对我指手画脚。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泰然自若。于是右派立即請求內閣总理中止發言。达拉第先生回过头来看見了我，于是便一声不响了。这时掀起了狂風暴雨似的謾罵和恐吓。但这都沒有而且也不可能伤害到我。

霞普先生和他的工業金融貴族与大地主階級的朋友們，以其流氓姿态和乱闖闖的叫罵而显得特別突出。他們瘋狂地要求立即把我逐出會場。我起立發言，坚决而有力地要求他們尊重宪法。我出席議會的权利是任何人都不能剝夺的。

作为一个議員，我有权代表我的选民，代表一百五十万贊同我的政綱的法国公民說話，以保衛我們国家的利益；我有权在議會講台上闡明共产党的政策，唯有这种政策能保証法国获得公平与持久的和平，并保障它的自由、安全、独立、繁荣和

幸福。

但是，右派分子企圖用咆哮与詬罵来压倒我的声音。他們全体起立質問議長，并責令議長把我驅逐出去。

赫里欧先生有义务在这班瘋狗面前保护我，有义务使他們尊重議會組織法，有义务使这些搗乱分子遵守秩序并保障我的議員权利。

他請求大家肃靜，并揮动右手表示他要發言。他从座位上站起来面向着我，宣布我的出席議會是一樁荒唐無耻的事情。我反駁說他自己的發言才真正是荒唐無耻，而我現在出席議會則是我的权利。我向他請求發言以便进行答辯，因为我是当事人。

議会有义务听我發言。于是我从口袋里拿出准备好了的政治宣言，并且用足以压倒那些盛怒的議員們的咆哮的嗓子高声朗誦起来。

議會行政处負責人首先發难，畏怯地向我扑来，企圖从我手里把文件搶走。我强有力地抗議这种应受譴責的不可容忍的举动，这种举动应当受到議長的严厉制裁。右派得到了鼓励，繼續进行謾罵。而在所謂左派的議席上，則不仅对这种反共和主义的令人噁心的情景一語不發，也沒有制止的表示，并且还参加了这场反动的叫囂。內閣总理背靠着講台，默不作声。

赫里欧先生于是在瘋狂的議会的命令之下，揮动手势下令把我驅逐出去。

十几名議會办事員向我扑来，后面跟着一群胆小的資本代言人。他們企圖用暴力把我拖下座位并闖出門外。

我傾全力反抗，紧紧抓住座位，高声号召議會內还可能存在的共和派和民主主义者起来反对这种違反宪法的举动，反

对这种破坏共和国法律的行为，反对这种只有在帝制时代才会采用的可耻手段。但是，誰也沒有甚么表示，沒有任何人提出抗議或企圖干涉。

我孤立無援，仅仅和病弱得非常厉害的高納凡一起反抗所有的人。

当我被他們从座位上拖开以后，我抓住了欄干。但是，在行政处負責人和办事員的推、拖、冲撞和某些議員的毆打之下，我被弄得衣履不整，終于被他們拖出了会场。負責維持秩序的衛隊長立即下令把会场守衛起来了。

一九三九年的这个集会已經不配称为議會，因为它既沒有很好地遵守最基本的正义原則，也沒有忠实执行共和国根本大法的任何条款，它不仅容忍、允許、而且要求把它的成員驅逐出去。

每个議員都代表着整个国家。任何阻碍議員行使其职权的行动都將伤害到国家整体。

从一个議員可以因他在議會中的活动受到追究的一刹那起，这些活动就不再是自由的活动，因而議會也就不再能忠实地行使它的职能了。

如果反动派、人民的敌人和政府可以单独凭其独裁意志就把議員中的某一个人乃至整整一个議員团排斥于議會之外，使不能参与立法和表决，那么議員的立法特权还有甚么用处呢？

国家不再可能有議會监督，不再可能有議会对国事的指导权。

所以当議會中最强有力的一个組成部分被剝夺以后，一九三九年的法国議會便成了一个可憐的諷刺、一个百分之百的虛構体，它只配用来卖弄玄虛，欺騙輿論，并且把陰險的反

动独裁政府对人民的所作所为，用民主外衣掩盖起来。

像这样一个议会所讨论和决定的一切都将是无效的，因为自从共产党议员被关到桑台监狱以后，他们已被非法剥夺了参与议会的权利，不再能用他们的言论、计划、建议和表决权去影响议会的讨论了。

而假如这些共产党议员还留在议会的话，谁敢预言他们的发言对于舆论界、对于那些不管属于何种党派和具有何种哲学与宗教信仰的全体法国公民及选民群众，不会发生重大影响和引起他们的注意呢？

议员在议会的辩论是公开的，他们的报告的速记记录每次都全文发表在“政府公报”上。因为按照立法精神，人民应当熟悉议会的内部情形，以便掌握情况进行判断，否则就不复有民主制度的存在，所剩下的只不过是民主的讽刺和伪造罢了。

但是我的发言没有在“政府公报”上刊载。我的发言受到非难。下院议长在议会秘书处的共谋下用“邦特先生曾经发言，但未送到秘书处”的虚伪报道，掩盖了这种又一次破坏法律的行为。

当天早上的非法行为还不限于如此，他们后来并且还逮捕了我。

就在议会内部，我被一些手中并无拘票的警察抓住了。

而且即使他们带着拘票，即使他们能够拿出拘票来，他们也没有权力来抓我，更不用说把我投入监狱了。因为议会特别会议正在开会，我应该受到议员特权的保障。

政府不尊重议员特权，那它就犯了滥用职权的错误。它的行动便超出了它的权利范围并违反了全民意志。这是一种独裁暴戾的举动。它将导致腐化、恐惧、怯弱和松弛的流行。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議會會場里發生的嚴重事件和我在議會門口被捕的事實，無可否認地証明了我們此時正是面臨着這樣的局勢。

自十月以來，所有忠實于他們的理想、他們的黨、他們的職責和他們的選民的共產黨議員，都在違反憲法的情況下被監禁、通緝或被迫轉入地下活動了，因而他們都不能出席議會。如果人們沒有忽視上述事實的話，那麼每一個正直的法國公民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一九三九年，法國已經不復有民主共和的存在。

所有的只不過是反動派的獨裁；只不過是一個替人民的敵人服務的政府，一個專事破壞由共和主義者經過好幾代頑強的鬥爭所得來的一切民主自由的政府；一個早已準備好替維希政府的老混蛋作踏腳石、並以其可恥的叛國勾當替希特勒怪物效勞的奴才議會。



## 第四章

### 从議會到法庭

一輛汽車停在大学街离下院議長办公室正門不远的地方。

逮捕我的三名警察將我押进汽車，被安置在后排座位上。一名警察和司机在一起，坐在前面，其余兩人坐在后面，我坐在兩人中間，被严密地看守起来。

汽車开动了，在兩百多公尺远的地方，在位于布哥涅街議會会财务处进口正对面的安伐丽德区和軍校区警察局前停了下来。

我被帶进局長室。房間里沒有人。我閱讀着当天还没有時間过目的报纸，足足等了一个小时。从报纸上知道那毫無骨气、自高自大而又卑鄙無耻的季通已經叛变了。

終于另一名警察給我帶來了拘票。原文如下：

“巴黎警察总局，B·S·二二八一号，司法警察科轉抄初审法庭拘票副本：茲命令全体法院办事人員及公安人員將弗洛里蒙·邦特依法拘捕归案訊办。該犯現住瓦萊斯街七号，罪名为違反解散一切共产党組織的命令。执行本令时，如持令者認為必要，并希各公安負責人員予以协助。特此签名盖章。签名：寻午区軍事法庭預审推事馬沙克，一九三九年十月六日于巴黎法院。”

警察通知我到司法警察科，去見巴黎寻午区軍事法庭預

审推事馬沙克上尉。

几分钟后，坐在警察总局黑色六座、司机座位与后面隔断的汽車里，沿着塞納河，經過外交部街車站，最后到了俄費佛滨江路三十六号。

来到四層楼上，一个警官等在那兒。他盤問我的身份，我說了。接着他們將我衣袋里的东西全部搜了出来，开出一張清單。

其中兩份文件特別引起警察們的注意：一份是我在議會只宣讀了前几頁的演講稿，另一份是一張兩頁四开蠅头小字秘密出版的一期“人道报”。

演講稿分析了全国政治、經濟与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指出了政府对人民群众所采取的各种鎮压措施和侵犯民主权利的行为，并叙述了劳动人民的要求和政治活动。

演講稿中举出了我为什么要在今年十月一日代表共产党議員致函下院議長，請求在議會中公开討論和平問題的理由。

演講稿有力地揭露了各方面所表現的短見、無能和政府工作中的混乱情况。并且对于政府反民主的迫害措施和給予希特勒第五縱队以种种便利的行为加以严厉斥責，并請求釋放所有被捕下獄的共产党議員和斗士。

演講稿中提出了共产党的正确建議：要求政府倚靠苏联的力量，以便获致公平合理的持久和平，保証法国的安全与獨立。

演講稿的最后部分有力地号召法国人民为爭取已失去的自由权利、为組織一个与共和国实質相符的政府机构而起来进行斗争。

秘密出版的“人道报”深深引起了警察們的巨大好奇心。他們把報紙手傳手地閱讀着，审查其中的意义，并且非常仔細

地加以观察。

“人道报”在宣战前一星期就已经被迫停刊了，但居然现在还在继续出版。警察们惊奇到了极点。这样精美的印刷，加上报纸质量和版面形式的良好，简直教他们赞赏不已。

我要求收回这两份文件，但被拒绝了。

身份登记和开列被没收物品的清单足足花去了一个钟头。最后，警官想起来：还应当把拘票执行的情况登记起来。

两个警察带着我，穿过司法院的一个院子，到了拘票登记处。这是一个大而且长的四方形房间，中间有几张大桌子，沿墙书架上放满贴着绿色标签的档案材料。几个录事在这里、那里地聊天。

值班员看见我们进来似乎不大高兴。

“是送交军事法庭的吗？”这不关他的事。于是送我来的两名警察和这位司法警察科的职员激烈地争辩起来，彼此不大客气，甚至有些粗暴。谁也不愿意让步，不愿自找麻烦去向有关部门索取登记入案所必需的材料，或者去请求批准登记手续。话说得不少，可就是没有人动身。

最后，送我来的警察终于有一个抽身出来，穿过长长的房间，从一个门口走了出去；十分钟后，带着拘票应予登记入案的命令回来了。

办好手续后，两名警察带着我走向一条宽敞的走廊的尽头，到预审推事的办公室——小预审室去。

我被带进了办公室。这是一间陈设简朴的普通房间。看来好像是临时驻扎处的军官指挥所。一张简简单单的桌子，上面堆着一些废纸。

我第二次被查问身份。录事记录着。对于预审推事的讯问，我表示除非在辩护律师面前，不愿意对这些不合理地责难

我的事实作任何答复。

我指出我的辩护律师就是維拉尔先生。

預审推事讓記下来。录事記錄下来了，然后将記錄冊上的空頁划銷，給我在最后一頁的下面簽字。我拒絕了，并且举出为什么要拒絕的理由。

我提出議員特权的問題，并且提請推事注意下面这件重要的事实：議會正在开会，而我在当天早晨到会，因此我的被逮捕与拘留是橫暴無理、違反宪法的。我根据法律，要求立即恢复自由。

馬沙克上尉命令录事將我的抗議記錄下来。我將記錄全文复看了一遍，然后同意在上面簽了字。

可是，預审推事竟決定將我临时監禁在寻午区陸軍監獄。我再一次提出抗議，理由是：第一，假如我应当被監禁，就应当監禁在桑台監獄，和那些从十月八日以來便已先后被專橫拘禁起來的共產黨議員关在一起，而不是在寻午区陸軍監獄；其次，因为我根本不应当被監禁；恰恰相反，根据法律，应当恢复我的自由。

于是，再度展开了一場短兵相接的爭辯。我們回到議員特权問題上來。这种特权是我应当享受并应当保护我的，而預审推事所持的論点則与我相反。我告訴他，过去的全部先例都証明我是有理由的。

我向馬沙克上尉引用了皮埃尔律师的言論來作証，他在議會法方面的論著一向是被奉为权威的。我的論据是正确的，馬沙克猶豫起來，無論怎样处决，显然都使他感到頗費周折。他不敢負責，企圖將这种非法拘留的措施的重大責任推到別人身上去。

他說他要出去商量一下，只把我和录事以及兩個司法警

察留在房間里。他出去的時間相當長，討論得一定很費勁。

直到一小時以後馬沙克才回來。他告訴我由於我在抗議中提到議員特權，他認為自己不應過問我的事情，應當把我送還司法警察當局處理。在這種情形下，如果尚有正義可言，無論如何都應當恢復我的自由。可是，正義已經完全不存在了。下午兩點鐘左右，我又被非法帶到司法警察科去。

按照警察們的說法，我一直被“監視”到晚上六點半鐘。關在司法警察科的一間办公室里，“在理論上”我是自由的，既非逮捕，亦非拘留，也不是監禁，只是被“監視”。

為什麼會再一次等待這樣長的時間呢？因為政府需要爭取時間，使御用議會重新分配角色，在這出違反憲法的丑劇中加演一幕新的插曲。

這幕戲的情節大體是由內閣總理、下院議長和巴黎衛戍司令商量擬定的，主題是對我的非法被捕和橫被監禁給以形式上的法律根據。不過他們要達到這一目的，就不得不另外採取一次新的非法行動。

整個過程是這樣的：

巴黎衛戍司令埃林將軍受命向內閣總理提出一份呈文，請求取消下列議員的特權：邦特、卡特拉、杜克洛、杜迪佑、蒙慕梭、貝里、拉麥特、李加爾、多列士、狄戎以及因病而臨時被釋的高納凡。

接信後，內閣總理达拉第立即轉交下院議長赫里歐，請他馬上向議會提出取消議員特權的問題。

赫里歐決定照辦。

他宣稱：“我接受了准許逮捕某些議員的要求。”

他要求大會採取緊急措施，停止一切工作，立即討論逮捕共產黨議員的要求。

“沒有反对的嗎？”赫里欧按照慣例征求大家的意見。

沒有人請求發言。他宣布：“原案通过。”

然后大会宣布休会。

在休会期間，議會領導機構召开了會議，指定委員會，审查有关共产党議員的案件，起草报告，通知政府，并且作出决定。这一切都在兩小时之內完成了。

下午四点十分，大会复会。議長赫里欧向大会宣布：

“要求批准逮捕某些議員的通知，已經由特設委員會加以审查。現在政府根据議會組織法第九十六条，請求議會立即討論該委員會所提出的报告中的結論。

“在大会决定是否立即討論之前，我指定德魯峨先生發言，宣讀委員會的报告。”

德魯峨向議會說明：取消十一位議員特权的請求是巴黎衛戍司令在致內閣总理的信中提出的。

德魯峨用几句话把原信綜述了一遍，然后声称委員會一致要求議會接受信中所提出的請求，下令取消这一批議員的特权。

議長赫里欧征詢有沒有人反对立即进行討論。沒有反对的意見，討論立即开始。議長接着宣讀了下列罕見的条文：

“議會批准取消下列議員的特权，計开：邦特、卡特拉、杜克洛、杜迪佑、蒙慕梭、貝里、拉麦特、李加尔、多列士、狄戎、高納凡。”

請求發言的議員只有查維埃·瓦拉先生。他就高納凡的特殊情况提出反对意見：

“我对議長先生宣讀的最后一名提出不同意見。

“高納凡先生不应当再受这种法律处置。

“議長先生剛才宣布取消他的議員特权，然而高納凡先生

却是已經一度被控告，被監禁，並且由法院偵察庭裁決臨時釋放的。因此我認為沒有必要討論是否取消其議員特權的問題。”

就這樣，法西斯分子瓦拉對於取消埃林將軍信中提出的前十名議員的特權，毫無異議地加以贊同了；而對病況嚴重的高納凡被取消特權這一點，他却認為是多此一舉的怪事。

然而，馬上有幾個議員對他叫嚷起來：“當然還應當經過這層手續！”

對於這些中途插入的叫囂，瓦拉的回答是：

“不，不必要。他已經下過獄；並且，他這次因為健康而臨時被釋放是經過法院決定的。”

這時，另一個社會黨議員為了消除他的反動同僚虛偽的顧慮，起而發言。這是安德烈·勒特羅蓋。他向瓦拉叫喊道：

“要知道法院的決定是暫時的，因此是隨時可以撤消的！”

馬賽爾·埃勞起而助戰。他和勒特羅蓋一樣，贊成取消高納凡的議員特權：

“倘若高納凡此後濫用其暫時得到的自由，以致預審推事認為不得不再度予以逮捕時，而我們今天又沒有取消他的議員特權，那末就非經過議會事先討論與宣布取消其議員特權，便不可能予以逮捕了。”

接着他聲明議員們對於經常進行這類性質的討論毫不感到興趣，因而結論是：應該毫不猶豫，批准取消他的議員特權的決定。

這樣一來，高納凡在臨時被釋放後短短的幾天里，雖然並沒有任何過失，但因為假設有一天可能會有逮捕他的必要，於是人們就事先宣布了取消他的議員特權。

這真是無恥到了極點的橫暴措施。原條文被提付表決并

获得通过。下午四点十五分大会休会，前后历时共五分钟。

在五分鐘之內，下院批准了逮捕十一位議員的命令，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他們都是共產黨員。

在五分鐘之內，一群毫無國家意識、隨時可以賣國投降、以一切拱手讓人、並且可以干出任何無恥勾當的議員們，演出了這樣一幕丑劇。

討論的結果立即通知了預審推事。

預審推事的顧慮隨之烟消云散。法律手續總算是完備了！馬沙克在拘票上簽了字，時間是下午六點。一刻鐘以後，警察總局的汽車把我送進了桑台監獄。



## 第五章

### 桑台監獄里的普通罪犯牢間

桑台監獄敞開兩扇大門，讓警察總局的汽車駛了進去。

由兩名警察左右挾持着，並在一名看守長和幾名看守的伴隨之下，我被帶到了秘書處。先查明身份，然後在登記簿上登記并按上右手四個指頭和左手食指的指印。這些手續完畢後，我收到一塊白牌子，上面寫着：“一三八五號，弗洛里蒙·邦特，四十九歲。違犯解散共產黨組織的法令。八·二七號牢房。”

我還得到另一個辦公室去一下。一個文書把我的白牌子換成一塊紙牌並向我說：“往那邊走。”

我回轉身來。我背後站着一個看守，身上帶着一串大鑰匙。他粗聲粗氣地命令我跟着他走。他帶着我走向一條很寬的走廊盡頭，把我關進左側最末了的一間發臭的牢房里。這牢房長二公尺半，寬一公尺八。

我按規定把領帶、小刀、背帶和鞋帶等等用手絹包好，掛在門外的一個螺絲釘上。

熄燈的時間已經過了三十多分鐘，牢房的門關上了，並緊緊地鎖上。看守從門上的小洞口向我吆喝道：“睡覺！”

在一張矮床上放着一個薄而且髒的稻草堆成的草墊。直到第二天早晨七點打起床鐘的時候，我一直沒合眼，幾乎被跳蚤、臭蟲給吃掉。領子周圍，手腕、膝蓋和踝骨上，滿是一圈圈

臭虫咬过后腫起来的疙瘩。全身布滿了被跳蚤咬痛了的斑痕。

在桑台監獄，人們只用單詞講話，例如：搜查、淋浴、放風、會客、律師、法庭、審訊，在這些單詞前面再加上一個號碼，一個代表你的號碼；因為雖然你還僅僅是被告，但你却已經變成只是犯人簿上的一個號碼了。

一個看守把門打開，他做手勢叫我出去並且說：“搜查”。

在一個文書的面前，搜查開始了。搜查得很徹底，接着便將沒收去的東西：皮夾，各種證件，大小刀子，表，結婚戒指，鋼筆等登記在一本專門的冊子上，並注明它們的大略價值。

接着我便去淋浴。這不過是做做形式而已。只要你從一個門口進去，從另一個門口出來，文書便記下：“淋浴完畢”。

最後，我被帶往八·二七號——第八部第二十七號牢房。

經過一條長而且寬，兩廂設有會客室與律師和法官接待室的走廊，我們到了一間圓形的房屋；再由此登上一座狹窄的石梯走上二樓，這兒有一條繞着牆壁并駕乎走廊之上的陽台似的鐵狹橋。經過這條狹橋，就到了第二十七號牢房。

這間牢房長寬各約三公尺。

這裡曾經拘留過強盜、殺人犯、小偷、妓院老板、騙子手和人肉販子。他們在髒得發黃的牆壁上，以他們這類人特有的方式，留下了他們的痕跡，留下了證明他們的虛榮、並有時是他們復仇與清算的意志和願望的東西。

我曾經無意中記下他們的某些名字：“巴黎大市場的奈尼斯”、“貝爾維爾的羅杰”、“馬賽的皮埃爾·德·聖一讓”、“星廣場區的杜都爾”、“聖德尼的百靈鳥”、“科西嘉人史巴德”等。

牢房里很暗。光綫是從兩個小而暗的玻璃窗口透過來的。窗玻璃中只有兩塊比較明亮，可以從這裡看見一小塊天空。

傢俱非常簡單：一張可以翻轉的鐵床，掛在釘在二十五號牢房界牆上的一個大鈎子上。床的大小可以勉強容身，草墊和床墊硬得像木板一樣，但毛毯還好，床單也乾淨。

牢房的另一邊有一把椅子，用鏈條拴在二十九號牢房的界牆上。在界牆上還拴着一張桌子，桌子分成兩部分，較大的一部分用鉸鏈可以使之轉動，並可以沿着牆壁提高和放平。

在桌子上方離地面約兩公尺半的地方，有一盞光綫很弱的電燈。按照防空司令部的命令，燈上有一個黑板紙做的長燈罩，使外面看不見燈光。因之，晚上它只能照到牢房里很小的一部分，房間的五分之四都是黑暗的。靠桌旁坐下，光綫弱得無法看書。

再往下數，還有杯子一個，衣刷一把，臉盆一個，木勺一把，監獄管理規則、食堂物價表和工資表各一張，以及一個兩層的木架和一個三只鈎的衣架。有兩道向走廊開着的門，其中一扇上有一個給囚犯送飯的小窗子。一個從前在這兒住過的囚犯在窗上刻着下面的字樣：“餓人之窗”。

按照罪惡多端的無能的統治者的命令，就在這種沒有取暖設備的狹小而寒冷的牢房里，正當嚴寒的冬天、非法地囚禁着一些法國的議員。他們沒有犯任何罪，他們只是因為保衛他們祖國和人民的真正利益而被認為有罪罷了。

他們被關在這兒，並將一直關到轉換監獄的時候；他們和那些最荒淫無恥的流氓罪犯一樣，一同受着普通罪犯的待遇。

我們中間有三個第一次大戰時的重傷員：

讓·杜克洛，他在作戰受傷後又壞了兩眼，曾獲得榮譽軍團十字章，軍功章和作戰十字章。

費利克斯·勃蘭，他在凡爾登時雙腳被凍壞，割去了兩腿，曾獲得榮譽軍團十字章，軍功章和作戰十字章。

皮埃尔·达多，他在作战受伤之后被割去了一条腿，曾获得荣誉军团十字章和作战十字章。

他們三人受着像狗一般的待遇。

在一九四〇年一月末，预审推事曾經請眼科專家德里安教授检查讓·杜克洛的健康情况。这位教授在诊断書的最后写道：“眼部健康情况不适宜于任何監獄生活”。

因此，讓·杜克洛按理应当被釋放，但事实并非如此。达拉第政府把他送到了瓦勒·得·格拉斯医院的第四精神病院。住在一間塞滿人的小房子里，窗戶緊閉，光綫是从天花板上透进来的。室內所有的用具一共只有三件：一張床，一个便桶和一只飲用的杯子。

于是讓·杜克洛开始絕食。

全法軍事医院軍医总监，瓦勒·得·格拉斯軍医院上校主任医师以及第四精神病院值勤主任医师等都很惊駭地来到了讓·杜克洛的病房。

他們企圖威吓他。讓·杜克洛很坚定。他說自己对瓦勒·得·格拉斯軍医院是很熟悉的，因为在作战受伤后所施的二十三次外科手术中，曾經有十九次是在本院进行的。那时他曾表現得很勇敢。今天他自然也不缺乏勇气，他繼續絕食。

第二天晚上，他便被帶回桑台監獄，和勃蘭关在同一間牢房里。

我們中間还有一些病况严重的人。他們完全沒有得到他們的健康情况所需要的照顧。

強盜們所受到的待遇比我們共产党人要好得多。

在最反动的年月里，政治犯曾受到特別的照顧。

現在則一点照顧也沒有了。这真是独裁統治，完全可以和希特勒德国的監獄和集中營統治媲美。

在我被关进去的第二天——十二月一日早晨，我所见到的第一个被监禁的同志是埃密勒·高索諾；我用手向他打了一个招呼，然后我独自一人轉身走到一个十五步長四步寬的方形院子里。院子三面被高牆圍繞着，朝着巡邏路綫的一面沒有牆壁，裝着一道鐵柵。頭頂上，在一條可以俯覽整個放風場的走道上，看守在監視着。

十分鐘后，当回到我牢房去的时候，我看見了皮佑和讓·克里士多福。我放慢脚步，很快地把昨天在下院所發生的事情告訴了他們。

他們用亲切与同情的微笑回答我。

我因为受到这些將近兩月来一直被监禁着的同志們的讚許而感到愉快；因为他們是忠实于自由和和平事業的坚定不移的共和主义者，是把祖國的神聖事業跟民主自由、各国人民的友爱和社会主义事業結合在一起的优秀的法国公民——共产党员。

接着我便回到了孤独寂寞的牢房里。

牢門剛剛鎖上，便有人請我到会客室去。來訪的是我的律師維拉尔先生。沒有一個当代的政治家，沒有一個法国工人对这位律師永不疲倦的服务热忱是不熟悉的。他走遍了欧洲各国，到处对反法西斯的政治犯們表示他那种充滿兴奋言辭而令人信服的热情，并以他的法律知識来支持他們；他的天才一向是为人們所讚許的。

我沒有想到他会來探望，因此在和他会晤、向他表示敬意，并以朋友和同志的身份和他握手时，我的欢乐的心情是异常强烈的。

略略談了一下共同熟悉的往事以后，維拉尔律師便令人感动地向我叙述我的家人和亲友們可佩的勇气以及我妻子的

可佩的勇气。自从我被迫轉入地下活动两个月以来，她毫不疲倦地对付着她所遭遇到的种种残酷的迫害，对付着極端困难的境况。但是，她不断地从各方面得到热烈的和积极的同情。

我們的全部积蓄都用光了。我們夫妇兩人都沒有财产，生活很穷困，甚至比当初彼此互相認識时还穷得厉害：那时我是路易·非耶公司的建筑測繪員，而我妻子則在沙多林商店里当妇女服裝縫紉工人。

今天，我們已經有了三个不小的孩子了：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三个孩子？不，他們已經是大人了。两个大的已应征入伍，一个是医生，另一个是技艺工程师；最小的女孩子也有二十岁了。

依照政府命令，国庫已經停止發放議員津貼。

因此，为了維持这一个小小的家庭和照顧两个已入伍的孩子，要花費多少心血啊！

維拉尔律师动人地叙述了这一切；我妻子不願憂愁和牽挂，不願目前的痛苦、沿途的荆棘和黯淡的將來，以法国妇女傳統的精神进行了反抗。我請求維拉尔律师代我向她表示最亲切的感激。

作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和作一个好的父亲这两种品質是不矛盾的，并且可以說是彼此互相补充的。一个作父亲的人，如果他願意作一个真正的徹底自覺的共產黨員，他就應該作一个好的父亲。夫妇的任务可以不同，他們的取責可以兩样，但兩人都向着同一个目标而努力：养育子女，培养他們的荣誉感和人格，培养他們对自己和对別人的尊重，使他們成为全心全意为社会的幸福和不断进步而工作的自覺的公民。

在我被非法逮捕的前几天，我曾在一本有关巴黎及其郊区的历史中讀到：甚至在梵塞納堡<sup>①</sup>里，国事犯們也享有某些

优待。他們中間很多人可以在獄中著書，可以接待父母和朋友，并且完全可以掌握時局的演變。

而今的世道已大不相同了！每周只允許會客一次，而且隔着一道鐵柵欄，由看守在一旁監視着。時間只有六七分鐘，幾乎沒有時間坐下來談談獄外所發生的事情。實質上這種會見純粹是形式上的，只不過名義上叫做會見而已。由於時間的短促，甚至沒有工夫解決一下純屬家庭性質的問題。

但是我們是法國的議員，控訴我們的案件是政治案件，而人們却從不允許我們搜集我們為進行辯護用的政治方面的材料。我們的權利因而完全不存在了。我們應該得到自由，而當我們要求這種自由時，我們遭到了預審推事、檢察官和高等法院的頑固拒絕。

但是無論如何，我們總應該與曾經向希特勒拍電致賀的佛蘭亭同樣享有出席議會的權利，特別因為我們所主張的是為了法國的幸福、繁榮和公正而持久的和平的政策。

律師是我們唯一能夠直接見面的人。會客室的窗子是玻璃的，目的是為了讓看守能監視被囚禁者和他的辯護律師的一舉一動。

而且在接見前後還得被搜查一番。

沒有報紙看。唯一的优待是可以看政府公報，這種优待全體犯人無例外地都可以享受，因之也不能算作是專給我們的优待。有兩種刊物可以閱讀，這是經過監獄管理總處許可的：“法國畫報”和“兩個世界”。這對熟悉國內外政治生活的動態，是絕對不夠的。

等到開庭的日子到來時，將是我們被囚禁好幾個月以後

---

① 十四世紀法國國王菲利普六世所建，后改作監獄。——譯者

的事情了。軍事、外交、政治、經濟和社會情況都將有所改變。毫無疑問，那時所發生的種種事件將已經或正在證明我們的政策、建議和綱領的正確性，而我們却無法利用這一切不可缺少的重要資料作為證明材料。因為我們只能收到一些零零碎碎的新聞和消息，必須把這些零零碎碎的消息像拚七巧圖之類的遊戲似地拚湊起來，並且還不保險拚得成功。

既然當我們還沒有失去自由的時候，由於檢查制度的嚴格和新聞界的偏袒——整個新聞界，因為“人道報”和共產黨的所有報紙都被封閉了——，為了收集一切所希望的資料尚且不免有所困難，那麼今天，在牢房四壁的中間，在極端孤立的情況下，在冬季，在每天有十二小時以上處於黑暗之中的條件下，當然就更加困難了。

一個普通罪犯所受的待遇，的確令人憎惡：

早上七點打鐘起床，但在我的牢房里却聽不見鐘聲。

按照監獄管理規則，應該掃地、疊被、簡略地梳洗一下。但是在這時還依然無法分辨什物，因為黎明的曙光只能從兩個窄窄的隔着一張瀝青板紙的小窗子里透進來。

過一會，看守跑來打開門清查犯人，然後又把門关上。於是你可以像籠中獅子一樣地在牢房里兜圈子。八點到九點是放風的時間。一個看守走過來，打開牢房嚷道：“放風了”。這時你早已作好準備，因為你已經聽到他打開與关上鄰近的牢房門並且喊着：“放風了”。

輪到我的時候，我把腳步放得慢些，尽可能地慢些，借以等待二十五號牢房的鄰居：高納凡和雅克·格萊查，他們接着也走出牢房，很快地大踏步追上了我。

由於犯人太多，無法只讓一個犯人單獨留在放風場里，每三人在一起放風是許可的。這便是彼此交換片斷的新聞和消



息的机会。这些消息是在会客以及跟律师們談話的时候得来的，是在上理髮室、去医务所或出庭时从看守們彼此的交談中偷听来的。

放風的时间，随着監獄当局的高兴与否，可以是五分、十分或十五分钟。到九点钟时，所有的犯人無例外地都重新回到了牢房；于是，一陣墳場般的寂靜籠罩着整个監獄，偶尔傳来看守長对各楼看守們高声發出的有关值勤的口令。

九点半鐘时，分發一次时冷时热、或稀或稠的菜湯，盛在一个粘手的盆子里，上面漂着几片葫蘿蔔和青菜。十点钟时，如果你的經濟許可的話，食堂服务員可以在你的正餐外少許补加一些，并且可以送来針、綫、肥皂以及其他日用小物品。

光陰單調而永远毫無变化地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囚犯們在五步来寬的牢房里来回踱着，傾听着看守們的呼喚。有的犯人正出庭受审，有的受审回来，另一些人則上理髮室去或者被律師叫去談話或会客。

下午獄內大鐘响四点的时候，天色已經很暗了。

沒有办法看書。天冷得人都冻殭了，不得不頓足取暖。看守們来回巡邏着。牢房里早已完全黑暗了。如果看守沒有忘記的話，他便替你开灯——一盞小得可憐的按照防空司令部的命令塗着藍色的伪装了的电灯。

時間似乎很長。將近五点半鐘的时候是吃晚湯的时间，六点钟杂役把湯盆收回去。六点半鐘便熄灯了。于是黑夜——冰冷的黑夜开始了，因为室內毫無取暖設備。每隔兩小时看守巡邏一次。他来回巡走，开灯，打开牢房的小窗，查明你是否在床上，然后关上小窗，熄灯，于是便走到另一間牢房去。你可以听到他那笨重的木鞋敲击地板的声音，繼而逐漸远去。于是又安靜下来了。在这种寂靜里最宜于沉思，宜于回忆过

去和展望將來。時間慢慢地過去，每過一刻鐘便傳來一次報時的鐘聲。

不到半夜是很少能夠安然入睡的。因之有五小時以上的時間可以用來組織進行辯護的材料，思索明天所要寫的信件，想念親人。有時，睡上十分鐘或一刻鐘，便突然又從噩夢中惊醒。最後，由於疲勞已極，終於入睡了，但仍然時時被刺骨的嚴寒所凍醒。

七點起床，像昨天一樣，在孤獨的牢房裡，生活——被囚禁在桑台監獄裡受著普通罪犯待遇的共產黨員的生活又重新開始了。

桑台監獄的管理規則，遠沒有放寬，相反地，稍有機會便在各種借口下弄得更加嚴格或者被破壞了。

因此，有一個月時間，我被剝奪了收到信件的权利。萬不得已時，可以認為由於郵局工作的不正常，因而產生某些遲到和某一封信不幸被遺失的事情，但問題是涉及到我全部的信件。更嚴重的是我所發出的信件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沒有一封達到了收信人的手裡，雖然其中某些信件僅僅涉及純粹私人間的消息和專門技術性的瑣事。

即使對褐衫隊陰謀案件的头子們也沒有採用同樣的手段。他們曾經陰謀毀滅共和國，曾經在他們秘密的軍械庫裡儲藏着從外國運來的用以屠殺法國人民的戰爭物資。

事實上我既不是不法資本家，又不是殺人犯、騙子、小偷和濫開空头支票的人，而且我從來沒有和烏斯退克<sup>①</sup>或史達維斯基<sup>②</sup>之流茶來酒往。而如果我真地曾經這樣的話，毫無疑問我將反而會受到更大的重視和更好的待遇，我的信件也將更快和更正常地交來。然而我只是一個法國共產黨的議員，只是一個無私的議會成員，從來沒有參與過第三共和國的任

何無恥勾当，并且謹慎謙虛地履行人民代表的职务和为公共福利与祖国貢獻自己的力量。而这已經足够說明我为什么要受到折磨了。

我向桑台監獄的領導人写了一封强有力的抗議信，他替我把信轉給了預审推事馬沙克先生，但沒有得到任何答复。于是我决定写信給下院議長赫里欣先生。該信內容如下：

“議長先生：

“今天我很榮幸地写信給你，这并不是为了要对一九三四年二月反共和国暴动的組織者們在今年十一月三十日早晨下院开会时所挑起的痛心事件进行一場辯論；不是为了向你指明当議會特別會議开会的那天我的到会并不是一樁荒唐無恥的事情，而是受宪法保障的一种不可侵犯的权利。

“也不是为了揭露那些議員們的偏袒不公：他們胆怯地投票贊成取消其同事之一的議員特权，不讓他在主管委員會面前和公开會議的講台上，对自己的言論和行动进行正当的辯护，而这种为自己辯护的权利是各种法典都承認的。

“我之所以写信給你是为了使你注意兩樁特別严重的不可容忍的事情，這兩樁事情跟其他不法行为一样都是加到我本人身上的，而我却是一位法国議會議員，其誠懇、正直与忠誠是無可否認的。但我在十一月三十日被捕下獄了，并且受到普通罪犯待遇。按照監獄管理規則，被告或犯人是每天

① 法国銀行家，有名的投机者。一九三〇年以伪造鈔票罪被判徒刑，但由于他在政府中任要职的庇护者們的干涉，該判決竟以“缺乏原告”的理由宣告撤銷。——苏联編者注

② 著名的投机者和間諜。由于与法国政府要人相勾結，曾長期肆無忌憚地进行活动，一九二八年終于被人告發。但此案件竟被隱瞞达六年之久。至一九三四年，由于消息已广泛傳播开来，法国当局被迫对他进行审讯。史达維斯基在受审过程中自杀。——苏联編者注

都能与外面通訊的。然而我所發出的信件沒有一封到达过收件人的手里。我曾写过好几封信給邦特夫人，她連一封也沒有收到。有些信件写的只是一些純粹技术性的瑣事和私人的訊息。

“从十二月十五日早晨起，我自己就沒有收到任何一封私人信件。我知道我妻子會給我写过几封信，但一封也沒有交到。我完全可以意料到还有其他一些信件寄給我，其中有些信件可能有涉及我兩個已經应征入伍的兒子的消息，他們中間有一个現在正在前綫。

“我很难設想把这种收不到信件的情况归于一个簡單的偶然原因。我的信件被扣留一定是由于某方面的决定。

“因此，他們不仅企圖損害我作为一个議員所应受到的尊敬，并且还要从我和我最亲近的人之間高尚的感情上来对我加以伤害。

“对于这种加在我身上的不可容忍的手段所作的抗議，其合法性我深信閣下是不会否認的。

邦 特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于巴黎桑台監獄”

一直等到十二月底我才收到由这位滿怀民主热情的里昂市長、偉大的“民主人士”的秘書長所签字的下列收据：

“議員先生：在回复您十二月十七日<sup>⊖</sup>給議長先生的信件的同时，我很荣幸地通知您上述信件的抄本已轉交給內閣总理兼国防部長了。

“議員先生，請允許我向您表示敬意。”

直到次年一月，我才最后能够比較正常地收到家信。至

---

⊖ 此地日期恐原文有錯誤，似应为二十六或二十七日。——譯者

于我們屢次提出的享受政治犯待遇的請求則始終遭到否定的回答。內閣總理借口軍事當局的拒絕而輕輕將責任推掉了。

一九四〇年五月的第三個星期，當把我們盡快遷往別的監獄的命令下來時，六十五歲的喬治·勒維體重減輕了十五公斤，亨利·羅哲萊吐血了，亨利·馬戴爾減輕了七公斤，高納凡也減輕了七公斤並且得過動脈狹窄，半身不遂和局部不能言語等各種病症，經常面臨着死亡的威脅。

## 第六章

### 預審推事馬沙克上尉

我第一次受到預審推事的正式訊問，是在十二月十一日，星期一的下午。

看守把我提出牢房，帶到樓下的寬闊走道里。在那兒，他叫我面壁立正，雙手交叉在背後，不准向後面或左右觀望。然後把我編在一隊由九個我所不認識的被告組成的行列末尾。點過兩次名後，我們被帶到停在桑台監獄的前院巡邏道外邊的一輛囚車里。

這就是所謂的“囚車”：一輛小卡車，中間一條走道，每邊五個小小的鐵房，就像是工廠中工人的衣帽間。

看守打開車門，把我們推進去，然後關上車門。坐在裡面，你的膝蓋非貼在對面的鐵板上不可。簡直透不過氣來，光綫也很暗淡。

走到十字街口時，汽車停下來，然後又突然開動，大搖大晃，這時，你的頭、胳膊、膝蓋和脊背就免不了在前後左右的板壁上碰撞。看守們則在外面大叫大嚷地歡鬧着。

不上十分鐘，我們便到了法院。

“囚車”里單人間的小房門一扇接着一扇地打開，然後關上，發出一陣鑰匙的響聲和金屬的碰撞聲。被告們一個個走下車來。

這是法院里面的一個院落。天氣很冷，我帶上了帽子。

这一下可触犯了一个平民装束穿着一件皮外衣的家伙，他好像就是汽车司机。

“脱帽！”他用非常无礼的口气向我喊道。

我瞪着他，但没有把帽子取下来。我的态度使他恼怒。他跟在我后面，举起一支手来威胁我，口里不干不净地骂着。我不动声色，完全不睬他这一套。

我们被带到一个办公厅的过厅里。这时，依照习惯，同时也正如一切有礼貌的人所应该做的那样，我脱下了帽子。刚才那家伙还在嘀嘀咕咕的发脾气。我满含讽刺的眼光和他打了一个照面，他转身走了，于是我微笑了。

看守叫到了我，他问我的姓名和牢房的部别和号数，然后逐项记在一本大登记簿上。

两分钟以后我被关进第二十四号牢房。这是一间三公尺长，一公尺半宽的臭房间，既缺乏光线，也不通空气，脏得令人作呕，墙壁潮湿到了粘手的程度，一股腐烂的味道笼罩着整个房间，发出臭气。

没有窗子，难得感觉到的光线从上部装着铁栏的门里透进来；待在狗窝里也要比这儿强得多，而我在这里却一直待了三个钟头。

自卫队的一个小队队长来找我。他领我穿过一连串错综复杂非常阴暗的地下走道，光线微弱的电灯这里那里地照耀着。最后我们到达了预审推事的办公室。

我的妻子和女儿从律师那儿知道我要来，便在小预审室外面的大厅里，坐在一条长凳上等候着。

维尔拉律师正在和她们闲谈。看见我走来，他马上过来和我握手，并且给我一些他认为在出庭接受马沙克审讯以前需要交待清楚的指示。

可是看守着我的自衛隊，一個又肥又胖、養得很好的小伙子，大概是由于耽心自己的前程，同時又害怕到前綫去，便前來干涉了。他要看看辯護律師的談話許可証，而以往是從來不這樣作的。

許可証上的日期是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

於是，這位小隊長——也許是中士吧，因為在自衛隊里，他們差不多全都在袖口上有一兩道甚至三道金邊——認為文件已經失去了時效，拒絕承認。他要預審推事當天簽署的證明文件。維拉爾律師只好去找馬沙克上尉，請他來說服這位熱心維持秩序的衛士。

最後，我終於可以和我的辯護律師交談了。我們談得很久，一直到當時正在進行的審訊結束。

這時從預審推事的房間里接着出來了兩個人：保羅醫生和一個後備隊的軍官。

錄事出來招呼我們進去。預審推事和律師們互相見面問好之後，他們就讓我坐在錄事辦公桌旁的一張包了皮的椅子上。

審訊開始了。一共有六個問題，每個問題又分為一系列比較詳細的小題目。

每個問題都牽涉到法國共產黨的解散、法國工农議員團的成立和致下院議長函件的起草、送達、公布和分發。

預審推事開始審訊。他剛說完第一個問題我就把他制止住，請他先解釋一下審訊的性質和審訊的真正目的。他的答復很含糊。他說審訊是根據九月二十六日頒布的關於解散共產黨組織的法令進行的。他找了一下原文，但沒有找到。

我告訴他，所有這些論據是絕對不夠充分的，我認為毫無價值，因為它們沒有任何具體事實作根據。



我請求預審推事解釋一下是不是有具体事实。是由于組織工农議員团，还是由于給赫里欧先生写信，还是由于這兩件政治活动合并在一起；因而給我加以罪名？預審推事既不作否定的答复，也不加以肯定，只是支吾其詞，非常謹慎地为自己預留地步，無論如何不願意把自己牽扯进去。

他另外提出了一些問題。

是誰提議組織工农議員团的？你在中間出了多大力量？参加第一次會議的有哪些人？組織工农議員团的目的何在？信是誰草拟的？是誰寄給赫里欧的？是誰交給新聞界的？在哪一次會議上决定这样做的？为这开过几次会？討論过嗎？有过爭辯和反对意見嗎？参加討論的是那些人？申請加入工农議員团的有哪些人？征求参加者采取的是什么方式？对不在巴黎的議員也發出了征求参加的通知嗎？屬于其他議會党团的議員有加入的嗎？

毫不待言，对于这些牽涉到法国工农議員团内部討論情况的問題，我一概不予答复，因为这是違反議會慣例的；而且根据宪法与議會組織法的規定，議會党团可以絕對自由地隨意处决有关其本身的問題，任何法官或司法机关都無权干預。

每一个議會党团内部的討論仅仅是該党团本身的事情。

只有決議部分才加以公布。这是所有議會党团的慣例，工农議員团正是按照这种慣例办事的。

而且，作为工农議員团的总書記，我無权洩漏任何細節，因为这是和我所担任的职务的尊严不相容的。

但是，我接着告訴他，关于工农議員团的成立，关于我們的政綱，我們对于一切国内外政治問題的态度，我准备詳細地加以說明，因为这样做只会說明事实真象，而我們并沒有什麼需要隱瞞的。我并請求預審推事將这次审讯紀錄的全文送交

所有的報紙和新聞通訊社，務必請他們予以刊載，以便我們所受的可鄙的非法控訴終于得以為人民所了解。

我有權利公开发表言論，对被人收买的新聞界所有計劃散布的誹謗和誣蔑进行答辯。預审推事應該承認我有这种權利。

我記得，法国工农議員团成立的情形早已为众所周知了。首先是諾尔省議員拉麦特創議：召集几位朋友討論一下在下院中組織一个議會党团是否有用处或有必要。法国工农議員团曾草拟过一份公报，并且曾經分送給新聞界。

那末，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当解散法国共产党的法令公布以后，当时的形势是怎样的呢？

共产党議會党团，和其他一切共产党組織一样，被解散了。被这一横暴的措施所侵犯的議員們，不得不考虑因之而为他們造成的新形势。

留在巴黎的議員在一次聚会中討論了这一事实，决定組織法国工农議員团。

他們把总書記的职位交给了我。

我自豪地接受了这个光荣的职务。

而且組織这样一个議會党团，是进行議會工作所不可缺少的。

根据現行議會組織法的規定，任何議員如果不隶属于任何一个議會党团，事实上便不可能在下院內有效地进行工作，切实完成他的任务。

下面的事实便是再显著不过的例証：一个不属于任何政治組織的議員，如果想执行他的人民代表的职务，便只好加入一个所謂“独立的”党团——“無党派人士議會党团”。

这里只要举一个最基本的例子就够了。一个沒有加入任

何議會党团的个别的議員，絕對不可能在決定下院議事日程时起任何作用，因为下一周的議程是在每个星期四召开的各議會党团主席联席會議上決定的。

同时，我还詳細地告訴預审推事：在組織法国工农議員团之前，拉麦特和我曾征求过有关当局的意見，并請求按照法定程序，办理成立議會党团的手續。

我們到議會行政处去見過行政处长：議員爱德华·巴特先生。

我們又到过議長办公室，秘書長苏伏罗接見了我們。这一切手續都是在九月二十七、二十八兩天內全部办理就緒的。

根据我們所得到的指示可以看出：在議會已經开始执行其立法任务以后，組織一个新的議會党团所采取的方式，是和 在議會剛成立时不同的。

当議會初成立时，議會党团的主席只要把根据同一竞选綱領选出的議員所組成的議會党团成员的名單送交議長办公室就够了。个人簽名的申請書并不是必需的。而在議會执行立法任务期間則需要有个人簽名的申請書，并且需要特別起草一份政治綱領。

下院行政处与議長办公室兩方面所給的这些指示，我們严格地一一照办了。

以前屬于共产党議會党团的議員們送来他們个人的申請書，并按照規定簽名。这样，工农議員团便組成了。

至于所必需提出的政綱，我們采用了仔勒·盖德和保罗·拉法格的綱領，并在前面加上一篇序言，声明工农議員团的 政治态度是以此綱領为根据的。

工农議員团的組成及其綱領曾經正式刊載于一九三九年

九月二十九日的“政府公报”上。

这时，我接着对预审推事说道：“如果维拉尔律师备有这一期的公报，请你准许他把公报交给我，让我将原文宣读一遍。”

预审推事同意这样做，于是我將盖德和拉法格的綱領讀了一遍，然后繼續解釋。我指出：根据發表在公报上的原文，加入工农議員团的个人申請書是按照議會最高当局的建議和指示分批征集的，并且合乎議會組織法的規定。

我們所采取的程序完全是那样合法，以致在法定手續完成以后，从来沒有任何方面提出異議。議會行政处并正式撥出一个办公室和几間會議室供我們使用。

現在，事情已經解釋得很清楚了，我們曾得到議會行政处和議長办公室的指示、同意和支持。

工农議員团的成立不仅是一种絕對的权利，而且是合乎慣例的，沒有人可以或者有权因此而对我們有所不滿。此外，假如沒有成立工农議員团，共产党議員就不得不加入另外一个議會党团。理由是这样的：

实际上，在提出举行公开投票的請求时，只要一个議會党团的書記或主席的簽名，就抵得上正常所需的二十五个議員的簽名。

如果沒有成立法国工农議員团，那么和其他議員比較起来，我們就会处于不利的地位。任何共产党議員都將無法提出举行公开投票的請求。

另一方面，我們这样做是有先例可循的。实际上，在法西斯联盟解散的时候，属于这个联盟的各派別的議員便在“法蘭西人民联盟”的名义下集合了起来。

而議會行政处与議長办公室还曾經宣布这个組織是合

法的。

那末，为什么对某一些人許可的对另一些人就要禁止呢？难道只因为后者是共产党員嗎？

沒有任何人或者任何法令可以强迫一个議員不經自己的選擇而参加任何一个議會党团，否則，就会严重地侵犯議員的特权，侵犯他的意志和言論自由的权利。

另一方面，既然所有其他的議會党团都和法国共产党是敌对的，那么他們也决不会將一个作为共产党員的議員接受到他們的党团里面去。

在这样的情况下，組織工农議員团当然是势所必然的了。

而且如果研究一下所有的議會党团，就必然得出这样的結論：不論在理論上或在实际情况中，一个議會党团并不等于一个政党，因为这些議會党团常常包括几个不同政党的成員。

这里可以指出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实。法国工农議員团仅仅包括以前属于共产党議會党团的某些成員，而不是全部都包括在內。事实上，有一部分共产党議會党团的成員由于恐惧怯懦，拒絕加入，并且声明反对成立这一組織。

因此，工农議員团并不單純是共产党議會党团的改組，而且即使是改組，也不能算是錯誤。因为这是我們的权利，我們並沒有違法。

工农議員团成立时，对于以前属于共产党議會党团但已应征入伍而不在巴黎的議員們，我不記得是否曾給他們寄去过申請表格，但为了尽到我的責任，后来是按照規定給他們寄去了。

我指出在下院任何一个議會党团成立时所采取的方式也

都是如此。

我特別舉出了法英議會黨團<sup>⊖</sup>的情形，我曾經是它的書記之一，而它的副主席之一是加伯列·貝里。

通常都應當發出申請書，征集簽名；有時這種申請書甚至是通过議會行政處寄出的。因此，現在可以从各方面來檢查一下法國工农議員團成立的經過，並且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它的成立是完全合法的，因而不可能用來作為控訴我們的根據。

在作過這樣一番說明以後，我隨即談到寫信給下院議長的問題。

我明確指出：這封信是經過工农議員團一次全體會議討論之後由我執筆寫的。十月一日晚上經拉麥特同意後，他和我一同在信上簽了名。第二天，我帶了幾份副本，放在波旁宮內的記者桌上。

我這樣做不過是按照慣例辦事。

事實上，一切議會黨團在作出重要決議以後，通常都向新聞界發表公報。

而且，不論對於新聞界或對於議員，都不曾聽說有其他可能的辦法；議員們經常到四柱大廳來了解情況，或者在他們認為必要時親自來此發布消息或接見記者。

最後，我提請預審推事注意這一事實：議會行政處會自己向全體議員正式由郵局發出這封信件的副本。

因此，在這封信的寄遞分發上也毫無可資指責之處。這是絕對合乎議會規定的正規活動，誰也不能因此而對我們加

---

⊖ “法英議會黨團”是法國議員組織的，目的在於“建立兩國議會間密切友好的合作聯繫”。一九三九年六月，該黨團主席是伊馮·德爾波士，副主席之一是共產黨員貝里。——蘇聯編者注

以責備。

因此，決不能以這一點作為任何起訴的法律根據。

解釋至此，預審推事宣布要中止審訊，而在下一次繼續進行。我請求他允許再講幾句話。在我的律師一再請求後，得到了預審推事的許可。

於是，我強烈抗議對一個法國議員採取的無恥措施：用囚車從監獄送到法院，到了法院後又長時間拘押在一間陰森的牢房里。

接着我指出辯護權受到了侵犯，因為現在我不能讀報，無法知道目前所發生的政治事件。報紙成天對我們進行侮辱毀謗，而我們卻無法回答，也無法利用法律所給予我們的答辯權。因此，最低限度我要求享受真正共和主義的和民主的人民國家里通常所規定的政治犯待遇。

最後我強有力地指出：我自信已經行使了共和國憲法所賦與我的不容侵犯的權利，已經完成了一個法國共產黨員、一個法國議員、一個法國的共和主義者和一個法國公民的義務，因此問心無愧。整個審訊過程中，錄事伏在記錄本上抄寫，記錄得非常詳細。

走出預審室，我和我的妻子女兒在一起談了幾分鐘。自衛隊帶着懷疑的神情，始終在一旁監視着。

然後，我再一次被帶到“老鼠籠”似的臭牢房里。一小時以後回到了桑台監獄的八部二十七號牢房。和去的時候一樣，這次仍然坐囚車回來。天已經黑了。走到十字路口時，商店和酒館的燈光不時從車上通氣的小縫里透進來。冷寂而無生氣的監牢生活重新開始了。

我們是裝在棺材里的活人。

第二次審訊在十二月二十一日舉行。

这一次采用了“外提”的办法。

所谓“外提”是将我提出牢房，在拘留所的秘书处交给两个警察。在我由监狱到法院、以及在受审时和返回的道路中，完全由他们两人负责看管。

监狱会计从储金账上提出一笔四十法郎的款子交给他们。来回出租汽车的费用都在这笔款项中支付。

两个警察一老一少，全都规规矩矩。手续办好后，我们从监狱出发。年轻的警察叫来一部崭新的出租汽车，在监狱的院子里等着。

两扇大门开了，走上大街，我深深地呼吸着新鲜空气。天气很晴朗，温度在零度左右，墙壁上到处贴着布告，号召大家参加支援军属的委员会。自从下狱以来，现在已经二十一天了，走在大街上喧嚣奔忙的人群中，叫人感到多么舒服呀！

街头上有一个报摊。我很想看看报。警察们也很机伶，随手把一份“巴黎小报”丢在座位上，我就可以看看标题了。坐车的路程很短，还不到十分钟。穿过塞纳桥，向左转弯就到了法院。大门口有二十来个自卫队站岗。

我们走上一条长而宽的走廊，走廊尽头便是预审推事的办公室。

老远我就看见幽莲特·法戎坐在一条长靠椅上。她丈夫艾蒂安·法戎请假回来了，现在正在预审推事那兒。马沙克上尉在审问他。

这不就是法戎吗？他走出门来，审讯结束了。我们互相拥抱。他穿着士官制服，身体很好，精神焕发，经得起一切考验。法戎应征入伍已经三个月了，现在得到了暂时的假期，在巴黎还可以逗遛三天之久。前几天，他已经和同志们见过面。到处全都坚持下来了，同志们的情绪很高。



有些地方發現了叛徒。這些背叛我們事業的逃兵受到了狠狠的譴責，大家對他們的可耻行為普遍報之以卑視、憤怒和訶斥。他們只好藏着不敢露面。

我們繼續談下去，毫不理睬在旁邊兜圈子的警察。他們抽着紙烟，也不來干涉我們。

在走廊的另一頭，我發現了我的妻子和女兒，一看見我妻子的皮外套和我女兒的紅大衣，就認出了是她們。

但是站崗的自衛隊不讓她們過來。

維拉爾和錄事一道來了，我把這件事告訴了他們。錄事走上前來，問清原委，然後找着自衛隊，命令他讓我的妻子女兒和陪她們一道來的瑪麗亞·拉巴德進來。我們盡量抑制住深深激動的感情，親切地擁抱着。

馬沙克還沒有准备好繼續進行審問的工作，因此我還有一刻鐘的時間可以和家人們留在一起。我得到關於我兒子塞爾吉的消息，他現在軍區某地，在那兒他曾經遇見他醫院的老“上司”：現在的布魯克將軍。

同志們和親友們的身體都很好，情緒很高，大家都堅持住了，沒有屈服，正在進行鬥爭。

同時，她們告訴我，就在昨天，九十七個共產黨員被捕了，包括莫里斯·加戴特在內。他們被解到巴叶，關在冶金工會大樓里，那兒從前是冶金工人的休養所。這樣一來，這座用冶金工人一蘇一蘇<sup>⊖</sup>募集起來的錢購置的精美的大樓，本來應當是老弱病人用來休養、娛樂以及工人家屬們在節日和星期天用來聚會歡娛的地方，竟被政府沒收，變成了一座集中營。

政府作戰的對象不是希特勒而是人民，是工人階級，是工

---

⊖ 法幣名。——譯者

人階級的各种組織和它的最忠誠的战士。达拉第、龐納及其党羽所組成的政府，步希特勒的后塵，用極端可耻的鎮压手段，用猜疑、偵查和告密来进行統治。即使在帝制时代也从沒有墮落到如此地步。

仅仅为了一些毫不足道的小事，为了片言只字，或者为了一些事情表示了一点点不滿，例如生活費太高，政府拒絕發給軍屬補助費，某些商品缺乏，煤炭供应不足，可耻的过早撤退，后勤机关的贪污行为等等，总之，只要有少許不滿，不論男女老幼就会被橫暴地从家里帶走，投入監獄，拘留在集中營里，送到特別法庭和軍事法庭審訊，最后被判处往往長達五年的徒刑。

另一方面，不法銀行家和強暴的人肉販子們却受到法外的寬容，這該是多麼鮮明的對比！这批坏蛋們有着強有力的保护人。仅仅由于他們是有錢的人，由于他們的朋友——議員和部長們——都是有權有勢的，或者替他們掩蓋，于是大批不法銀行家和人肉販子都被釋放了。

正如阿尔薩斯議員塞尔茲在十一月三十日下院討論授予政府全權的一次會議上所指出的：“达拉第总理是在对國內进行戰爭。”

法戎又告訴我另外一個消息。它充分表示出議員們的反動法西斯思想狀態和他們的奴才心理。

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三，下院外交委員會——我和貝里是該委員會委員——舉行會議，它的全体委員，包括格倫巴哈先生等社会黨議員在內，一致把我們兩人开除出委員會。

佛蘭亭、米斯特勒、格倫巴哈、維埃諾、德尔波士这些先生們和他們的党徒偷偷地进行了这件工作。他們乘外交委員會中的共产党議員被捕下獄的机会，干了这样一樁新的非法勾

当。这是一次新的罪行！又一次新的怯懦行为！

到这里，我不得不中止谈话。要轮到我了，审讯又要开始了。

我要回答的问题有十来个。

事实上我所要回答的并不是什么问题，而是一系列语气非常肯定、毫无根据的断语，连一点点证据的影子也没有。

这些断语和每天在报纸上重复出现的论调完全一模一样。因为声名狼藉的新闻界早已被戈培尔的宣传机构所收买，亚贝兹的党羽把持了这个所谓的新聞界。他们竟不惜以他们的卖国言行换取一百五十万法郎。

这次审讯的全部阴谋只是为了要证明组成法国工农議員团以及致赫里欧函件的起草和分发、送达都是出于“外国的指使”，是为了散布“第三国际的口号”！

首先，我提請预审推事注意：在九月二十六日以前，法国共产党始终是一个完全合法的政党。

我指出，虽然法国共产党今天被公开侮辱并且被宣布为非法，但它曾经参加过许多次伟大的示威运动，达拉第也曾以能置身于这些游行队伍的前列，与多列士、杜克洛、加香等并肩前进而深深引以为荣。

预审推事一定也不会忘记，在人民联盟全国委员会中，共产党曾经与激进社会党委任的正式代表合作，而当时激进社会党的主席正是达拉第先生。

在下院左派代表团中，共产党曾经和达拉第的政治伙伴们共同进行工作。

而这批人不也曾投票、选举法国共产党的领袖担任下院副議長和書記等最能代表第三共和国的职位嗎？

然而达拉第当时并非不知道法国共产党曾参加第三国

际，但是他并不認為这一点足以阻碍其在大选时与法国共产党合作，反而毫不犹豫地号召大家选举法国共产党最有威望的領袖，选举他今天誣蔑为“受国外势力操縱”的政党的領袖。

对于这种可耻的行为，我提出严重抗議。

法国共产党是法国的政党，它的根深深長在法国的土地里。它的行动口号是从法国人民中間来的。法国共产党的使命和职责在于保衛与法国的利益不可分离的人民的利益。

关于法国工农議員团的成立，我請預审推事参考前几次我所提出的声明。工农議員团是根据法国議會立法权的原則組成的。而且，下院議長曾表示接受它的成立，并在“政府公报”上公布了成立的通告，这样，下院議長当然承認了成立工农議員团的合法性。我并且告訴馬沙克：还可以从很多其他証据中举出一条証据，就是沒有人胆敢請求解散工农議員团，也沒有人敢于發布采取这种非法措施的法令。

从审問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一件事實：由于法国工农議員团对于正常行使我們的議會职权和完成我們的議員任务是必要的，所以我們成立了这一組織。这不仅是我們的权利，而且是我們的义务。我們行使了权利，也履行了义务。

預审推事的談話中有不少錯誤。例如，为了起訴的需要，他詭称参加共产国际是个人的而不是集体的。这是一个严重的錯誤。我指出这些錯誤以后，接着便詳細談到写信給下院議長的事情。

我再一次着重宣称，对于这件事我可以負全部責任。

事实上这封信是一个法国議員在行使他的职权时受到其他一些法国議員的委托而草拟的，委托者們也只是在法国工农議員团一次正規合法的會議中为了行使自己的职权而这样作的。而工农議員团則是按照議會組織法的規定經過正規合

法的手續成立的。

我肯定指出：这封信完全从法国的情感出發，其目的只是在保衛和祖国利益不可分割的法国人民的真正利益。

預审推事的档案中沒有这一封信，于是我又把原信在他面前作了一次詳尽的分析。

然后我向預审推事指出：我敢断言沒有人可以在这封信中找到任何可以指責的东西。我請他注意：信中所包括的建議，已經在人民群众的壓力下，为議會各个不同的政党所接受。同时我提醒預审推事，这些建議曾經在报纸上登載，并曾公开討論过。我們的建議是如此正确，甚至达拉第先生也不得不为此召开一次議會特別會議。

此外，我請預审推事注意下列事实：提出建議的人和撰文評論這項建議的作者当时不但未被控告，甚至并未因此而遭受任何麻煩。所有有关这一重要問題的專文与評論也都得到新聞檢查机关的批准而被全部刊登。

在这些情况下，應該逻辑地得出結論說：加給我們的罪名是不存在的，因此这一場审問絕對是無的放矢。

根据这些情况，應該得出这样的推論：

第一，对我们所进行的控告，只不过是达拉第企圖把法共議員排斥于国家政治生活之外，所采取的極端粗暴而实际上并不高明的陰謀手段；而法共議員在一九三六年五月大选中所提出的政綱，則是曾經得到一百五十万公民的拥护的。

第二，我們被捕入獄的目的，只不过是為了使在实行違背全国人民願望的政策期間，在監獄里保有一部分人質而已。

最后，既然已經証實了这次起訴中所述各項毫無根据，而且相反地在兩次审訊中，我提供了許多理由，証明不論大小罪名一概不能成立；因此，我請求暫時恢复自由，并請求暫時

釋放所有目前被拘禁在監獄和集中營里的我的朋友們。

維拉尔律師遞給我一份事前打好的關於請求釋放的申請書，我簽了名，然後交給預審推事。

最後，預審推事問我還有什麼話要講。于是我再一次對我們在桑台監獄中所受到的不能容忍的普通罪犯待遇提出了嚴重抗議。

同時我指出我們為自己辯護的手段是不完備的。令人憤慨的是法國報紙上每天充滿了侮辱、誹謗和造謠，而我們竟無法答辯。

不久以前，我從“政府公報”上知道，达拉第先生以不可容忍的方式用行政權力干預司法方面的事務。他竟毫無根據地說：在和平的日子里，共產黨人會採取戰爭政策。

這是誣蔑、造謠、而且卑劣的行為。其所以是誣蔑，因為是違背事實的惡意誹謗；其所以是造謠，因為它的目的在於欺騙中傷；其所以是卑劣，因為這是在深知被誣者無法干預，無法迫使造謠毀謗者收回其無恥謾言的情況下干出來的。

我告訴預審推事我手頭上有一些無法駁倒的文件，可以說明：

第一，法國共產黨戰前所奉行的是和平政策，其基礎是所有愛好和平和獨立的人民與國家之間的合作；

第二，如果政府採取了這一個建立在集體安全基礎上的和平政策，戰爭的災禍就應該可以避免了。

我指出，作為一個預審推事，責無旁貸，他應該保證我能充分進行辯護，使我能引用法共各次代表大會、會議、中央委員會的決議和多列士以法國共產黨總書記的身份所作的報告、演講和聲明等等。然後我接着說：

“讀讀我們黨的历史吧。只要查閱一下所有的文件，你們

就不得不承認：我們的一切言行都是有利于和平的。而我們現在却受到普通罪犯待遇，我們的口被堵塞起來，被排斥于法蘭西的生活和法蘭西社會之外。但是，我們能夠引以自鑒的是：共產黨員並沒有在慕尼黑條約上簽字，而巴黎和倫敦的執政者們則通過慕尼黑條約，將捷克斯洛伐克，控制多瑙河地區的波希米亞的四方戰略基地和法蘇之間航綫上的天然連絡站送給希特勒了。我們不難收集到各種證據確鑿的文件來證明我們的事業是正確的。然而，我再重復一次，我們無法做到這一點，因為我們沒有受到政治犯待遇。因此，在按照正義恢復我們的自由以前，我堅決要求得到政治犯待遇。”

預審推事一面記，一面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口授給录事，命令他記錄下來。第二次審問也是最後一次審問便以這篇聲明結束了。我必須指出，就在這一次，我再度對扣留我的信件提出了強烈的抗議。

預審推事表示很詫異，他說已經下令停止這種行動。然而，對他來講非常不幸的是桌上還放着几封信，竟沒有注意到事先拿開。我看得出信上正是我妻子和女兒的筆跡。

他解釋說這是送來檢查的。接着又指責我不該在信內談論政治問題。

他所提到的這一段我是這樣寫的：我應當與易巴內加雷、格倫巴哈、佛蘭亭、德洛奈、波利曼、龐納、勃魯姆之流一樣，有完全同等的權利，在議會講壇上發表意見。

我告訴預審推事，我們是法蘭西議員，我們的案件是屬於政治性質的，因此，與家人通訊時不可能不談到政治問題。

在我第二次受審的過程中，審訊曾經一度中斷。

有人要見預審推事。那人告訴傳達有一件極其緊急的事情，傳達把他帶到隔壁房間里。馬沙克向律師和我告辭，走出

大厅，单独接见了求见者。当他回来时，手里带着卖国贼费多内的四本著作。

“我马上就要处理这件事情”，他带着疲倦而怀疑的神情向维拉尔律师解释说。

看来他们对这个为希特勒服务的间谍发生兴趣了。

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这些统治者的心理状况。达拉第政府以警察镇压力量来对付人民和反法西斯战士，而对希特勒的代理人、第五纵队分子却不闻不问，任他们惬意地安顿下来，甚至在政府机关中担任职务；对于银行巨头、重工业巨头以及冶金化工协会的资本家们也从来不加以即使是最轻微的处置。而大家都知道，这批人始终和希特勒勾勾搭搭，宁愿看着法国灭亡，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利润和巨大的特权。

对于背信弃义、怯懦透顶的政府和它的御用议员来说，他们心目中的敌人是法国共产党，因而也就是法国人民，这是必然的逻辑推论。

的确，他们心目中的敌人正是人民，这可以从政府对人民的一切行动中得到证明。他们企图奴役人民，企图以希特勒式的手段威胁人民，迫使人民充当“战神莫洛克”的祭品，正如雷诺所说的那样。

他们能够长期使人民屈服吗？根据我们以种种方法所得到的消息，包括从监狱杂役（他们是从再度应征入伍的士兵中挑选来的）得到的消息来判断，这是不可能的。

军区的一些士兵特地凑钱给我寄来了一包饼干。这种体贴入微的关切难道不是意味深长的吗？每天都有请假归来的士兵，不愿偵緝告發，来探望我的妻子，请她将他们热烈关怀的心情转告给我。这些令人感动的访问难道不是好的征兆吗？从预审室出来时，沿途居然能够得到这样一些好消息，该



是多么重大的安慰啊！

再一次，这也許是最后一次了，我和妻子女兒親切地擁抱着。她們在嚴重的考驗面前充分表現了法國人民的英勇气概。

自然，我們提出了恢復自由的申請書。上訴法庭還需要詳細地審查。但是，我們不能抱任何幻想，我們的請求將被毫無理由地批駁回來。不用說，我們一定將提出抗議，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但我們也很清楚，應該作最坏的估計。我們已經作了準備。回到桑台監獄以後，我比以前更加堅決，面向鬥爭，決不辜負黨和人民對我的信任。

我記起了拉芳丹的一句話：“哀怨和恐懼不能改變命運！”這句話是再確切沒有了。不過我們的詩人忘記了一件小事，一件可以說是非常細微的事情：命運是可以用自己的行動來影響或受別人的影響的。

在監獄內部，在法庭上，毫無疑問地將有一天我們會在法官面前，以我們的態度和行動來鍛鍊我們的命運，並且以我們的微薄力量來支援法國共產黨所領導的為爭取法國的自由、和平和獨立的艱苦而有效的鬥爭。

我們將利用監獄生活中的漫長時間，來準備將來需要在法庭上所提出的辯護詞，或者不如說提出我們的起訴書。

我以為初審已經全部結束了。可是，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九日，我又被預審推事龔波先生傳呼出庭。這次是作為証人出庭的。

早晨八點鐘我被提出監獄，然後坐上囚車來到法院。開始時我被單獨關在一間牢房里。幾分鐘以後，被帶進另一間狹窄陰暗既髒且臭和豬圈一樣的牢房，面積三平方公尺，裡面已經有兩個犯人了，據說是危險人物，因此被看管得特別嚴密。

其中有一个青年，不久以前，以白鸞持械伙劫哥布蘭路珠宝店的罪名，被塞納省刑事法庭判处八年劳役。另一个是杀人犯。他們对自己的犯罪行为絲毫沒有悔改的表示。在长达六小时以上的時間內，我必須和他們一起留在这間漆黑的房間里。

我是因为政治問題而被捕的，虽已起訴，但还没有判刑，因此就应按照法律規定，在被告的罪名沒有肯定以前視為無罪。然而，我虽然为人正直，身任法国議員，达拉第政府却將我与土匪、杀人犯同等看待。

第三共和国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政府敢于对政治家加以这样的侮辱。在平时这一定会引起憤慨和不滿了。然而預审推事接到抗議書以后，却毫不予以答复。

在这間牢房里，有可能發生一場爭論、凌辱和挑衅的行为，最后终于动武，我可能因此而被这两个匪徒和杀人犯所打死。如果听到了这样的消息，达拉第政府和在議會講壇上請求給我們每人腦后一粒子彈的那些議員將會是多么愜意啊！

一次侮辱接連着一次侮辱。被粗暴地帶出这間骯髒的牢房后，我帶着手銬，像流氓一样地被押到預审推事那里去，然后又被送回桑台監獄。这次不是单独关在囚車上的小間里，而是和另一个犯人关在一起。这完全違反了行政法規以及安全規則的最低要求。由此可見，为了削弱我們的力量，剝夺我們的公权，一切手段都使用了。

但是，这些可耻的措施無論如何不能降低正直的人們对我的尊敬，它們只不过暴露了这些措施的策划者的卑鄙無耻而已。

## 第七章

### 非法撤銷共产党議員

反动分子自称他們正在作战。对,的确是这样,但并不是对希特勒作战。

他們在向法国人民,他們最好的兒子和最忠誠的代表,向誠实的共和主义者、坚持不渝的民主分子和明智的爱国主义者——法国共产党人开火。

他們在作战!請看他們在进行怎样的战争吧!

有一位議員曾在議會講台上作过如下的描述:

“轟炸机在天空盤旋,但却不扔一枚炸彈;炮彈堆集如山,但却一炮不發;大規模的軍隊互相对峙,但除偶尔有小的接触外,却彼此互相观望親伺,显然毫無作战之意。大人物們到前綫去,他們在那兒並沒有遭到机枪的襲击,却反而受到标語的欢迎,我相信前綫甚至还唱起国歌来欢迎他們。”

一位法国作家在他杰出的报道中曾把这叫做“莫明其妙的战争”。

上述这位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描繪了当前战争圖画的議員名叫讓·易巴內加雷,是一个法西斯分子,后来成了貝当的閣員。

由此可見,他已正式承認政府并未向希特勒作战。

他們正在作战!对,的确是这样,但是在对法国人民作战。

內政部長沙洛，有一天當他在上院講台上向那些可敬的上議員們顯耀他在迫害共產黨人方面的獵獲物時，曾宣布過這一點。

他的言詞就好像是一份“勝利”的捷報。

他說：“共產黨已經從組織形式和作戰陣地兩方面被摧毀了，因為我們已經破壞了它的堡壘和指揮部，破壞了它的出版機關、工會組織，並且監禁了它大量主要的戰鬥領袖。”

他在把自己描繪得似乎應該受到一次光榮的表揚、獎以反動的戰鬥十字章和勳章之後，接着說道：

“就一個正直的人看來，這一切所造成的後果，可以使那些批評政府太軟弱的人們受到教育。”

現在還算軟弱嗎？好傢伙！

所有的監獄都關滿了，集中營里滿是“嫌疑分子”，也就是說充滿了反法西斯的戰士。

克利蒙梭曾說過：“我正在戰鬥”。

达拉第和他的同謀者，他們也正在戰鬥，但是在同法國人民作戰。

他們早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就採取了宣布法國共產黨為非法的主要法令。接着又發布命令，撤銷了各個由共產黨人領導的市政機構。他們用下列納粹手段完成了上述措施：（一）用一九三九年十月五日的法令專橫地停止了共產黨議員所享有的議員特權；（二）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八日的法令停止了公務員所享有的一切合法保障；（三）最後，用所謂處理“嫌疑分子”的法令，賦予一切警察機關在地方政府領導之下將任何被懷疑為共產黨人的法國公民安置於被監視的住所的權力。自然，所有希特勒的代理人、所有的間諜則享有充分的自由以進行他們的叛國勾當。但是，共產黨依然存在着，

它不願統治者手下的鎮壓機關所進行的無休無止、日夜不停的追尋，繼續活動。

他們的敵人不是希特勒，而是法國共產黨。為了使它動搖，使它跌倒，並從而對它加以踐踏使之歸於毀滅，政府企圖給它以決定性的打擊。政府起草並送交議會調查委員一紙宣布撤銷共產黨兩院議員的法律草案，並促其立即討論。

一九四〇年一月九日星期二，在下院常會的首次會議上挑釁開始了。

議會座位上坐着四位已应征入伍的共產黨議員，他們是為了參加辯論，經過合法請假手續從部隊里回來的。這四個人是：雷蒙·葛約、夏爾·米塞爾、安德烈·麥爾西埃和費南·格勒尼埃。反動分子易巴內加雷用怒罵發出了騷動的信號：

“怎么回事，共產黨員坐在議席上！這是不能容忍的！”

這幾位共產黨員却是法國的戰士！柏貝里埃、狄克西·魏昂谷和雅克·杜博伊斯—弗勒斯內之徒，在其黨羽的叫好之下高聲怒吼起來：

“會議不能開下去了！必須休會，我們不願跟共產黨人在一起！”

主席屈服了，宣布休會。

復會時，騷動愈來愈厲害，四位共產黨員終於被一群發怒得鼻翹嘴噉、滿口白沫的瘋狗們在瘋狂地拳腳交加的攻擊之下趕出會場，從而結束了這場騷動。這般胆小鬼！他們竟全體出動來對付四個人。這四個人英勇地進行了抵抗，但是不得不在眾寡不敵和暴力面前退却。下院禁止他們再出席議會。這般胆小鬼們！從此他們彼此都是自家人了，至少他們自己以為是這樣。

一月十一日星期四，議會黨團主席聯席會議在通過了撤

銷共产党議員的法案之后，建議下院于下周进行討論。

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法西斯暴动的組織者、后来成为奸賊貝当头号警察头子、并在赴叙利亞执行叛国將軍貝当的反法使命途中淹死于地中海的法西斯分子霞普建議立即进行討論。但他碰到了一位絕無仅有的反对他的議員——法戎，他是当天早上从部队赶来的。法戎要求用“橫暴無理，不能采納”的理由对这种不合理的法案干脆加以拒絕。沒有人听取他的意見。下院一致决定在一月十六日星期二的會議上討論撤銷共产党議員的法案。究竟用甚么理由来解釋这一法案呢？不可能找出任何有效的理由来。

最凶惡的反共分子之一、陶里奧的党徒、下院議員狄克西·魏昂谷首先指出了这一点，他說：

“現在共产党議員和工会干部被監禁已經三个月了，然而我們依然沒有办法对他們提出合乎我們的法律和公理的控訴。”

他并且进一步指出：

“他們改組了被解散的集团，事实上这就是为了便于参加議會委员会的工作而組成的議員团体。至于写给赫里欧議長先生的那封信，我們可以說，这并不能作为一个重大案件的那怕是部分的根据。”

然而，他居然不顧这种自白，向下院宣布他將主張撤銷共产党議員，虽然这些議員还没有成为任何罪刑的承担者。

“对，我們都將投票贊成这一法案”，全体議員附和着說。“但是当我們把共产党議員赶出議會之后，共产主义在国内还是会存在的。”

于是他們又进一步指明撤銷共产党議員只不过是步驟之一，事情應該干得更徹底一些。他們向政府叫嚷道：

“必須摧毀共產黨地下組織的活動，僅僅宣布‘共產主義是我們的敵人’是不夠的，我們應該用盡一切辦法追尋其蹤跡，設法打擊和肅清它。為了摧毀共產黨，首先應該去掉它的首腦，用錘子把這些毒蛇的頭給斬掉。”

法律草案的報告人是後來因為與維希政府和希特勒合作而被處以死刑的社會黨議員喬治·巴特雷米，他高聲嚷道：

“我們很遺憾兩院僅僅有權宣布撤銷共產黨議員。不過我們已經決定讓這一措施成為展開廣泛行動的序幕。打擊應該是快而且狠的。”

另外一位社會黨議員弗朗索瓦·夏塞尼發言表示擁護，他的論調是：

“應該使共產黨的首腦處於不能為害的狀態。我們不僅不願意政府軟弱無能，並且要求政府堅強，遺憾的是政府有時在這一點上不能做得更好一些。”

於是這位後來成為貝當的部長的先生，進而要求槍斃共產黨人。他說：

“我們過去應當在議會講台上提出的，而且——因為我曾經在共產黨內待過，知道它的某些秘密——我曾經徒勞無功地向政府請求過的，便是當戰爭一開始就採取必要的措施，不經過其他法律手續，給某些共產黨分子腦後一顆子彈。”

而法律草案的報告人巴特雷米則在此後利用另一次機會，趁下院在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日開會時，用下列論調重申了他的社會黨同伙的願望：

“說起來他們都或多或少地犯了罪，不過其中有些首腦如多列士、卡特拉以及很多其他的人，則應該立即讓他們到軍事法庭去受審，接着並請他們尝尝巴黎斷頭台上鋸刀的滋味，而不是拖去槍斃，因為槍斃對他們未免太光彩了。”

但是，所有这一切瘋狂的叫囂与憤怒的咒罵，所有这一切关于施行迫害、鎮压、謀杀的神經質的号召，既不能代替应有的辯論，也不能証明这一法案的合理性。

很显然，按照一八五二年所公布、以及被下院一九〇一年三月四日會議所認為仍然有效的法令第二十八条之規定，只有当一个議員在其任期內被判处罪刑并因此取消了被选举权的时候，才能撤銷其議員資格。因此，除了事先曾受有关剝夺政治权利的刑事处分以外，議員資格是不能被撤銷的。这不是我們的情况，因为現在連預审也还未結束，还没有作出提交任何法庭受审的裁决。

正如議員德魯峨在他發言中所指出的那样：

“截至目前为止，共产党議員还未受到絲毫此种处分，而且甚至連任何一种可以使他們受到此种处分的罪名也沒有找到。”

在重复了一番法西斯分子狄克西·魏昂谷所引証过的理由之后，德魯峨強調指出了“用以控告共产党議員的罪名都是很輕的”。

所以，既無事先剝夺政治权利的刑事处分，也找不到可以判处这种处分的罪名，可見撤銷共产党議員的法案是毫無根据的。然而德魯峨也跟其他的議員一样，請求撤銷共产党議員。这是作为一个特殊的法案提出的，但他們仍然投票贊成。

德阿和馬尔盖所操縱的新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领导人路多威克—奧斯加·福罗薩在發言时也情不自禁地指出：

“撤銷議員資格从来都是由法庭正式宣布判处刑事处分的直接、正常、自然的結果和結論，因之当我们通过这类法案时，我們所需要做的，好像只是对于司法当局在經過一切正常



的法律手續之后所宣布的罪行加以确定而已。而現在則是我們即將通过这样一个法案，它沒有事先的刑事处分，毫不顧及最根本的法律保障，也沒有經過反对方面的辯論。而且还要追究既往，这就更加显得專制武断了。”

然而这位剛剛指出本法案違反了根本的法律保障、缺乏不同意見的辯論以及具有追究既往的專断性的議員福罗薩在作結論时却說道：“但不管怎样，我們还是應該投票贊成这一法案。”

这同样也是那位向希特勒、墨索里尼、張伯倫和达拉第等人拍电致賀的佛朗丹的意見，这也是共和联盟党人弗朗索瓦·馬丁和天主教民主党人恩斯特·柏哲的意見。

在各党派之間，仅仅在执行撤銷法令的日期和对待某些懦夫叛徒的或寬或严的問題上有不同的意見。

有的主張从十月一日开始，有的主張同月二十六日，另一些人則主張一九四〇年一月九日。

这种在年月日和在某些字面上的分歧，适足以証明他們在需要撤銷共产党議員的人民代表資格这一根本問題上的一致，而这种資格則是只有人民才能撤銷的。

从社会党人起到習慣上所謂的極右派止，在所有的議員中，仅仅有一个人起而对那些厕身于大資產階級行列中的希特勒的代理人作強烈的反抗，并指出他們的無恥叛国勾当，指責政府——它的鎮压力量只用来对付共产党人——的罪惡态度。

这位議員名叫亨利·德·克里利斯。他的發言句句被插話、漫罵和凌辱所打断。在这一場是而且只可能是以唯一效忠于人民和共和国的法国共产党为目标的論战中，他向佛蘭亭、斯卡彼尼之流和褐衫队的“精华”提出了控訴并表現得勇

气十足。

那些拥有托辣斯的巨头和銀行老板們的战斗口号并不是“打倒希特勒！”他們的战斗口号是：“共产主义就是我們的敌人”，“把共产党员关到监牢里去”，“吊死共产党人”，“歼灭共产党人”。

但是，在下院的議席上，仍然有兩位共产党議員給予他們以英勇的还击。这便是法戎和阿德里安·穆栋。由于他們是軍人，沒有能及时請准假，因而也就沒能跟葛約、米塞尔、麦尔西埃和格勒尼埃一道出席本屆會議的首次會議，所以也就沒有像他們一样受到被驅逐的不公平的制裁。迟到成了他們所以能够出席的原因。

法戎利用这一机会使議會听到了法国共产党的声音。他宣称：

“下院正在投票表决撤銷共产党議會党团成員的資格的法案，这些議員在迫害的打击下，拒絕否定自己的过去，拒絕抛弃自己的理想和离弃橫被解散了的党。

“除了几个特殊的例子以外，你們正准备表决通过的这一措施所要对付的議員早已被排斥于本會議之外了。实际上从十月初开始，政府已下令逮捕他們，下令不經审判就以普通罪犯待遇將他們投入監獄。

“我要对这些議員的被無理監禁提出最强烈的抗議。我要求恢复这些橫被監禁的議員們的自由。

“我站在議會講台上，向被監禁的同志和朋友們致以兄弟般的敬礼，并向他們保證，当有些人因为受不了打击而变节的时候，我个人將永远和他們團結在一起。

“我和这些同志們，我們是永远毫不动摇地忠实于我們的共同信念的。

“談到向我們提出的這一法案，我的意見正像我在上一次會議中所曾經說過的一樣，是請求下院認為這是不可接受的並且干脆加以否決。

“如果要从法律方面着眼的話，那么我只須指出你們所準備剝奪他們的特權的議員們从当选的那天起，并未受到任何刑事处分这一点就行了。因此，撤銷他們的資格是專橫而非法的舉動。

“但是，先生們，这在我看來还只不过是問題的次要的一面，因为在今天，你們似乎可以很隨便地把你們所認為眼中釘的人們監禁起来，这方面我已經舉過一些例子了。

“我認為更重要的是要提醒大家：不管人們願意与否，我們是普選的当选者。做为人民的代表，我們認為关于我們的議員資格問題只有人民才有權利發言，也只有向人民我們才应当有所交代。

“而現在，你們竟企圖代替全体人民，專橫地撤銷一部分法国居民所任命的代表。因此，关于撤銷我們的議員資格的投票，將是对于民主原則的罪惡彰著的破坏，而你們却居然敢于自称为这些原則的保衛者。

“真的，政府并没有等到今天才动手消灭那一点点民主自由。但是时至今日，資產階級民主的真正內容已經全部被大家看清楚了。

“你們准备采取来对付我們的手段，正是專橫地逮捕未应征入伍的共产党議員的行為的繼續；是在我看来簡直是無恥地把議員驅逐出會場的手段的繼續；是对四位按規定被召集来开會的議員加以漫罵，并把由他們的瘋狂的政敌所挑引起来的事件归咎于他們的行為的繼續。

“这是解散共产党和工人階級的最強大的工会組織、逮捕

成百的工会代表、建立集中营、頒布处理‘嫌疑分子’法令、对千百万劳动人民施行迫害——而他們的罪名則是不肯向你們所保衛的大资产阶级的独裁屈膝——等行为的續演。

“显然，你們企圖引用德苏互不侵犯条約的签定和你們所謂的苏联对芬蘭的侵略等国际事件，来替自己的反共暴行和撤銷我們的議員資格的法案作辯护。

“但是，先生們，你們中間有些人也正如同我們一样清楚地知道：从巴黎和倫敦的角度看来，芬蘭領土随时可能用来作为襲击苏联和扩大战争的基地。

“也許正由于上面我所指出的計劃的破产，于是某些不久以前还参加了国际帝国主义者扼杀西班牙共和国事件的人們，今天又搖身一变，以民族独立的保衛者自居了。

“要对政府的理由加以駁斥是很容易的，只須引用一些它自己的言論就成了。

“在政府新近公布的黄皮書里，我們可以从第一四〇号文件中看到当时外交部長乔治·龐納先生在和德国駐法大使会談时所作的下述紀錄：‘我向大使談到他可以看到在法国所掀起的支持政府的全国性运动。选举將被停止，公共集会將遭受取締，一切外国的宣傳，不問其性質如何均將被禁止，共产党將被制服。’

“这是一九三九年七月一日的談話紀錄，也就是說在德苏互不侵犯条約簽訂前好几个星期的事情。

“因此德苏互不侵犯条約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迫害計劃是早在此一条約签定之前就决定了的，而今天司法部長龐納只不过在履行他在去年七月一日作为外交部長时向德国大使所作的諾言罢了。

“事实上你們对共产党人所采取的手段，其真正用意是瞞

不过我們国家的大多数劳动人民的。

“在你們消除国内一切自由权利的同时，虽然你們厚顏無恥地宣傳正在进行一場保衛自由的战争，但你們所实行的迫害措施，却使得大多数劳动人民認識清楚了你們所进行的這場战争的真正性質。

“劳动人民將會很有根据地从我們的被撤銷議員資格和你們所奉行的破坏社会法律、对工資收入增加額外捐稅、使农民和小商人归于破产以及物价經常上漲的政策之間找出因果关系来。

“我們必須指出，这一打击劳动群众的政策实施，是受到下院包括社会党在內的所有党派的支持的。

“正因为你們知道人民反对这一政策，所以你們便解散他們的組織，打击他們最优秀的保衛者。

“执政諸公：今天你們可以迫害我們，把我們当中的某些人抓进監獄，把他們趕出議會。

“但是，你們却無法摧毀法国人民的意志，無法摧毀他們保衛社会成果的意志，这种成果是他們在过去的斗争中所得到的收获，也無法摧毀他們使社会、經濟、政治更加向前發展的意志。

“尽管你們發布命令、进行迫害，然而人民的意志却仍然会表現出来，它总有一天会比你們更加强大大。

“至于我們，我以我个人、我的同志和朋友穆栋以及被关在桑台監獄里面的同志和朋友們的名义再重复一次，我們將繼續对工人階級的事業、法国人民真正的事業、社会主义的事業效忠到底。”

法戎的每一句話都被粗暴的叫囂声所打断。其中社会党議員馬克斯·勒热內的橫蛮的打扰和卑鄙的漫罵，显得特別突

出。但是法戎仍然完滿地完成了黨的領導所交給他的困難而又危險的任務。他一到巴黎就和黨的領導取得了聯繫。

整個下院只有法戎和穆棟起而保衛共和國的法律和法國的民主傳統。當撤銷共產黨議員的法律草案付諸表決時，在五百二十四個投票人中，有五百二十二票贊成兩票反對。投這兩張反對票的便是法戎和穆棟。

不過為了使這一違反公理和令人憤慨的、剝奪一百五十萬法國選民在議會中的合法代表的法案，得到法律上的效力，還須經過上院的批准。上院也和下院一樣將會通過這一法案，因為它關係到不是反對法西斯而是反對法國共產黨的一種鬥爭手段，這一點在上院和下院是一致的。然而某些上議員採取了棄權的方式，因此就避免了用他們的投票權來贊成這一違反公理的法案。

反對共產黨議員的法律程序的荒唐性、對他們控告的非法性，以及監禁共產黨人的專橫性是如此昭然若揭，以致這一法案的擁護者馬克斯·杜摩阿本人也感覺到不得不引用下面這一後來變成了殘酷事實的假設，以表示自己對這一法案的某些保留：

“現在有不少議員正在部隊里，而這一場莫明其妙的戰爭也許不會永遠像目前這樣繼續下去。因此在我們所要撤銷其資格的議員當中，如果有人像其他的士兵一樣，履行他的義務，僅僅是履行他的義務而在戰場上犧牲了，人們將在他的墓碑上寫着：‘為祖國而犧牲’，但我請求你們不要在這上面同時也寫下‘曾被法國議會開除’的字樣。”

當一切都已解釋完畢之後，便投票表決。票數統計的結果如下：在參加表決的二百九十四人中，贊成者二九四票，反對者零票。六人棄權。於是這一草案就變成了法律。這一法

律是在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日公布的，刊登在一月二十一日  
的“政府公报”上。原文如下：

### 关于撤销某些議員的法令

“茲經上下兩院通过并由共和国总统公布下述法律：

“第一条：自本法律公布之日起，所有一切代議机关的成員，凡曾参加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关于解散共产党組織的法令所指出之共产国际法国支部，而又未于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以前公开提出申請或發表声明，断然表示退出共产党和不参加任何为上述法令所禁止之活动者，均得撤销其議員資格。

“第二条：本法律适用于立法會議之成員时，得由政府提出請求，經上院或下院批准之；

“适用于其他代議机关之成員时，則由地方行政長官提出請求，由地方政府依法执行之。

“第三条：所有前述成員，在按第一条之規定办理退出手續或公开发表声明之后，由于違反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之法令因而被判罪者，均得按本法律之規定，自罪刑确定之日起，撤销其議員資格。

“本法律曾經上下兩院討論通过，今后將作为国家法律施行。

共和国总统

阿尔培·勒布蘭

內閣总理兼国防部長外交部長

爱德华·达拉第

副总理

卡密尔·蕭 当

掌璽官兼司法部長

乔治·龐 納

內政部長

阿尔培·沙 洛

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日于巴黎。”

上下兩院这一荒唐無恥的決議在全国範圍內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極大不滿。

从法国的各个角落，从城市到乡村，都發出了电报和信件，对于正在进行“莫明其妙的战争”的政府提出了强烈的抗議。政府的一切活动都是反对人民的，人民很清楚地知道，从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以及工会組織被摧毀以来，他們便毫無保障地被置身于大資本家和反动独裁政府沉重的枷鎖之下了。

不过上下兩院还有另一樁事情要作。他們还得按照这一罪惡法律的規定，对于“沒有在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七日以前公开提出申請或發表声明退出共产党”的共产党議員实行撤銷資格的处分。

下院和上院制定了一个名單，上面登記着一些叛徒的名字，这些人或者由于个人利益，或者由于懦弱，曾經否認了他們要效忠人民、共产党和共和国的誓言。下院決定在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二的第二次會議上执行这一法令，上院則定于同月二十九日的會議上执行。

御用議會投票通过这一荒唐無恥的法案，不仅远沒有吓退法国共产党人，却反而加强了他們的活動。政府向工人階級进攻、支援芬蘭法西斯党徒和在叙利亞准备反苏战争的罪惡政策，以及对希特勒德国从来一彈不發，任其自由自在地完成動員和准备侵略軍的因循容忍的罪惡政策，日甚一日地遭



到了人民的反抗。然而下院终于以四九八票对零票撤销了共产党議員。当时沒有共产党議員出席議會。已应征入伍的法共議員在部队里沒有回来，其余的則被关在監獄或轉入地下了。同样的把戏也在上院献演过，仅仅有一位上議員提出了抗議，那便是亞历山大·巴歇萊。

問題是在討論撤销加香の議員資格时引起的。

加香在上院特設委員會的訊問面前，驕傲、高尚而勇敢地替法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作了辯护，并拒絕在脫党的声明書上签字，因为这將無异于否定他那全心全意为工人階級和法国人民服务的一生。

巴歇萊在發言中着重指出了这一点：

“加香不願意改变操守，他認為永远忠实于他的党的理論是光荣的事情。我必須指出：不管怎样，他的这种态度是相当高尚的。”

他剛說完这几句話，瘋狂的抗議便野蛮地打断了他的發言。主席和上議員們提請他注意議事日程，企圖阻撓他發言，并用撤销其發言权来恐吓他。

当會場重新平靜下来时，一位上議員起立發言。發言者是法国社会党人杜摩阿。他宣称：“我只想指出一点：巴歇萊先生仅仅是以个人身份而不是代表社会党發言的。”

事实的确如此，社会党——它的領袖們要求用子彈或断头台上的鋸刀来对付共产党人——絕不願意跟那些受共和、民主和真正社会主义的思想所感召的人們站在一起，社会党对这些人是抱否定态度的。

于是上院也跟下院一样，撤销了共产党議員的議員資格。

当我得知这一絕對違反一切共和傳統的非正义的決議以后，便立即从桑台監獄写信給下院議長，以表示憤怒的抗議。

該信原文如下：

“致巴黎國民議會議長先生。

“議長先生：

“我是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大戰時的法國戰士，一九一四年九月在蒙米拉依，當我帶着全排前進的時候，曾受過重傷并被昇為連長；此後并于一九一六年在香檳省的前哨陣地梅尼爾嶺被俘。我父親是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戰爭中的法國戰士，曾在巴波姆戰役受過傷。我的兩個兒子是法國現役軍人。正是由于這種地道的法國人的身份，我才義不容辭地對於違反正義的撤銷議員資格的法案提出最強烈的抗議。這一法案企圖破壞我作為議員的榮譽，侵犯我的公民權利并且損害我作為家長的尊嚴。

“剛才我聽到了關於兩院討論時的情況。

“一月十六日星期二的下院會議和同月十九日星期五的上院會議變成了兩個多么奇怪的法庭呵，因為它們把一批真正的法國人判了罪，卻不給他們發表他們自己的辯護詞的權利。

“他們沒有下令進行預審，沒有進行任何訊問，沒有將案情通知被告，沒有對他們宣讀起訴書，使他們知道被控告的理由，沒有召集証人進行對質，也不容許作任何辯護。總之，任何保障都沒有了。

“該決議的通過是沒有經過任何對審辯論的。

“我相信在每個文明國家的歷史中，從來不曾有過這樣彰明較著地破壞最根本的公理標準和這樣完全置神聖的人權原則于不顧的例子。

“這種手段是違反共和傳統的。

“我被囚禁在普通罪犯的牢房里，與外界完全隔絕，得不

到任何客觀的消息和重要的資料，甚至連議會主管委員會的報告也不能夠看到。

“就這樣，從今以後你們就可以陷害好人，用誹謗和謊言去誣衊他們而不給他們為自己的正確理由進行辯護的機會。

“我自己是問心無愧的。

“你們儘管來檢查我的一生吧！

“你們可以調查我的最微小的生活細節，但卻不可能發現任何小的污點。我曾用我畢生的全部力量服務於祖國和它的人民。

“我的孩子們不會因他們的父親感到羞辱，他們可以自豪地勇往直前而決不會抬不起頭來。他們知道他們的父親是一個忠實於公共利益的公民，他行使了自己的不可侵犯的權利，盡到了作為法國議員的神聖責任。

“你們決不能在我的一生中找出任何違反祖國的幸福、自由、和平與尊嚴的行動。

“我從來沒有從外國政府那裡接受指示。我永遠為法國人民最人道最高尚的情感所鼓舞。

“我從來沒有貪污一分一毫；從來不曾和那些為亞貝茲所豢養的間諜走狗們來往；從來沒有在秘密軍械庫裡儲藏用來殺害法國人民的外國軍火。

“我從來沒有同意過簽訂任何協定，把捷克斯洛伐克這一堅固堡壘的鎖鑰交給希特勒，放棄歐洲中部最重要的戰略基地。

“我有和政府相反的政見，而這是我的權利。難道這也足以構成把我當作嫌疑分子、關進監獄並被置於國家放逐令之下嗎？

“如果可以不顧憲法的規定，擅自破壞國家的代議機關，

取消一百五十万公民在議會里的直接和合法的代表，那么普遍选举制也就只不过是一个騙人的幌子了。

“既然在沒有商得选举团体同意前，就用特殊措施如此專橫地改变了議會中的成份，那末今后还有甚么法律及其效力可言呢？”

“今后議會中的自由、独立、客觀性和立法权已經不可能繼續存在，因为事实上宪法第十三条的規定已被取消了。該条文規定：

‘上下兩院議員在行使其职权时，不得因發表言論或进行投票而受到控告或追究。’

“我也不相信任何人有权可以用祖国的名义，来作为掩飾他以我和我的某些同志們为牺牲品的排斥异己的严刑峻法的借口，因为在我們共和国所有的学校教育中，祖国这一概念与权利、公理和自由是不可分割的。

“而当人們扼杀自由、摒弃公理与侵犯人民权利的时候，也就同时損害了祖国，毀灭了法国世世代代的人民經過几世紀所积累起来的文明遗产。

“事实上你們所控告的只不过是我们个人信念，我們的政治理想，我們的共产主义哲学和我們对自己政治綱領的忠誠。

“你們所引用来對我們进行迫害的国际协定，只不过是為了把我們排斥于法国政治生活之外的一种遁詞、借口和手段而已。这一点我已从法国政府最近發表的外交文件黃皮書中找到了無可否認的証据。实际上，在第一七〇頁——第一四〇号文件——外交部長龐納在一九三九年七月一日与德国駐巴黎大使韋尔采克伯爵的談話紀錄中，我看到下面一段重要的文字：

‘最后：我向大使談到他可以看到在法国所掀起的支持政府的全国性运动。选举將被停止，公共集会將遭受取締，一切外国的宣傳企圖，不問其性質如何，均將被禁止，共产党將被制服。’

“我必須強調指出，这是一九三九年七月一日的紀錄。

“由此可以看出你們用來做兒子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約只不过是一种借口，因为迫害行动至少是在該条約締結之前七個星期便决定了的。

“的确，議長先生，我深深感觉到遭受了違反正义的打击，但我并不感觉到自己是被撤銷了，因为我从沒作过有損榮譽的事情。相反地，我因为受到所有善良人們对我的尊重而感到自豪。不管他們在政見上是敌人或朋友，只要他們是維護人权、热爱公理和自由的。

“如果我不向你提出这次抗議，那我將等于疏忽了自己的职务，并將受到良心的譴責。

“我相信你將會用心閱讀这封抗議書。不管你的意見怎样，我希望你能考虑这封信是一个既不畏懼也無怨言的公民写来的，他的全副精力，都孜孜不倦地用来使法国成为一个放射着智慧的光芒、它的独立受到羡慕、并能以它的社会进步而驕傲、以它的傳統和人民的成就而自豪的国家，用来使法国能够站在那些自由国家和摆脱了人与人間一切剝削关系的民族的前列。

“議長先生，請接受我崇高的敬礼。

弗洛里蒙·邦特

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三日于

桑台監獄八部第二十七号牢房”

但結果是連一紙簡單的收据也沒有得到。

我們所受的待遇比普通刑事犯还坏。他們是在經過辯護之后才被宣判的。而我們居然在預審還沒有結束、我們还未發一言之前就被撤銷了議員資格。這事實上只不过是因為我們是共產黨人，是地道的愛國者和真正的法國人而已。

## 第八章

### 移送軍事法庭

暫時恢復自由的請求被拒絕了。

改受政治犯待遇的請求被拒絕了。

我的妻子英勇奔走營救，向下院議長和各個部長提出請求，然而毫無結果。

到處是碰壁，始終是碰壁。

我們受着普通罪犯的待遇：住在長寬不超過四步，對角不超過五步的牢房里；有時可以和辯護律師談上一刻鐘；每星期有三、五分鐘的時間，在看守的監視下，在兩排相距一公尺的鐵欄後面會一次客人。這就是全部生活。其餘的時間留在牢房里，而二十四小時內，有十二小時是在黑暗中度過的。我們像囚在鐵籠里的獅子、躺在棺材中的活人一樣地生活着。

我們和外界失掉了聯繫，對於外面的事物毫無所知，或者知道得很少。所得到的都是些片斷的消息，還得拚湊起來才能略知梗概。在這種情況下就只好全憑猜測臆斷了。

有一天，管理信件的軍官找我去，告訴我有一封我妻子的來信不能給我。這封信被沒收了。並將收到我的檔案中去，直到恢復自由時再給我。這種決定的理由是這封信的內容超出了私人範圍。實際上信內裝的是幾份關於作戰情況的“政府公報”，而這是被禁止的。我的兩個兒子塞爾吉和皮埃爾早已應征入伍，他們是否安全，前綫是平靜還是活動頻繁，我都

沒權利知道。

我們處身于囹圄之中，但在一九四〇年二月七日，居然發生了一件我們認為是非常特殊的事情。這一天，我們就好像置身在下院办公室里出席共產黨議會黨團或者法國工农議員團的會議一樣。

我們全都聚集在一間辯護律師的會客室里，听候巴黎第三軍事法庭預審推事馬沙克的文書宣布將我們移送軍事法庭受審的命令。文書告訴我們：一九四〇年二月五日，檢察官曾控告我們違反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六的法令，提出起訴，這道命令便是根據該起訴書頒發的。

所有關在桑台監獄的共產黨議員全體在場，听文書宣讀命令原文。

“法蘭西共和國，巴黎第三常設軍事法庭。

“下列各被告以違反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六日解散共產黨組織之法令被控，業經初審完畢，計開：一、巴列爾，二、巴托里尼，三、貝沙，四、貝諾瓦，五、白利奧茲，六、皮佑，七、邦特，八、勃蘭，九、卡特拉，十、高納凡，十一、高索諾，十二、高斯德，十三、克里士多福，十四、克羅阿查，十五、達多，十六、德繆索阿，十七、雅克·杜克洛，十八、讓·杜克洛，十九、杜迪佑，二〇、法戎，二一、賈武，二二、格萊查，二三、讓，即讓·雷諾，二四、拉勒普，二五、勒維，二六、羅哲萊，二七、馬戴爾，二八、米道爾，二九、蒙慕梭，三〇、莫蓋，三一、繆斯摩，三二、貝里，三三、柏蒂，三四、菲利波，三五、普拉晒，三六、普勞特，三七、布雪，三八、拉斐特，三九、李加爾，四〇、羅歇，四一、多列士，四二、狄戎，四三、杜沙，四四、瓦哲宜。

“上列被告，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七日至十月五日期間（每人開始活動的時期尚未確定），在巴黎以及法國領土內，曾



參加成立所謂‘法國工农議員團’的工作和活動，特別是曾參加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致下院議長的信件的起草和散發，并同時在蘇聯授意下侈談和平，直接或間接地傳布第三國際和實際受第三國際控制之機構所發出的口號。根據初審結果，此等罪名均已充分証實。

“上述事實已構成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六日法令第一、三、四諸款所列举应予懲處之罪行，該法令系根據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九日之法律而頒布者。

“據此，茲決定將上列四十四名被告移送巴黎第三常設軍事法庭，以便依法審理。

巴黎第三常設軍事法庭預審推事

馬沙克上尉(簽署)

一九四〇年二月五日于

巴黎法院辦公室。

本副本驗明無誤：文書……”

我們之中，除了少數人曾在接見律師時，或在走廊里、會客室、醫務所、理髮室、放風場以及法堂上偶爾相遇外，大家已經有三個月不見面了。

我們一致對上述裁決提出了嚴重抗議，并同時聲明反對這一紙命令和極力要求自己對於作為法國議員所作行動負責的權利。

文書為自己辯護：這不關他的事，他只不過是完成行政任務，按照命令辦事而已。他把簽名紙交給了我們。大家輪流簽了名，然後我們交換感想。從去年十月以來，這還是第一次有機會在一起談談我們自己的情況。

每個人情緒都很高，對將來抱着堅定的信心。決計將來在軍事法庭受審時，不以被告或負責人的姿態出現，而是以原

告、債權人的姿態出現；下定決心，爭取我們應該得到的權利，大胆地說出想說的一切，毫不隱諱；並且我們可以根据材料證明真正的罪犯正隱藏在政府和議會內部，他們的首領便是內閣總理。

我們談話的聲音愈來愈大，响徹了整个走廊。看守們感到不安，去告訴了看守長。看守長匆匆趕來。監獄領導方面也惊動了。這種情形在桑台監獄的非政治犯中是從來不曾有過的。

副典獄長趕到了。他要求大家肅靜。

我們告訴他，是預審推事命令我們到這兒來的，因此只有預審推事和他的代表才有權利給我們提意見。副典獄長冷靜下來，催促文書趕快把手續办好。我們繼續談論着。我們質問副典獄長並且對他說：

“我們不應該被囚禁。我們是真正的法國人民。我們的鞋上沾有法國的泥土，這一片法國的土地會得到我們中的許多人和我們的祖先們的鮮血的灌溉，而目前我們的孩子們正在這一片土地上馳騁着，他們或者是在戰區，或者是在前綫，或者是在靠近前綫的地方。那些誣蔑我們、囚禁我們的人之中有幾個能這樣講呢？這批人憎恨我們，對我們進行控告，但人民却是尊敬和愛戴我們的。”

副典獄長一聲不响。

我們大家約定要做好準備工作，以便將來在法庭上提出有力而無情的反駁。

當大家在申訴書上簽名完畢後，文書馬上走開了。

看守重新把我們帶回牢房。

我們曾經得到准許，每人買了一本黑色漆皮的練習簿，在這本練習簿上，我們將記下我們的證據和理由，準備在審訊時引用。

日子依然在單調沉寂之中過去。我們對於所提抗議的結果並沒有存任何幻想。法官和檢察官們只是奉命行事而已。當上面下了命令的時候，他們便只有服從。

一個月以後，三月十二日，我們的辯護律師終於帶來了消息。在法院里大家傳說着：我們的申訴已經被拒絕了。我們的訟案的日期可能確定在三月的第三個星期里。

現在，我們必須緊張地準備辯護詞，將我們的最后聲明修改妥貼。再也不能白白放過一分鐘的時間。通過辯護律師，我們可以互通信息，使彼此知道大家有些什麼意見和論點。

第二天，三月十三日，我們得到了確實的消息：我們的訟案將在三月二十日星期三上午九時開始。

一個少校，一個上尉和一個中士來正式通知我們。他們帶來一九四〇年三月七日起訴書的副本，原件已由二級軍法官路易·羅里歐以巴黎第三軍事法庭檢察官的身份在二月二十四日於巴黎法院檢察官辦公室提出。

被告共四十四名。全體共產黨議員再度集聚在一間辯護律師的會客室里，由副檢察官布呂贊少校向我們宣讀起訴書的摘要。然後他給每人發了一份打印的副本。

我們又回到自己的“房間”。

回到八部第二十七號以後，我開始閱讀起訴書，讀時不禁大吃一驚。我發現起訴書所根據的文件是偽造的。一點也不錯，我發現了這件令人吃驚的事情：起訴書中引用的信件已經被大加篡改，面目全非了。

這種篡改是異常嚴重的，這樣一來，原信失掉了申請召開議會的內部文件的性質，而換上了純然是宣言之類的語調。

而這正合乎政府和檢察官們的需要。他們企圖借此使他們所已採取的控訴、監禁、撤銷議員資格、移送軍事法庭審訊、

以及判处严刑等措施，在不了解全面情况而被蒙混欺騙了的公共輿論面前，显得似乎是公正合法的。而如果引用原文，他們便無法达到这一点。这就是他們为什么要窜改原信以遂其陰謀的原因。

以后在审讯过程中，我們才知道原信始終保存在下院議長的档案里，沒有被拿出来。經過我們一再坚决要求，只是在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一日正式审讯辯論时，原信才被交出来。

原告方面伪造文件这件事提到法庭上以后，法庭不得不行文司法部長，請求將原信交出。

司法部長手里沒有这份文件，他不得不写信請赫里欧把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所收到的致下院議長的信件提交巴黎第三軍事法庭，以便作为正在进行中的辯論的参考。

但是，就是这位下院議長赫里欧先生，他过去从来沒有犹豫过：当他將法共議員送交警察局的时候，他沒有講过話；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他也曾毫不遲疑地將我非法逐出議會會場；而現在在接到司法部長来信后，居然要顧慮重重了。

赫里欧認為不能在未得到下院命令以前，擅自將这份重要的議會文件交出来。

因此在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一日他將这一問題提交議會討論，而議會討論的結果，也只好是下令交出原信。

就是这样，我在三月十三日發現了控告的根据是伪造的，而伪造者正是司法当局本身。

在引用来作为控告的主要根据之一的文件中，既發現了与原文严重不符的情形，因此移送軍事法庭的命令、起訴書以及繼此而来的一切法律程序都成了問題。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公平正直，超然独立而深明职责的法官都應該宣布移送軍事法庭的命令和起訴書为無效，当然也

就是宣布整个訴訟程序为無效。

再过几天，在这场非法訴訟的辯論过程中，我們就可以看出在法国是否还有真正名副其实的法官存在。

当然，結論总是要有的。但是不管他們作出什么結論，有一件事將是主要的：那就是我自己良心的判決，以及一切善良的人們眼中的评价。

無論如何，我不会退讓分毫，这是肯定的。初审时所講过的話，以及一切应当講的話，我將一字不差，甚至一个标点也不改变地講出来。只要有自由發言的机会，我將說出我所要講的一切。我感觉身心都很健壯。我將帶着散步一样的心情走上法庭，以永远忠誠于我們的政綱和共产主义的信念的名副其实的人民代表大会来要求自己，以共产党员和法国人来要求自己。不管会發生什么事故，我已經尽到了自己的职责，过去是这样，將來也永远这样。

## 第二部

### 第九章

#### 卑怯的原告达拉第和龐納

我最后一次搜索了我的口袋。

我从口袋里拿出一束紙，这是我的筆記。很好。我又把它们放进了口袋。摸摸口袋，全都在身上，好極了！把整个牢房又看了一眼，沒有忘記什么。看守催了。好，出發吧！我和同志們都走到靠近登記处的監獄的大厅里去。

典獄長、副典獄長、看守長和大批看守都在那兒。我們按姓名字母的次序排成一行。我右边是皮佑，左边是高納凡。大厅的門开了。在進門的院子里可以看見三輛綠色布蓬的軍用大卡車。大批警察出动了。为了監視我們，保證我們的“安全”，居然出动了五十來名武裝的首都警備部隊，帶隊的是一个中尉，以及近百名警察和便衣警察。此外甚至还有十來名摩托兵。点名輪到我們時，我們便上前一步，每人由一个衛兵特別看守着，并被帶上卡車。在大厅里点过一次名，在院子里点过一次名，上車前又点了一次名。

我还忘記了一点：每人都被很仔細地搜查过。事前防范得無微不至，即使对于土匪也从来不会如此周到。

終於監獄的兩扇大門开了，警察們出来，排在对面長長的人行道上，立正站着，旁边是一个咖啡店，招牌上写着“祝君健康”<sup>①</sup>。

馬達噼噼拍拍發動了。摩托車兵斜背着卡賓槍，走在卡車前後。我們一行開始向法院進發。我們的案件，也就是說控告我們的那批人的案件，在上午九點鐘就要馬上開始審理了。

一路上毫不停留，即使在十字街口也無須等待。旁的車輛聽見交通警察的哨子聲便應該停下來，讓我們優先通過。於是，共產黨議員們過去了……綠色布蓬的卡車在兩旁好奇而莫明所以的人群中開了過去。

進到法院，在院子里下車，經過走廊和鋪着地板的房間，走上螺旋形石梯，最後在一間方形的候審室停下來。我們毫不感到侷促，就像是在圖書館，或者是在下院委員會辦公室或會議室里一樣。

警備部隊帶隊的中尉做了一個手勢，大家安靜下來。聽說法官們剛才已經入庭了。我們得準備起來，馬上就會輪到我們。但是十分鐘過去了，一刻鐘過去了，我們還沒有被帶進去。

聽說審判長正在和辯護律師們爭論。律師中有些已經有十五年、二十年乃至三、四十年的工作經驗，由於他們從來沒有逾越過律師行業的規範，因此在同業中的聲望很高。

審判長最初在談到我們以及我們的辯護律師時，發言中隱約之間含有濃厚的威脅意味。這一點是我們以後才知道的。

審判長表示：他將堅持不容許我們超越法庭所受理的事實範圍，不容許我們發表與本案無關的聲明，或牽連與本案辯論無關的任何人。

這樣一來，在經過下院議長、預審推事、以及檢察官的專

---

① “祝君健康”為雙關語。“A la bonne Santé”亦可了解為：“請進桑台監獄”。——譯者

断举措以后，我們又要受到这位审判長的制裁摆布了！

于是，达拉第在处心积虑清除了議會中的异己者以后，曾經在議會講壇上針對我們这批人民代表作过卑鄙無耻的毀謗性的控訴，而我們竟被剝夺了控告达拉第的权利。

但是，我們的辯护律師馬上起而給以严厉的駁斥。他們說：

“我們知道，律師行業中規定了一些我們必須遵奉的义务和职责，然而我們也知道，另外还規定了一些我們可以享受的自由权利和保証。我們想要合法忠实地按照規定利用这些权利和保証。”

他們接着指出：只要不超出本案的範圍，他們准备对审讯中提出的一切問題加以全面考虑。無論如何，他們坚持必須利用法律上所承認的一切权利来进行辯护。只是在經過了這場最初的論战以后，被告們才被傳呼出庭。

我們按着姓名字母的次序，魚貫而入，走进被告席。最先看見的只是一些長凳，于是我們跨过长凳走向前去。

我的座位在第一排，找到座位后就坐下了。

現在我所注意的不是那些坐在按照慣例鋪着綠台布的法官席上的大大小小的軍官們，而是要看看留給旁听者的席次，我找寻了一会，在大厅的最后發現了我的家屬：我的妻子和女兒。

我們中間沒有一个例外，全都做着同样的手势和姿态，希望找到我們的亲人，他們的勇敢使我們不断地得到安慰，激發着我們的勇气、决心和对理想的忠誠。

有人举起手来，令人感动地打着招呼。有人把小孩高高举起，小孩們用柔和的緋紅色的小手向爸爸和祖父送过来甜蜜的亲吻。有的人眼內閃耀着难以抑制的泪珠。



我們的親人全在那兒，擠在大廳的盡頭處；他們只好站着，因為全部座位已經被另一些人占住了。這些人一個個衣冠楚楚，年輕而魁梧，年紀最大的還不到四十歲，都符合入伍的條件，然而沒有被征入伍。他們最先進到大廳里來，不是經過還被緊閉着的旁聽者出入的大門，而是從辯護律師專用的門里進來的，他們是所謂的“自己人”，一群“被派來冒充聽眾”的角色。

我們甚至還沒來得及看看大廳是方形還是長方形的。

最後，我們發現每一道門旁都有警察把守着。靠近我們，在原告和被告席入口處，站着六個衛兵，手持步槍，槍口上着刺刀，將大廳內被告席、辯護律師、新聞記者以及法官席所占的部分和其餘部分隔離開來。最後，我們認出了我們的辯護律師，便和他們握起手來。

律師中有人悄悄告訴我們“達拉第政府垮台了。”

消息馬上傳布開來，使全體大為震動，並且引起了我們的高聲談論。

就在共產黨議員案件正式開庭的當天，達拉第垮台了！政府一垮台，當然就不應當再開庭審判！大家臉上浮出一絲微笑，掩不住高興的心情。法官們感到十分惶惑。審判長加法約里上校，一個矮胖粗壯、肥頭大臉的家伙，愁眉苦臉地沉思着，毫不採取行動。他時而轉向右邊，時而轉向左邊；他那副尊駕不斷地前後搖晃着；他用探問的眼光瞪着已經垮了台的“政府”，這就是說，瞪着代表政府的兩名檢察官：羅里歐上校和布呂贊少校。

然而，哪兒是被告席呢？當然決不是我們現在所處的四周布滿了衛兵的“罪犯的席次”。

法官們耐心地靜靜地等待着。由於我們進來而引起的輕

微的騷動和好奇的人群的嘈雜聲，以及我們之間打招呼、互相介紹、低聲細語和談話的聲音漸漸平息下來，最後終於完全安靜了。

於是，錄事開始宣讀召集証人入庭的命令，辦事員齊葛馬拉斯念着一連串幾乎無休無盡的証人名單，由於他身長將近兩公尺，顯得特別威嚴。

他念到达拉第和龐納的名字。

引起了一陣好奇的騷動。

我們很想喊出來：“別念吧”，“已經垮台了！”

可是檢察官布呂贊少校搶了先，他說：

“我現在要宣讀某些証人申明不能出庭的信件。”

首先是內閣總理兼國防部長达拉第三月十九日寫給檢察官的信。

我們為了不漏掉片言只字，把手掌放在耳朵傍邊，注意地听着：

“據亞謝特律師通知，我和司法部長龐納先生被傳，於本月二十日至第三常設軍事法庭出庭作証。此外，葛義先生亦被傳為同案作証。

“請轉告軍事法庭：根據一八一二年五月四日法令之規定：非有特許之法令，政府人員不得出庭作証；而就本案言，取得這種特許法令似乎是不可能的。”

布呂贊檢察官接着宣讀議會常設委員會主席巴特的來信，他說他對於本案的事實經過，完全是以議會常設委員會主席的身份來了解的，因此，如果有人對他進行訊問，就會違反所有的先例。

最後的一封信是赫里歐寫來的。他認為如果要他出庭，就會與議會權利不容侵犯的原則相抵觸。

在宣讀文件过程中，我們想到了很多事情。

首先是一八一二年五月四日的法令！

前任內閣總理兼國防部長以及前任外交部長，居然在第一帝国的法律和法令中寻求辯护，以掩飾自己的卑怯，掩飾其不敢和我們这些原告見面的恐惧心理。

巴特先生的借口，却是以职责所在，不得不保守秘密。

显然他忘記了自己曾經給我們指示和建議，告訴我們采取什么途徑和方法組織法国工农議員团！他應該和我們一道，面对着法庭，对于工农議員团的成立，要求分担他所应負的責任。可是他沒有这份胆量。

至于赫里欧先生，他曾經听凭共产党議員遭受逮捕而毫無异議。有一位議員为了在这位主席的保护下履行其議員职责而到波旁官来，赫里欧却命令將他驅逐出去。他曾經与人合作，用可耻的手段撤消了四十四位与他一同共事的人的議員資格。他听凭別人在某些議員的背后对他們进行極其卑鄙無恥的誣蔑毀謗。而現在当法庭需要他出庭作証的时候，他却認為法庭違反民主，犯了大逆不道的罪行。請問他平时的民主思想哪兒去了？为什么要这样胆小如鼠！对于这类行为，人們难道能不嗤之以鼻嗎？所有当天在場的人一定都深深有这种共同的感觉，包括听众中大批的新聞記者和律師，他們来旁听这次审讯，就像是来看一場初次上演的杰出而轟动一时的戏剧似的。

宣讀信件以后，接着是一陣暫时的沉寂：法官們因为有些尷尬而一声不响，被告席上則是無言的輕蔑。

維拉尔律師打破了这一段沉寂，他起来宣讀被告方面的請求，希望傳呼达拉第、龐納兩名証人出庭。

維拉尔律師將請求書亲手交給审判長，他一方面說明这

份請求書已經不完全合乎目前的情況，因為达拉第和龐納的政府已經垮台，就要讓位給另一個政府，因之即使是第一帝國時代的法令也不足以構成阻止傳呼他們出庭作證的障礙，同時他接着說：

“當這批人民選出的議員還沒有被人民撤消其議員資格以前，他們便已經無法開口，被剝奪了一切辯護和反擊的機會，無法在任何講壇上公开发言，而在當時，政府中却有一位首腦，敢于卑鄙地在擴音器前，当着上下兩院，公開對這些議員提出嚴重控告，極盡誣蔑凌辱之能事。當然我用不着指出他是為了誰而這樣干的……”

“他封閉了這些議員的口以後，便將他們交給公共輿論加以裁判，幸而輿論是不輕信的；他並且把他們交給深知底細的司法當局去懲處，而自己則又兼任司法當局的首腦，這樣一來，便完全違背了三權分立的原則，而且抹殺了辯護的最基本的權利和保證。

“這是行政加于司法的難以忍受的壓力。

“他們對於你們的獨立性已經害怕到了這種程度，於是他們企圖置你們於双重既成事實的面前：誹謗和撤消議員資格。

“關於撤消議員資格，我們以後再談。

“至於誹謗：這些人民選出來的議員即使被提出控訴，但在沒有審判以前，他們應當被認為無罪。可是，行政當局的首腦不僅視他們為已經判決的罪犯，而且認為他們罪大惡極，但又不敢當面對質，提出控訴。

“政府首腦既然對全國人民發表了性質如此嚴重的言論，而他又兼任司法方面的首長，那麼，怎么能設想他能夠拒絕向司法當局說明原委，拒絕提出他所根據的文件、證據，或至少類似的東西呢？作為被告，我們有權利知道這些證據，並且

加以討論。

“可能有兩種情形：這些證據也許是存在的，那麼他為什麼遲遲不提出來，當面使被告服罪呢？他還等待什麼？

“也許這些證據並不存在，那麼，他如果出庭，我們就可以証實他公開損害名譽和瀆職了。

“我們在這裡所捍衛的不僅是我們的權利，不僅是我們的自由，我們所捍衛的是比生命還要寶貴的東西，這就是我們的榮譽，是我們在中國人民面前所保衛的共產黨員的政治榮譽，也就是反對那些犯了重大罪惡使人民陷於危險的人們。

“這樣一來他們當然要倒臺了。不過現在已經是必須去掉這一切違反正義的高壓手段的時候，必須去掉這些蔑視共和國悠久傳統的措施，以及對於三權分立原則的混淆。他們這樣做，不過是為了使人先入為主，反對我們，造成一陣曖昧含糊的空氣，在這種蓄意散布的令人窒息的氣氛里，我想即使是原告也會是透不過氣來的。

“以上是第一個問題。

“下面我們看看第二個問題。

“政府和原告對這三十五位議員所提出的罪名是他們曾經加入過附屬於第三國際的政黨。對於從一九二八年起到現在已經存在了十二年的第三國際的綱領章程，政府和原告裝作剛剛發現似的。

“他們不願意承認這些後來制訂而執行到今天的綱領，對於這種作法目前姑且置而不論，不過，我們不能不感到驚異：這位政府首腦竟會如此健忘，當這些綱領正付諸實行的時候，他曾經和擁護這些綱領的人們一道參加過示威遊行，而他居然會長期沒有看見這些綱領。

“當他舉起拳頭，和多列士、杜克洛一道並肩前進，從巴士

底廣場游行到民族廣場的時候——这里有当时的一张照片——，他难道不知道这些綱領嗎？

“一九三六年他代表自己的政党在人民陣綫的綱領上簽了字，这上面同样有多列士的簽名，当时他难道不知道这些綱領嗎？

“在第二輪选举中，他号召他的党的选民投票选举今天他所控訴的一位被告，同时由于他求助于共产党的选票，五十名激进党员因而当选。当时他难道依然不知道这些綱領嗎？

“那么，不論在选举中，在議會內，以及在全国，在他們的眼目中，何以共产党的加入第三国际沒有成为合作的障碍呢？

“更妙的是：当他在勃魯姆的第一任內閣中任副总理时，他曾經毫不犹豫，請求共产党人参加政府，至于他們是否能一道担任部長，則只取决于他們自己。

“那么，对于他这些过去的同路人，对于他們曾經贊成这些他不可能不知道的綱領这件事，他今天有什么权利去加以挑剔呢？

“先生們，这是兩個历史事实，根据这两点，被告方面認為有必要听取达拉第先生的解釋。

“至于龐納先生，他會相繼担任現政府的外交部長和司法部長。毫無疑問，以共产党人为目标的迫害行动的出發点，你們的看法可能和我們过去的看法一样，是在德苏互不侵犯条約簽定以后，共产党人拒絕参加瘋狂的反苏运动，拒绝对苏联肆意进行造謠中伤和謾罵。

“先生們，請你們不要受騙吧。这只是官样文章。

“在簽訂德苏互不侵犯条約两个月以前，龐納曾經向德国大使提出保証，或者說曾經向德国大使宣布过：法国政府將要制服共产党人。

“关于这一历史事实，被告方面認為七月一日担任外交部長而今天在樊多姆广场担任司法部長的这位先生应当加以解釋，以照亮我們辯論的端緒。

“被告方面同样非常希望这同一位先生对另一点能够提供解釋。

“無疑地被控告的議員們將指出：沒有参加第三国际的人們也能体会苏联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所起的作用。

“黃皮書轉載了几段顧隆德先生的紧急报告，但不包括龐納的复文。

“为了弄清事实真像，我們認為龐納必須对这一点加以解釋。假如可能，他應該講一講：英国外交部大事宣傳了这样久說要出版有关莫斯科談判經過的白皮書，到現在为什么又宣布不出版了？

“上面就是我們所要提的問題。你們决不能抹杀這些問題在辯論中的重要性，因为有三十五位政治家，真正的法国人，三十五位被控訴的法国人民的代表，直到現在被剝夺了一切發言的权利。他們將要在这场辯論中說明他們的政治立場，并且要針對原告的誹謗誣蔑，証实他們的政治信念是正确而且合法的。”

一切正直無私的人們，都会認為被告方面所提出的請求傳呼达拉第、龐納兩位先生出庭作証的理由是正确而可行的。

但是檢察官罗里欧表示不同意，他对法庭說：

“先生們，我請求法庭接受証人們所提出的不能出庭的理由，因此被告方面的請求应加以拒絕，在辯論中不必考虑。”

我們的辯护律师还来不及講話，被告們更来不及發言，审判長便宣布法官暫時退席，以便进行商議。

商議的時間拖得很久。

這成了攝影記者給我們拍照的機會。我們也乘機和親友們互相交換深摯而親切的手勢。律師們好意地將報紙展開，讓我們看看標題。

法官回來了。

守衛的兵士舉槍致敬。法官們行過禮，然後審判長開始宣讀：

“以法國人民的名義”，法官們再度行了一次禮，審判長繼續宣讀：

“本軍事法庭，

“鑑於被告所請事項，與一八一二年五月四日法令第一條之規定不合，碍難照准；

“根據此項法令之規定，本法庭無權傳呼政府部長級人員出庭作證，

“經多數表決通過，宣布不傳喚達拉第、龐納兩先生出庭。

“因此，法庭將被告所請各項批回，辯論中不予考慮。”

我們馬上開始一陣陣有節奏地齊聲喊道：“收回成命”。法官要求保持肅靜，而我們繼續叫喊着。辯護律師起而發言，請法庭注意：在檢察官提出請求以後，被告們還沒有得到發言的機會，這是與司法原則根本相違背的。

法官們交換了一下意見，最後終於同意按照正式規定的程序進行，收回剛才的裁決，並且准許被告發言。

不過當我們正要發言的時候，審判長發現還沒有詢問被告們的身份。於是又開始詢問：

審判長：你叫甚麼？

被告：維吉爾·巴列爾。

審判長：多大年紀？



被告：五十岁。

审判長：職業呢？

被告：議員。

审判長：你現在已經不是議員了。究竟什麼職業？

答：那麼，就算是被撤消了的議員吧。

审判長：這不成其為職業。

答：那麼，還是議員吧，因為選民們並沒有撤消我們的議員資格。而且，對於他們所委託的職責，我一向是忠實履行的。

下面一個接着一個，以至於對每一個議員，同樣的情形一字不差地重復了一遍。

輪到我的時候，我聲稱：

“我是光榮的聖安東尼郊區的議員，在我們區里樹立着波丹<sup>①</sup>的雕像，我代表巴黎市民族廣場、拉神父墓地、巴士底廣場和共和國廣場之間這一塊巨大的方形區域內的人民。”

除了卑鄙怯懦的瓦哲宜以及他的同類巴沙爾軟癱癱地倒在座位上以外，我們每個人都高傲地堅持自己人民代表的稱號。审判長看見到案的每一個共產黨議員在被詢問時都憤憤地回答以“議員”兩個字，不能不被懾伏，於是就不再囉嗦了。

身份詢問結束以後，重新討論达拉第和龐納出庭作証的問題。維拉爾先生再一次宣讀了請求書中的主文。檢察官把以前的回答一字字地又重復了一遍，然後审判長問被告還有沒有什麼要補充的。我們當然有要補充的，法官們馬上就會知道。如果达拉第和龐納之流不是懦夫，就一定會來和這些被

---

① 波丹（1811—1851），法國政治家，一八四九年當選議員，一八五一年拿破侖第三解散議會時，巴黎人民起而反抗，波丹死於巷戰中。——譯者

他們背后詆毀的人見面了。我們是不怕真理的，而他們則蒙蔽真理，扼殺真理，把真理踐踏在腳下。

巴列爾說：“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要用一八一二年的法令作擋箭牌，而不讓一個有意破壞法蘭西共和國憲法和我國法律的人出庭呢？內閣總理對我們這批人民選出來的議員所提出的罪名是非常嚴重的，並且在公共輿論中一再傳播，以至使我們家屬的生命遭受到威脅。他把我們說成賣國賊，而我們却是法國利益的真正保衛者。他應該到此地來，在你們面前，同時也當着我們的面拿出他的證據。至於龐納，他應該到此地來公開說明為什麼早在一九三九年七月一日，他便向德國大使館宣布他將要制服共產黨人，也就是說，他應該解釋為什麼他的行徑竟和希特勒完全一樣。”

我接着發言：

“达拉第先生利用我被強迫逐出議會、并在去年十一月三十日非法被捕的機會，利用議會內沒有任何共產黨員提出反對意見的機會，以叛國罪對我們提出無恥的控訴，企圖對我們進行誣蔑。我們要求他到此地來。在法庭和新聞界的面前，我可以證明賣國賊決不是我。我是共產黨員，曾經參加過一九一四——一八年的戰爭，我的兩個兒子現在也正在前綫。和所有的共產黨議員一道，我曾經大胆揭發過以达拉第為首的法國統治者用以破壞和平和危害法國事業，並且為希特勒、法西斯和一切人民的敵人的事業服務的外交活動。既然談的是賣國賊，是危害祖國的人的問題，那麼，大家的目光就不應該注視在我們身上，而應該集中到那些執行以退讓、投降促進希特勒粉碎我們兄弟國家的政策的人們的身上。而达拉第和龐納便屬於這類人，他們曾經反對我們的集體安全政策和團結和平民主力量的政策。讓他們到這兒來吧，當我們讓他們

嚙回他們的造謠和誹謗以後，看看他們是否還有胆量敢于正視我們。”

法官和檢察官們還在听着，但从表情来看，他們已經开始不耐煩了。

瓦德克·罗歇起立發言。

“根据达拉第的控告，我們不仅被逮捕，被撤消了議員資格，而且还受到普通罪犯的待遇。因此，首先就应当由达拉第出庭加以說明。达拉第先生說我們是卖国贼，就因为我們和他在对德苏互不侵犯条約的看法上不一致，并且我們还認為每一个政府的首要任务是靠攏苏联。而如果达拉第出庭的話，我可以馬上提醒他下面的重大事实：面对着奥地利的被吞併，倫敦和巴黎政府毫無反响。他們听凭西班牙共和国遭受扼杀。接着，在慕尼黑，他們不讓苏联参加討論，而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甚至与法国是曾經簽訂过協定的。最后，在一九三九年內，倫敦和巴黎政府本来應該与苏联協議，組成和平陣綫，但由于它們一貫企圖指使德国对苏联作战的陰謀和詭計，因而使和平陣綫無法成立。因此，如果今天英法兩國处在异常困难的地位，如果它們在世界上处于孤立的狀態，那么，錯誤主要应当由倫敦和巴黎政府担負，因為它們从来沒有根据集体安全做出忠实于和平的政策。”

这一段發言簡要明确，富于說服力，無可辯駁。

法官們显得頗为狼狽，一个个低下头来。审判長加法約里煩燥不安地用肥肥的手指不断敲打着他的桌子。

檢察官罗里欧起而解圍。他打断了瓦德克·罗歇的發言：

“剛才的發言牽連到兩個政府，不能够輕易放过。”

审判長振起了精神，接下去說：

“我完全同意檢察官先生的話。罗歇，如果你还要繼續講

下去，我就要取消你的發言權。你到這里來，不是為了批評英法兩國政府，而是針對別人提出的控告，為自己作辯護。我們不需要對這兩個政府發表任何意見。”

這樣一來，按照檢察官和審判長的看法，达拉第、龐納，還有其他的部長們，以及勃魯姆、福羅薩、夏塞尼、巴特雷米、陶里奧、霞普、狄克西·魏昂谷之流與他們的同伙在五個月之內，有權對我們肆意進行誣蔑，而我們卻沒有權利對他們提出控告！

這樣一來，倫敦和巴黎政府通過它們的罪惡政策，把它們的國家引向深淵的邊緣，而我們卻沒有權利揭露他們的嚴重責任！

我們什麼都可以談，可就是不能談最主要、最根本的東西。

辯護律師起而發言，提出抗議：被告們既然都是政治犯，便應該有權利作為政治犯而進行辯護。我們也跟著紛紛發言。審判長要求大家停止這種舉動，否則他將加以制裁，把某些被告趕出大廳去。

大廳漸漸平靜下來，審判長再一次堅持說：

“願意發言的可以起來講話。不過我提醒你們，不准牽涉法國政府、英國政府和內閣總理。”

皮埃爾·拉勒普不動聲色地聽着審判長新發出的指示。在他請求發言得到准許後，他回答說：

“你的指示我已經記住了，不過如果达拉第不出庭，這些指示是沒法照辦的。我不過是一個工人，不是法學家，但是我相信我還知道：按照法國法律的規定，原告必須拿出證據來。如果达拉第先生確實有文件，有證據，那麼他就不應該害怕到這兒來把證據交給你們。如果確有把握，他還怕什麼呢？因

此，为了尊重法律，我請求下令傳达拉第出庭。”

法官和檢察官們一声不响。

現在輪到艾蒂安·法戎發言了。他坐在証人席的附近，在他还没有开口以前，审判長就对他說：

“不要牽涉法国政府或英国政府，也不要牽涉內閣总理和司法部長。”

被告方面提出严重抗議：

“那么，你要被告方面怎样进行辯护呢？”

实际上，还不如給我們帶上手銬，嘴上加上封条，立即解回桑台監獄的牢房。

但艾蒂安·法戎却發言道：

“我認为內閣总理和司法部長出庭作証是必要的。現在有一些不正常的情況必須加以徹底澄清。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們認为應該有机会和控告我們的人当面解釋清楚。剛才审判長先生在打断我們的一个朋友的發言时对他說：‘这兒不是在議會’！是的，他現在要到議會里去是非常困难的，我也是如此！我們已經被趕出議會！不过当我最后一次出席議會的時候，我曾經向达拉第先生提出質問，正和我將在这里質問他的一样。那一天他脚上受了伤，沒有出席。可是部長席上坐滿了他的同伙，他們不答复我們的質問，只是和議會中其他人一起，对我肆意进行誣蔑謾罵。我們相信，在这所大厅里，他們就不能再像在議會里那样逃避我們所提出的問題了。”

亨利·馬戴尔是在高納凡發言后最后一个要求达拉第和龐納出庭的。他的兩個兒子在一九四二年被希特勒匪軍以抵抗侵略者的罪名槍杀了。他大声說道：

“多少年来，我的家乡曾經長期被德国占領。那是一个边疆地区，經常受到敌人的軍事侵略，因此这一地区的人們对于

卖国贼和卖国这样的字眼是非常敏感的。而达拉第和龐納兩先生却用可怕的罪名来控告我們。我很希望這兩位先生今天能到这儿来，当着法庭，当着故乡所有的劳动人民，提出証据来，証明我馬戴尔是卖国贼；同时証明我的朋友繆斯摩（他也是諾尔省的）也是卖国贼。含糊其辞是不行的。人民需要証据。讓他們拿出証据来吧。他們今天沒有出庭，我对此感到無比的憤慨；而同时他們却利用我缺席的机会，在議會講壇上对我肆行污蔑。諾尔区的人民深深知道我們的忠誠正直。我在此地向他們大声疾呼：不，馬戴尔不是一个卖国贼，繆斯摩不是卖国贼，共产党員們都不是卖国贼！我以司法的名义，要求內閣总理和司法部長出庭。如果他們拒絕来，那么，諾尔省的居民就会得到进一步的証明：控告我們的人只不过是一群騙子。”

說得很对，这些人不过是一些粗野鄙俗的騙子。人民對我們知道得很清楚。他們看見过我們是怎样工作的。他們知道我們是法国人，忠誠的爱国者；而我們大家，包括工人、職員、农民、手工業者、知識分子，我們就代表着法国。人民知道或者說他們感覺得到：共产党員是正确的。

这当然不是受命进行工作的法庭的想法。法官們暫時退席，考虑辯护律师所提出的請求。这只不过是一出滑稽剧，一种表面文章，假仁假义的花样，因为，几分鐘后，法官們回来，原封不动地將已經宣布过的裁决重又一字一句地宣讀一遍，連标点符号也沒有改动。

現在达拉第和龐納得到了法官們的決定的庇护。

几天以后我們再度提出請求傳龐納先生出庭，理由是：龐納先生既然不再当部長了，当然不应再受一八一二年法令的保护。但是这次請求再度遭到了法庭的拒絕。

这次龐納先生送来一張医师證明書，証明他需要到乡下去長期休养。

而法官們并没有檢查这份證明書的可靠程度。这是一件有关四十四个人的荣誉和自由的事情，因此被告方面認為稍为麻煩一下像龐納这样高貴的証人，應該是沒有太大关系的。但是法庭不願意这么办。

兩天以后，日报上登出了下列消息：

“激进党議会党团曾在下院举行會議。龐納先生向他的同事們提出了他对他已經离职的部采取敌視态度的理由。有龐納先生参加的議会党团办公室奉命將会中所發表的意見通知达拉第先生。”

原来龐納害的不过是外交病，不过是無聊的撒謊而已。

不論是第三軍事法庭或者是檢察官們，都沒有想到要追究龐納欺騙司法当局的行为或者追究医生开具假證書的行为。

他們在袒护誹謗者，使被告在实际上無法为自己进行辯护，特別是不讓他們有記筆記、書写以及參考必需文件的機會。

为了准备辯护詞，我們向法庭提出請求，希望能夠自由地收到一切報紙書籍，以及手抄和印刷的文件，并且希望將鋼筆發还給我們，在審訊时使用，并准許使用鉛筆。但是法庭的一紙裁決將所有這些請求全給駁回了。

不仅如此，法庭还不加思考地批駁了被告方面提出的一切請求。不論是請求上訴，或者請求延期審訊，或者是抗議对原函文句的窜改，抗議对預审秘密性的破坏，或者是指出整个審訊过程的非法和無效，或者是請求再开一次补充性質的偵查庭等，法庭的裁決一概是严詞拒絕。

至于我們自己，我們早已下定决心，無可改变，我們將逐步进行辯护，决不后退分毫。我們將采取一切合法手段来和他們的不法行为进行斗争。因此，在法庭宣布了有利于达拉第与龐納的裁決以后，我們便宣布將提出上訴。

通过辯护律師，我們提出了上訴的請求，并且請求在上級軍事法庭作出決定以前，暫時延期審訊。

法官們暫時退席，但在回來時他們否決了被告所提出的請求。

我們繼續大力进行斗争，决不示弱，因為我們所保衛的事業是祖國的正义事業，我們希望法國成为一个自由、獨立、幸福、民主的國家。

第一次審訊在上午九點鐘開始；等到審判長決定結束時已經過了十二點半；三個半小時的戰鬥。休息兩小時後，斗争又將重新展開，而且比以前更要激烈，更要有力，更要殘酷。



## 第十章

### 反对秘密审判的激烈战斗

第二次开庭时，在处理了某些事件之后，檢察官罗里欧上校便以下面的口吻發言了：

“由于本案的特殊性質，为了国防和社会秩序的利益，我請求軍事法庭依照軍法第九十二条之規定，下令以秘密审判方式进行辯論。”

我們并没有被弄得措手不及，我們早就料到了这一着。因此，当我們在法院的一間大厅里一起用午餐时，我們便决定了要利用目前仅仅剩下来的几小时公开审讯的机会，开始对原告及其罪惡的反动政策进行控訴。

我們曾与律師們商量好，趁目前还来得及的时候，趁新聞界还被允許参加辯論的时候，利用我們可能采取的办法把全部基本問題公开地提出来，借以闡明法国共产党国内政策的正确性。

我們并不抱任何幻想。我們确切地知道軍事法庭將怎样判决，知道軍事法庭將“乐于”下令进行秘密审判。政府不惜任何代价阻止进行公开辯論。它害怕公开辯論，因为它對我們、对人民、对国家都是有罪的。因此，不管付出任何代价，我們都应该进行有力的活动，展开进攻，努力揭穿軍事法庭和檢察官的一切無耻伎倆。

亞历山大·哲瓦爱斯律師受委托首先發言。

他首先指出只有当公开审讯危害社会秩序或有伤风化的时候，法律才允许进行秘密审判，接着便开始论证在本案中没有任何涉及道德、风化和社会秩序，或者对国防是危险的东西！

他的发言如下：

“一方面你们指责被告曾在议会内建立‘工农议员团’这个议会团体。那么问题就在于搞清这个团体是否合法，是否合乎正规手续，搞清它是不是由前共产党议会党团重新组成的。但是，像这种纯属于司法和议会的辩论，像这种有关宪法权利的辩论，又怎么会给国防带来伤害呢？”

“也许你们还会提到现在的被告写给赫里欧先生的信件，那封在议会开会期间由享有议会特权的议员们写给下院议长的信。那么请问这封在起诉书内所曾引用的信件，又怎么会国防有即使是一丝一毫的间接的损害呢？这封信内到底说了些什么呢？信中谈到，在讨论和平的时候，应该召开议会并应特别通知已经应征入伍的上下院议员出席。

“此外在该信的第二部分还提到，如果我们真想要对付那可能威胁我国独立的军事同盟的话，就应该坚持联苏的政策。

“因此，先生们，这只是一个可以有分歧意见的外交或国防政策的问题。总之，被告所发表的并非他们特有的观点。

“还在三天以前，我曾在三月十七日的‘秩序报’上读到由一位在外交政策方面声名卓著的人艾密尔·毕雷先生所写的一篇重要文章。他写道：

‘从地理状况着眼，以及从必然的趋势来看，在今天，在布尔什维克时代，正如在一九一四年沙皇时代一样，我都是拥护法苏协定的。’

“先生们，我再重复一遍，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是一

个可以贊同也可以反对的观点。关于写给赫里欧先生的信件以及工农議員团的組成問題，如果要在本法庭加以討論的話，那么請問这两件事究竟在哪一点上会給国防造成危害呢？这就是問題的中心所在。”

于是哲瓦爱斯律师援引历史事实，指出关于政治問題的案件，从来没有过以秘密审判方式进行的先例：

“先生們，請回忆一下，我不用說得太远，請回忆一下过去若干年前，回忆一下一个世紀前的情形吧。在国民大会时代就曾經有过先例。这正是第三等級通过革命法庭和公安委员会实行革命專政的时候。当时發生过很多案件，請問这些案件是秘密审判的嗎？难道国民大会不是在光天化日的公开會議上审判路易十六的嗎？难道丹敦是以秘密方式被审判的嗎？当时丹敦用他那使人震惊的强有力的声調，像海上的狂風驟雨一般，同时回答了傅基耶·丹維尔和聖什斯特的控訴。此后三年，在五總裁內閣的統治之下，对，先生們，正是在五總裁內閣这种道德淪喪、政治与社会方面开倒車的反动統治之下，当人們在特別法庭控告近代的第一批共产主义者巴貝夫及其英勇的同志們的时候，难道巴貝夫是被秘密审判的嗎？当时曾开庭九十二次，辯論从一七九七年二月繼續到五月，不仅沒有用秘密审判，而且还在审訊过程中第一次出現了速記記錄，有关巴貝夫案件的九十二次公开审訊的內容，全都由速記記錄了下来。

“而且，先生們，如果我还要找尋先例的話——說得簡略一些——那么試問在七月帝制統治之下，当人們审判共产主义者布朗基、民主主义者拉斯巴义、山嶽党人馬丁·貝尔納和巴貝斯的时候，不論在特別法庭或者刑事法庭，难道采取的是秘密审判的方式嗎？不，当时一切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

行的。

“一八七一年在凡尔赛镇压的翌日，当审判巴黎公社社員的时候，当社員們出現在凡尔赛第三战时法庭的时候，难道是秘密审判的嗎？不是。而且由于第三战时法庭地方太小，不足以容納参加公审的群众，于是改在临时加以布置的‘跑馬厅’举行，因之兩千人才得以参加辯論。

“此外，在第三共和国或者說在盗用共和国这一名称的政府的統治下，当那些战士被控告时，难道不都是在本法庭里公开审判的嗎？”

于是哲瓦爱斯律师进而預先指出檢察官所將要作的反駁：“也許檢察官会对我們說：‘但是目前我們正在作战，战争状态既然帶來了粮食供应方面的限制，同时也就應該給公开审判帶來限制。’”

哲瓦爱斯的回答是：

“那么好吧！檢察官先生，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請問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間难道沒有战争嗎？如果我沒有搞錯的話，这乃是‘最后的战争’、‘爭取权利和文化’的战争。而剛好在这一战争时期中有过不少案件！当时曾發生过紅帽党人的案件，發生过控告約瑟夫·加約和馬尔維的案件。但是，当紅帽党人就在本审判厅內出現于由法瓦尔上校所主持的第三战时法庭时，他們并不是被秘密审判的。而据我所知，当加約和馬尔維被召到特別法庭的时候，他們也不是被秘密审判的。而且，在这些案件中所涉及的并不是甚么組織了一个議員团的問題，也不是有誰給当时上議院議長安托宁·杜波斯特先生或下院議長保罗·得夏內尔先生写了一封信的問題，而是涉及某些国内外政治家之間的关系的控告，是有关外交政策的案件。按照起訴書所說的，是有关通敌的問題。然而你們进行

审判时却都是完全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参加辩论。

“不过又何必引证上次大战时的事情呢？今天我们是因违反了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六日的法令而受到控告的。难道共产党斗士是第一次因违反这一法令而受到控告吗？在全国范围内，由于同一法令而发生的案件已超过百余起，难道你们曾经想到过要采取秘密审判的方式吗？那么今天有甚么理由要采取这一方式呢？”

然而历史上也确曾有过一次采取秘密审判的有名的案件，哲瓦爱斯律师随即指出那便是一八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由寻午区初级战时法庭所审判的关于德莱弗斯上尉的案件。这次审判的结果是甚么呢？哲瓦爱斯律师指出：

“该案是秘密审判的，可是糟糕的是当时秘密审判是如此有利于许多违法现象与错误的形成，以至寻午法庭的判决后来终于被上诉法院驳回了。而当该案为最高法院驳回之后，德莱弗斯案件乃交由雷纳战时法庭审判。而这回可不再是秘密审判而是完全公开的了！而且由于当时雷纳战时法庭地方太狭窄，人们还特为此案布置了雷纳中学的礼堂。阿伯特·威尔姆和我都曾经在場。这次审讯是在两千多人面前进行的，其中有四百五十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

于是哲瓦爱斯律师再一次向法庭指出，“关于秘密审判，无论从法律、从判例或者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都是不合理的。”他从而提问：“那么你们为甚么要请求秘密审判呢？”

“那是因为你们害怕被告的某些答辩所可能产生的反响，因为你们害怕被告的回答在舆论界所将引起的反应，因为你们害怕法庭会变成讲台。说也奇怪！你们对这点感到不安吗？你们曾经——检察官先生们，你们当然知道我这話并不是对你们本人講的；但你们是政府、国家和当前政治制度的代

表，因之，我是向你們的上級說的——我說，你們曾經用一紙命令解散法國共產黨，取消它的報刊，解散它的社團：不只是解散共產黨，而是所有一切你們認為與共產黨有即使是一點間接聯系的組織。你們取消了‘人道報’、‘今晚報’以及百來種其他報紙。難道在作了這些措施之後，你們還害怕共產黨的宣傳嗎？你們在自己的業績面前退却了。好吧，讓我告訴你們：就在本案首次審訊開始的時候起，你們對秘密審判的請求便表明了你們無力證明自己對這些人的控告是合理的。你們關於秘密審判的請求正是訴訟的破產。

“那麼，先生們，你們決定吧。不過請你們听听被告的發言，他們對秘密審判的問題也有話要說。我不能不想到他們中間某些人今天早上所說的使人感動的話：‘甚么？多少月以來，別人對我們進行了極端無恥的誹謗和污辱，控告我們以叛國罪；而今天我們竟沒有權利在光天化日之下表明我們的清白無罪和對法國的忠誠！……’

“檢察官請求進行秘密審判，先生們！我告訴你們這是毫無根據的，是沒有任何理由的，我請求你們予以駁回……”

這一有力的發言所產生的印象是很深刻的。所有的聽眾、記者、律師都愈來愈專心地傾听了這一發言。

他們的意見是一致的：不容許採取秘密審判。的確，又有誰能夠不同意辯護律師們所提出的論斷和威爾姆尖銳而有力的發言呢？威爾姆律師說道：

“當他們被監禁的時候，當他們無法進行辯解，無法使公共輿論听到自己的聲音的時候，你們曾經利用大規模的宣傳對這些人進行最嚴重的控訴，最莫須有的誣蔑；今天，在我看來，秘密審判將是一種司法上的謀殺行為。的確，秘密審判將是一種司法上的謀殺行為。”

這句話產生了显著的影响。这可以从全体既不恐惧而又素来問心無愧的被告的热烈贊許声中看出来：他們用喝采声支持他們的辯护律师的强硬而勇敢的發言。

至于我們，我們願意宣揚真理，希望把它摆在光天化日之下，以便讓全国人民都能看到，而执政諸公們，他們則害怕真理。他們畏惧它，企圖掩盖它、窒息它、扼杀它。不过举行秘密审判，那有这么方便的事情！

为了証实这一切，維拉尔律师依次从他的座位上起立發言，他高声說道：

“你們只是在書面上引用一些‘社会秩序’或‘公共道德’的字样来当作合法的根据是不够的。这些法国公民、这些并没有被人民撤銷議員資格的人民代表們，到現在已經被活活地禁錮了將近六个月。在他們中間有二十名老战士以及相当数量的人因作战而受伤和成了殘廢，他們的軀体上留着痛苦和牺牲的痕跡，他們的胸前挂着表彰和象征他們英勇的勳章。

“他們是政府的政敌，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六个月以来，政府便假借战争状态的名义，不顧共和国宪法——这点我們即將加以揭露——，剝夺了他們發言的机会，把他們当作人質，把他們排斥于国家生活之外，与全世界隔絕。在他們所住的普通犯人的牢房里，你們不仅禁止他們以任何方式發表意見或回答別人的漫罵，并且禁止閱讀一切報紙，禁止閱讀別人用以攻击他們的一切文件。而本案毫無疑問首先是一个政治性的案件，在准备这样一个案件的答辯工作时，这些文件是不可缺少的。新聞界一致的叫囂，已經使全国乃至全世界不仅知道了这一公开以法共議員为对象（沒有人相信、甚至連他們最坏的敌人也不相信这一点）、以細故为借口的控告是不公

正的，而且还使他們知道了那些匿名或者署名的誹謗是卑鄙無恥的。

“你們就这样竭力使他們在輿論的面前失去信仰，虽然这是徒然的。我曾經風聞在最近的某些辯論里——我相信就是昨天上院里的辯論——一位內政部長和一些上院議員曾取得一致意見，認為对共产党人的这些迫害所得到的差不多全都是相反的效果。

“同时你們徒勞無益地竭力用隔离的办法使他們气馁，企圖以此破坏他們之間彼此一致的鋼鐵般的团結，并且使用了一切压力，甚至对告密与变节許以公开的獎金。你們以最粗暴、最狡猾和周密安排的新聞攻势，竭力从政治上去扼杀他們，从道义上去摧毀他們。

“你們用尽了一切电訊設備来攻击他們。六个月以来，这批公民、这些人民代表們活着的理由只有一个：等待着有一天他們終將获得时机，不仅能大声疾呼說明其為众所周知的清白無瑕，而且还要为他們最宝贵的东西——他們的政治声誉，共产党人的政治声誉进行辯护，并且使这一公开的控告以及控告者公开地受到法律制裁。

“現在，你們这些手段，这些誹謗和混淆是非的言論公开結束的时候到了；澄清这一骯髒气氛的时候到了；而你們竟敢使用秘密审判方式封鎖他們的辯白嗎？那么請問这是为了甚么？这是为了禁止人民听到他們自己人——那些忠心保护他們的人們的声音，禁止他們听到真理的声音。

“但是，此地每个人都知道，这將是一樁不可言狀的丑事，是一樁即使是在專制时代和帝国时代也找不出的史無前例的丑事。”

这时維拉尔律师提出了下面的問題：



“法国的輿論界对于只通过公报来了解他們自己人，他們的代表的命运的情形，并不習慣，請問他們將會把秘密审判了解为一种怎样的侵犯权利的行为？”

他指出除了下述答案以外，不会有其他的結果：

“这种行为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釋，这只不过是你们弱点的又一表現，是这场辯論的肇始者、操縱者和制造这场辯論的那个政府对于辯論有所恐惧的証明。我敢說你们害怕真理，害怕真理会傳到人民的耳朵里去，害怕这场大事喧嚷的控訴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成为話柄，害怕被告們会公开地变成原告。

“但是，那些認為秘密审判可以阻止真理得到昭彰的人是打錯了算盤。

“他們决無法抹煞真理，無論是在国外或在法国，人們到处都已經开始了解真象了。

“总之”，維拉尔律师在結束他的發言时說，“我希望原告先生們千万別幻想，以为用封鎖的办法可以絲毫改变我所为之辯护的人們的态度和信念，当然也更不会影响被告方面大胆的控訴。我們忍受得已經够了，已經太够了。將近六个月以来，这三十五个人竟横蛮地被迫与国家生活隔絕，与人民分离，被迫接受公开而惡毒的辱罵而不能作答……

“不过我們的發言并不是專对法庭講的。在將近一百五十年前，巴貝夫——关于他的事情剛才哲瓦爱斯已經非常雄辯地对你们談过了——，作为被告的巴貝夫，曾在法官面前大声疾呼道：

‘听取我們發言的除了法官以外还有其他的人。人民同样关心我們所說的一切：我們在这兒發言永远像人民就在面前一样，正是在全体人民面前我們才进行自我辯白的。’

“半世紀之后，正是共產主義者布朗基——剛才哲瓦愛斯也同樣地向你們談到過他——在他被囚禁的時候，曾在法庭面前宣稱：

‘陪審員先生們，我雖然站在你們面前，但並不是只對你們幾個人說話，我是對全法國發言，它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最高法院，它的判決才是最後的判決。’

“而我們，先生們，我們這些在輿論界面前被控告、在我國人民面前被誹謗的人，正是在輿論界面前，正是在人民面前，才願意不只是為自己進行辯白，不只是要說明我們對之毫不害怕的真理，而且還要向誹謗者進行控訴。

“而這種辯白和控訴正是執政諸公們所企圖同時加以抹煞的，因為他們希望能夠一舉而不僅把我們的無可非難的行為加上罪名，同時還要把我們的理想——他們所深深懼怕的理想判罪，並且還不讓我們的理想在此地公開表達出來。

“我很清楚地知道原告方面以及政府當局在拒絕公開接受我們的要求的時候，就等於已經承認了自己的不安和無能；不過對於原告，對於政府，以及對於那些已經種下了惡根而想依靠你們以避免自食其果的人說來，那可是糟糕透頂的事。他們是一定要自食其果的。不過我們希望，法官先生們，希望你們不要同意這一陰謀，否則全法國、全世界的人們，在讀過明天早上的報紙以後，都將知道在紀元一九四〇年，在攻陷巴士底獄以後的一百五十年，我們法國卻居然主張以扼殺人權和民主自由來‘保衛’民主制度。

“‘我們現在是否還有民主？我們現在是否還生活在法國？’一位年老的共和主義者、前部長鮑奈威先生最近曾在下院提出這樣的問題。

“先生們，這應該由你們去回答。”

又一陣热烈的掌声使維拉尔律师动人的結論显得更加有力。

当一个極权政府，一个反动独裁的政府下令把代表將近一百五十万选民的議員加以逮捕、监禁并赶出議會的时候，难道还有民主可言嗎？絕不可能！

如果这些法官还算是法官的話，如果这些軍官还算是軍官的話，最后，如果这些人还算是人的話，如果他們还算是法国人、真正的法国人的話，那么他們將會想到对一个法国人講来，最大的污辱并不是被当作杀人犯，而是被人当作卖国贼；他們就会給我們在一切人面前为我們被污損了的荣誉公开进行辯护的权利。

如果这些法官还算是法官，这些軍官还算是軍官，这些人还算是人，如果他們还是真正的法国人，难道他們竟能同意讓誹謗与污辱我們的人利用秘密审判，繼續干他們那騙人的無恥勾当嗎？

当我们行將帶來种种証据，說明我們政策的正确和我們建議的英明，表明我們爱国主义的热忱和对公共利益的忠誠时，秘密审判却允許腐化的新聞界报道一些聳人听聞的“秘密”消息、“鉄証如山的文件”，以及对我們說来一个比一个更为严重的其他报道。

秘密审判，这是应当对祖国灾难負責的执政者繼續进行巴粹尔式勾当的又一措施。秘密审判，这是在極尽誹謗之能事以外再加以無情的虐待的又一种手段。

先生們，这应当由你們去解答。

不过，就目前來說，則正輪到我們共产党議員發言，輪到我們把这光荣的声音、人民的声音傳播出去。

再等几个鐘头以后，我們也許就不可能再使外界听到我

們的聲音，完全與群眾隔離起來了。

即使允許我們發言，我們所要說的一切也都等于白說，沒有人會知道我們所說的是甚麼，而新聞界可以把一切最荒謬的東西硬塞到我們的嘴里。他們將把那些和我們所想的和所說的完全相反的東西，硬說成出自我們的口中。

關於可憐的新聞界的墮落行為，我們是清楚的。他們玷辱了新聞工作者這一職業，他們報紙的字里行間都充滿了無恥的捏造。僅僅由於我們與多數人的政見不相符合，僅僅由於我們不同意出賣法國和共和國的利益，他們便肆行毀壞我們的名譽，對我們進行污辱。

如果進行秘密審判，那麼明天甚麼樣的無恥鬼話他們不會捏造出來呢？好吧，趁現在還來得及的時候說我們的吧。既然我同時是工农議員團的總書記和致下院議長書信的執筆人，因之大家決定由我首先請求發言，並且就這樣办了。

一開頭，我便提出由於我們的案件的重要性以及國內希望確切知道與此有關的消息的願望，請求法庭同意遷往巴黎最大的會場去，把各工廠、企業、城鄉、海陸空軍部隊所正式推選出來的代表召集到那里。法庭應該在那里展開辯論。應該有代表政府的檢察官出席。檢察官應該有可能要求傳呼一切他所認為必要的人証，並且能夠把所有的部長們都邀請來，把所有投票贊成撤銷我們但卻沒有膽量讓我們出席議會并听取我們發言的那些議員們都召集來。

至於我們，我們這些被誣告的人們，將從我們中間產生一個人作代表，隨便指定誰都成。而他，僅僅他自己一個人，就將擔負起我們的答辯任務。

然而我敢斷定即使在这种完全有利于政府方面的情况下，我對於代表們的意見和陪審員們的判決仍然是有信心的。

他們會下令立即釋放我們，讓我們迅即回到下院去并恢復我們作為議員的全部權利。

然後我進而談到關於秘密審判的問題：

“怎麼能想像我們的案件用秘密審判的方式進行呢？這一案件早就是公開的了。政府本身公開和洩露了預審檔案材料，這是與法國司法程序的慣例相違背的。關於保守預審秘密的原則難道不是政府親自破壞的嗎？以上這些問題除肯定的回答以外，是不可能有其他答復的。”

實際上，我們的審訊檔案的某些材料已經被拿出送到議會特設委員會去，以便在上下兩院的講台上作公開的討論，并且所討論的只是極不全面的一小部分。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正是根據政府本身的意旨，我們的預審檔案才被調閱和加以篡改的。也正是這個政府會利用報紙和廣播電台來進行它的惡毒的偽造勾當。而我們卻沒有向被政府和新聞檢查機構所蓄意欺騙了的廣大群眾表明我們的正直和善良的可能性！預審既然已經公開，審判也應當公開。你們竟敢以道德倫常、公共秩序、社會風化和國家安全等為借口，說甚么公開辯論會毀滅這一切。而實際危害社會秩序、風化和國家安全的正是原告們的惡意、虛偽和使法國分裂的罪惡政策。

請問我們還有甚么可責備的呢？是關於組織工农議員團的事情嗎？

接着我便把預審時已經在法官面前講過的全部論點進一步加以發揮。

我又一次指出法國工农議員團的成立經過，指出組織該團的必要性、正當性和合法性。

審判長表示不滿，他打斷我的發言，要我簡短些，并請我就正題——秘密審判——發言。好像討論有關秘密審判的建

議，就不應該死死抓住原告，指出他的矛盾與無理。我不聽審判長的勸告，繼續進行論證。

審判長再一次打斷了我的發言。

我請他注意在談完工农議員團的問題以後，為了說明我反對秘密審判的理由，我必須涉及到原告方面所援用過的一切借口，因而也就要說到致下院議長的那封信。

他只好任我說下去。

凡是我在“秘密”的預審過程中說過的話，我都在此地當場說了出來。我分析該信的內容，說明它的每一個部分，每一個建議的正確性。

“簡單些”，審判長嘆道，“把這一問題留給你們的辯護律師。請談秘密審判吧。”

然而，這正是不應該讓步的時候。有新聞記者們在場。我們應該利用這一機會對檢察官偽造文件並且在起訴書中使用偽造文件的行為作公開的揭露。

“你們聲稱致赫里歐先生的信件實質上是採取了宣言的形式，但起草這封信的人便是我，因此我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事實是怎樣的。我再說一遍，這封信是由一個議員在行使其職權時，為了要求召開議會而寫的一封議會內部的信件。不過，我要在此地對政府及其出席本法庭的檢察官們進行控訴，他們把我們的信的內容加以變動、割裂和篡改偽造。起訴書中所引用的該信的內容是……”

我還沒來得及說完，全體被告都從座位上站了起來嘆道：“偽造，的確，這是偽造”，“达拉第就是偽造者”，“這個案子真可恥”，“重新舉行預審”，“把原信拿出來”，“我們要看原信”，“宣讀原信，和起訴書比比看”，“撤銷本案”，“要自由，自由！”

審判長想說話，但他的聲音被喧嚷聲掩蓋了。聽眾都站

了起来。律师公会的代表——他們的理事以及很大一部分會員起身去找我們的辯護律師打听消息。新聞記者們等候着动人听聞的消息。起訴書是以偽造作根据的？不，这是不可能的！然而这却是事实。最后，終於听到了审判長的声音：

“安靜”，他喊道，“安靜！”

我利用这一相对安靜的时机回答道：

“然而这的确是偽造。”

审判長向我說道：

“別再說下去，否則我將取消你的發言權。請就秘密审判發言吧，如果你超出範圍，我就不讓你繼續下去。”

但是，我还是証明了这是偽造：我列举出信中完全被刪去了的句子，指出他們如何把逗号与句号改成惊嘆号，以致使該信变成了宣言的形式。

記者們記了下来，有些人甚至还离开审判厅去向报社打电话。他們將會發表什么东西嗎？新聞界已是如此地慣于从事撒謊、誹謗、侮辱和陷害的勾当，它难道会报道真理嗎？

审判長發怒了。他提請我注意遵守秩序，他再一次請我專就秘密审判問題發言。

“你們有頗負盛名的辯護律師，他們將會作必要的辯護的”，他終於讓步了。“不管怎樣，我鄭重地告訴你，請就秘密审判問題發言，而且只就秘密审判發言，否則我就撤消你的發言權或者把你驅逐出去。”

我对他的回答是：

“在这种情况下，审判長先生，請你决定进行公开审判吧，因为並沒有甚么值得控訴的材料。而如果这样会危害国家安全，那么請問为甚么每次當我們的問題在下院討論的时候，沒有看到任何議員、任何部長，也沒有看到內閣总理請求秘密討

論和組織秘密委員會呢？起訴書中所舉的理由是沒有根據的，那只是一些不值一駁的借口。因此我請求批准我們律師的請求，宣布辯論將公開進行，這才算是公平。”

偽造，發現了偽造。“偽造”這個字眼好像在法官、檢察官、律師、新聞記者和群眾的耳邊反復傳聞着。偽造，發現了偽造。

現在輪到勒維發言了。由於六個月的監獄生活，他變得很憔悴，瘦了十公斤。他那顫動而感人的聲音，即使是心腸最硬的人也都會為之感動：

“過去我們是政治家，將來我們仍然是政治家。這些政治家們，五個月以來在共和國的監獄中等待着為自己辯白、為自己的政治榮譽辯白的時機。因為在我以往三十三年的社會生活中，服務於我的理想——我從來沒有利用這一理想為自己服務而只是自己替它服務，服務於祖國，但卻沒有利用過祖國謀取自己的利益。在我身上找不出任何錢財方面的污點，找不出‘郵政航空公司事件’一類的污點；有的只是光明磊落的社會生活和私人生活；有的只是一個醫生的生涯，他四十多年來忠實於他的顧客，從來沒有黑過良心，也從沒有受過刑事處分；而正當他有可能到議會的公開講台上為自己申辯的時候，卻被人關進了監獄。

“我曾希望至少在一月十六日議會進行公開辯論的時候，會被通知在議會講台上為自己辯護；但我並沒有接到通知。

“此後我們曾希望在議會特設委員會中仍然會被允許為自己辯護。但我們被議會拒絕了。它竟在沒有听取我們發言的情況下，用一紙特別法令撤銷了我們的議員資格，這是一紙史無前例的法令，破壞了法律上不咎既往的原則，侵犯了人權，侵犯了辯護權。而目前可以為我們的政治榮譽進行辯護”



的，便只有現在这个隆重的場合了。难道在我們等待了將近六个月的時間，受过种种痛苦之后，你們还企圖剝夺我們这种神聖的权利嗎？

“除了这种权利之外，我們同样还負有义务，不仅对今天而且对历史負有义务。因为，先生們，我个人虽微不足道，但本案却是一件具有历史性的案件：一百五十年以来，大批逮捕議員的前例只有四次：即在国民大会时代（吉倫特派），在五总裁內閣时代，在三总裁政府时代以及在一八五一年的十二月二日。而第五次則是在第三共和国統治下产生的。那么难道你們竟允許別人不仅是在我們今天所代表的人們面前，并且还向着未来控訴我們与撤銷我們的資格嗎？”

法庭內引起了高度的注意，这真是动人的时刻。我們中間的長者以青年人的热情作了發言。那些曾經取銷我們資格的人們具有的只是奴性的、頹廢的、动搖的性格；至于我們，我們有信心，对未来的不可摧毀的信心。我們对人民、对祖国、对法蘭西絕對信任。这种信心和信任，按照我們中間各个人不同的氣質、个性、語言、出身和職業，以不同的方式表現了出来，但它們在本質上則是完全相同的。

現在高斯德繼勒維之后發言。他像火热的熔炉里的矿石和鐵水一样，热情鼎沸。他說：

“先生們，站在你們面前的是这样一些人：是一些了解与热爱他們的職業的工人，一些懂得耕种的艰苦劳动的农民，一些优秀的知識分子；我們在場的这些人每个人的鞋底上都沾有法蘭西的泥土；毫不客气地說我們在議會中要算是最好的議員集团……我們中間好些人曾參加議會中各种重要的委員會；我們在国防部的各个委員會中占有重要的职位；我們手中握有国防机密，我們沒有洩露这些机密，而在本案的審訊过程

中，也許我們可以舉出一些人，一些洩漏了機密的人的名字來……”

高斯德說得對，是他們洩漏了機密，因為第三帝國的強盜們，通過這批第五縱隊分子，通過這些目前仍然還自由自在地繼續進行其無恥的間諜與叛國活動的僱傭分子，得到了確實的消息。

接着，穿着上士制服、尚未受到拘禁的被告法戎以堅定的語氣依次發言了。

他指出秘密審判的真正理由是：你們知道我們不只限于討論起訴書，而且還要把六個月以來對我們所策劃的可恥的誹謗攻勢首先加以揭露。

於是他便進而以有力的雄辯抓住了法庭的要害：

“在我們所希望公開審判的案件里，下列所舉情形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原告們能證明我們真正是叛徒，有愧於法國人這一稱號，在這種情況下，那只要槍斃我們就成了，這對國家安全將會有好處的；或者是我們反對他們的誣蔑的論點使他們陷於混亂，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利益不會因此受到絲毫損害，因為如果統治一個國家的某些人有权不受制裁地誹謗這個國家十分之一的居民的代表，誹謗這些代表中最活躍的人物，那這個國家才算是真正地走上了下坡路。

“先生們，如果本案以秘密審判方式進行，我相信你們可以想像得到我們可能產生的憤怒，因為有些東西並不是秘密進行的，那便是你們用以攻擊我們的一切言論。我的同志們一直被關在監獄里，因之對於作為一個正直的人——例如就處身行伍的我來說吧——，當他看到自己身旁有一個士兵或平民在閱讀涉及我本人的文章（正如我所帶的卷宗中的某些文件一樣），這些文章把我當作‘莫斯科的僱傭分子’，‘希特勒

党徒’或‘愚蠢的农奴’，这时所感到的痛苦与不安，是我的同志们無法衡量的，——显然他們所处的惡劣地位使他們不可能作这样的衡量。

“你們應該了解那些忍受过这种苦难的人們——这里我还不想把这叫做苦难——，因为如果从某些方面來說，忍受別人在自己四周散布流言可以算作一种苦难的話，那么当我們被那些我們認為是国家灾禍的負責者橫加誣蔑时，我們所感到的光荣使我們的苦难有时候也得到了补偿。

“总之，如果說六个月以来我們必須保持緘默，如果說六个月以来我們忍受了这一切，那正是我們希望在今天可以把各种卑鄙的誹謗与謊言一扫而光。不过，这正是我們的誹謗者所不願意的。他們想用請求秘密审判的办法来扼煞我們的聲音，他們想对人民隱藏真理，他們想不讓人民对这一問題有他們自己的看法，他們希望使人民在听过原告的話之后，無法再听見我們的聲音。”

但这不过是枉費心机的希望，他們的目的是不可能达到的。法戎总结道：

“但是，先生們，如果你們宣布秘密审判，法国人民也不会因此受騙；法国人民会知道——因為他們是头腦清醒眼睛雪亮的——，如果在对共产党議員橫加誣蔑之后，你們想封鎖他們在法庭前所要說的話，这正是因為他們的論点毫無疑問地会使原告的‘論点’完全归于破产。因此，不管你們是否宣布进行秘密审判，我們坚信真理將同样地会不辯自明。不管在法庭內將作出何种判决，法庭之外是会作出另一种判决的。

“审判官先生們，你們可以完全相信，如果法国人民在当今时代繼目睹失去出版、思想和言論的自由之后，随着公开辯論的取消又失去了他們所热愛的另一种民主自由，他們將會

因此对扼杀民主的负责人作出不利的结论，而共产党人则不会因法国人民所将得出的这种结论受到任何损失。”

但是法庭对这种谨严的雄辩是否会加以考虑呢？阅读明天的报纸时，你就会发现完全不是这样的。

现在由勃兰向法官提出问题，他因为是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间战争中割去双腿的重伤者，曾被暂时释放。

他手里拿着“巴黎晚报”和“今日报”。

这两种报纸告诉读者：检察官将请求秘密审判，以及审判长将不顾被告方面的努力和反对，宣布举行秘密审判。

因此，根据这些报纸，可见一切都是已经事先准备好了的。命令早已下来，法庭只有付诸实行。

勃兰将报纸交给法庭审阅，并提出下面的问题：

“法国人民明天从‘巴黎晚报’或者从其他报纸上看到你——审判长先生，和你们——法官先生们，不顾被告方面所提出的论点而宣布秘密审判时，将会说些什么呢？法国人民看到法庭真地遵循了报纸上所给予的指示——请允许我们把这种指示叫做‘命令’——，他们将会产生怎样的心情呢？”

“我是一个老战士，在战争中受过重伤。那些拿着笔桿的匪徒们曾极端无耻地侮辱我，把我当作卖国贼，而你们竟剥夺我公开揭露他们的谎言的权利。这我是不能容许的。”

当勃兰吃力地坐下的时候，路易·普罗特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也对“卖国贼”这一可恨的诽谤提出了抗议。

“你们想用秘密方式审判我们，那是因为你们胆怯”，克里士多福就这样开始了他的发言。审判长立即提醒他遵守秩序，但他继续说道：

“今天早上到这兒来的时候，我曾坚信在此地会碰到我们的原告。然而现在我证实了那些敢于在背后控告别人的人并

沒有勇氣到此地來重復他們的控告。在法文中有一個刻劃這種行為的字眼，那便是‘怯懦’。

“秘密審判，這是對控告我們的人的判決……他們才真正是負責人，他們才真正是罪犯。你們沒有權利糾纏到用秘密審判以封鎖辯論的陰謀里面去。”

接着，德繆索阿補充道：

“我們抗議秘密審判，因為它不僅使我們無法為我們的榮譽辯護，並且也不能為我們的家庭和他們的榮譽辯護。”

克羅阿查繼而發表意見。他是巴黎第十四區工人區的代表，以擁有八十萬名冶金工人、被政府解散了的工會聯合會總書記的身份發言的。

他一開始便指責某些叛徒們的卑怯行為，他們為了個人利益而不忠於自己的誓言；另外一些人則當災難在法國日益增長的時期，提高他們的議員津貼。

“我們”，克羅阿查大聲疾呼道，“我們為了始終忠於我們的理想並保衛工人階級和人民的利益而犧牲了議員的一切好處。我們是對的。我請求法庭支持我們的正義要求，使這個以我們為犧牲品的案件的內幕通過公開辯論讓外界知道，使事實的真象大白於世。”

當巴列爾請求發言的時候，審判長威脅他，如果他的發言超過了目前所討論的問題——關於秘密審判這一範圍的話，就撤銷他的發言權。

巴列爾並不因此而慌亂、恐懼，他說道：

“站在你們面前的是一个老战士。今天正是我的一个纪念日。整整二十五年以前，我被一顆子彈打中，躺在萊沙弗考普夫真空地帶無人行走的道路上：腿被打斷了，躺在雪地里，不敢讓人在天黑之前來找我。在戰爭進行了八個月之後，我

第二次負了伤，而这还不是最后的一次……你們竟敢說我是卖国賊，并且还会有人到我家去說我是卖国賊，难道我不能公开声明，說我在此地的論辯是为了証明我不是一个卖国賊，并請求巴黎的报纸和哈瓦斯通訊社对此加以报道嗎？难道你們竟以为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权利像所有我的同志們一样感到激动嗎？”

巴列尔有力而勇敢地对这种有辱法国尊严的措施提出抗議，他繼續說道：

“我們不仅要为自己辯白，并且还要求讓我們来进行控訴。

“你們已經很清楚地感覺到我們的思想是多么一致。就我个人來說，我准备攻击的并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个階級。因为事实上，目前此地所發生的一切，并不是某几个人的案件，而是一个階級的案件。这个階級被人封住了嘴，現在它已經無法講話了：这便是法国的工人階級，出卖国家的并不是它。

“我們是法国人民的代表，我們不是卖国賊：人民是不会出卖国家的，因为如果他們出卖法国，那就等于出卖了自己，因为人民就是法国。出卖国家的正是有产階級，他害怕失去它的特权。”

对，巴列尔說得有理，卖国賊和胆小鬼并不出在我們共产党人里面，他們出在資本家階級的成員中，这些人一直宣称自己宁可投靠希特勒而不支持人民陣綫，他們曾以希特勒为賭注，以便摧殘民主，毀灭法国人民在过去的艰苦斗争中以重大代价所爭得的各种自由。而在我們中間，則全都是信仰、有操守、有荣誉和有正义感的人。

夏尔·賈武用他手工業者的語言，再一次以我們的名义說

明了这点：

“的确，正如同我所有的同志们一样，我是一个正直的人。我家有九个孩子，我排行第七。我们每个人都服过兵役：我自己服过三年现役，打过四年仗。我在战场上丢掉了我最亲爱的人——二十岁的儿子；而为什么今天，人们却说我是卖国贼，并且在这个引起了全国人民注意的案件中，不允许我有公开剖白的权利，使我不能揭露我的那些卑鄙的原告们造谣中伤的无耻罪行呢？但你们是自费工夫，瓦尔省的工人和农民们了解我。他们只会对原告加以鄙视。”

下午三点钟便开始了的审讯，继续往下拖延着。夜已经到来，法庭四周和各种什物显得很暗淡。法官桌案上亮着三盏微弱的电灯。

审判长和法官们商量了一下，好像向他们征求意见似的。他用眼色征求检察官们的意见。最后才决定讲话了。他向律师们说道：

“难道我们能够这样继续一整个晚上吗？是不是让所有的被告都依次对同样的问题说一通呢？”

有甚么不可以的呢？我们是准备搞一通晚的。夜里开会这种事情我们已经养成了习惯。而且为甚么每一个被告没有说出他所想到的东西的权利呢？

维拉尔律师回答道：

“只好这样，因为，毫无疑问，明天再使全国听到自己的声音并在法国的面前为自己辩白，这对他们说来是太迟了。”

审判长作了一个表示厌倦与遗憾的姿态。辩论继续进行下去。每个人都对他邻人的发言，加上新的论证，用新的概念来补充前人的思想，甚至使法官、检察官、书记官、警卫人员乃至全体听众不能不始终不懈地并且愈来愈加感动地注意倾听

被告的發言。

現在輪到高納凡了。他的發言真是一篇地道的辯護詞，構思的豐富與層次的謹嚴堪稱傑作。他激起了全體律師們的欽佩，律師們對他那雄健有力的辯才感到驚訝。他把起訴書里的論點逐條舉出，並且把它們一一駁倒。我們以不斷增長的興趣傾聽他的發言。

“檢察官在援引軍法中的條文時，說到如果涉及道德問題，就有必要採用秘密審判：我不相信在我們——工人、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中間，會有一个人曾有过甚么值得反省的違反道德的事情。只有在無所事事的階級當中，人們才能夠找到荒淫浪蕩之徒。我們是清白的，我們——正如我的朋友們剛才所說過的那樣——我們過的是工人生活，是樸素的議員生活，因為如果今天有那樣一種人，他們認為在戰壕里生活一天可以只用十四個蘇，而生活在議會里反而需要十萬零七千法郎一年或者說二百九十三法郎一天的話，那麼我們一直認為只需要過去議員津貼的半數就可以生活得很舒適了。我們沒有接受過外國的津貼。我們並且為了在國內宣傳我們的思想而貢獻出了二分之一的議員津貼。

“你們要求秘密審判。整個新聞界明天也將提出同樣的要求。但這是怎樣的一個新聞界呢？他們是一批唯利是圖的家伙，多年以來就對法國人民散布毒素。剛才我們曾經談到政府首腦所提出的控訴，不過這一控訴並不是去年才開始的。一九三八年，在內閣總理，也就是同一位达拉第先生的廣播演講中談到工人組織的領導人時，就曾經把他們當作積犯對待。然而我們卻從來不曾跟烏斯退克和史達維斯基作過朋友。

“我們從沒有像某位專案報告人——一位戰時的重傷者於一九一九年在法國下院中所指出的那樣：將價值十億法郎



的航空設備只用六千三百萬法郎就給變賣了。我們共產黨議員也從來沒有在洛林省收回以後，把洛林省在一九一四年大戰以前尚且估計值八十億金法郎以上的礦藏財富，只用幾億法郎的低價加以變賣。我們從來沒有沾染過任何道德上或經濟上的不名譽的事情。我們是清白的。”

那麼人們所可能找到的要舉行秘密審判的理由是甚麼呢？高納凡接着一一加以分析：

“是為了國家安全嗎？如果在法蘭西有夠資格說這句話的人，那便恰好是這些坐在被告席位上的共產黨議員。當西班牙事件發生的時候，只有我們指出了政府當局的政策替法蘭西所造成的危機。

“說到國家安全，只有我們才真正看清楚了應當如何去保障它，我們不是從一個以數百萬死屍和大規模破壞所換取的軍事勝利上來看待它，而是從保衛和平的角度來看待它的。對於國家實力，我們不是從軍事勝利上去看它的：這回要取得一次軍事勝利將不僅給我們帶來一百五十萬人口的死亡，而且可能是這個數字的兩倍或三倍，我們的兵士、平民、婦女和孩子都將要遭到殺戮。我們是從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正常發展，以及從產生法蘭西大革命和相繼而來的各種革命運動遺留下來的一切傳統的角度來看國家實力的，是從自由與幸福的人民中去看國家實力的。

“難道是那封信的內容影響了國家安全嗎？決不，在這封信裡面沒有任何秘密，因為信中沒有一件事情提到或暗示有關軍事的問題：戰術、戰略、兵員、軍用物資或其他。

“在我們的信件中並且還有保障國家安全的辦法。因為該信曾指出我們希望使祖國免除一次長期的戰爭，一次即使是勝利了也將給我們帶來創傷的戰爭；我們並提供了保衛祖

国独立与安全的办法：依靠偉大的苏联，依靠那个沒有領土野心并能在自己国内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

自然，說到此地时他被审判長打断了，审判長宣称問題并不在此，應該扼要一些并且應該談秘密审判的問題，于是高納凡回答道：

“我說的完全是題內的話。

“我正在討論那封信件的問題，因为这封信提出了苏联的問題，我不相信你們可以迴避有关这一問題的討論。我敢說法苏之間最亲密的友誼始終是我們国家独立的保障，同时也是我們法国人和全世界的人民和平的保障，因为当我们保衛平时，我們保衛的不仅是法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是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的确，在我們的信里沒有任何危害国防的东西。相反地，其中一切都对国防有利，因为我们曾按照自己的看法，指出了唯一可以保持我国独立与安全的道路，同时使国家避免一場可怕的战争，这场战争現在正威胁着我們，它事实上已經存在，但是还没有爆發。你們为什么要举行秘密审判？为的是使別人無法回想起过去我們是正确的，即使在我們反对你們全体的时候；为的是使別人無法說現在道理仍然在我們这一边。

“难道法国宪法不曾賦予国民議會——它是代表代議制度与人民主权的——以研究和預聞与国家利害有关的各种問題的权利嗎？难道行政当局——正如它的名称所表明的那样——的存在不正是为了执行兩院即議会的意志，而不是为了讓行政根据自己的意志向議會發号施令嗎？

“当我们請求召开議會的时候，我們同时要求对法律和宪法予以最严格的尊重，而且我們是按照宪法的規定提出这种

請求的，因為憲法第十三條這樣明白地規定：各級議員不得因在行使其職權時所犯之錯誤或所發表之意見而被控告與追究。

“我們發表過意見，但我們曾將此意見通知下院議長，我們曾將此意見通知上下院全體議員。難道我們違反了憲法嗎？完全沒有。

“邦特的那封信完全沒有超出我們所具有的議員的職權範圍，這種職權我們一直是尊重的，因之我們曾把它當作我們的權利，同時——我再重復一遍——也把它當作我們的義務，因為我們並不是只為了每個月底去領津貼的議員：我們是要負擔起自己的議員責任的。

“因此，繼我們的朋友之後，我跟辯護律師一道提出請求：不能宣布秘密審判。如果我為了祖國的榮譽，為了使我們的國家能繼續在世界上存在、並表現得像一個革命的國度，像一個人民自由的國度而堅持真理的話，我同樣也要堅決保護自己的榮譽。從這一意義來講，也可以說是為了個人的利益。也許這正是今天很多人所沒有的一種弱點。但是就我個人來說，我絕對堅持保衛我無疵的榮譽，保衛同胞們對我的信任，保衛法國人民對我的尊敬，這便是為甚么我請求不要宣布秘密審判的道理。

“過去當我們想在下院提出討論某些貪污案件時，就有政府代表起來說：‘先生們，司法當局在進行處理，你們不能討論這樁事情：議會無權干涉一件正在進行的訴訟案件。’

“而今天，你們竟來干涉正在進行的訴訟案件了，你們調閱了檔案材料，引用其中的文件並完全違法地宣布了一項撤銷議員資格的法令。

“對我們被告說來，秘密審判是一種威脅，因為我們不僅

需要在你們面前表明我們的無辜——這從本案的判決來說是很重要的——而且還要在法國人民面前表明我們的無辜——這從整個人民對本案的判決底角度來說是很重要的——，而秘密審判剝奪了這種可能性。

“我已經充分發揮了這一切論點，因為這些論點中的任何一個實際上都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控告我們的這一案件中，要想宣布秘密審判，而又要使這樁事情本身不成為繼那些打擊我們的無數非法行為之後的一個新的非法行為，那是不可能的。”

就這樣，高納凡從容不迫地作了發言。每個人的嘴唇都跟着他一塊兒動作，每個人的胸脯都跟着他的胸脯一塊兒起伏，每個人的嘴里都念着他所說的每一句話。

法堂上只亮着三盞小小的電燈。

整個審判廳都墜入了半黑暗狀態，但沒有一個辦事員想到要去開燈。

不開燈也沒有關係，因為高納凡剛才在原告所作的謊言的暗影中發出了一股奪目的光輝——真理的光輝。我們全體轉向高納凡，向他表示兄弟般的热情的感激。他坐在我的旁邊，我握了一下他的手。問題已經很清楚了：道理是在我們這邊，是我們向法國人民指出了安全的道路。我們的心彼此一致而和諧地跳動着。

貝諾瓦說道：

“我們是共產黨人，我們擁護真理。而關於秘密審判的請求却表明政府是害怕真理的。但是當別人看到政府不是向希特勒而是向工人階級作戰的時候，誰又會不最後搞懂這一真理呢？”

政府當局從來不曾有過像這樣一次可以使我們無辭以對

并且証明其控告理由的好机会。如果它有証据，那么就請拿出来吧。罗歇从这个論点出發，使政府当局和原告陷于一个进退兩难的境地而不能自拔。

“今天早上”，他开始說道，“当我们离开桑台監獄的牢房而被解送到此地来时，我們會感到有些高兴。的确，六个月以来，我們肩上帶着一个鉄項圈，它快要把我們压死了。六个月以来，我們被置于与外界隔絕的境地，不能向任何人發表我們的意見，無法对任何控告——不管它是怎样無耻——进行答辯，而檢察官先生今天竟然还想把这一鉄項圈給鎖上。然而，請問对于公开审判能够感到高兴的除了政府本身，除了原告本身而外，还有誰呢？难道六个月以来，你們不曾在報紙上說我們是被收买的分子，是被外国所豢养的走狗嗎？

“而今天，原告方面已經有可能通过公开审判的方式，公开証明我們真正是卖国贼，是敌人所雇佣与收买的分子。但他們却拒絕这样作。在檢察官面前有着内容充实的档案，如果这些档案中有这种証据的話，那就請拿出来吧。

“这样，先生們，你們不仅可以很輕易地判处我們最严厉的刑罰，而且我們还将受到另外一种對我們說来比什么都更可怕的懲罰：人民的懲罰。在相反的情况下，如果原告方面要求秘密审判，正是由于他們不能証实这是一个叛国案，正是由于他們不能証明我們曾經有过瀆职行为。他們想掩盖六个月以来的一切可耻行徑和他們所散播的全部誣蔑。这就是事实的真象。先生們，我可以用一句話作出結論：坏事是在黑夜里干的。如果你們想干坏事，那么你們就在黑夜里干吧，你們宣布秘密审判吧；但如果相反地你們像自己所說的那樣是欢迎真理的，那么你們就得拒絕原告方面向你們提出的請求。”

說得完全对，事实已經再明白沒有了；法国人民——我們

全体在场的人便是他们忠实的代表——法国人民是和我們在一起的。他们的想法和我們一样，他們和我們是一致的。

如果我們有可能和任何一个法国人个别談話，那么当談話結束的时候，他一定会表示：我們解放全人类的理想，为世界謀幸福、为爭取公正而持久的和平，以及在劳动与欢乐中求得幸福的理想，也就是他們的理想。沒有任何东西可以夺去我們的这种信念。

有多少法国男女在信以为真地向我們进行攻击，原因是他們對我們毫不了解，他們受了拿着笔桿的匪徒們的欺騙，被导入歧途，而这些拿着笔桿的匪徒們則正是替那些百万富翁的走狗——公开作惡的人們服务的。

从早上九点起，我們便坐在这一个由初等刑事法院改成的第三軍事法庭的席位上。在这里沒有任何一人，沒有任何一个人，甚至在法官和檢察官中也沒有任何一人，如果他們心自問的話，能够不承認我們不仅沒有可責备的地方，而且由于我們的忠誠正直，还應該得到尊敬。

當我們講話的时候，由于我們来自东西南北，口音、語調、發音是不同的，但每个人發言的精神都是从法国的生活，从工人、农民和知識分子的生活出發的。有理由的正是我們。我們是共产党人，正因为我們是共产党人，所以是法国人民最优秀的兒女。我們每个人随着心弦的跳动，低声地把这几个字說了出来。的确，从今早起，我們坚定地高高举起法国共产党的旗帜进行战斗。而現在天色已經晚了。我們沒有注意到时光已經按照亘古不变的步調緩緩地消逝。已經差不多是夜里了。黑暗即將籠罩一切。被告們从开始起就好像是行使其固有的权利一样，把自己看作原告，他們所發表的堅定有力而無可辯駁的言論，使全体法官、檢察官、書記和他們的助手呆呆

地坐在席位上，甚至沒有想到要去打开电鈕。也許是因为剛才罗歇談到了黑夜的原故吧，天花板上的灯亮了，大家看到皮佑站了起来。他作了最后的發言：

“当原告連到这兒来作解釋的勇气都沒有的时候，誰还能相信我們是卖国贼呢？”

“原告竟不得不引用一八一二年的法律，处在第三共和国时代，竟不得不引用我国历史上最可怕的違反自由的年月——一八五二年时代的法令。那么，在这个国度里就只有引用帝国时代的法令才能反对共产党人嗎？”

“好吧，也許就会进行秘密审判，如果檢察官坚持这样作，而法官先生們又認為值得考虑的仅仅是政府方面或新聞界的压力的話。不过，如果是秘密审判，請你們当心点！其結果將不是我們低着头走进自己的牢房，而是你們將在良心上感到自己在黑暗中做了不應該做的事情。

“我們，我們是共产党人：我們以驕傲的心情这样称呼自己，因为在这个时代里，除开工人階級和劳动人民之外，很少有人能够面对着自己的良心說：我們沒有任何值得責备的地方。”

于是，正如我們每个人在發言时所作过的那樣，皮佑大声疾呼道：“那么，到底为甚么要秘密审判呢？”

皮佑进而对以伪造为根据的起訴書中的花言巧語直接予以駁斥：

他的論証是：

“起訴書中牽涉到好像有不利于国防的东西。审判長先生，我对法律問題懂得不多，不过我以为在行將举行的辯論中，只有起訴書才能作为訴訟和討論的基础。好吧。然而我們曾經指出：在起訴書中有伪造的部分。为甚么說是伪造呢？”

因為我們那封信是合法的，是享有議員特權的保障的，是受一八七五年憲法中所規定的國家代議機關不可侵犯的原則的保障的。對和平和戰爭問題發表我們所想到的任何意見，這是我們的絕對權利；或者說得更好一些，這是我們作為共產黨議員，作為國家代表的義務。”

皮佑在指出反共分子狄克西·魏昂谷也曾說過寫給赫里歐議長的信不能作為任何控告的基礎之後，接着充分說明了下面這一歷史性的真理：

“歷史上曾經有過這樣的時期：當統治階級註定要滅亡的時候，他們已不再能用自己的法律進行統治，為了設法保持自己的政權，便不得不对自己的法律加以踐踏。

“达拉第政府的情況正是這樣。他所希望的便是摧毀工人的自由，建立反動獨裁統治，而‘國防’和‘安全’等字眼對他來說不過是為了替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六日解散法國共產黨的法令作辯護的可憐的借口而已。而九月二十六日的法令，只不過是實現龐納對里賓特羅甫所作‘共產黨將被制服’的諾言罷了，正如刊載於黃皮書中的一九三九年七月一日的照會所洩露的那樣。”

皮佑提請法庭注意這一切，接着便用精確的例子說明原告方面的陰險意圖……

“實際上，我們被控，正因為我們是對原告們的一種活生生的譴責，他們是把法國陷入這種悲慘境地的負責者。因為他們阻止與蘇聯結成聯盟，任憑民主的西班牙遭受摧殘，與里茲·斯密格里和貝克這兩個波蘭的叛徒談判，破壞了國家安全。而我們究竟又有甚么可以責備的地方呢？是因為我們曾經不斷地宣稱與蘇聯的和解是獲得公正而持久的和平、並從而保證我們的民族獨立所絕對不可缺少的嗎？歷史向我們證明



这正是真理所在，而未来的事变也将给我们带来证明。

“显然，起诉书中还曾经提到：‘共产主义，这是唯一挽救欧洲和平的方法。’

“我们对检察官先生表示感谢，因为这种引证可以改变我们共产党人希望战争的反动口号。你们想举行秘密审判，是不是因为你们害怕国内的人们知道共产主义是唯一挽救欧洲和平的方法呢？不管怎样，我们可以肯定，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堵塞我们党的声音，因为这是人民的声音。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距今将近一个世纪的时候曾经说过：‘一个怪影在欧洲游荡着——共产主义的怪影。’<sup>①</sup>

“曾经有过许许多多的人试图在共产主义发展的道路上阻止它，其中有很多比今天正企图阻止它的人们要伟大得多的人物：他们并没有成功。如果你们残害一个共产党人，你们就会唤起另外几十个共产主义者。我想提一提几天以前一个自卫队军官所说的话。‘我不知道’，他说道，‘共产党人所能交给他的战士的到底是些什么；我不知道他们给后者注射了一些些什么样的病毒，因为我们愈向他们进攻，他们的人数愈多……’他说得对。你们可以采用你们愿意采用的一切措施，一切你们所愿意采用的秘密方式，你们却不能消灭共产主义：它在你们自己的制度里面生长。你们的资本主义制度将会走向坟墓，这是你们无法阻止的，它将日趋没落；不管你们如何挣扎，代表未来的却是我们。审判官先生们，请不要进行秘密审判。不过，即使你们要这样作，这仍然不足以阻止我们在辩论过程中说出我们所要说的话，并且证明我们的原告才是被告，才是真正的卖国贼。”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中文版，第八页。

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发言。我只能写出一个平淡的摘要来。可惜这些发言不能像在我国历史上最辉煌、最杰出、最动人的时代那样，在冬季赛车场、布法罗运动场、夏乐宫或是协和广场，在群集的巴黎人民面前发表！

法官们退庭了。他们的讨论要用去相当长的时间。我们等待着。我和我的律师让·馮丹谈着话，他是比利时人，是布鲁塞尔上诉法院的律师。

我们向待在大厅后面的亲友们挥手表示友爱，他们正以焦急的心情等待着法庭的决定。

\* \* \*

“敬礼”！

法官们复庭了。

审判长宣布道：

“今天，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日，第三军事法庭，代表法国人民，在进行秘密讨论并对于检察官和被告方面所提的请求加以裁决时，

“审判长曾提出下述问题：‘在本案中，有没有进行秘密审判的必要？’

“本军事法庭按照法律进行了表决，

“鉴于在本案中，公开辩论将给社会秩序带来危害，而秘密审判不会有任何地方足以损害法律的尊严和被告方面的权利，

“因之以多数票的决定宣布：按照军法第七条之规定，在整个辩论过程中，有必要采取秘密方式；

“据此，本审判长下令旁听者离开法庭，并下令采取必要的戒备，以免他们对行将讨论的内容有所知晓。”

审判长宣布退庭。我们离开了大厅。我们在首都警备

部队的監視下，在背着短槍的摩托兵的护送下，用和早上同样的交通工具，重新回到了桑台監獄。

我赶快潦潦草草地写了几句話給我家里：

“我回到監獄了，時間是下午八点三十五分。我們全体都因今天这个日子而感到滿意和驕傲。我們是按照共產黨員、按照法国人的身份行事的。我們証明了我們是把理想置于一切之上的。我們是正直和清白的。只有我們才是有真知灼見的人。也只有我們才是有理的。我們那种只有把握了真理的人才会有有的堅定、熱情和自信，表明了我們堅定不移的信心。律師們也都無愧于我們對他們所寄與的信任。

“我在法庭里看到你了。我也瞧見了馬格麗特。我會远远地用全部熱情擁抱你們。我曾提到我們的兩個現在正在部隊里的兒子塞爾吉和皮埃爾。在辯論時我們全家都到場了。我們大家如兄如弟，我們是法国人，是愛國者，是始終如一、堅定不移的共產黨人，並決心永遠堅持共產主義。

“目前，你應該冷靜，不必擔心！該怎樣就怎樣吧！反正我盡了自己的義務，我將永遠這樣作。我永遠相信你那裡經得起一切考驗的愛情。

一九四〇年五月<sup>①</sup>二十日星期三于巴黎

桑台監獄八部第二十七號牢房”

第二天早上，當我們為了審判的第二個日子而坐上被告席以後，我可以從那些被暫時釋放了的朋友們所特別替我們打開的“人民報”上看到：

“在這樣一個漫長的審判日子的晚上”，記者寫道，“要想掩蓋事實或企圖隱藏甚么東西是會完全徒勞無功的。真相無

---

① 疑五月為三月之誤。——譯者

可辯駁地被揭露了出來。只要分析一下辯論的經過就足以表明：共產黨議員占了很大的優勢，法庭方面則大為失敗。

“從上午開庭起，自始至終，人們目覩了一個極端稀有的場面——對我說來則是僅有的一次。審判長加法約里上校由於對自己的責任感到如此棘手，以致在其席位上顯得非常紊亂和極度慌張。

“與此相反，被告們則給人以完全安然自在的感覺。審判長猶豫不決，說起話來口吃，時而下令，時而撤回。而被告們却是論戰老手和開會專家，他們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要說些甚麼，並且表達得很好。這位被訴訟程序上各種問題所淹沒了的審判長連最簡單的法律手續都給忘了。被告和他們的律師們在答辯時用鋒利如箭的論斷來抨擊司法官。他只好自行更正，回頭再重新開始。這和一般所說的司法尊嚴是完全相違背的。”

我的律師在他的法庭記事里記下了他的印象：

“當我總括昨天一天的印象時，我便看到被告們好像以一股巨大的精神上與道德上的力量支配着這場辯論，達到了難以描寫甚至難以想像的程度。

“被告們使人肅然起敬。這種尊敬可以在審判長的態度上看出來：開始是懷疑和近乎敵視的態度，繼而轉為和緩，最後終於給予充分尊重，制止發言時也改用了請求的方式，並且逐漸以表示尊重的語調代替了開始所慣用的‘我將把你們驅逐出庭’的說法。

“被告們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同情和贊揚。由於來自各個省份，每人帶着自己的鄉音。工人、手工業者、農民、知識分子，都在自己的舉止動靜中流露出他們各有一技之長，他們共同代表了滿足人類需要的全部艱巨而自覺的勞動。他們都來

自人民，对自己的出身感到驕傲，他們是在自己所乐于接受的教育之下成長起来的。他們都是眼光尖銳的觀察家，其所作分析體現出了精深的論理方法；他們是言無虛發的演說家，具有一針見血的、动人的、实实在在的辯才。从全体听众經久不懈的注意力上可以看出大家对他們的关切、同情和贊歎。

“被告們清楚地表現出了他們观点上的完全一致。我記起了聖經中的一段話：‘應該不帶片紙只字，直接了当地想到甚么就說甚么；于是便可以說，这是聖灵在講話。’对于被告們來說，則是共产主义这个‘聖灵’在講話。而这对他們每个人說来都是正确的。通过他們每个人所表現出来的正是共产主义。每个被告对其他同志的事情、身体、言論所具有的亲切关怀；每个被告当其他同志發言或牽涉到其他同志的問題时所表現的激动，真是一幅动人的圖画。

“至于秘密审判呢？

“七名法国审判官是已經这样宣布了。这是‘借司法制度以进行謀杀’。

“于是被告們对于起訴書中伪造部分、对于被用作控告根据的窜改原信事件的揭露，便因此被审判官們用一層帷幕遮盖起来了。”

## 第十一章

### 共产党人对党与祖国的忠诚

从这天起，直到四月四日本案结束为止，在十四天当中，审判厅将以加倍的警备封锁着。首都警备部队、自卫队、司法警察、保密局的人员和身份高低不同的情报人员充满了各个厅堂。法院大厦的走廊变成了警备们的营房。

这是秘密审判。审讯中的任何消息都不允许也不能够以任何方法传到外面去。我们是在秘密审判的蒙昧状态下受审的。政府总觉得法院四壁的厚度还不够。它害怕牆缝壁耳，采取了在法西斯统治下所流行的各种措施，以防最小的疏忽。它害怕，它害怕真理！

在审判厅里将不再有听众，不再有新闻记者，甚至不再有刺刀插在枪口上的兵士。这是绝对的百分之百的秘密。在十四天当中，事实上除了各报刊在其愿意的时候，用不多几行刊载法庭对律师们在被告和原告间发生偶然事件时提出的请求所作各种裁决以外，人们将再也得不到有关本案的消息。

从来没有任何请求得到过许可，法庭方面只是机械地加以拒绝。法官们就这样拒绝让被告证实起诉书在引证致赫里欧议长的信件时所含有的严重错误，也拒绝下令把原信全文插入到这一起诉书中去。

他们甚至拒绝给予我们在审讯过程中为了记笔记所必需的铅笔和纸张，拿我们当一般刑事案件中的土匪看待，然而在

我們这些人当中，有十二个人受到过表揚，十个人得过作战十字章，四个人得过軍功章，三个人得过荣誉团十字章，一人得过玫瑰花結荣誉团章。

但是对于那些曾經把外国武器运进法国来并曾屠杀法国人的褐衫队员們，你們曾拿出过甚么办法呢？甚么也沒有。对那些曾向希特勒領取成百万津貼的匪徒們，例如曾經出卖过秘密會議記錄的上院女速記員，你們又采取过甚么行动呢？甚么也沒有。对第五縱队的所有代理人，对希特勒、戈林、戈培尔、墨索里尼、佛朗哥的党徒們，你們曾作过些甚么呢？甚么也沒有。有三个反动議員曾以通敌罪受到控告。但他們却沒有被撤銷議員資格。他們繼續領取議員津貼。

而共产党議員則被撤銷了議員資格，他們的妻子兒女不得不靠別人的帮助过活。如果他們要想免除牢獄之灾，究竟應該作些甚么呢？應該發表一篇反希特勒的宣言嗎？不会有事情，一輩子也別妄想！在法国正与希特勒处于并不作战的“战争状态”，与苏联尚訂有并未失效的互助条約的情况之下，所需要的却是一篇反苏宣言。

达拉第与龐納的党徒和走卒們說我們是卖国賊。那么理由是甚么呢？是因为我們不願意与納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同謀者资本主义寡头發生任何联系；是因为我們不同意接受法国冶煉業公会、煤矿委员会和紡織業集团的命令，也不同意接受巴黎、倫敦和華盛頓銀行老板們的指示；是因为我們坚忍不拔地保衛了工厂、农村、實驗室、事务所、商店和行政机关中劳动者們的基本要求。

“卖国賊”！不过他們叫錯了人。卖国賊：这是那些有产階級，他們从古以来，当其階級特权發生危險的时候便出卖祖国，并且不惜求助于外国軍隊以保持这些特权。卖国賊：这是

那些貴族階級，他們中間的史塔埃爾夫人曾經說過：“法國貴族認為與其說是法國人的同胞，毋寧說是世界各國貴族的同胞”。而貴族階級的头子孔德親王并會大胆地宣布說，應該“讓法國見識見識那些正準備越過萊茵河、阿爾卑斯山或比利牛斯山的庇蒙特的部隊以及西班牙或普魯士的部隊。”并且說“通過恐怖可以獲得一切”。

就是這同一位親王，除了作過其他無恥的事情外，還曾肆無忌憚地說過：“對，對一個聖路易的子孫來講，不管屠殺法國人民這一意念會引起怎樣的恐怖，我仍將作為世界各國貴族的領袖，領導所有集合在我的旗幟下、忠于其本國君主的臣民，去援救這位不幸的國王。”

賣國賊：這是那些一八一四年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當德國侵略軍進入巴黎的時候，在貧民區受着含悲忍淚的痛苦和貴族區过着不合時宜的狂歡生活的情況之下，竟在巴黎歌劇院替那個高唱“威廉和他勇敢的戰士們萬歲”的法國男高音喝采捧場。當時，法國資產階級是由英國所組織的反法聯盟的最好的盟友，因為法國商人對於已經盡了鞏固資產階級地位作用的拿破崙制度不再感到需要了，他們也不再需要妨礙法國商務的封鎖了。

賣國賊：這是那些曾經拒絕實行聯蘇政策的人們，因為他們企圖摧毀社會主義國家。

大資產階級是把他們的階級利益放在民族利益之上的，放在和平的利益之上的。

今天，當外科醫生用他們的手術刀在我們的傷口中探尋的時候，他們還可以發現有捷克斯洛伐克標記的鐵片，這些鐵片是斯科達工廠用由張伯倫和達拉第送給希特勒的蘇台德山的礦產所製造的步槍、機槍和大炮所發射出來的。



而今天，議會和新聞界的一大群瘋狗為了接受張伯倫和达拉第這兩個家伙的豢養，竟在主子跟前獻媚，向着我們共產黨人——法蘭西和共和國利益的真正保衛者狂吠。

的確，如果根據事實，根據我們的行為進行審判，我們有信心會被釋放，因為我們是法國人民最好的保衛者。但是，在此地我們卻是在充滿階級成見與反共仇恨的情況下受審的，因此我們將被處以罪刑。但這又有甚么關係呢？我們的案件將會被重新審查的：法國人民將擔負起這個責任。我們對將來滿懷信心。法國的人民群众將使我們獲得自由。那時，他們將對真正的賣國賊及其同謀者，达拉第分子、雷諾分子、貝當分子以及全部慕尼黑流氓黨徒進行控告。這就是在各次審訊時期法官們從共產黨議員嘴里所聽到的全部口供。

正如他們是代表着不同的省份一樣，他們每個人都各以自己的方式，組成了一個整體，共同進行辯護，這一辯護像花崗石一般的堅硬，像鋼鐵一般的牢固，像玉石一般的鏗鏘，像陽光一般的輝煌。

沒有任何重複的地方：每個人都採取了最適合於自己的個性、氣質、出身、鄉土、品質與人格的特有的方式，但是就像一個完全統一的整體一樣，大家都向着每人都同樣清楚領會了的僅有而且共同的目标。

決不讓步，決不屈辱，決不投降，決不叛變。對於自由、民主、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勝利的信心是永不動搖的。他們想叫我們說自己不再是共產主義者，說我們叛變了法國共產黨！不可能，不可能，絕對不可能！這永遠、永遠、永遠做不到！

我們每個人在發言時都找到了動人的辭句，以宣布自己對共產主義理想的忠誠。我記下了這些辭句：

“是共產主義給我以生活的意義。”

“我所学习到的一切，我的今天，都是那些我曾与之并肩作战的人们所给我的，是我的党——法国共产党所给我的。”

“我想念我身体脆弱的爱人和我的三个孩子，他们当中最大的还不到五岁。我很爱他们。正由于爱他们，所以我将忠实于我作为共产党人的过去，忠实于我的党——法国共产党，忠实于我的祖国——法蘭西。”

“我为自己的过去感到骄傲。我后悔当初没有作得更多。我将永远保持共产党员的称号。现在我把这一点告诉你们。你们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因此你们将来判处我以罪刑时，并不是不了解情况的。”

“我曾经作为工人、兵士、議員和共产党员为祖国服务。我要继续为我的祖国服务。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决心永远保持党员的称号。”

“我要保持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是我的骄傲，也是我的光荣。”

“这并不是只牵涉我们个人的问题。我们早已把自己的身体贡献给人民了。你们的企图是要毁灭共产主义。你们永远别想达到这个目的。共产主义现在存在而且将永远存在。”

“如果你们想把我脑子里的共产主义信仰去掉，那只有一个办法：砍掉我的脑袋。”

“不愿监狱，死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

“无论从形式或者从实质上讲，对于法国共产党说过和作过的事情，我都绝对拥护。”

“我是共产党员，我过去是以共产党员要求自己的，我将永远以共产党员的身份来行动。”

“我们所以进行活动，是因为我们是共和主义者，是爱国者，是共产党人。”

“‘共产党人’和‘爱国者’这两个先后排列着的名词，是不可分割的。”

“我们是共产党员。我们全体共产党员和多列士、杜克洛、弗拉商、加香一道，为法国的解放而斗争。”

“你们可以把亨利·巴比塞和保罗·瓦扬—古久里等的名字从街道牌上抹掉，但你们却永远无法抹煞我们心里的共产主义。”

“你们想要摧毁共产主义，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工人运动是不可伤害的。”

“不管你们愿意与否，我们都是法兰西共和国的代言人。”

“你们想损害我们的名誉，但你们的举动却适足以使我们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更加提高。”

“把你们的臭钱留给犹太去吧。我们将永远忠实于我们的共产主义理想。”

“并不是所有企图侮辱别人的人都能够实际上给人以侮辱。我们的存在回答了诽谤者们的谎言。”

“我计算了一下我曾经给党作过的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和党使我得到的知识和道德方面的快乐，我的结论是我没有给党甚么，而党给了我一切。我因为能作一个法国共产党的党员而感到骄傲。”

“对，我们是共产党员，我们以身为一八七一年光荣的巴黎公社社员的继承者而感到骄傲。”

“共产主义，这就意味着在和平环境中人性尊严的充分发扬，科学与文学的高度成就，以及人类文明的灿烂繁荣。”

“对于祖国，对于曾经经历过一七九三、一八三〇、一八四八、巴黎公社、一九三四年二月九日和十二日以及一九三六年五月的法国，我们是满怀信心的。”

在我們的一言一行中，从来不曾有过虚伪、花招和矯揉造作。

一切內政外交問題都曾經被正面地加以討論，加以分析研究，並且在我們共产主义辯証法的篩子里篩過了。

我保存了写在桑台監獄食堂的紙袋上的全部紀錄和全部參考資料，這些資料我曾經在軍事法庭上有关外交政策的發言中加以应用。它們能保存到現在，這是我妻子的力量。事情是这样的，在審訊过程中，我曾經設法把它交給我妻子，她把这些东西藏在很可靠的地方了。当时我曾經把我的發言全部写下来。因此今天就能够把它完整地重新組織起来。这篇發言是根据我的記憶，根据一九三九年最后一个季度与一九四〇年第一季度的“政府公报”和下院行政处所送給我的黃皮書写成的。

同样我也弄到了法戎的發言紀錄，因为他是軍人，所以在当时还有过几小时的自由。

被告們所作的其他發言也都貫穿着同样的精神，同样的对于我們的正义事業的信仰，同样的对于民主的前途和法国的命运的信心，以及同样的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胜的坚定不移的信念。

面对着第三軍事法庭的审判官們，我們依旧忠实于共产党議員們一九三六年在下院柯尔柏厅举行第一次會議时的庄严宣誓。

誓詞的內容是：

“作为法国共产党的議員和斗士，我們宣誓要为我国人民的尊严和保衛世界無产階級而斗争。

“作为法国共产党的議員和斗士，我們要徹底为集合在爭取面包、和平、自由的人民陣綫以內的劳动階級服务。

“我們愉快地服从党的紀律，对党的不可抗拒的向前迈进的步伐充滿信心，我們宣誓要为法蘭西民族的团結，为实现一个自由、强盛与幸福的法蘭西用尽一切力量，而这正是一切共产党人所希望和所將要作的。”

每天晚上在审讯完畢之后，当我们回到牢房的时候，我們便感到尽了自己的責任，感到用我們自己的表現，对于被迫轉入地下的同志們所领导的日益壯大的斗争作了一定的貢獻。

我們因为能始終忠实于自己的誓言，因为能無愧于法国共产党——法国人民、第三共和国和法蘭西的偉大政党——而感到驕傲和愉快。

## 第十二章

### 慕尼黑分子的罪惡政策

三月二十三日星期六，复活节的前一天，下午繼續进行审讯。

早上被审的是貝諾瓦和白利奧茲。現在皮佑正結束了他堅強而有力的發言。

一樁突如其來的嚴重事件打斷了对皮佑的审問。我們的辯護律師發現有兩個人躲在大厅最陰闇的一个角落里，正在速記辯論过程中的全部發言。律師們請求法庭在被告面前当众盤問他們，沒收他們的記錄并在本案辯論中加以公布。因为已經决定了秘密审判，并且法庭曾經宣布全部审讯保守百分之百的絕對秘密，那么在审讯中除了与审讯有关的全部人員，亦即审判長、法官、檢察官、主任書記官、文書人員、辦事員、值日官、被告、以及辯護律師之外，当然不容許任何旁人在場。法庭駁回了辯護律師的請求。据他們說，他們有权准許政府工作人員到大厅內來。

不錯，這兩個人是政府工作人員，但不是普通的工作人員，而是巴黎警察总局和保密局派來的代表。法庭迎合警察局和政府的要求，決定秘密审判，而現在却不僅容許別人破壞自己的決定，而且还企圖以此不僅对被告施加压力，并且对証人們也施以压力。証人們來到法庭上为共产党議員辯護，已經表現了很大的勇氣，而在警察監視之下發言，当然需要更大

的勇气，事后他們也許会受到警察的通緝、搜捕以至被关到集中营或監獄中去。

辯護律師本身也感到他們的自由和权利被类似的威胁所限制。我們記下了这一筆賬，然后直接按照我們既定的行動綱領繼續进行辯護。

皮佑出色的發言結束以后，我接着發言，針對那些簽定羅馬協定、抱定不干涉主義和參加慕尼黑會議的人們所执行的罪惡政策加以控訴，這些人是祖國災難的負責者。

我把所有有关此次發言的筆記和參考材料，在審訊过程中全部交給比利时辯護律師讓·馮丹以及我的妻子了，他們很珍貴地將材料保存了下来。下面是發言的全文。

審判長和法官先生們：

本案进行之初，我們曾經請求公开說明我們的正确的政策，明智的建議，以及高瞻遠矚的爱国主义。

我們曾經要求公开更正被內閣總理、各位部長和他們的御用議員們在議會講壇上有意歪曲了的事实真相的权利，我們曾經要求对腐化的新聞界的無恥誣蔑公开予以答复的权利，但是你們用秘密审判剝奪了我們的这种权利。

因此，六个月来誹謗者得以利用我們被囚禁的机会，肆意謾罵造謠，其無恥行为層出不窮，而你們甚至不准許我們向人民申訴；只有人民才是唯一合法的裁判者，而且我們只能向人民报告关于普选所付予我們的議員职责的完成情况。

你們所作的違反正义的裁决，妨碍着正直的法国公民在遭受卑怯之徒陷害时不能公开為他們的荣誉进行辯護。我們再一次对此提出抗議。政府不願意我們公开指出其可耻的誣告純粹是無稽之談，因此通过檢察官請求进行秘密审判。政府不願意將事实真相告訴人民，不願意人民知道：我們在法庭

上并不是作为被告請求減輕情狀，而是作为原告来对政府禍国殃民的罪惡政策，提出有决定性的証据的。然而政府絕不能阻止我們揭發其違反国家利益的行为。共产党过去和現在始終以無比的勇气，不顧对其坚强有力的斗士所进行的凶殘迫害，保衛着这种利益。

我马上就要揭發政府違反国家利益的行为，并以檢察官起草的起訴書作为我控訴的根据。起訴書中的主要文件，是我和我的朋友拉麦特在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送交下院議長的那封信，信內我們請求他召开議會，討論和平問題。

去年十一月三十日，我因为被逐出議會，沒有得到發言的机会。今天我要把当时沒有能講的全部內容講出来：說明我們对于內外政策的一切問題所持的态度，說明我們对战争与和平問題的看法，并且証明我們一貫所拥护的集体安全政策是唯一能够保証和平、保衛法国独立的政策。我希望法庭能准許我說出我認為必須說的一切，因为这一切对为我們曾献出生命的正义事業进行辯护是絕對需要的。

### 資本主义制度——战争的根本原因

为了避免混淆，使法庭把这些事情徹底弄清楚，我們必須声明：我們一貫是主張用社会主义的傳統理論来解釋战争問題的。

我們認為資本主义制度是战争的根本原因。偉大的社会主义宣傳家饒勒斯有一句名言，充分說明了这一历史性的真理：“資本主义本身帶有战争，正如烏云帶有暴風雨。”最近七十年內，在法国国土上已經进行过三次战争，証明了这一真理的正确性。这便是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三九年的三次大战。三个世代，經歷了三次



战争。

我們对于战争一般原因的根本認識并非开始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从討論凡尔賽和約的时候起，我們便已經發表过相同的意見。我們一直認為凡尔賽和約是帝国主义矛盾、对立、冲突和战争的永久根源。

我們認為：战争既不是偶然的現象，也不是命定，它只不过是將和平时期的政策加快了步調而且用武力加以推行而已，战争不过是和平时期在攫夺市場、占領势力范圍、壟断原料、爭夺世界霸权各方面竞争的延續。

然而却不能从此得出錯誤的結論，說我們是宿命論者，認為战争不可避免。我們知道：和平是人类最寶貴的財產。面对着战争的威胁，我們决不能靜止不动。这就是我們为什么从来不停止揭露一切战争贩子并与之进行斗争的原因。最先指出危机来的是共产党员，他們曾發出警报，并且指出防御这种危險的方法。

在反对战争的斗争中，我們的主要战术始終是这样的：

- 每一个国家内部的劳动人民团结起来；
- 世界各国劳动人民在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 一切爱好自由的人民团结起来；
- 一切希望和平的国家团结起来。

沒有这种团结，斗争便不会得到胜利。而这种团结的实现，是足以击退战争的。一种縝密而坚定的集体抵抗，可以成为战争挑撥者的一个难于克服的障碍。

我們过去曾一再提出請求并且希望：不要放过可以阻止灾禍發生的任何机会。但是各资本主义政府和它們的同謀者与帮凶——社会民主党的党魁們，在我們的道路上安排了層出不穷的障碍和困难。

資產階級政府的責任既不容推卸而且是沉重的。他們逐步推翻了國聯憲章所載的原則，使國際聯盟成為帝國主義進行陰謀活動的場所，成為服务于托辣斯巨頭的跛足外交的大本營；由於他們放棄集體安全，頑固拒絕蘇聯團結所有反對戰爭的國家形成和平陣綫的一切建議，他們為侵略者开辟了道路，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鋪平了道路。

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的責任也是同樣沉重而不容推卸的。社會民主黨破壞了並且仍然破壞着國內的行動一致和國際的行動一致。他們參與了並且還在參與對人民的殘酷鎮壓和扼殺民主自由的行動。他們促進了大資產階級的罪惡政策，並且贊助法西斯主義，而我們則對於這一切嚴重事件不負任何責任。大資產階級的政策直接引向戰爭。共產黨集體安全與團結的政策則維護和平，制止戰爭販子的活動。在判斷兩方面孰是孰非的時候，不能把目前所發生的事件孤立起來，因此，也不能把戰爭孤立起來，而不聯繫以前發生的事件，以及雙方在這些事件中所占據的分量。

### 一九三九年的戰爭

從外交觀點來看，目前進行的戰爭，實際上是在經過了實現協議、締結公約、簽定協定、組織同盟，並且根據帝國主義利己主義的利害，使之成而復散之後才爆發的。過去，資本主義國家有時把賭注下在這個上，有時又下在那個上，利用這個反對那個，彼此互相對立，然而，儘管有這些矛盾，由於對民主與社會主義的共同仇恨，它們全體是一致的。

一九三九年九月開始的這次戰爭，不過是早已存在於世界各個不同角落的武裝衝突的第二個階段，而現在則已經蔓延到全歐洲。

事实上，战争的第一阶段开始于一九三五年的埃塞俄比亚，一九三六年的西班牙，一九三七年的中国，以及一九三八年的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意大利、日本和德国的侵略行为，特别是它们签订了反共协定，组成了罗马—柏林轴心和罗马—柏林—东京三角同盟。

在第一阶段，我们一般的态度可以说明如下：我们宣布，拯救世界之道在于建立集体安全的合理组织，在于国际行动的一致，在于建立一道战争狂澜所不能逾越的和平堤坝。

我们指出：对战争贩子、法西斯主义让步是不利于和平的，因为这样只能刺激他们的胃口，增长他们的胆量，有助于帝国主义者的计划，削弱各国人民，把世界推向绝境和把它引向战争。我们曾经证明坚决的抵抗行动足以推迟战争，因为这样会鼓励各国人民起而进行斗争，争取每一个国家的自由和独立，使得各有关国家召开一个庄严的会议，有助于采取和平解决的方式。

以上是我們过去所主張的論点。过去的事件证明了它的正确性。

### 以弗朗索瓦·龐賽的言論为証

关于这一点，我們可以引証法国駐柏林大使龐賽的話。原文見法国黃皮書第十七号文件。黃皮書中包括各种外交文件，以及跟德国一方和英、法、波另一方开始作战前的談判和当时所發生的事件有关的資料。

龐賽認為：民主国家从慕尼黑协定所应当得到的好处，是懂得了只有本身力量的强大和团结一致，才能够避免重蹈覆轍。

一九三八年十月四日他写信給龐納說：

“在德國人中間，很少有人認為值得為蘇台德區人而冒險發動一次歐洲戰爭。人民群眾對蘇台德區人根本不瞭解，對蘇台德區人的命運也不大感興趣，正如他們對羅馬尼亞境內的德國人的命運不感興趣一樣。如果只是對捷克斯洛伐克大興問罪之師，他們倒不會不贊成，但他們一定寧願放棄蘇台德區人民，而不願看到整個世界都起來反對德國。”

然而英法兩國政府卻採取了對和平勢力進行分裂破壞和對希特勒讓步容忍贊助的政策。

### 悲慘的結果

下面便是它們的罪惡政策所造成的悲慘結果。

在埃塞俄比亞，由國際聯盟大會五十四個國家所決定的制裁行動遭到破壞，承認了意大利吞併埃塞俄比亞王國的既成事實。

同時引起的後果是墨索里尼以法西斯武力為後盾，再度提出對突尼斯、科西嘉、尼斯和薩伏伊的領土要求。

在西班牙，是罪惡的“不干涉政策”，是國際法的被否定，是置國際聯盟的會員國於不顧和聽任希特勒和法西斯的干涉行動，是對佛朗哥的可恥寵信，其悲慘結果是西班牙民主的被粉碎。

在中國，是對日本軍閥集團的長期幫助，拒絕通過印度支那運送軍火給中國軍隊，把戰爭物資交給日本，其結果是法國在遠東的地位大大削弱了。

在奧地利，正當悲慘事件發生之際，蕭當政府怯懦地辭職了，並且承認了德國兼併奧地利的罪惡事實。

在捷克斯洛伐克，通過貝茲加登、哥德斯堡<sup>①</sup>、慕尼黑一連串會談，最後達到了與希特勒合作、讓步的罪惡政策的頂

点。同盟条约上的签字，庄严的诺言以及曾经许下的保证，都被抛到脑后，为了满足第三帝国提出的要求，对捷克斯洛伐克使用可耻的压力。慕尼黑会议在战略上的后果是一种灾难，它可以同萨多瓦、滑铁卢和色当<sup>①</sup>的灾难相提并论。

你们知道，上面所说的不仅是我们的意见，同时也是外交记者柏蒂纳克斯和福熙将军的意见。福熙将军为了抗议法国政府的可耻行为，辞去了驻布拉格军事代表团代表的职位。我们还可以引证塔杜本人所讲的话：“送掉布拉格就等于送掉麦茨、土尔和凡尔登”<sup>②</sup>；还可以引证亨利·德·克里利斯的话，他曾经为失掉捷克斯洛伐克这一道马奇诺防线和它所有的军事物资而深致惋惜。

### 慕尼黑会议送给希特勒德国的礼物

至于德国从慕尼黑会议得到的收获，希特勒曾经于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克罗尔歌剧院作过一次总结，得到了他手下凶徒们疯狂的喝采。

他说：“议员们，我禁不住要给你们描绘一下有关这个中欧国际火药库的近乎天文的数字。占领整个国家后，我们已经取得了下列物资并且已经转运到了安全地点：

一、空军：飞机一、五八二架，高射炮五九一门；

二、军火：轻重大炮二、一七五门，掷弹筒七三五个，战车

① 一九三八年九月，在慕尼黑会议决定瓜分捷克斯洛伐克的前夕，英首相张伯伦曾先后至贝兹加登、哥德斯堡与希特勒会谈。——苏联网者注

② 萨多瓦为波希米亚之市镇，一八六六年普鲁士在此大败奥地利。一八一五年拿破崙败于滑铁卢。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中，法皇拿破崙第三降于色当。——译者

③ 三地均系法国东北部军事要地。——译者

四六八輛，机关槍四三、八七六挺，手槍一一四、〇〇〇支，步槍一、〇二〇、〇〇〇支；

三、彈藥：步兵彈藥十亿余發，炮彈三百余万發；

四、其他器材：大量的作战裝備，听測設備，探照器材，測量儀器，摩托車輛，以及特殊用途的摩托車輛等。”

### 顧隆德先生的証詞

在此以前一个月，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九日，法国駐柏林大使顧隆德先生送給外交部長龐納一份值得注意的报告，报告中对希特勒匪軍这次不費一兵一彈，在数小时之内所获得的成果也作过一次总结。这份报告刊載在黃皮書第八十号。

审判長先生，你曾經告訴我不要引用黃皮書中的文件。然而，我有权在政府官方刊物中，選擇我的論据。是不是因为黃皮書中的文件也等于对达拉第先生及其外交部長龐納先生的政策的起訴書，你們便企圖禁止我宣讀它們？我要求給予按照我的方式为自己进行辯护的权利。而我認為黃皮書是应当放到我們的档案中去的一份重要的材料，因此我加以引用。請你們听听吧：

顧隆德先生是这样講的：

“甚至从慕尼黑會議的第二天起，非常明显地萊因河以外地区的人們便認為所簽訂的协定，允許德国在中欧和东欧可以自由行动，因而也就意味着西方国家对这些地区不予过問。人們了解到——也許是表面上这样了解，——在慕尼黑會議中，英法兩國最希望阻止訴諸武力，而除此以外，在英法無力采取有效措施的这些区域之内，英法不得不任德国为所欲为。

“依照德国的看法，由德英宣言和法德宣言<sup>①</sup>完成了的慕尼黑协定，意味着在西方諸大国的暗中參預或者至少在它們

的容忍下，給予第三帝國自由組織中歐和東南歐的權利。幾個月以來，這種看法每天都出現在作為官方喉舌的大的德國日報上，而大使館的通訊也曾多次透露這種看法。”

顧隆德先生接着指出，占領捷克斯洛伐克以後，德國的軍事潛力將要大大增強：

“歐洲地圖最近又一次的改變，對於德國非常有利。從現在起，德國如果在兵員數額方面沒有變動，至少在軍事潛力上將要大大增強。德國發行紙幣的基金來源已經完全枯竭，而現在取得了捷克紙幣發行銀行的大部分黃金和外匯。對於一個幾乎完全失掉國際支付能力的國家來說，這樣獲得的款項是一筆很可觀的補充金額。

“更重要的是德國在占領斯科達工廠後，同時又得到大量品質優良的軍事物資。這所全世界著名的兵工廠不僅供應捷克斯洛伐克，而且供應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由於這一事實，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的軍事力量便大大減弱了。在這裡我只是提醒一下：斯科達工廠同時也為我們製造飛機上的發動機。

“第三帝國——克虜伯工廠和斯科達兵工廠的占有者——今後以一種無可異議的姿態成為在供給東歐和東南歐軍事物資方面占有非常優越的地位的供應者。這樣它就握有對政策施加壓力、控制軍備的一種手段。不可否認，這種手段是很有效的。同時它可以通过在國外銷售商品，收回數量非常可觀的貨幣。”

---

① 德英宣言（一九三九年九月三十日）和法德宣言（十二月六日）事實上就是互不侵犯公約。“英法兩國政府在其與希特勒德國簽訂的此種條約中，充分顯然表明出了它們的意圖，是想把希特勒的侵略威脅從自己身上移走，因為它們認定慕尼黑協定和其他類似的協定已經洞開了希特勒向東方去侵略蘇聯的門戶。”（蘇聯情報局有歷史意義的文件：“揭破歷史捏造者（歷史事實考証）”）。——蘇聯編者注

接着，顧隆德先生研究了糧食供應和勞動力的問題。他寫道：

“取得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sup>①</sup>二地區只是擴充領土的初步行動，從糧食供應方面來看，第三帝國也并非毫無所得。相反地，它十分顯著地改善了德國糧食供應的一般情況，不僅因為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的土壤比較肥沃，並且主要是因為第三帝國今後已經接近了匈牙利和羅馬尼亞谷倉的大門。

“另一方面，第三帝國經濟方面的領導人將得到一大批勞動後備軍供其驅使。自給自足、過度的擴張軍備、大規模的建設工程，其所需要的勞動力已經超過第三帝國的供應能力，在德國的工業和農業兩方面共缺少一百五十萬工人。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能想像德國如何在總動員的情況下對付它在勞動力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並填補因入伍而留下的空缺。被認為不宜於服兵役的捷克人，將提供在這種情形下所需要的三百万勞動者。

“最後也是最主要的一點：德國的戰略地位得到了大大的改善。捷克斯洛伐克和第三帝國間長達數百公里的令人愁苦的邊界為一條十分短促而易於防守的界綫所代替，這條綫使奧地利和西里西亞連結起來。這樣德國就能把在戰時應當用來防守捷克邊界的幾個師節省下來。

“此外，波希米亞高原和摩拉維亞成為一個出色的前進基地，特別是對於空軍：其飛行範圍可遠達巴爾干半島的大部分地區，更不必說匈牙利和波蘭了。捷克斯洛伐克成了空軍的

---

① 捷克斯洛伐克分為三部分：（一）西部為波希米亞高原，布拉格在此區內，其東北為蘇台德區；（二）中部為摩拉維亞；（三）東部為斯洛伐克，位於喀爾巴阡山之南。——譯者



中心。德国軍事当局占領捷克各省以后所作的第一件事，便是使維也納成为一支新的空軍大队——第四（东南）航空队——的中心，它是由駐紮在奥地利、苏台德区、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的空軍部队組成的。德国报纸曾經指出：第四航空队的建立大大增强了我国的空軍力量，这是出乎我們的意料的。”

顧隆德先生又补充說：

“德国不費一兵一卒，除了遇到少数抗議之外毫無阻碍地得到了一千万人口，徹底改变了欧洲的結構，并且建立了一个軍事机构，使欧洲在紧要关头不得不一再順从德国的要求。这种成就，即使头脑最冷靜的人也确实不能不为之目瞪口呆。不久以前完成的軍事行动实在过于輕易，在此之后，‘元首’就开进了拉德新区<sup>⊖</sup>。希特勒如何能不自視為所向無敵？如何能不繼續加强其已經得到的空軍优势呢？明天德国便可能采取在奥、捷已經成功的办法，来对付羅馬尼亞和波蘭，迫使它們作出選擇：或者是使和平居民遭受屠殺，不設防的城市遭到破坏，或者是付出重大代价，屈辱地接受德国的条件。同时我們不得不这样假設：德国在未完成其向东方發展的广泛計劃以前，也可能轉过身来对付西方列強。”

顧隆德先生所作的毫不容情的分析，异常明确，令人不寒而慄。他強調了局势的極端严重和法西斯侵略的危險性。我們可以引以自豪的是：顧隆德先生只能秘密在外交報告中所講的，我們已經大声疾呼地告訴了法国人民。至于当时是否还能挽救和平并使世界免受战争的痛苦呢？当然是可能的，如果英法兩國倚靠苏联的話。

---

⊖ 布拉格的一个区。

然而，令人憤慨的事情是：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安全的担保者——既沒有参与共同商討，事前也沒有得到通知。倫敦和巴黎可耻地將苏联排除在欧洲国家協議范围之外，甚至沒有征求它的意見，便决定了与苏联有傳統友誼的国家的命运。英法兩國政府的首腦只好为自己辯护，說他們已經保證了一个世代的和平。

我們共产党人，尤其是通过我們党的总書記多列士的声音，曾經对此加以駁斥，指出这完全是胡說八道，慕尼黑就是战争。正是我們是正确的。

佛蘭亭曾經給希特勒拍致賀电，我們指出他就是卖国贼。在这一点上，历史也証明了我們是对的，我們的預見完全正确。然而，張伯倫、龐納毫不理睬我們一再提出的警告。他們和希特勒、里宾特罗甫一道，繼續进行其反动陰謀。

### 資產階級瘋狂的反苏心理

支配大資產階級的并不是对保衛民族利益的关心，而是对共产主义的仇恨和瘋狂的反苏思想。希特勒正是他們所需要的人。在締結了反共协定以后，御用的新聞界对此表示滿意；它对羅馬—柏林—东京三角同盟的組成大加讚賞，因为它以为这一个法西斯三角同盟的鋼刃將插入苏联人的皮肉，并將粉碎各国的最積極的民主力量。

对德国所采取的这种行动方針，就英国來講，根源在于削弱一九一八年以后工業更加發展了的法国的力量，通过它的所謂欧洲均势体系，起調整和維持它在欧洲的霸权的傳統作用的意願。

武裝萊因区以及簽訂英德海軍条約虽然使英法兩國的对立显得更为尖銳，但它們显然同样企圖扶持納粹，使納粹成为

反对社会主义的先鋒，并迫切希望德国向东方扩展，因此英法兩國在对德态度上有其共同之处。

### 龐納的可恥的供詞

黃皮書中还有不少顧隆德与龐納的文件，可以証实我們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一九三九年七月一日外長龐納关于他和德国駐巴黎大使韋尔采克公爵談話后所作的报告，便是一篇可耻的供詞。希望审判長和法官先生們注意。

这份报告發表在黃皮書第一四九号。龐納是这样写的：

“慕尼黑协定以后，如果說法国曾經考虑充分与德国合作，那么，法国同时也認为中欧某些国家，由于它們的地理位置，可以在經濟上和德国取得比和法国更多的联系。”

### 对德国的縱容

然而慕尼黑协定并不仅限于經濟方面，它准許德国在东欧为所欲为，顧隆德先生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給龐納的信中对这点說得很清楚。这封信曾刊載在黃皮書第三十三号文件里。顧隆德保証德国确有誠意，根据他的看法，德国願意尊重目前的領土現狀，抛弃与法国过去的一切糾紛。然后顧隆德肯定地說：“德国希望向东方扩展，至少在目前对西方沒有任何企圖。这两点可以說同样肯定，而后者正是前者必然的結論。”

顧隆德更进一步闡明：“希特勒計劃的第一部分：合併‘德国民族領域’大体上已經完成，現在爭取‘生存空間’的鐘声响了。”

他把納粹們給这两个名詞所規定的涵义解釋了一番：

“首先征服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成为中欧的主人，然

后建立一个受德国霸权轄制的大烏克蘭。”

顧隆德先生补充說：“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須使羅馬尼亞屈服，征服波蘭，夺取苏联已有的权益。”这位法国大使特別着重地說：“德国的实力論在这些困难面前是不会停止的，軍人們已經描繪出了一幅飲馬高加索和巴庫的圖画。”

从一九三九年三月到九月，德国以全副力量开始行动。首先是捷克斯洛伐克被全部毁灭和分裂。

### 苏联的建議

顧隆德在上述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九日的报告中，曾經列举这一悲惨事件所造成的灾难后果。然而，当时如果能够及时醒悟，采取与苏联相同的看法，这一岌岌可危的局势还来得及加以补救。实际上，苏联已經提出明确的粉碎侵略的建議。如果倫敦和巴黎政府接受了苏联的建議，世界面貌一定会为之改觀，希特勒德国將不得被迫讓步。然而非常不幸，它們拒絕了苏联的全部建議。

三月二十日，苏联建議立即召开英、法、苏与波、罗、土、南、希腊諸国的會議。这一會議被張伯倫以輕蔑的口吻拒絕了。对英、法以及各民主国家的灾难后果来得很快，因为羅馬尼亞和德国簽訂了經濟协定，于是德国可以得到廉价的小麦和石油。

一九三九年六月，苏联建議締結援助波罗的海沿岸諸国的协定，并对一切可能遭受攻击的国家予以尽可能的保証。这一建議遭到同样的拒絕。英法兩國政府为了玩弄兩面手法，甚至演出了一幕滑稽剧：派遣軍事代表团到莫斯科去。而代表团并無实权，只是在締結英法苏互助协定的談判中無休止地拖延时日。

## 伏罗希洛夫元帅的声明

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伏罗希洛夫元帅于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一次著名的与记者的谈话中，对“消息报”记者说明了谈判破裂的原因。当时“人道报”已被迫停刊。只有一份法国报纸“秩序报”曾登载全文，因此只是很少一部分法国人知道这件事，绝大部分人都被有意地蒙蔽住了。

如果对这次有历史意义谈话的内容毫无所知，便不能理解締結德苏协定的理由。因此必须在此引述谈话的原文：

“消息报”记者问——与英、法军事代表团的谈判是怎样结束的？

伏罗希洛夫答——谈判中断的原因是由于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英、法军事代表团遂即离开了莫斯科。

问——可以知道是些什么分歧吗？

答——苏联军事代表团认为：苏联与侵略者没有共同边界，苏联军队如果不假道波兰，便不能援助法国、英国和波兰；因为除此之外，苏军别无途径可以和侵略者的部队发生接触。在上次世界大战中，英美两国的军队如果没有得到允许在法国领土上作战，它们便无法与法国部队在军事上进行合作。同样地，如果苏军不被允许通过波兰，那末它们也无法与英法的军队在军事上进行合作。虽然苏联的立场显然是正确的，但英法军事代表团不同意苏联代表团的这种立场。波兰政府曾宣布不需要和不接受苏联的军事援助。这就使苏联不可能与这些国家进行军事合作。这就是意见分歧的根本原因，谈判因此中断。

问——路透社今天广播说：“伏罗希洛夫曾向英法军事代表团团长宣布：由于苏联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政

府認為与英法繼續进行談判是無益的。”路透社的消息正确嗎？

答——不正确，这是和事实不符的。和英法談判的破裂并不是因为苏联和德国簽訂了互不侵犯条約。恰恰相反，正因为与英法的談判由于不可克服的意見分歧陷于絕境以后，才和德国簽訂了互不侵犯条約。

### “法国画报”的論証

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法国画报”也承認波蘭应当負責。“法国画报”上写道：“有一个困难产生了，这是从波蘭本身而来的，它毫無理由地拒絕紅軍进入波蘭的領土。”

而当时波蘭是法国的盟友，并且曾經得到英国的保証。在这里应当特別指出来請你們注意：正和一九三八年慕尼黑會議时捷克斯洛伐克所發生的事情相反，不論是法国政府还是英国政府都沒有对波蘭政府使用任何压力，使它接受苏联的建議。

試問如果法国政府在一九一七年禁止美国远征軍在法国登陸，大家又当作何想法？

倫敦、巴黎和华沙的政府的态度大大加强了希特勒的胆量，于是他一步紧接一步：占領默麦尔<sup>⊖</sup>，武裝但澤，改变了但澤的現狀。

作为一个法国人，作为一个公民和一个議員，我們有責任揭發这一罪惡政策。达拉第政府企圖阻止我們这样做。他們虽然使用了各种非法的鎮压措施，但是沒有成功。为了制止我們的活動，他們不顧宪法，解散了法国共产党，并且把共产党

---

⊖ 立陶宛商港，濱波罗的海。——譯者

最積極最忠誠的战士投进監獄。

### 外交人員的警告

然而，正確的終歸還是我們共產黨人，我們提出集體安全政策，支持一切合乎法國利益的蘇聯建議。我們在黨的代表大會、各種會議、群眾大會、以及議會講壇上公开发表的言論今天已經為法國的大使們一再提出的警告和迫切呼吁所証實。實際上，在英法蘇談判過程中，在一九三九年六月一日，他們就曾經說：“如果達成協議，希特勒一定會讓步”；六月十三日他們又說：“里賓特羅甫會放手的”；他們建議說：“必須加速達成協議”；他們堅持：“必須加速進行談判”；八月十三日他們再度提出：“應盡最大可能加快速度”；八月十八日他們又堅持說：“應當不惜任何代價達成協議”。

下面我還要引用黃皮書。審判長先生也許要說：“不要再提黃皮書吧！”

我的回答是：如果政府允許我們參考報紙，那麼我們就要引用報紙。不過你們知道，我們受到和盜匪一樣的普通罪犯的待遇，關在監獄里，與外界完全斷絕了聯繫，我們能夠看到的只有一個文件，這就是黃皮書。毫無疑問，下院行政人員不了解政府的意向，把黃皮書送給了我們，而桑台監獄長則誤認為這既是官方出版物，也就照發給我們了。

這是我們可以得到辯護參考資料的唯一來源，此外還有一份“政府公報”——監獄當局唯一特許的報紙，以及一份“法國圖報”——列在允許供犯人閱讀的雜誌單上。如果你們在下令秘密審判之外，現在又禁止我們利用官方文件，那麼你們最好馬上中止辯論，立即宣判吧。至於判決的內容，毫無疑問，你們已經奉令事前決定了。

我看得出：审判長先生做了一个手势，我想这是表示否認吧。

### “黃皮書”的証詞

于是我繼續我的論証。

法官先生們，請你們注意听吧。

黃皮書中有二十多处——我曾經計算过——提到我們所不斷強調的事實：如果英国和法国与苏联达成協議，希特勒就会被迫讓步。

顧隆德先生在一九三九年六月一日写信給龐納——我引用第一三二号文件——說：

“在威廉街<sup>⊖</sup>流行的看法是：假如波蘭不讓步，希特勒的決心將依賴于英苏協定的签字。大家認為希特勒只有不对苏联作战，才会冒險發動战争。如果他知道同时不免要和苏联冲突，那么他宁可退步，而不願使他的国家、党和他本人冒灭亡的危險。在英苏談判長期拖延的情況下，最近數周內以武力夺取但澤便不是不可能的了。”而历史証明，英法兩国的統治者破坏了这些談判。

在同一封信內，顧隆德先生指出：时机迫促，談判必須立即达成協議。顧隆德認為八月大約是危机的頂点，尤其是談判結束以前一段时期最为危險。他接着报告了一段非常宝貴的消息：“英国大使和我的意見一致，認為这种情况非常严重，他告訴我已經把全部情况轉告倫敦，并坚持必須尽速締結英法苏協定。我告訴他，我們这方面也正在尽一切努力，以便能毫不延迟地得到这一結果。”然而倫敦和巴黎所做的却剛好是

---

⊖ 德国外交部所在地。——苏联編者注



它的反面。

顧隆德先生在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三日另一封信中又提到同一問題，這封信發表在黃皮書第一三五號。他堅決認為西方諸大國必須“加速談判，顯然柏林方面是害怕達成協議的”。顧隆德當然只是空費唇舌，受信人裝聾作啞，根本不願意理睬他。

一個月過去了，倫敦和巴黎的統治者繼續進行他們破壞英法蘇談判的工作。黃皮書第一九四號所載顧隆德給龐納的一封信中提到：為了避免希特勒發動對波戰爭的可怕的危機，他認為主要的是：

“一、堅持不屈，組成一條團結無間的陣綫，因為任何即使是表面上的退讓，也會引向戰爭，必須堅持在一旦發生事變時主動出兵援助；

“二、德國軍力不斷增長，必須保持同盟國家的軍事力量、尤其是我國的軍事力量與德國處在同一水平。絕不可使人誤認為我們可能讓步，這一點非常重要；

“三、盡快與蘇聯達成協議；

“對德國來說，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心理因素，因此我一再毫不厭煩地加以強調。”

然而，所有這些動人的警告再一次被全部漠視了。

最後，根據黃皮書第一九九號文件，八月十八日顧隆德先生大聲呼喚說：“應當不惜任何代價與蘇聯達成協議。從各方面來看，德國軍人目前正極力促使希特勒發動對波戰爭；制止他們最有效的辦法莫過於締結對蘇協定。”

### 倫敦和巴黎的固執

然而倫敦和巴黎兩方面充耳不聞，仍然固執堅持其罪惡

活动。为了把德国拖入反苏战争，并且希望苏联战败，他们破坏了组织和平阵线的工作。

这一点可以在英国白皮书关于亨德遜<sup>①</sup>与希特勒谈判情况的报道中找到无耻的供词。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九日萧当在上院发表的声明也可以作证。萧当满心高兴地预计苏联将由于“红军情况恶劣”而战败。

我们揭穿了我国统治者的反苏心理，因为他们不仅有意漠视他们曾签过字的法苏协定<sup>②</sup>，而且有步骤地故意加以破坏。我们控诉法国政府破坏了法苏协定，把法国引向战争的惨祸。实际上，如果法国政府遵守法苏协定的条款，就可以保证法国的安全，保卫住法国的独立，使法国可以在西方诸强国英、德、意、西之间得到自由发展。这样就可以保证和平。

### 德·克里利斯先生的意见

没有人会怀疑德·克里利斯是信仰共产主义的，而他在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五日“时代报”上也是这样讲的，并且得到新闻检查的许可：

“法国与苏联缔结了协定，我们的大使们一致认为这是唯一可以拯救和平的手段。但是法国报纸对红军却有不少嘲讽的看法，甚至对红军加以侮辱；而德国军方报纸对红军则大事赞扬。将来的历史家必然会为这件事惊异不已。我们曾经徒然地企图使官方人士注意这种矛盾的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他们也许有权拒绝与苏联结成同盟的思想，这种思想也许未可厚非。但是一方面我国的全部外交都采取与英国一致、和苏联缔结同盟的方向，而同时任凭新闻界大事宣传，抵销政府的

① 当时英国驻德大使。——译者

② 指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签订的法苏互助协定。——苏联编者注

一切努力，并为德国的计划服务，这就說不过去了。”

虽然如此令人惊异，但这却是記載在史冊中的事实。法国政府將法苏协定束諸高閣，視之为已經失去时效的死的文字。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法国政府的基本政策是建筑在英、法、德、意四国反苏同盟的基础上的。在大资产阶级、托辣斯巨头看来，为了維持资本主义制度，粉碎进步的国际运动，这一个同盟是必需的。

### 法德宣言

我并没有臆造，只是陈述了悲惨的事实。由于这些事实，里宾特罗甫才能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六日法德宣言签字之后着重声称：“同时联合德、意一方与英、法另一方的有计划的团结和四大国关系的协调无间，能够达致两个轴心之间的合作。”在重新分配任务与划分势力范围时达到了如此深刻的协议，以至龐納不得不在送交法国所有国外外交代表的备忘录中对此給予詳尽的說明。

德国应当执行慕尼黑會議所分配給它的任务：作为进攻苏联的先鋒，向社会主义国家挑战，將德国的装甲师团开向烏克蘭，开向烏克蘭的小麦、煤矿和矿产区。然而，就在这一时刻，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犹豫了。

德国之所以犹豫有两个主要的原因。它考虑到：第一，苏联的实力；第二，苏联内部是一团“神秘”，非常危险。在这兩点上，我們可以引証克莱因司令的言論，凱得尔將軍和勃劳奇將軍的意見，顧隆德先生的情报。

### 德国克莱因中校的意見

毀謗之徒当然已經忘記了德国克莱因中校在拉帕罗条約

(一九二二年)签字以后所發表的預見性的言論。德·克里利斯曾在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六日“时代报”中引用过他的言論。

克莱因中校說：“目前苏联的军队是不存在的，这种情况可能还要繼續相当長的时期。然而，一个国家的力量不能从它的部队的数量、質量、实力和装备方面来衡量。这种力量要从地理、战略、經濟是一个整体，再加上人口多寡和領土广狭两个因素来衡量。一个人口三倍于我的国家，拥有無限未开發的資源，国境从波罗的海直到太平洋，从黑海直到北冰洋，在將来的世界大战中，一定会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任何国家如果与之为敌，必然会遭遇極其鉅大的阻难。反之，如果与之为友就可以無限量地扩展自己活动的范围，可以过問世界上任何引人注意的地区的事务。我們所有的努力都应当用来使苏联在將来的复仇战争中成为我們的盟友。如果它不能做到这一点，便應該在与法国算賬以前事先征服它。这样当然需要一段較長的时间，而且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然而，这是容易了解的：上面的話在簽訂拉帕罗条約时既然屬实，在一九三九年自然更加正确；因为苏联工农业的实力已經大大增漲了。

正如顧隆德先生所宣布的，应当不惜任何代价接受苏联的建議。然而，苏联的建議被拒絕了，这样正符合希特勒的意圖。实际上，当德国將軍們談到英法苏协定时，他們坦率地認為毫無希望。对这一点，顧隆德大使在一九三九年六月一日給龐納的信件中曾經談到他的看法。該信被轉录在黃皮書第一三二號。

### 凱得尔將軍和勃劳奇將軍的意見

希特勒曾經問他的參謀总長凱得尔和陸軍总司令勃劳

奇，在目前情況下，全面沖突是否會轉對德國有利。兩人都回答說，要看蘇聯是否參加戰爭而定。

如果蘇聯不參加戰爭，凱得爾的答复是“有利的”，勃勞奇則說：“可能有利”。兩人都說：“在德國必須對俄國作戰的情況下，德國很少有機會贏得戰爭。”

由此可見，本來完全有可能使希特勒帝國陷於鉗形包圍之中，並迫使它讓步。從一切官方文件中可以明顯地看出這一點。

然而張伯倫和達拉第不願意這樣做，因為他們希望犧牲蘇聯，而與希特勒取得諒解。正是這些政治人物的罪惡態度迫使蘇聯政府簽訂了德蘇互不侵犯條約。

張伯倫和達拉第既然拒絕了蘇聯政府的一切建議、警告和呼喚，拒絕了蘇聯對波蘭的援助，拋棄了各項有保證的條約，蘇聯只好簽訂德蘇互不侵犯條約，除此以外就沒有其他方法可以保衛它的西方邊界。

有人曾強迫我們非難和譴責這一外交行動，強迫我們接受達拉第政府的論點。我們拒絕了這種可恥的勸告。正如對一切國家之間所簽訂的其他條約一樣，我們有權利分析和判斷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也正如對慕尼黑協定和貝克與希特勒簽訂的德波協定我們所做過的一樣，我們有權利對此條約有我們的意見並發表這種意見。

是否有人曾向法國議員們要求指責英德海軍協定呢？沒有，不是嗎？當美國總統宣布美國保持中立時，是否有人曾向法國議員們要求指責他呢？沒有，不是嗎？

我們會以一種絕對客觀的態度來分析和解釋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然而人們要求我們的不是反希特勒和反法西斯的信念，而是反蘇聲明。

我們明確地拒絕參與政府、議會和它們的僱傭新聞界的反蘇咆哮。我們不僅沒有背叛法國，我們並且保衛了它，因為我們擁護唯一可以保衛祖國的榮譽的正確政策，因為我們曾經大聲疾呼：一個名副其實的法國政府，它的職責就在於奉行法蘇友好政策，迅速與蘇聯接近，派出最優秀的外交人員，忠誠嚴肅地與蘇聯政府進行談判。

我們得到的回答是殘酷的鎮壓攻勢。达拉第政府利用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作為進行反共迫害的粗暴借口，並且企圖用這種可憐的辦法將擁有三十萬黨員，一百五十萬選民的法國共產黨從法國政治生活中消滅掉。

這裡再重復一遍：我們完全有權就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發表意見，正如我們過去曾經對英德條約，英意協定，斯坎的納維亞國家的會議、荷比會議，以及英、法、土和巴爾干諸國談判等發表過意見一樣。這種權利是不容侵犯的。

### 喬治·龐納先生的供詞

上面我們提出的論點，在黃皮書第一四九號文件中還可以找到不容置辯的證據。

實際上，對共產黨發動的迫害活動早自七月、即德蘇條約簽字前六星期便已經決定了，可見這不過是借口和虛假的掩飾而已。

龐納在一九四〇年七月一日的報告里承認說：“最後，我向德國駐巴黎大使韋爾采克伯爵談到他可以看見在法國所掀起的支持政府的全國性運動。選舉將被停止，公共集會將遭到取締，外國的宣傳企圖，不問其性質如何，將受到彈壓，共產黨將被制服。”

由此可見，遠自七月一日，亦即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簽字前

大約兩個月，法國政府便已經在官方文件中宣布：它所奉行的政策在於摧毀共和國的自由和鎮壓共產黨人。這一供詞不僅粉碎了起訴書中的借口，而且揭露了巴黎和柏林的統治者的反民主的勾結陰謀：為反對共產主義、反對布爾什維主義而進行鬥爭；而這實質上也就是反民主、反人民的鬥爭。

歐洲在這種情況下漸漸轉入了戰爭。張伯倫、达拉第、希特勒、墨索里尼之流，昨天還是同謀者，而自去年九月以來，就在這種情況下變成了針鋒相對的敵人。他們正像一批巫師的徒弟，親手放出一群魔鬼，結果卻沒有能力再將這群魔鬼加以制伏。

如果要正確地評論一九三九年八、九月間的局勢，便不應當忘記倫敦和巴黎所應負的責任。同時也不應當忘記：倫敦和巴黎曾不惜以一切手段扶持納粹主義，納粹主義正是通過英法兩國對希特勒不斷讓步而逐漸得到發展和鞏固的。

假如沒有國際大金融寡頭的援助，希特勒龐大的戰爭機器是無法建立起來的。正因為採取了對德國反动勢力不斷予以援助，以及對蘇聯始終敵視的政策，這一場目的在於爭奪市場、找尋原料、重新瓜分世界、獨霸歐洲和統治全世界的戰爭才終於爆發了。

### 波蘭的悲慘局勢

去年九月倫敦和巴黎的統治者曾宣布他們準備援助波蘭，保衛它的領土完整和民族獨立。但任何人不論如何孤陋寡聞，都知道沒有蘇聯波蘭是無法保衛的。然而事實俱在：波蘭受到英法支持，拒絕了蘇聯的援助。而且波蘭成了第三帝國的同謀者：它從立陶宛奪取了維爾紐斯，參加了扼煞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奪取了特申區，從而使我們的盟友遭受到瓜

分的慘禍。波蘭的外交部長曾經是希特勒在歐洲的掮客。

希特勒的同謀者——貝克波蘭沒有辦法保衛自己，終於變成了希特勒的犧牲品，陷入他的魔掌。此外，波蘭在反動專政的統治下，為不可解決的內部矛盾所損害。這是一個各族人民的囚牢，因為波蘭貴族對猶太人、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立陶宛人實行加倍的壓迫。

波蘭的軍事力量是十分微弱的。它沒有一座堡壘指向德國。它的“馬奇諾防綫”全部面向蘇聯。空軍和防空部隊可以說完全沒有。希特勒占領捷克斯洛伐克、默麥爾和但澤之後，實現了德國軍隊對波蘭的包圍圈。波蘭的精神狀況是可憐的。全國各處，尤其在上層社會里充滿了腐敗、無能、欺詐、賣國的風氣。

### 德·克里利斯先生的証詞

德·克里利斯先生証實了我們今天和在去年九月間所講的話。

他在“時代報”上寫道：“德波戰爭大大暴露了德國間諜的活動。當時報紙曾經公布了一些令人驚異的消息，但由於這些消息夾雜在許多荒誕誇張、使整個歐洲為之震動的新聞之中，因而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而今天事情已經非常清楚：從和平的時日起，德國就周密地進行了組織上的準備工作，於是不幸的波蘭人民便史無前例地被出賣了。政府各部所作的一切決議以及參謀總部所作的一切決議幾小時之後便被德國人知道了。等到部隊接到轉移或作戰的命令時，德國人却早已知道了這些命令。當一個行政機關在華沙的一所房子里設立起來的時候，德國飛機便會在三小時後來轟炸它。後來在狼狽撤退的時期里，敵人事先就知道了專車出發的時間，專車



还没有到达目的地，目的地就被轟炸了。德国的办法在于使敗坏風俗的努力与上述間諜活动配合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波蘭的崩潰是必不可免的。由于它内部和外部的弱点，波蘭在十五天内便全面崩潰了。面对着这种急速的分裂，这种可怕的变迁，苏联军队开进了原来属于苏联的領土。当时我們曾經宣称：苏联的决定在于保証苏联的安全。于是所有的报纸，所有的政党，从法国社会党直到法西斯右派，便一起对我们大肆誣蔑。然而，道理終于是在我們这一边。

当苏联在波罗的海沿岸諸国采取了其他的保障措 施 时，这便是又一陣反苏反共的詛咒狂潮。

然而，苏联采取这一立場却意味着波罗的海貴族統治和多年来条頓种族的迷夢的結束。

### “法国画报”的証詞

这一点是“法国画报”所承認的。一九三九年十月七日“法国画报”写道：

“这样一来，俄国人在波罗的海取得了非常巩固的障地，可以同时控制芬蘭灣和里加灣，試問它所采取的預防措施如果不是针对德国，那么是针对哪个国家的呢？”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四日，“法国画报”又談到同一問題：

“自此以后，苏联的地位已非常巩固了，因为它可以对付从这一方面發生的任何侵略。但如果不是德国，那么还有哪个国家想夺取波罗的海沿岸諸国呢？俄国采取这些預防措施，肯定地是为了对付唯一的日耳曼主义的扩展。它一方面阻止德国向东北發展，并同时取得波屬烏克蘭与加里西亞，截断德国向东南發展的道路。”

“法国画报”并没有因为作了如上正确的論断而被控訴。我們所講的与此完全相同，但是我們却遭到控訴、逮捕和監禁。

十月二十一日，“法国画报”再度談到这一問題。在談到德国的讓步时“法国画报”写道：

“德国把波罗的海的霸权讓給了苏联，从而在倉卒之間放弃了——并且也許是永远放弃了多年来所不能忘怀的夢想。德国向苏联讓步是历史上的一个特殊事件。”

“法国画报”的結論是：

“俄国取得波罗的海沿岸諸国，可以認為是德国所遭受到的最严重的失敗之一。”

我們的意見是：“法国画报”所做的声明，如果出自共产党人之口，便成了可以抨击的口实；而苏联为了保衛国土，削弱希特勒陣地所作的一切努力，在我国統治者及其仆从們看来，也全都是口誅笔伐的材料。最后还須指出，整个新聞界对苏联所作的只是侮辱謾罵，而对希特勒德国却一向抱着保留的态度。此外，我們还要肯定地揭露政府御用的新聞界把苏联军队进入白俄罗斯和烏克蘭西部說成是进行吞併，这种說法完全是撒謊。

苏联不过是解放了从前曾經被畢苏斯基波蘭夺去的苏联領土。它只是恢复了由寇松勳爵本人所規定的种族分界綫而已。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法国画报”明确地承認了这一点，它說：

“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時間內，俄国已經从波蘭重新取得了著名的寇松綫以东各省几乎全部的領土。寇松綫在一九一九年即已提出。二十年以前提出这一条分界綫就是为了尽量公正合理地在波蘭与苏俄之間划出一条以种族为区分的疆界。”

如果倫敦与巴黎的执政者們，如果張伯倫与达拉第不曾企圖与希特勒妥协，組織反苏十字軍，从而破坏英法苏三国的談判，他們也許可以压制法西斯势力，对欧洲的幸福做出貢獻。可是他們并不願意这样做。因此他們应当担負由于执行反苏政策而促使战争爆發的沉重責任。我們曾經对这种違反法国利益的行为加以譴責。这是我們的責任。我們深以履行了这种职责而自豪。

### 共产党人的正确建議

然而，我們并不滿足于批評，因为我們曾提出建設性的意見，特別是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我們受共产党議員的委托写信給下院議長赫里欧时就这样做了。

要很好地了解写这封信的动机，必須把由于貝克分子的波蘭迅速和灾难性的崩潰所造成的局勢放在考慮的範圍內。

战争开始后一个月，我們認為如果能向我們天然的盟友苏联請求援助，还可能挽回局勢，找出一条有利于法国的出路。

我們曾經指出：我們認為战争是長期而殘酷的，应当使用一切方法，使我国避免战争的灾难性后果；假如能与苏联密切合作，時間并不算晚，还可以得到公正而持久的和平。我們認為：战争將給法国帶來貧困、野蛮、破坏和廢墟。我們这样做难道是犯罪嗎？不是，因为下令用違反宪法的迫害行为和非法手段来对付我們的政客們自己也曾經这样講过。

可見我們写給赫里欧的信正是傳播了真理的声音。的确，一九三九年九月波蘭崩潰以后和平依然是可能的。这正是世界人民真正的利益所在，因为和平意味着跳出由于罪惡因循的外交政策、由于对苏联系統的攻击、由于放弃了唯一正确的

集体安全政策所掘成的深渊。

政府当局和他们雇佣的新闻界企图扼煞我们的声音，他们布置了一层严密的火网来对付他们所谓的“和平攻势”。

### 我們对于政府谎言的决定性答复

他们到处宣传，说自己在进行反法西斯战争。我们的回答是：“你们进行的不是反法西斯战争，因为你们破坏了反法西斯胜利斗争所必需的团结，背弃了我们同盟者——民主国家，助长了法西斯主义的罪恶活动。”我们是正确的。

他们甚至自称在进行保卫民主的战争。我们曾经加以反驳。因为他们破坏了民主宪法，用法令来进行统治，废止了议会的一切有效监督，剥夺了传统的公民权利，下令撤销共产党议员，进行非法逮捕，并且到处传播法西斯思想，采用法西斯手段。我们是正确的。

最后他们说是在进行保卫自由的战争。我们反驳说这完全是欺骗。实际上，甚至在宣战以前，达拉第先生在取缔了“人道报”之后，解散了法国共产党，并下令没收了它的财产。他疯狂地进行破坏，宣布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的职业团体和文化团体为非法；他攻击法国劳动人民多年坚韧努力所建立的一切。他把成千上万的法国公民关到监狱中去，并且创立了集中营，使古代国王密诏任意下狱流放的制度复活了。

达拉第违反宪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下令緝捕并拘禁共产党议员。宪法第十三条规定：“上下两院议员在行使其职权时不得因发表言论或进行投票而受到控告或追究。”达拉第践踏了第三共和国的根本法制——代议制、普选、人民主权。他撕毁了人权宣言，建立起“嫌疑犯”的统治。

政府政策的反民主、反共和、反人民的性质是和法国人的

良心抵觸的，以至于較保守的議員也因而提出了激烈的抗議。

然而這些議員沒有一個遭到控訴和逮捕，也沒有被帶到法庭之前。可見在法國存在着兩種尺度。假如法國還有正義存在的話，我們早就應當恢復自由了，並且應當恢復我們作為公民和議員的一切權利。

### 不是對希特勒而是對法國人民作戰

任何人都可以証實這一點：达拉第政府沒有對希特勒作戰。他們在對法國人民作戰，將代表人民的共產黨議員關到監牢里，以不人道的普通罪犯待遇對待他們。

然而，另一方面，對於謀殺意大利反法西斯志士羅塞利弟兄的褐衫隊員，組織普萊斯堡街暴行、企圖以此嫁禍于工會組織而未遂的法西斯黨徒，從德、意取得軍火、準備屠殺法國人民的流氓，猶太城慘案的負責人，以及反對法國的武裝土匪組織，达拉第政府却給以庇護和支持。

從一九三九年八月以來我們看到了些什麼呢？我們看到的是：凡是受到寬容和享有非法特權的人們，不外是亞貝茲的走狗，出入沙龍的人士，高踞在大冶金工廠和重工業企業櫃台後面的大亨，托辣斯的寡頭，軍火製造商，石油商人，以及受希特勒、墨索里尼津貼的法西斯間諜，總之，是那些叫喊着“只要資本主義能夠得救，讓法國和自由、正義毀滅吧！”的人們。對希特勒分子，對法德委員會的人員毫未採取任何措施。他們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而另一方面，針對反法西斯主義者和蘇聯，却掀起了造謠誣蔑的狂潮。

德·克里利斯先生在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五日“時代報”上指出了這一點。他寫道：

“宣战后反苏反法的运动并没有停止，相反地却更加增长了。叛卖祖国的沙龙人士可以为所欲为。自从开战初期——德·克里利斯先生在他的报纸中是这样表示的——，英法参谋部曾得到确息：在波兰使用过的新办法同样也曾经在法国使用。这一点正是早已预料到的，因为在和平时期便已经有某些发现，而且也知道德国秘密警察、国社党以及德国国防军掌握了很大一笔拨款，用来津贴在国外活动的间谍。”

这些间谍究竟是什么人呢？德·克里利斯回答了这一问题。他宣称，实际上：

“希特勒在上层社会选择他的男女间谍。最足以代表这类德国间谍的两种典型便是布特内和亚贝兹男女两个间谍。他们经常来往于巴黎最高尚的沙龙、大使馆、部长、政治家们之间，与官方人士串通一气。他们既然能够在各处自由出入，受到科学院院士、议员、沙龙人士、部长、报纸主笔之流的欢迎，于是便能巧妙地从上层进行活动。上面我所写的事实，任何法国人不论是军人或者平民都在谈论着，而且都能够加以证实。然而议会对这些事不愿过问，新闻界上层中的一部分也不愿过问，因为亚贝兹先生……因为布特内……因为保尔·费多内……因为奥班先生……因为……因为……”

### 政府给叛国者的优遇

可是政府采取了什么措施，来粉碎布满在政府各部、编辑部、沙龙、深闺、卧室里的间谍网并从根揭发其叛国阴谋呢？根本没有采取过任何措施。

这些人继续出入豪门，盘据要津，而代表人民的议员却受到控告。而人们企图以祖国的名义来掩盖的正是这种非正义、反民主主义、破毁我们的自由、对第五纵队的代理人有利的可

恥制度。

于是权利被侵犯，正义被摒棄，自由被扼杀。祖国在暴政的鉄蹄下被踐踏蹂躪，几代法国男女数世紀以来所累积的文化遺產被摧殘佚散。而当前我国的統治者的一切美妙言辞，勇敢的口号，只不过是用来遮盖丑惡的现实和欺騙法国人民而已。

如果說法国今天正处在一个悲慘的局面下，那么就应当追究責任。我們認為責任不是單方面的。

### 战争的責任

正是資本主义制度应負战争的总責任。至于特殊的責任，則同时屬於德国、英国和法国。希特勒和他的党徒，戈林、戈培尔之流应当負責；同样地，我們認為法国也有責任。正如我們曾經指出的：共产党人所奉行的公正、持久、平等、真正和平的政策敌人負有責任。集体安全的破坏者、宁可遭受战禍而不願与偉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結成同盟的人們負有責任。

### 法苏同盟的必要性

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宣称通过忠实严格而平等的法苏同盟，就可以使公正、持久的和平成为可能时，我們是作为真正的法国爱国者，为了法国的利益而說話的。法苏同盟必然是法国独立的绝对可靠的保証，因为它可以使法国不做希特勒、張伯倫、墨索里尼之流的奴隶和臣仆。

与苏維埃国家締結同盟可以保証法国的安全，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会献出它辽阔的空間，地上与地下無限的富源，巨大的社会主义工業，規模宏偉的集体农業，它的自由的各族人民

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團結一致，來保衛在和平時期富有生產力的勞動。

在考慮上面所列举的全部事實，並且正如我剛才在發言中對國際政治情況所作的分析一樣，客觀地分析了當前形勢之後，我於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寫出了給下院議長赫里歐的信件，這封信現在正被你們用來作為控訴的主要根據。

### 致赫里歐的信件

這封信是一個法國議員在履行其正常合法的議員職責時以法國人的身份寫的，是受“法國工农議員團”中其他法國議員的正式委託而草擬的。

法國工农議員團是得到議會行政處的許可以後，嚴格按照議會組織法的規定組成的，其目的在於使我們能夠正常行使我們的職權與完成我們的任務。實際上，一個議員如果不隸屬於任何議會黨團，他的意見就不可能帶到每星期四為決定下周議程而召開的議會黨團主席聯席會議上去；他既不能參加較大的委員會，也不能提出修正案或請求進行公開投票。

這封信是激於愛國的心情而寫的，其目的只是為了保衛法國人民的真正利益。

我必須提請你們注意一件事實：這封信是寫給下院議長的，因此這件事主要是議會內部的活動，目的在於促使議會執行其最崇高的任務。

我有权強調這一活動的議會性質，尤其因為起訴書所根據的，正如我們已經証實的那樣是一個蓄意偽造的文件；信的原文被嚴重地篡改，以圖改變它的真正性質。而且作為本案根據的原件只是在昨天才交給法庭歸檔，所有正直的人們都



認為這是可恥的。正如在德萊弗斯事件時一樣，整個與我們有關的可恥的訴訟程序，只能以偽造文件為根據，以使用偽造文件的方法來進行。

### 查底格的奇遇和司法制度

這件事使我想起查底格<sup>⊖</sup>在法庭上的遭遇，大可和我們目前的案件作一個對比。

查底格和朋友們在花園里散步，談起最近國王幸運結束了對依爾卡尼王子的戰爭。查底格對國王的神勇大為頌揚，並立即賦詩四句，寫在記事本上。他的朋友們一致表示贊賞，然而查底格並不滿意。他將寫着詩句的紙片撕成兩半，隨手丟在玫瑰花叢里。

一個素性嫉妒的小人看見了這幕情景。查底格回家以後，這家伙花了很大的氣力，找到了紙片的一部分，上面寫着幾句極其惡毒的咒罵國王的詩句：

由於無法無天的罪行  
皇上在金殿發號施令  
在太平無事的日子裡  
這是絕無仅有的敵人

查底格被告發後進了監獄。案子很快便判決了。自然沒有人願意听取查底格的申辯。人們不允許他發言。他的詩說明了一切。查底格被判刑了。

在查底格等死的期間，國王的鸚鵡從陽台上飛出去，落在查底格花園里的玫瑰花叢上。一個桃子從鄰樹上被風吹落在這兒，掉在一張紙片上，二者粘在一起。鸚鵡含起桃子和紙片，帶回來放在國王的膝蓋上。

<sup>⊖</sup> 伏爾泰的小說“查底格”中的主人翁。——譯者

国王看看紙片上的字句，毫無意义，好像是一首詩句的結尾。他把紙片拿給王后看，王后記起了查底格的紙片上所写的东西，派人將它取来，兩下对照，正好完全相合，原来查底格的詩句是这样的：

由于無法無天的罪行，我目覩海內天翻地复。  
皇上在金殿發号施令，終于使天下臣服。  
在太平無事的日子裏，只有情場上才有斗争，  
这是絕無仅有的敌人，值得我們深深戒惧。

这时国王才明白判罪失当，于是查底格恢复了自由。

### 使用伪造文件

从前人們曾經这样講过：“欲加之罪，何患無辞。”

至于我自己，在受到政界友人的委托后，給下院議長写了一封信。報紙上登出了一部分經過選擇、而且經過增減窜改的片段。起訴書中也把这封信修改变动了。政府特地選擇这封信作为借口，把我投入普通罪犯的牢房里。并且判決撤銷我和我的同志們的議員資格。正和查底格一样，沒有人願意听取我們的申辯。然而查底格最后終于出獄了，而且得到了国人更大的尊敬。

我相信：我們將來总有一天也会这样，因为我們的事業是正义的，因为我們的信中表达了法国人民的深厚情感和合法的願望。

### 我們的职责

送出我們的信并且加以散發，不成其为罪行和錯誤，而是我們的权利和义务。这决不是一种罪行，而对一个受保衛法国人民的利益，并且特别是对我們說来，是受保衛一九一

四——一九一八年曾經遭受過戰火的一代的唯一願望所支配的議員說來，這正是一種權利和義務。共產黨議員被監禁後，在人民的壓力下馬上有大批議員和新聞記者重新提出了我們的建議，在報紙上展開宣傳，要求下院召開會議進行公開討論。

上面所說的這些人在提出建議展開宣傳以後，並未受到控告，甚至沒有因此而受到驚擾。我們的建議是如此正確而且符合人民大眾的願望，連达拉第本人也不得不被迫讓步，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召開了上下兩院的特別會議。

另一方面，審判長如果閱讀過關於討論國家預算時的情況的報告，便會知道大批議員對政府破壞議員特權的行為提出了嚴重抗議，並提出請求行使議會監督，認為政府沒有通知業已應征入伍的議員參加會議的態度是可恥的。

用以責難我們的錯誤是不存在的，控告當然是無的放矢。我們只是單純地行使了共和國憲法所保證的議員權利。

### 違反憲法的行為

這種違反共和國憲法的行為引起了下面一系列後果：

全民代議制度遭到破壞，因為一大部分人民被非法剝奪了在議會中的合法代表權。一個議員如果沒有議員特權，在各種壓力和腐化勢力的引誘下，就無法繼續保持行動的自由與獨立。一個議員如果沒有議員特權，立即會陷入行政當局的掌握之中，如果沒有議員特權，操守薄弱的議員就會流於卑躬屈節，唯命是從。整個上下院就會變成尾巴式的議會。

目前的議會既不經過听取申辯，便將共產黨議員逐出議院，那麼，它就不再能繼續按照憲法的規定進行立法了，因為整個國家已經被強力所壟斷，普選制度遭受到玩弄。議會所制定的法律失去了效力，因此，法國公民既然面對着如此橫暴

僭越的專制統治，應該認為不再有服從它的責任了。

因此，對於我們所進行的訴訟是絕對非法的；起訴的理由是不能接受的，因為組成工农議員團和發出我們的信件，是絕對符合共和國憲法和下院組織法以及慣例的。

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締結曾被利用來攻擊我們，而我們已經證明這只是非常可憐的借口。最近幾個月內，又有人利用蘇芬戰爭迫使我們聯名發表宣言，譴責蘇聯的態度。我們沒有同意這樣做，將來也決不同意這樣做。

### 芬蘭的反蘇挑釁

一九三九年十月和十一月，當我被迫秘密活動的時候，我留在巴黎，而警察一時尚無法執行其逮捕的命令。在這兩個月內，我每天還能注視着蘇芬談判的各種情況。近來在訴訟過程中，我又讀過一篇詳細分析蘇芬戰爭的文章。

正是芬蘭以它的敵對行動和一再挑釁，發動了反對蘇聯的戰爭。

全部事實表明，芬蘭政府是為了希特勒德國而採取行動的。而自稱在進行保衛民主自由與反法西斯戰爭的達拉第政府和它的御用新聞界立即站到芬蘭法西斯分子、反民主和親希特勒的方面去了。這真是可恥。

此次戰爭的起因一方面是芬蘭正規軍在邊境集中，直逼到列寧格勒城下，這不僅構成對列寧格勒的威脅，而且是對蘇聯的一種敵對行動；另一方面是芬蘭炮兵轟擊蘇聯部隊，以及芬蘭政府拒絕下令把卡累利阿地峽中的軍隊撤後二十五公里。

蘇聯政府不能容忍芬蘭軍隊如此逼近邊境，使擁有三百五十萬人口的重要城市列寧格勒處在芬軍大炮射程之內；而

苏軍并没有威胁芬蘭的任何重要城市，因为保衛列宁格勒的苏联部队駐紮在距芬蘭重要城市数百公里之外。

苏联政府希望与芬蘭保持友好而互相信任的关系的一切努力，都遭遇到赫尔辛基政府的惡意反对。

### 蕭伯納的声明

著名的英国作家蕭伯納就芬蘭事件回答“每日邮报”的一个編輯时說：“芬蘭是被一个愚蠢的政府統治着。它应当接受苏联交換領土的建議，做一个聪明的鄰居。假如芬蘭考虑过本国的利益，也許不至于拒絕苏联的建議。”

蕭伯納接着說：“世界上决不会有任何一个大国能够容忍这样的边界，从这条边界上，像列宁格勒这样的城市随时有被轟击的危險，特别是当它知道处在国境另一边的虽然是一个小而弱的国家，但由于这个国家的政府不得不遵照其他更大的国家的利益来行动、而后者威胁着它的安全的时候。”

設菲尔德劳工會議和工会联合会的查理·达伐尔先生發表过相同的意見：“一个毫無忌憚的政府利用了不幸的芬蘭人民。这个政府在其他大国的操縱下进行反苏活动。假如沒有这些陰謀，讓芬蘭人民自己来决定，这件事必然会友善地解决的。看不到第三个大国加以干涉的事实，近来所發生的事件就失去了全部意义。”

說得很对，在芬蘭，事情已經非常明显，法国最近所散布的一本小冊子証明了这些事情。英法兩國統治者不对希特勒作战，却始終計劃發動对苏战争。为此，他們打算取得两个作战根据地：（一）取得芬蘭的协助，在北方作战；（二）取得羅馬尼亞和土耳其的协助，在巴尔干和近东作战。

总之，直到今天，对于英法兩国的当政者說来，問題并不

在于对希特勒作战，他们首先责备希特勒没有对苏联发动战争。问题在于打垮社会主义国家，在全世界恢复资本主义野蛮暴虐的统治。

我们决不能容许他们这样做。我们在这里宣布完全拥护我们党的领导英勇揭发达拉第政府这种绝对违反法国利益的态度。在这一问题上，正如在其他问题上一样，法国共产党是保卫人民和国家的利益的。

### 忠实于我们的共产主义理想

不论在哪一方面，我们绝对没有什么可以被指责的地方，然而我们仍然受到了控告，并且被解到你们的军事法庭。

事实上，人们控告我们的，是我们的个人信念，是我们对自己的政治纲领的忠诚，是我们的共产主义思想。

不错，我们正是这样公开声明的：共产主义是人类一向能想像到的最美好的理想。这个理想曾经启发鼓舞过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的思想，曾经到处出现在“百科全书派”的著作中，它存在于社会主义先驱者的梦想中，而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中得到了发展。昨天还是空想，明天将会成为现实。

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我们始终是共产主义者。但我们的思想观念却是和爱好自由、幸福、正义、和平的自由的人们一致的。这些思想观念在这里不能当作争辩或讨论的对象。

只有在议会的公开会议中，而不是在避开人民，重门紧闭的法庭内进行讨论；只有在公共场所，在人民群众的面前才能进行讨论。

只有当人民摆脱戒严令的锁链和束缚、并忠诚地按照普遍、直接、秘密、对所有十八岁以上成年男女一律平等的投票

方式，征求他們的意見時，才有權利實行賞罰制裁。

我們相信人民的裁決，因為我們已經盡到了我們的責任並且行使了議員、共和主義者、法國人的權利。

### 我們的驕傲、我們的光榮

關於我個人的情況如下：我是法國的老戰士，一九一四年在蒙米拉依重傷，中尉。在克勞恩、邦達維、拉邦貝爾、梅尼爾嶺各次戰役中曾擔任連長。我父親是一八七〇年的法國戰士，在巴波姆受傷，我的兒子目前也都已應征入伍。

我的一生，正如所有同志們的情況一樣，充滿了正直和對公共福利的忠誠。

我可以和我的妻子正眼相視，不至於躲閃她的眼睛，因為我始終履行了一個正直的人的職責，勇敢地擔當起家長的沉重負擔。

我的孩子們可以昂首在大街上行進。他們不必因為自己的父親而臉紅，因為他們知道：我從來沒有做過違反榮譽的事情。

對於人民，我全心全意地熱愛他們，和他們息息相關，對他們有着無尚的信心。我知道人民決不會忘恩負義。他們將要說：我和我的同志們，共產黨人和他們偉大的黨，對祖國有過很大的貢獻。我深深相信：法國一向忠於它的慷慨的傳統，熱愛獨立，並以其社會進步和人民的成就而自豪；法國將由於它的天才，由於它在美術、技術、文學、科學各方面的偉大成就的光輝燦爛而置身於所有團結一致的自由、獨立、幸福的國家的最前列，不顧它的道路上的一切艱難險阻，以堅定的步伐，向着新的、更高級的共產主義文明邁進。

## 第十三章

### 反苏政策的阶级根源

今天是复活节！天主教徒庄严地纪念着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复活。其他的人，不论信教与否，都认为这是春天的第一个大节日。钟楼里响起钟乐，教堂里演奏着风琴。

今天是复活节，然而，却是战争的复活节、“莫明其妙的战争”的复活节！到处看不见欢乐，处处是悲愁和忧伤。家庭不能团聚，家人们彼此被凶暴地拆散了。有的在前线和军区，有的在集中营、监狱和苦役营里。

今天，复活节不再是狂欢的节日。虽然这一天仍然是一个使人对美好的将来寄以希望的日子，可是法国的主教公会不去唱“和散那归于大卫的子孙”<sup>①</sup>，却号召组织十字军；这支十字军不是反对法西斯和希特勒，而是对法国最有远见的法国爱国者和共产党人发动“圣”战。

我们在过一九四〇年的复活节，“莫明其妙的战争”的复活节。巴黎第三军事法庭的法官们从早晨起便遵奉达拉第的继任者保罗·雷诺的命令开庭了。他们没有复活节，继续进行他们的秘密审判。

我们不是“有人打你的左脸，连右脸也转过来给他打”的那种人，我们有力地进行还击。我们知道“以眼还眼，以牙还

<sup>①</sup> 见“新约全卷”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九节。——译者



牙”这一公式，可是我們更贊成保羅·瓦揚一古久里的話：“以兩眼還一眼，以全嘴報一牙”。在特別庭上我們以我們自己的方式實踐了這一名言。復活節的早晨，被告繼續對达拉第、雷諾、龐納等原告進行不妥協的控訴。審判長主持着審判，警衛森嚴，防范周密，牆壁隔住了審訊的聲音，法庭用盡了一切方法不使講話的內容透露出去。

這一天終究是復活節。我們雖然被隔離，雖然有警察局的嚴密封鎖，可是在復活節的早晨，從法國的每一個角落，仍然給我們送來了成千封熱烈慰問的電報和信件，後來其中大部分都被沒收歸檔，留作證據。

審判長、法官、檢察官，全露出倦容。只審問了兩個人。他們打算把下午和晚上空出來回家去過節，審問推延到第二天上午進行。我們便利用這一段間歇的時間，給家人寫几句溫柔慈愛的話，同時磨礪我們的論點、答辯和抨擊。

第二天和以後的日子里，繼續進行着秘密審判。

三月二十六日輪到法戎，他借審訊說明了共產黨人理論上和實踐上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立場，把列在起訴書中以及由受命於祖國的破壞者和葬送者的政府的新聞界所公布的誣蔑捏造的罪名與無恥謊言駁得一千二淨。

## 什麼是帝國主義

他的發言主要內容如下：

——共產黨人和工人階級要在分析每次戰爭的性質和階級內容之後，再決定他們對於戰爭的立場。

在這次辯論中經常提到“帝國主義”。“帝國主義”這一名詞的涵義對於我們是非常明確的，我們所指的就是上一世紀末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所進入的發展階段。資本主義發展的這

一阶段的特点曾經被許多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論家們研究过，但只有列宁在他的名著“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底最高阶段”中，才給帝国主义作了完善的科学的分析。

帝国主义的第一个特点是具有無尚权力的壟断組織的發展；銀行的高度集中；由于工業資本与銀行資本互相滲透，而在每一个資本主义国家里形成了金融資本的寡头政治；以及这一寡头政治对国家經濟、政治的各主要部門的統治。这一时代，例如在法国，依照达拉第先生一九三四年十月所用的公式，是“二百家族統治法国的政治和經濟的时代”。

帝国主义的第二个特点是資本主义列强已經完成对世界領土的瓜分。对殖民地、原料供給地、資本和商品的市場、勢力范围、海上主要航路的攫取完成了。

帝国主义的第三个特点是資本主义列强的發展速度極不平衡。由于發展不平衡，各大国間經濟和軍事力量的对比不断改变，結果，就定期提出按照新的力量对比重新瓜分世界的問題。

在我們这一时代里，战争是由于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而引起的。每一个帝国主义集团都不甘心向对方讓步，因此便产生了我們所說的帝国主义战争。

###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战争和 一九三九年的战争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主要是由于英法兩國大資本的利益与德国大資本的利益相冲突。战争在一段时期內保證了英法金融家在歐洲和殖民地的霸权，而把希特勒主义得以成長起来的压迫和奴役强加在德国人民身上。大战并没有損及帝国主义的經濟和社会基础，因

此，也沒有消除戰爭的根源。

而目前的戰爭與上次帝國主義戰爭之間有着顯著的差別，這一差別大體上可以解釋為今天的“莫明其妙的戰爭”的特點：一九一四年世界上的主要矛盾，是各帝國主義集團之間的对立。今天除了這些对立之外，駕乎其上也籠罩着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與上次戰爭中誕生的社會主義世界——蘇聯之間的对立。

如果不考慮這一根本矛盾，便不可能了解倫敦和巴黎的資本家和他們的政府在戰前年代所採取的政策。這種政策在於贊助希特勒侵略者的一切活動，希望如此增長的德國勢力在反蘇戰爭中向東擴張。應當承認：假如這種政策獲得成功，它必然會大大有利於倫敦和巴黎的金融家。在他們的心目中，這種政策可以使在蘇聯實現了的社會主義退縮甚至失敗。

正是這種希望，推動張伯倫、达拉第之流，在英法蘇三國之間由於人民的壓力而已經開始了的談判中，大力進行破壞。激進黨的“雅可冥報”在戰前最後一期中，登載了一篇由米特朗署名的報道，這篇報道指出派往蘇聯的法國軍事全權代表們，除了接受他們的英國同伴所能接受的一切以外，別無其他權力。在開戰前幾天發表的伏羅希洛夫元帥對記者的談話中也有相同的論述。這一點証實了倫敦和巴黎的資產階級政府有意破壞集體安全與與蘇聯合作的政策，而這一政策是可能拯救和平的。

為了拯救和平和爭取寶貴的時間，締結德蘇互不侵犯條約是當時蘇聯唯一還能做的事情。反蘇陰謀的破產加強了各帝國主義集團間的矛盾，從而把它們推向彼此間的戰爭。

## 法国同苏联的关系

我們在写給下院議長的信中，主張采取与苏联合作的政策，从而爭取并保衛和平。这一点被人們提出作为控訴我們的罪名。然而，不論从地理、經濟或軍事各方面來說，沒有苏联便無法保衛和平，这應該是非常簡單明显的道理。德苏互不侵犯条約难道禁止法国人提出靠近苏联的主張嗎？

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即使在目前，即在本案进行的时期中，法国資產階級的政客們也还可能公开提出靠攏德国的軍事盟友意大利的政策。

根据“每日报”的报道，費南·勞朗先生曾經在三月二十二日的議會常会上說：“我們議會內部有很多人都認為保持中立和意大利的友好願望是我們胜利的根本条件。”

我們提出了改善法苏关系的問題，因此受到譴責。然而时至今日，所有的法国報紙却都在討論這一問題。

## 反苏战争的准备工作

近来發生的軍事事件事件賦予這一問題一种熾烈的现实意义。实际上，根据官方承認的数字，一支数达百万的英法联軍正集結在地中海东岸一帶。芬蘭事件最近引起了法国政府的干預，送去大量軍事物資，并且准备了一支远征軍。根据三月十二日达拉第先生的声明，这支远征軍已經整裝待發了。

我們了解：法国的大資產階級希望对苏联进行战争，企圖攫取高加索丰富的油田；他們尤其希望消灭苏維埃政体，因为这一政体的發展正是宣告他們的政体的死亡；他們希望摧毁苏維埃政体，因为在这一政体下，大工業和銀行社会化了，大地主的土地分給了农民，消灭了人剝削人的現象，也就是消灭

了我国金融家存在的前提。他们不对希特勒作战，而希望对苏联发动战争；他们每天不断对苏联进行毁谤和诬蔑。

### 法国人民反对反苏战争

但是，法国人民反对任何企图发动对苏战争的政策。当士兵和工人们从报纸上知道苏联在波罗的海的创议最后只损及德国的利益时，他们不容许人们把这些仅仅为了保卫苏联本身安全的创议认作是进行反苏战争的借口。他们不容许过去曾拒绝援助受国际法西斯侵略的西班牙共和国的人们，在战争正激烈的时候，今天预备用后备物资和人员援助芬兰的法西斯分子，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挑衅。士兵和工人们认为引起援助芬兰委员会的发起人银行家勒依德和霞普以及慷他人之慨的亲芬分子波旁—巴姆亲王、勃鲁姆、石乌诸先生参加的事业，不是他们自己的事业。他们愉快地欢迎苏芬协定的签订，由于这一协定，他们可能被号召去送死的一个战场就不复存在了。

法国劳动人民对反苏政策的阶级根源愈来愈了解。他们不会忘记：一百五十年前，当他们的国家比其他国家首先走上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时，各封建国家曾经联合起来对它进行围攻，正如今天资本主义世界的反动势力起而围攻社会主义的苏联一样。

他们是一七九二年长袍党人的继承者。长袍党人在当时保卫进步的力量，反抗落后势力。当德国的伟大作家歌德随着普鲁士军队，在瓦尔密战役中，以不朽的辞句颂扬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时，他们认为他并不是一个不好的德国人，相反地，他也感到了自己祖国的前途和伟大。

假如反苏冒险的企图一旦实现，法国的人民和士兵们不

會忘記他們祖國歷史上的這些先例，正如他們的父親在一九一九年第一次反蘇侵略時不會忘記這些先例一樣。正因為我們希望使祖國免于戰爭恐怖和可恥的反革命冒險，因此我們受到迫害，并被以受人收買的罪名提出控訴。

### 忠誠的一生

但是並不是所有企圖侮辱別人的人實際上都能夠給人以侮辱的。我們的生活回答了誹謗者們的謊言。我們每一個人表現了對工人階級和人民的事業、對我們的黨和祖國的事業的無私忠誠，足以從根上退一切誹謗。這並不是說我認為我們的黨有任何需要感謝我們的地方。我計算了一下我曾經給黨作過的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和黨所使我得到的知識與道德方面的愉快，我的結論是我沒有給黨什麼，而黨給了我一切。人民群眾在和共產黨戰士們共同相處中，可以親眼看見他們的謙遜，他們生活的嚴正和光明磊落，以及他們一貫的忠誠。人民群眾不會受這個充滿腐化和無恥勾當的政體的代表們對共產黨人肆意進行誣蔑侮辱的影響。從來沒有一個共產黨人被卷入這些腐化無恥的勾當。

在我們的舊伙伴中，有人認為值得用光榮的政治生命換取幻想中的自由，並且不喪失其待遇相當優厚的議員職位，而結果却真正地喪失了自己的人格。在全體被告中我是唯一自始至終亲身体察到這種墮落的。當議會討論撤銷議員資格時，我注意到瘋狂的敵人對待我這些脫黨的舊伙伴和對待我自己的態度是不同的；對他們是輕蔑的眼光，對我則是仇視。我寧願得到敵人的憎恨，而不願受他們的輕蔑。

如果只根據起訴書中所列舉的事實進行審判，我們一定會被判無罪，因為這份起訴書在法律上說是空洞無物的。然

而如果罪名是为反对反苏冒险、反对大资本家而斗争，那么我們就会被判有罪，因为我們还决定要不懈地把这一斗争进行到底。

如果罪名是曾經为了争取和平、争取集体安全和与苏联合作而进行斗争，那么我們也会被判有罪，因为我們曾有效地进行了这一斗争，并因此感到骄傲。如果罪名是为了我們是共产党员，深信要得到真正的和平必須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那么我們也是会被判有罪的，因为这些就是我們的信念。

###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但是，不管本案最后如何宣判，共产主义将来終于要获得胜利，因为共产主义的行动綱領是符合社会发展的历史規律的。

回想一下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吧。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和封建占有形式之間产生了不可解决的矛盾，工商业在旧政体过时而窄狭的范围下奄奄一息，不能发展，于是革命爆發了。当时进步的资产阶级领导了反封建的斗争，并得到社会上所有被压迫阶级的支持，和他們一起得到了解放。而愚民政策，对大哲学家的箝制镇压，以国王密詔而判刑流放的制度，对思想的束縛，狄德罗的被投入监狱，“百科全书”的被銷毀等等都不能阻止革命取得胜利，不能阻止人类达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情形已經大不相同的今天，相同性質的問題又發生了。現代的生产力再一次与所有制發生了矛盾。社会性的集体生产已經在主要經濟部門中愈来愈取得統治地位，大的生产資料的私有制已經不能与之相适应了。因此产生了大量群众餓

死在他們生产了但不能消費的財宝山旁的悲慘景象，同时也因此产生了帝国主义战争。总之，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这种根本矛盾的具体表现。

正如一七八九年的资产阶级一样，今天，无产阶级把社会上一切被剥削的阶层都带进了反资本的斗争，他们将要和无产阶级一同得到解放。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将被彻底打垮，正如过去封建生产关系一样。今天，凶猛的镇压手段和过去旧制度的反动措施一样，也不能阻止历史的进程。共产主义创始人之一曾经说过：共产主义是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的产物。你们企图消灭共产主义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工人运动是坚强不败的。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时的工人运动比今天微弱得多，然而巴黎公社失败后可怕的屠杀只不过使工人运动暂时平息了短短数年而已。至于社会主义思想，你们没有这样广大的监牢和坚厚的墙壁来容纳它。

以上就是法戎代表我们全体的发言。

以后在我们整个艰苦的监禁期间，在法国的监狱和非洲的苦役营里，在最恶劣的考验之下，虽然我们与世界隔绝，虽然我们被宣布犯法并被流放，我们仍然深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胜利一定会到来，就是因为有这一个信念在支持我们。并且我们是正确的！



## 第十四章

### 动人的見証

原告方面帶來了它的証人：六個議會記者，一個哈瓦斯社總寫員，一個下院辦事員以及司法警察科的一個警官。

原告方面對証人寄以無限希望，然而作証的結果却使原告狼狽不堪。証人們不得不一致承認：針對我們提出控訴的事件全都發生在波旁宮內部；法國工农議員團之組成，寫信給赫里歐，將原信副本散發給新聞記者并分送各議員等等，全部是議會內部活動，完全合乎議會活動的慣例。

洛施先生本人雖系受命而來，但在我們斬釘截鐵的追問之下，無從躲閃，只好承認大部分事實是發生在波旁宮內部，并且承認把寫給赫里歐的信件印成小冊子并不能歸咎于被告。何況把原信印成小冊子并加以散發是一種權利和義務，因為原信已經被所有的報紙刪節改竄過了。洛施先生的態度很不自然，他并不適意。

難道不正是這位警官曾經對共產黨鬥士使用過酷刑嗎？

正好有一位受難者將他在司法警察科所受的酷刑設法通知了辯護律師。下面便是受難者所說的詳細情況：

“星期六，我被帶去見這位警官，在場的還有他的秘書和三個警察。他們問我是否知道某甲和他的住址。‘不知道’。警官站起來打我的耳光，警察們也用拳頭打我。接着是第二個問題：‘你知道某乙的住所嗎？’‘不知道’。警察們用拳頭打我

的腹部，我大声叫嚷起来，告訴他們我曾經受过伤——腸壁被打穿了六处，腹部曾开口达二十公分，手臂、膝盖、大腿都受过内伤——，动过几次手术，腹部肌肉現在是靠銅絲联系着的。他們进而脫下我的鞋，用脚跟踐踏我的足尖。他們之中有一个把我掀倒在地，兩腿朝上，用警棍打我的脚心至少有一百五十下。由于我始終拒絕回答，他們便用警棍打我的头和手臂……前后历时共兩小时以上。”

我們認為洛施先生既然曾犯下这样的罪行，对法国公民使用过希特勒匪徒所慣用的酷刑，他在法庭上的証言就不可能完全合乎法律的庄严要求。因此我們請求取消他的發言，我們的律師就这一点向法庭提出下列請求：

“鑑于司法警察科警官洛施先生系受檢察官之傳呼出庭，作为本案原告方面的第一名証人；

“而根据被告方面所搜集之下列資料：

“一、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日，洛施先生在訊問皮埃尔·乔治时<sup>⊖</sup>，曾对之施以酷刑，例如曾毆击其面部，并指使警察在當場和在洛施先生背后用酷刑拷問，例如以警棍痛击其脚心、脚尖，达一百五十余下，企圖获得告發旁人的材料；

“二、同日，洛施先生曾縱使其秘書对年輕的雅克·乔治施以非刑，毆击其下腹，并以脚跟踐踏其足部；

“同时，鑑于上述事实并非偶然發生，而洛施先生又不可能如法庭所期望者毫無憎恨恐惧地进行客觀之作証；

“为此，特請求法庭根据軍法第八十二条，在听取洛施先生作証之前，傳呼皮埃尔·乔治及雅克·乔治出庭作証，就上述事实加以訊問。”

---

⊖ 皮埃尔·乔治后来在反对納粹佔領軍和叛徒的斗争中，成为傳奇式的英雄鬚边上校。

法庭拒絕了這一請求。請求書遭到了與以前提出的所有這類文件同樣的命運，被丟在字紙簍里。

對我們反而有利的原告方面的作證結束以後，接着便詢問被告方面的証人。

被告方面的証人敢于出庭，這一行動本身是值得稱贊的，它表現了人民的勇敢。實際上，每一個証人的每一次作證都可能事後替他們招來控告和刑罰，把他們關到集中營或監獄里去。在一九四〇年三月里，敢于來到軍事法庭前，對共產黨員的忠誠正直表示敬意，就會馬上被列入黑名單，就會被政府法官和警察們認為是應當受到最嚴厲處分的錯誤和罪名。

從一九三九年八月起，只要在書面上對執政者略加批評幾句，只要貼一張標語，分發一份通告，寫信請求法官和部長給被監禁的共產黨員們以政治犯待遇，就會被判处五年徒刑。

從一九三九年八月起，只要有人告密，或者一經被匿名控告，就足以使一個法國人從家里被抓走，和其他成千上萬的法國男男女女一起關在監獄和集中營里。

為了答應被告、共產黨員們的請求，挺身而出，當着滿懷反共仇恨的警察、檢察官、法官們，表示同情這些被攻擊、誣蔑、取消了議員資格的人民代表，這是需要一種經得住任何考驗的勇氣的。

而不少男男女女都具有這種勇氣。他們知道，一旦到法院里來也許就永遠不能再回家了。然而他們並不因此而畏縮不前。他們到法庭上來，來到了我們的面前。他們所講的每一個字都表現出他們人格的偉大，深深打動我們的心坎，使我們無限感激。他們是具有不同身份、不同職業的男女老少。

他們輪流走上法庭作證，有科學家、教授、作家、藝術家、教師、牧師、醫生、律師、婦女社會活動家、家庭婦女、店員、手

工業者、工人和農民。

繼丹尼埃·勒努爾之后(這時勒努爾已經是巴叶集中營里的囚徒)，加香走上法庭。他的出色的証詞令人感動地表現了他對黨的崇敬和愛戴，給我們帶來了無限鼓舞。

為了表示感謝，我們全體肅然起立，向這位走上法庭的七十一歲高齡的老戰士致敬。他的言談舉止無處不流露出正直無私的氣概。

他的一生全部貢獻給了共產黨，忠誠無瑕，始終不懈。我們向他致敬，也就是向他所代表的法國共產黨致以莊嚴的敬禮。

然後，其餘的証人陸續走上法庭作証。他們中間有雷納·毛勃朗：高等師範學校的老校友，哲學教授；讓—李沙·布洛赫：曾獲榮譽團高級勳章，“今晚報”主筆（“今晚報”已於一九三九年八月被政府查封），優秀的作家，寫了不少有價值的文學作品；醫生亨利·瓦龍：法蘭西學院教授，擔任國內許多心理學和教育學學會的主席。

後來，政府大肆報復，解除了他們的高級職務。

作為哲學家、知識分子和關心社會道德的作家，他們毫不猶豫，一致對共產黨員表示深厚的崇敬讚美：不論在市議會、省議會或國民議會里，法國共產黨員始終在他們所屬的機構中，形成一股為公共福利而努力奮鬥的中堅力量。

証人們的發言，對於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親切友善的，替我們向腐化墮落的報紙的誹謗侮辱進行了反擊。

最後，是世界上一位最偉大的物理學家的出色的作証——保羅·郎之萬：法蘭西學院教授，科學院院士，倫敦皇家學會會員。

這位以科學工作為法國、為他個人的天才增添了不少光

菜的法国科学大师，現在出庭作証来了。

他走下科学的高峯，离开實驗室，到这儿来公开表示他对于法国共产党斗士的尊敬。他認為共产党斗士具有最高尚的道德品質。他向法庭說：共产党員对于公共福利和对于公共福利的發展的極端关心，以及他們为了經常改善劳动人民、改善那些用自己的劳动使国家强盛与偉大的人們的物質与精神狀況的坚决意志，使他大为感动。他表示自己完全同意共产党員对于社会正义的看法，并且和他們一样，同样抱着以人力改变世界物質与精神兩方面的狀況，从而使这一理想得到實現的願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也同样相信科学和人类觉悟無限發展与提高的可能性：一方面是自然科学，如果自然科学能够真正用来为全人类服务，从現在起它就可能使人类得到解放，消除貧困、愚昧和痛苦；另一方面是关于人类社会發展的科学，它可以使人类了解社会發展的方向，特别是可以揭露劳动条件和維持生活所必需的生产条件对于社会結構的影响。

郎之万宣称：“科学家們知道：关于世界及其規律的知識不可否認是在不断地向前进展；由于我們賴以認識与实践的方法日趋完善，并且通过各种学說和各种理論上的不断的爭辯，我們所描繪的世界的輪廓和我們称之为真理的最高面貌的輪廓一天天更为明显逼真了。我們深信：真理的面貌只有一个，它在我們的努力下，随着時間的进展而經常得到修正与补充。关于‘正义’这一人类的真理，情形亦复如此。与我們实践和生产的手段發展的每一阶段相适应，必然有一个稳定的人类社会組織形态，一种不断新生的更高級的生活方式，一个活生生的社会真理。那些以畢生精力探求这一真理并努力使之實現的人們，应当被認為是人类中最优秀的服务者。

“我有責任指出：現在站在你們面前的共产党斗士正是这样一种人。只有存心不良、連自己也不能相信的政权才会對他們加以迫害。”

郎之万結束了他的發言。警衛長引他走向法庭的出口。走过我們面前時，他向我們微微點頭，以手示意。我們目送着他出去。刑罰算得了什麼！監獄又算得了什麼！我們感到極大的愉快和幸福，因為我們代表黨，代表這一個過去和現在唯一實行法國路線、曾經並正在保衛法國和人類利益的政黨，接受了我國最偉大的人物之一——郎之万的热誠的同情，他的功績和天才在我國散發着燦爛的光輝。

真理已然得到勝利。

## 第十五章

### 破产了的原告的招供

关于两个檢察官的起訴，只有一件主要的事情值得加以說明。

从他們进行起訴开始，他們兩人都認為有必要先發表一篇郑重的声明，以引起审判長和法官們对这篇声明的重要性的特別注意。

实际上，首席檢察官罗里欧上校和布呂贊少校的發言是这样开始的：

“在提出起訴以前，我們必須声明：在这里，在法庭前，不論現在或將來都不能牽涉到叛逆、間諜、或通敌等罪行。我們必須声明：沒有任何根据可以針對上列各項罪行提出控訴。我們肯定地重复說明这一点。”

有了这篇官方自供，政府和被它收买了的議員以及新聞記者所加給我們的詆毀謠言全部一洗而空。六个月来，加在我們身上、加給我們的家庭、加給我們的党的种种污辱，現在已由这篇官方自供替我們进行了反击。

檢察官的發言事实上是对我們的爱国主义思想的頌揚。他剛說完，我們馬上报之以有力的掌声和叫好。

檢察官的这篇声明，簡直是对用来对付法国共产党的非法而橫暴的行動的譴責。达拉第、雷諾、龐納之流和他們卑怯的同謀者們將要听到这篇声明；它將像一記有力的耳光，打

在他們因羞愧而腓紅的臉頰上。

然而這是秘密審判。辯論始終在極端秘密的情況下進行。不論在作証、起訴、或辯護階段，法庭都不打算公開進行。法庭只是奉命行事，按照那批高踞在內閣的卑鄙的造謠誣蔑之徒的命令行事，而這些家伙是害怕事實真象的。

然而這一切都是徒勞無功的，人民最後仍將知道事實的真象。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至於起訴的其餘部分便不值一提了。檢察官只是含糊其詞地談到起訴書。下了很多肯定的結論，可是却拿不出一點証據。甚至首席檢察官羅里歐也不大相信自己的發言究竟會起多大作用。他談了將近二十分鐘，便讓他的副手布呂贊少校接着發言。

布呂贊少校進行起訴時的神情，活像被迫干一件滿心不願意的苦差事的人一樣，他時時刻刻碰到障礙和困難：找錯了檔案，弄不清文件，有時想起一個主意，等一會又丟開它或者是自行加以駁斥。

究竟什麼是最主要的罪名？是組織工农議員團？還是寫信給赫里歐？還是向新聞界發表這封信？他自己也不能正確地了解。他始終游移不定，時而說是這樣，時而說是那樣，接着說二者全都不是，而等一會又說二者都對。整篇發言單調空洞，沒有信心，沒有一絲力量和感情，只不過是一大堆疲塌不堪、充滿懷疑的字句堆砌在一起。甚至檢察官們在內心深處也不相信自己的行動是合乎正義的。他們的言談舉止無處不流露出虛偽造作的痕跡。在整個大厅中毫無反響，即使無精打采的法官們也不例外。他們奉命而來，只好執行命令。他們感覺到別人命令他們干的並不是好事情，但缺乏勇氣丟開檔案，昂首闊步地離開法庭，以抗議這件以偽造和專橫為根據



的非法案件。大厅里沒有任何其他的声响，似乎只有檢察官一个人在法庭上自言自語，而不是在被告和辯护律師們的面前發言。他所講的不过是照抄在議會講坛和巴黎以及各地報紙上重复了上百次的誣蔑造謠，而這些謠言和誹謗每次都早已被真理的大風刮进了垃圾箱和泥坑。

然后，被告方面起立發言。

我們的辯护律師包括布瓦代、蕭梅、馮丹、杜瓦約、維拉尔、威尔姆、哲瓦爱斯和他們的助手，虽然他們的政治主張和哲学信仰極其分歧，但馬上可以看出，在法庭面前他們好像是一个整体，毫無間隙，忠实地表达了被告們的思想。

他們把發言題目分配好，准备从法律和政治兩方面进行辯护。

辯护的內容包括下列各項：写信給下院議長以及組織法国工农議員团的合法性，頒布解散法国共产党的法令、取消議員特权、撤銷共产党議員資格的橫暴非法，違背宪法，破坏最基本的司法原則，行政機構压迫司法機構，檢察官伪造文件，并使用伪造文件，破坏秘密审判的原則，起訴書以及整个訴訟程序在法律上完全不能成立等等。

辯护律師們毫無困难地从司法方面提出了不容否認的証据：沒有任何应受控告的地方，因此，立即恢复我們的自由是法庭迫切的責任。另一方面，如果从政治方面研究这一案件，法国的利益需要宣布全部訴訟無效，恢复被告們作为法国公民和議員的一切权利，并承認法国共产党的政策是正确的。

政府能够向全国人民作出什么样的工作报告呢：失敗和貽誤人民的破产。

出版、言論、集会、結社等民主自由权利已經全部被廢止，在短短几个月內，不仅一九三六年以来人民所获得的民主权

利全部被剝奪，而且遠自半世紀以來已有的一切權利也都一掃而空，經濟上和社会上的倒退，生產解體，工業癱瘓，農業陷于混亂，後勤部門貪污舞弊，荒唐的令人憤慨的逃跑，停發家屬補助費，濫行征募，對應征入伍者不善于使用，高級軍官任命中的丑聞，大資本家和銀行家的子弟逃避兵役，對糧食供應工作的疏忽，保護勞工法令的橫被破壞，物價高漲，生活費昂貴，失業，貧困，老年人遭受折磨。

上述事實全都有證據和文件可以查考。达拉第所實行的政策，對整個國家引起了這樣大的災害，在全國憤怒的人民壓力之下，議會議員為了挽救門面，不得不罷免了达拉第內閣總理的職務。

對外政策也同樣地糟糕，它直接把國家引向深淵。與此相反，共產黨的國內政策卻是英明而具有遠見的。由於審訊的步調速度，我們在以前十九次審訊過程中所不得不零散提出的全部論點，都被收集在我們的辯護律師的辯護詞中，分門別類、層次分明地一一提出了。

辯護結束後，起訴書已經被駁斥得遍體鱗傷，完全破產。

維拉爾律師擔任辯論的總結工作，由於事先經過周密準備，加上他的老成諳練，以及為愛國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思想所鼓舞，他的發言異常精彩。發言大體如下：

“作為人民的代表，——在人民的心目中，沒有任何特殊措施可以撤銷他們，被撤銷的只會是特殊措施的制訂者——他們代表一百五十萬選民亦即五、六百萬法國人的意志。他們可以不承認司法機關的裁判，法國人民——他們當然的審判官的裁判除外。

“這些當選者的人身受到侵犯，也就是憲法本身受到了侵犯。

“不仅是保护个人自由与言論自由的原則遭受破坏，而是第三共和国的根本法制、代議制度、普选、民权以及我国历史上一百五十年来民主的光荣傳統，在‘人权宣言’的国家里，遭到了踐踏和蹂躪。

“不仅是法国議會而是整个国家遭受到了割裂与凌辱的痛苦，因为在它的整体中，相当大一部分人民被剝夺了宪法上規定的一切發表意見的合法手段，褫夺了他們自由选出的代表。

“而这一切正發生在人們宣称要為保衛这些制度和原則，保衛这些以四次革命的代价所获得的成果的时候。

“眼看国家代表机关已經变成御用奴役的机构，議会的監督权被剝夺，政府極力使議會架空，無事可做，利用其行政大权違犯宪法，并在国内进行战争。即使是不贊成革命而屬於議會右派和極右派的議員如莫里斯·德洛內、雷納·杜莽齐、路易·馬林、多瑪·塞爾慈也在十一月三十日提出了这样的指責。

“眼看个人自由、工会自由、集会、結社以及出版等自由全部被剝夺，与政府意見相左的报纸全被查封，文学著作被銷燬。被告之出現在被告席，給这块骯髒的地方帶來了光荣，而真正的外國代理人和曾經儲藏外国軍火并以此來屠杀法国人民的褐衫队却逍遙法外，高踞在議會和某些部中。这不是对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最大的侮辱嗎？

“刑法不具备报复和贖罪的性質，其目的也不是侮辱犯罪者。而目前的情形正好相反，手銬、囚車、糞桶、蚤蝨、寒冷、禁止使用領帶和背帶，被关在冰冷的牢房里，每天有十二小时半的时间必須在黑暗中度过，禁止閱讀一切报纸文件等等，这一切沒有一件不加到被告們的身上。

“在攻取了巴士底獄的一百五十年以后，在蒙丹涅和伏尔

泰的祖国里，竟在四个月到半年的一段时间内，把上述非人道的待遇加到二十位老战士的身上。他们有不少人在上次大战中成了残废，受过伤，三位重伤，一位失明，动过二十三次手术，一位丢掉了下腿，只能用膝盖行走。

“苏联的存在到现在已经二十二年了。它建成了一个新的社会。不仅结束了贵族特权阶级对人民的压迫，并且结束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周期性危机的祸患和长期存在的失业和愚昧的创痕。

“虽然经历了七年战争以及外国武装干涉、国际的经济阴谋、禁运、抵制、封锁等等，苏联不仅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医治了战争创伤，而且具备了一种文化和一种集体经济，这种文化和经济在很多方面胜过了大的资本主义强国。

“在沙皇统治之下多少带有殖民性质和俄罗斯化的被人为地连结在一起的各个民族，现在已经组成了互相尊敬的民族大家庭，他们成了命运的主人，迅速地建设着社会主义。在他们那里，劳动不复是苦役而变成了光荣的事情。这真可以说实现了人类古老的梦想。

“二十二年来，这一块占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的历史是和努力保卫和平的历史分不开的。在一个利润已经不复存在的国家里，不可能再有战争的利润，也不可能再有依靠战争发财的投机者。正是苏俄在它出生之初，在战争正酣之际向全世界提出了和平建议。这是它的第一个公开行动。从一九二二年热那亚会议起，只有苏联曾单独向各大国建议：普遍实行自动和有监督的裁减军备，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二年，苏联在所有其他国家的反对下，在日内瓦提出了逐步缩减军备的建议。苏联抱着这一目的参加了国际联盟。在国际联盟中，苏联努力使它成为各国人民间集体安全的组织，互相援助，抵御

侵略者，并以身作則，簽訂了許多公約，樹立共同防衛的實際榜樣。國際聯盟對所有這些努力一概加以反對，因而終於逐漸流於破產。蘇聯曾經首先提出召開包括所有國家的會議，但也毫無結果。

“每個人都清楚這一點：所謂‘保衛基督教文明’，事實上是使石油億萬富翁們從那些把他們趕出了巴庫油井的異教徒手中重新取得巴庫的油井。

“自蘇芬戰爭開始後，這種勢力便活躍起來。他們在軍事方面積極支持的不是芬蘭人民，而是馬內漢元帥。正如現任英國陸軍總司令瓦爾特·寇克爵士所說：‘馬內漢認為芬蘭人民是自己最危險的敵人’。‘時代報’也相當坦白地說：芬蘭事件是一個‘大好機會’，不應當輕輕放過。

“正因為凡爾賽的政策旨在反對德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播下了新戰爭的火種，並企圖使犧牲慘重的法國重遭戰火，因此法國共產黨對凡爾賽政策進行了鬥爭。

“正因為進占魯爾區是對德意志共和國最後的致命的打擊，因此法國共產黨公開譴責這種行動，而它的鬥士曾因此被關入監獄，直到後來上議院組織了特別法庭，在群眾的壓力下，才被宣布無罪並獲得釋放。

“後來，仍然是法國共產黨首先起來，不顧一切嘲諷叫囂，領導了抵抗法西斯的運動。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法國武裝政變的陰謀是被法國共產黨所擊破的。正是它建立和鼓舞了工人的行動一致、工會的團結，接着組織了人民陣綫，使法國勞動人民在‘麵包、和平、自由’的口號下積極組織起來，并向天主教的勞動者伸出手來，以期實現整個法蘭西民族的團結，反對寡頭政治。正是它把全國大多數人民引導到一九三六年社會改革的勝利。正是它領導了法國工人階級去擴大它在法國

人民中的作用，并領導了法国人民去扩大自己在整个国家中的作用。

“共产党領導工人，爭取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假期照付工資，訂立集体合同，选举工人自己的代表；領導农民爭取成立小麦收購机构，爭取家庭補助金，重定农产品价格；領導小商人和手工業者爭取免除營業稅，解决商業产权問題，減低貸款利息；帮助中下級公務人員、大小軍官，以及各种各样的劳动人民不仅要生活得不太坏，而且还要得到改善。共产党并使用一切办法，帮助改善貧民和老年人的生活狀況。

“这就是共产党以忘我的精神所一貫努力进行的合乎人道、有利于法国人民的工作。共产党过去和現在始終認為：保衛祖國就是保衛公众自由和社会成果。共产党从来不主張戰爭，它所希望的是通过互助、各国人民的和平團結，尤其是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来保証法国的安全；在國內則主張團結一切民主力量，成为一个坚强的整体，使侵略者望而却步。

“然而，听命于‘二百家族’的国家領導人則害怕人民，愈来愈和人民脫离。

“他們的目的在于加强德国，用它来反对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不惜使各国人民遭受苦难。这正是叛国的行为。这也正是統治势力的屬性：階級高踞在整个国家之上，并与整个国家为敌。

“法国政府采取現行政策的目的究竟何在呢？

“为了保衛波蘭嗎？可是由于波蘭的統治者和它所謂的保护人的緣故，波蘭人民已經被弄得完全沒有防衛的力量了。

“为了保衛各个小国嗎？然而正是达拉第、張伯倫、龐納之流使这些小国遭到灭亡，便利了希特勒的活动。

“为了消灭納粹主义嗎？这倒是适合煽动意圖的好理由，

或者正如十月二十二日德·克里利斯先生在‘时代报’上所写的，是‘粉飾門面的好办法’。

“为了保衛民主嗎？如果企圖在欧洲範圍內保衛民主，那决不会首先在本國內部扼杀一切民主权利。

“十二月十五日斯特劳斯先生在‘論壇报’上写道：‘对民主最大的危害莫过于一般地讚揚民主，而具体地加以擯斥；或者宣布以民主为对外政策的基础，而在國內則任其消亡。换言之，真正的民主必須先从本身开始。’

“保衛和平嗎？人民并不需要奴役性的和平。慕尼黑會議时期，几乎只有共产党人曾这样說过：‘我們既不需要战争，也不希望奴役。因为正如帝国主义战争招来奴役一样，奴役也必然会招来战争。’

“共产党人自一九二〇年起就有效地进行了斗争，反对凡尔赛政策，而自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九年，則是反对不抵抗政策。”

辯护詞的結尾說明了共产党員的政治态度，并对共产党的使命和作用加以讚揚，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是共和国的政党。

在这兩天結束时，我們的辯护律师經過商議，向法庭提出如下請求：

“不論在任何情況下，均請法庭依法宣布下列各点：

“一、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六日頒布之法令是違反宪法的，因此决不能付諸实施；

“二、一八七五年七月十六日的宪法，規定了議員在行使职权时所享有的議員特权以及立法機構不容侵犯的原則。而被告被控之各項活动，均受此規定之保障；

“三、被告所作各項活动，均系按照議會組織法之規定进

行，而議會組織法之規定在於保證議會正常行使其職權；當議員或議員集團按照議會規定方式提出有關立法之提案時，彼等即系開始行使其議會職權，從而按照憲法之規定個人不負任何責任，所提提案，可包括對戰爭行為之監督，以及在可能得到公正而持久的和平時提議停止戰爭；

“因此，請求法庭宣布所控各節不能成立，釋放各被告。”

我們每人還應當有一次最後並且是有決定性的發言的機會，可是時間已經很晚，黑夜降臨了。審訊暫時停止，延至第二天上午繼續進行。

現在就看法庭究竟有沒有足夠的尊嚴、良心和勇氣，能否不顧一切可恥的壓力，拒絕服從日暮途窮的政府的命令，充分獨立、自由、莊嚴地進行判決？

如果法庭判處被告徒刑，這將是違背正義的行為。正義要求釋放被告，給誹謗造謠之徒以應有的懲罰。一切善良忠誠的人們如果得以參加辯論，都必然會由衷地大聲這樣宣布，即使冒犧牲自由和生命之危險亦在所不惜。

如果正義尚存，就必須承認法國共產黨的政策是正確的，然而——凡事總離不了“然而”——現在有秘密審判的黑幕。罪惡勾當是在夜里干的，因為罪犯們以為旁人會毫無所見，毫無所聞，什麼也不會知道。但是，久而久之，一切終於會大白于世。那時，罪犯們就會服罪了。



## 第十六章

### 五年徒刑和褫奪公權

今天是有決定意義的日子。我們坐在被告席上，衛兵守衛在他們的崗位上，他們已經認識我們了：自三月二十一日以來，衛兵就和我們生活在一起，而今天已經是四月三日了。他們很難得地參加了全部審訊過程。開始他們注意地聽着，繼而感到興趣，最後終於被感動了。從三月二十一日起，他們每天都到桑台監獄來，陪伴着我們來去，每個被告始終由同一個衛兵負責。起初在執行其嚴格的任務時，他們顯得冷漠、謹慎、規矩而有禮貌，也許由於大規模的造謠設謗，因而對我們充滿了懷疑和偏見。但他們漸漸覺察到而且深深相信：我們都是值得尊敬的好人。

我們的為人正直誠懇，我們的論據堅強有力，我們的事業完全合乎正義，這一切使他們深深感動。他們中間沒有人不希望我們被判無罪、恢復自由。他們參加了全部審訊過程，深悉原委，然而不敢肯定地說最後不會判罪。他們替自己解釋道：“他們無法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和我們一樣，他們是軍人，是奉命行事的。”這裡，“他們”是指巴黎第三軍事法庭大大小小的軍官們。

那麼，究竟會怎樣判決呢？法官和檢察官們分別從兩個相對的門走進來。衛兵舉槍致敬，被告和律師們起立，審判長還禮，全體就坐，然後是一片肅靜。

审判長側身和左右鄰座低声講了几句話，然后轉向我們說：“現在被告可以發言。”

下面沒有人回答，既無人做手勢要求發言，也沒有聲音。审判長再度說道：

“我剛才講過：被告可以發言，現在被告有权發言。”

沒有人回答，审判席上显得有些尷尬，最后审判長用詢問的口气說：

“有人要求發言嗎？”

皮佑举起手來。

“講吧！”审判長對他說。

皮佑站起來，代表我們全体發言，發言的內容，是我們在法院的一間大厅里一起用餐時，大家曾經深思熟慮研究討論過的。我們每人都深深了解自己的責任，對於這篇莊嚴的共同聲明的精神和文字全部表示同意，我們委托皮佑擔任這一項重要的任務，在法庭上最后一次闡明法國共产党的國家政策。

他開始發言了。我們的嘴唇跟着活動，我們的心跳動着。

“审判長和法官先生們：

“我們的辯護律師已經對起訴書和檢察官先生們的控告答复過了。

“從法律方面來說，我們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再講的，請审判長允許我們向法國和比利時的辯護律師們致謝。

“但是檢察官先生們曾經提到我們的政治立場。我們認為有必要最后將這一點簡略而明確地再談一次。

“因此我以自己的名義并代表我的同志們：巴列尔、巴托里尼、貝諾瓦、白利奧茲、邦特、勃蘭、高納凡、高斯德、高索諾、

克里士多福、克罗阿查、达多、德繆索阿、讓·杜克洛、法戎、賈武、格萊查、拉勒普、勒維、罗哲萊、馬戴尔、米道尔、莫盖、繆斯摩、柏蒂、普拉晒、普劳特、罗歇、杜沙，發表下面的声明。

“在这件即將結束的案件中，作为被告的既不是共产党議員，也不是共产主义。

“在为資產階級服务的法律武庫中，你們找不出任何条文足以作为监禁我們、控告我們的理由。

“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和政体的發展过程中常常有这样的时期：統治階級为了維持政权，不得不破坏自己規定的法律。在我国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然而我們也可以看到：人民在坚强的斗争过程中，終于——推翻了这种專政。

“給我們所加的罪名是什么呢？根据議會組織法組織了一个議會党团，并且曾以議員的名义写信給議長，請求召开議會，討論和平問題。

“这就是逮捕和控告我們所根据的理由。

“根据一八七五年宪法第十三条規定，写信給議長和組織議會党团同样是受到議會特权以及議會不可侵犯的原則的絕對保护的。作为議員，我們有这种絕對的权利，甚至有义务来写这样一封信。

“事情还不止此：苏德互不侵犯条約这一外交文件也被武断地提出作为大規模反共迫害活动的根本理由。有人要我們对签字的一方苏联加以譴責，我們拒絕了这种奇怪的从無先例的命令，于是便受到迫害。

“我們不接受政府方面关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約的主張。六个月来这一点始終被用来作为控告我們的理由。我們的行為被認為是自絕于国家。一部分法国人民曾經受騙，以为这就是我們被控的原因。

“我們認為這種說法事實上是無恥的造謠欺騙。我們認為在一四九號黃皮書第一七〇頁政府已經自行招認了這一點。這個文件的標題是：‘關於龐納外長與德國駐法大使韋爾采克伯爵會談的照會’。文件中提到：

‘最後，我向大使談到他可以看到在法國所掀起的支持政府的全國性運動。選舉將被停止，公共集會將遭到取締，一切外國的宣傳，不問其性質如何，均將被停止，共產黨將被制服。’

“這份文件的日期是一九三九年七月一日。當時還不會發生共產黨人是否贊成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問題。七月一日，簽定該條約前兩個月，當法蘇兩國還正在進行談判時，法國政府就在一個官方照會中宣布了壓制共產黨的政策。那麼，事情非常明顯，大可不必使用這些遁詞詭計和卑鄙伎倆，不必強以借口為理由，不必譴責一九三九年八月底和九月里我們所抱的態度！我們的迫害者已經自己招認：以後所採取的罪惡勾當從七月一日起便已經決定了。

“當然，後來他們又企圖捏造其他的借口，他們展開了極端卑鄙的造謠誣蔑運動，剝奪了我們一切辯護的手段，用秘密審判的方式來審判我們。這一點不正是我國當政者極端害怕把本案的事實真相加以公開的證明嗎？

“可是，在審問過程中我們已經說出了事實的真相，並且現在我們又在講：辯護律師們已經駁斥了起訴書和檢察官的控告。我們的任務是使本案成為我們的控告人——金融寡頭政治的代表們的案件。

“我們之所以被逮捕和控告，是因為我們是共產黨員，因為我們不顧一切挑唆、威脅和迫害，始終保持共產黨員的稱號。

“我們之所以被控，是因為過去和現在我們始終起來竭力反對為害國家的當權者們所奉行的罪惡政策，因為我們號召人民起來要求結束這種政策，因為我們給法國人民指出了使我國自由和幸福的手段。

“不論是控告、刑罰、或是集中營，都不能阻止共產黨員繼續從事這一合乎人道的光輝事業。

“法國的當政者和資本家（我國的當政者是代表資本家行事的）企圖使人相信：戰爭的責任是單方面的，與他們毫無關係，而且企圖使人相信法國人民是為了正義，為了各國人民的自由、獨立而進行戰爭。

“在法國，是我們首先揭發了國際法西斯主義使世界和平所遭受到的危險，是我們在法國輿論面前熱心地提出了對希特勒的訟案。我們過去和現在始終是各種形式的法西斯主義的不可調和的敵人。

“雖然我們從來不主張對這種罪惡制度進行作戰，雖然我們始終主張德國人民的解放是德國人民自己的事業，但是我們捍衛了組織起來抵禦法西斯野心的政策。

“多少年來我們就會對法國政府說：或者是把歐洲所有善良的人們組織起來，拯救和平，保衛法國的獨立；或者是破壞這一努力，使戰爭爆發，而由你們擔負戰爭的責任，因為你們不願意阻止戰爭，而把保衛資本家的特權看得比關心各國人民的獨立與和平更為重要，戰火就會蔓延到全世界。

“而今天正是這一戰爭蹂躪着不幸的歐洲。應當負責的是資本主義制度。饒勒斯說過：‘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帶有戰爭，正如烏雲帶有暴風雨。’戰爭的責任到底由誰負呢？每個國家都企圖把責任單獨推在敵國政府的頭上。我們拒絕隨聲附和，支持這一大騙局。

“但国内还有主張这种說法的人！首先是前任政府及其首腦达拉第先生，他为了極少数大企業主的利益，曾运用整个国家机器来反对人民。

“而我們却能够自豪地以經常的行动保衛和平，反对那些不断为目前战争积累成因的当政者的陰謀詭計。

“下面是从一九三五年以来的一些具体事实：由賴伐尔先生签字，并經法国社会党首腦投票贊成的羅馬协定<sup>⊖</sup>使墨索里尼得以为所欲为，扼杀了不幸的埃塞俄比亞。只有共产党人曾經起来反对这一充滿战争火种的协定。法国社会党的首腦勃魯姆采取了罪惡的所謂‘不干涉政策’，从而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同党、法国的敌人，西班牙叛軍首領佛朗哥，摧毀了西班牙共和国。也只有共产党人曾經起来保衛这一民主共和的友邦。

“蕭当縱使希特勒占領了国际联盟的成員国奥地利。

“达拉第則把国际联盟的另一成員国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它的原料、軍隊、要塞、軍事物資和兵工厂一起送給了希特勒。达拉第和他在慕尼黑的同伙們却肯定地說：‘和平被拯救了’。只有共产党人曾經說过：慕尼黑的叛卖行为帶來了战争！

“慕尼黑會議期間以及会后，英、法兩國政府的陰謀打算，現在大家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它們曾企圖与希特勒德国取得協議，推使它进攻苏联。由于繼續采取这一政策，它們曾鼓励不久以前还是希特勒的盟友、并伙同德国瓜分捷克斯洛伐克的波蘭政府，拒絕讓苏联軍隊通过国境。

“拒絕苏联的建議，其目的在于使莫斯科談判归于失敗！

---

⊖ 指一九三五年一月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亞前夕賴伐尔和墨索里尼在羅馬签订的协定。通过这一协定，法国承認了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亞的占領。——苏联編者注

正如黃皮書中法國駐德大使顧隆德先生給外交部的緊急報告中所明確指出的：這樣一來，唯一能夠挽救和平的英法蘇三國公約便不能實現了。

“然而戰爭雖已爆發，資本家們仍然企圖組織反蘇十字軍，進攻蘇聯，攫取高加索的石油。這一目的他們還不敢承認，但卻欲蓋彌彰，日趨明顯。因此，他們從最北部的地區以至近東，加強了造謠、挑撥活動，企圖借此準備思想和把勞動人民引向反蘇冒險。

“但是這樣一種反法國的政策負責者，將遭遇到非常不愉快的意外後果。因為法國勞動人民從沒有忘記法國人是愛好自由的，他們不會成為這樣一種冒險的同謀犯。正如一九一九年一樣，他們會起來反對這些違背法國在全世界所負的光輝使命的罪惡政府。

“我們被傳上法庭，是因為只有我們敢於號召人民驅逐达拉第政府，這個政府對戰爭負有沉重無比的責任，它把反動和希特勒的統治手段介紹到了我國。

“這批在國內扼殺自由的凶手，居然敢說他們是在為自由而戰！达拉第政府在有關共產黨議員的案件中犯了瀆職罪；共產黨議員代表一百五十萬選民，今天，這一批選民被剝奪了自由選舉代表的權利。达拉第政府查封了法國最大的政治性報紙：‘人道報’；解散了法國最大的政黨：法國共產黨，沒收了法國共產黨的財產。對於工人、農民、手工業者的組織，職業團體，文化團體以及退伍軍人的組織採取了相同的措施。在它瘋狂地進行破壞的時候，對法國勞動人民在長久的歲月中辛勤努力所建設起來的一切無不加以攻擊，包括工會、合作社、非宗教性團體、體育協會、保衛婦嬰的機構、夏令營以及其他很多組織。根據达拉第和沙洛兩先生在上議院的招供，他

們監禁了成千上萬的法國公民，在法國成立了集中營，從而使古代以國王密詔判刑流放的时代又复活了。

“在工厂里，社会道德遭受破坏，在行政机关中有关公务人员的制度规章被取消。在国民议会、省市议会、劳资协商委员会等机构中，当选的工人代表被剥夺了职权，受到警察局的緝捕判刑，被关进了集中营或监狱。

“政府利用工人和农民应征入伍的机会，打入工农组织的领导部门，唆使平时和资本家勾结拉拢的分子篡夺了这些组织的领导权，分裂工人，让他们遭受资本家的过分剥削，赞助社会的镇压行动。政府现在用来领导这些组织的人正是以前被工人和农民们驱逐出去的分

子。

“查封报纸杂志，没收并销毁书籍和文学名著：这样便完成了达拉第、雷诺、庞纳之流的政府令人作呕的业绩。

“对于士兵，薪饷本来就很少，但还被可耻地克扣。

“工人职员和行政人员的工资日益减少，而工作则过度疲劳，因此不断发生事故。除了压在他們身上的其他各种捐税以外，还要扣除百分之十八的工资（警察除外）。根据国家预算讨论时所透露的数字：从职工人员所抽得的捐税达一百一十五亿法郎，而从资本家利润中所抽的捐税则不过三亿法郎。

“工资劳动者常常要加班加点，加班的工资少得可憐；可是生活费用却一天天增漲，失業的創痛一直持續着。

“农民的产品被低价征用，在农业生产方面存在着异常巨大的困难。

“应征入伍者的家屬遭受到家屬补助金方面令人憤慨的措施：毫無理由地拒絕發放补助金，总数十分不足，付款日期極不固定。

“边境区域的难民，尤其是洛林和阿尔萨斯兩省的难民，



則痛心疾首于撤退时的混乱情况：物資供应与衛生組織陷于可悲的地步，津貼費極不够用。

“手工業者、小商人、殘廢、老年人以及所有的穷人都遭遇到貧苦和破产！人民受貧困！大人物享受利潤！”

“我們認為保衛法国必須首先組織一个直接由全国人民产生的人民政府。

“在人民的压力下达拉第政府垮台了，代之而起的是雷諾政府。

“虽然雷諾政府得到了議會的多數票，我們并不認為它能够代表国家主权，因为它是由被剝夺了共产党代表的議會产生的。一个名副其实的法国政府应当使我們回到議會中去。现在的政府不能代表国家。除非依靠反动專政，它不可能維持下去。

“資本家們以为能够長期欺騙人民，因为他們得到了社会党及其党魁勃魯姆、保罗·富尔之流的支持，得到了总工会叛徒首腦們的支持，这些人已經成了鎮压工人的先鋒。

“勃魯姆、保罗·富尔和石烏的党徒們，过去曾經阻撓人民陣綫綱領的实施，現在則正以全力組織一个所謂的神聖同盟，进行破坏工人組織的活动。

“这批人应当对强加在法国劳动人民身上的悲慘狀況負主要責任。他們露出了他們是人民的敌人的真正面貌，按照法西斯的方式，揮舞着反共反苏的旗帜。但这只不过是一九一四年第二国际及其法国支部所曾經遭遇过的澈底破产和瓦解的重演，并且失敗得更加慘重而已。

“不錯，我們是国际主义者。我們是唯一的国际主义者。一切劳动人民，不論其种族膚色，都是我們的兄弟。英国的矿工和海員，埃森的冶金工人，汉堡的碼頭工人，底特律和芝加

哥的劳动者，布拉格的工人，波蘭的农民，芬蘭的樵夫，阿拉伯的农夫以及中国的苦力，他們的命运与我們紧密連系在一起，正如我們的命运和終于已經从沙皇統治和资本家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了的苏联工人和集体农民的命运連系在一起一样。

“我們始終認為而且一再重复指出：法国劳动人民并不需要从其他国家寻求解除痛苦的办法。法国劳动人民的解放將是他們自己的事業，这种解放將遵循我国人民的光荣傳統进行。当然，在我們以及全世界千千万万的男女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强有力的建造者斯大林，是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天才繼承者，而历史上有一些偉大的法国人，例如，特別是巴貝夫、傅立叶、布朗基，是这一重要事業的先驅者。

“馬克思研究了正在全盛时期的资本主义制度后曾給我們指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將要起而代之，这就是共产主义。一八四八年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写道：‘一个怪影在欧洲游蕩着——共产主义的怪影’。

“由于列宁和斯大林的努力，共产主义不复是一个怪影，而已經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变成了现实。明天，它將在全世界範圍內得到实现。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七年，列宁和他所締造的光荣的布尔什維克党曾給我們指出如何制止帝国主义战争，从而使工人、农民、知識分子以及殖民地的人民得到解放。斯大林則告訴我們怎样在二十年內將一个被帝国主义战争和资产阶级無政府状态摧殘了的國家徹底加以改变，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迈进。

“与一切国家的帝国主义者相同，法帝国主义者是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死敌。这一点很容易理解。他們对苏联的仇恨是一个生存已經受到威胁的阶级所感到的仇恨。苏联是法国人民活生生的榜样，它显示出消除了寄生者阶级以

后，人民可以發揮多麼大的力量。

“苏联已經打破了英法資產階級的計劃，目前英法驅使以希特勒德國為首的反蘇十字軍進攻社會主義國家的企圖已經失敗了。

“苏联解放了受波蘭壓迫的（這裡我們指地主統治下的波蘭，必須把它與人民的波蘭分開）白俄羅斯與烏克蘭的一千三百万人口，從而截至目前為止，使世界遭受屠殺的範圍縮小了。苏联和波羅的海沿岸各國建立了友好的關係，幾個星期以前“時代報”記者曾經承認這種關係完全是善意的。歐洲的東北部，特別是芬蘭，如果不是一小撮昨天還和德國將軍們結盟、今天則受雇於倫敦和華盛頓的銀行的冒險分子，使歐洲這一部分地區的關係陷於可悲的錯綜複雜的狀態，應當也能繼續過安靜而和平的生活。

“對於正在準備中的罪惡冒險活動，我們是不會受人矇騙的。我們看得非常清楚：一支十字軍就在我們的眼前組織起來了。我們了解：既然苏联在芬蘭的創議行動毫不影響法國的民族利益，法帝國主義者的企圖顯然不過是要從東綫的‘莫明其妙的戰爭’中抽出身來，亦即從不是對希特勒作戰的戰爭中抽出身來，轉而對苏联進行大規模的侵略活動。這一陰謀在芬蘭失敗了，於是轉而企圖在巴爾干與近東繼續進行。

“正是為了便於冒險活動的順利開展，因此企圖在對我們進行了無恥誣蔑之後再判我們的罪。當政的先生們小心一點吧！假如你們企圖實現侵略苏联的迷夢，企圖再採取過去曾使法蘭西民族遭受災害的封鎖政策，那麼，你們的制度本身就會在陰謀活動中整個崩潰！

“資本巨頭、當政者以及像布里農之類受亞貝茲豢養的第五縱隊的代理人，對我們展開了極端惡毒的誣蔑毀謗。而他們

的走狗社会党徒甚至比他們更为卑劣，他們宣称：‘我們將进行反对法国的活动！我們將接受外国的津貼！’

“我們早已答复过这些誹謗之徒了。現在我們可以这样講：請問这些榨干了我們国家的血液，依靠国家的貧困而自肥，对法国人民而且只是对法国人民作战的資本家們，你們难道敢大言不慚，說你們这一小撮坏蛋能够代表法国嗎？

“达拉第先生在議會內說：我們將成为德国的代理人。敢于發表这种謬論的正是参加过慕尼黑會議的人，他把捷克斯洛伐克的飞机軍火拱手送給了希特勒德国，以便它在現在和將來用以屠杀我們的妻子兒女和弟兄；他把逃亡在法国的德国共产党員拘禁起来，而德国共产党員正是希特勒的死对头。

“我們本来沒有必要再提及这一类卑鄙的行徑，而提出来只是为了提醒大家：一九一四年，極力主張和平的饒勒斯正是在遭受同样的誣蔑誹謗之后被暗杀的。

“只有厚顏無恥到極点的国际掮客和以他們的卖国行为获得金錢的雇傭分子才能以貪污腐化的罪名控告共产党員。他們很清楚：忠誠忘我是共产党員特有的品質，这种無可否認的正直使得这些掮客和叛徒們的貪污腐化显得更为突出。从来沒有任何一个共产党員曾經參預过从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九年間历次發生的各种丑聞穢史。

“在我們的队伍里，沒有斯达維斯基的党徒、季雪上校之流、巴勒銀行的職員、‘邮政航空公司’事件的策划者以及亞貝茲的部下之流的人物。他們全都隶属于各种‘左翼’和‘右翼’的政党，这些政党目前正联合一致，共同从事其‘莫明其妙的战争’，即不对希特勒，而对人民开火的战争。

“我們热爱法国，热爱組成法国的主体：人民。

“我們因法国的科学家、思想家、作家和艺术家而感到驕傲，他們使法国获得了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敬愛。

“在法国的历史發展过程及其偉大的革命傳統中，法国人民會奋起反抗暴君。

“馬賽曲中不正是有一段歌辞說明这一点嗎？而資本家是不会教人民的子女歌唱这段馬賽曲的。

“我們不願做希特勒的奴隶，不願做張伯倫的臣民，也不願做墨索里尼的仆役！

“不錯，我們热爱法国人民，我們要替人民清除引导他們走向死亡和毀灭以及使他們忍受專制耻辱的人們。

“至于背叛人民群众的一小撮懦夫如季通、加普隆之流則深为人民群众所不齿，这些叛徒只能代表他們自己，到处献丑。

“但我們向为共产主义英勇奋斗的無数劳动者們致敬。

“我們共产党員号召人民为了面包、自由与和平而进行斗争。对，我們是共产党員！我們以身为巴黎公社社員的繼承者而感到驕傲。他們牺牲自己，拯救了共和国，为劳动人民的解放进行了斗争。馬克思在談到他們時曾說道：‘他們的英勇精神可以冲破云霄。’

“共产主义就意味着在和平环境中人性尊严的充分發揚，科学与文学的高度成就，以及人类文明的燦爛繁荣。

“我們是法国人，因此竭力希望建立一个自由、强大而幸福的法国。

“我們是国际主义者，所以無产阶级的每一个胜利，無論發生在那一个国家，我們都認為是我們自己的胜利。

“正是如此！我們認為在苏联建設社会主义是从压迫与战争中解放各国人民的世界革命的第一步。

“法国共产党员們与多列士、杜克洛、弗拉商，以及我們所有被告的朋友們一道，我們共同为法国的解放而进行工作。对于祖国，对于曾經經歷过一七九三、一八三〇、一八四八、巴黎公社、一九三四年二月九日和十二日以及一九三六年五月的法国，我們是滿怀着信心的。

“我們对法国人民滿怀信心。我們深信：法国人民很快就会把貧困与战争的負責者——资本主义制度送进墳墓。自由的法蘭西万岁！幸福强大的法蘭西万岁！和平万岁！向共产主义迈进！”

皮佑的發言結束了。审判長再一次問道：

“被告中还有人要求發言嗎？”

一片靜默。法庭宣布退席，以便研究我們的辯护律师所提出的要求法官宣布控訴不能成立、被告無罪的請求。

复庭时，法庭批駁了辯护律师的請求，并立即宣布暂时中止审讯，下午繼續进行。

下午兩点鐘复庭时，审判長宣布辯論終結。

然后他向法庭的成員提出兩個問題：

一、被告是否犯有下列罪行：从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七日至十月五日，在巴黎亦即在法国的領土上，参与組成工农議員团并行使其职权，从而进行旨在直接或間接宣傳第三共产国际或第三国际所屬机构發布之口号的活动？

二、被告是否犯有下列罪行：参与公布、傳送及散發一封致下院議長的信件，其目的系在苏联的指示下侈談和平，并企圖宣傳第三国际或其所屬机构之口号？

审判長命令將我們帶出法庭，此后我們就不再到审判厅来了。

我們在一間長方形的房間里等候宣判，等了四个小时。

我們討論研究并預料宣判的結果。大概是要定罪的。有人認為每人判刑的輕重不會相同：拉麥特和我，以及被迫轉入地下活動的黨的領袖們也許判刑最重，其餘的人可能被判一年至四年或五年的監禁。

柏蒂甚至列出了一張名單，注明每人判處多少月的監禁以及多少法郎、多少生的的罰金。

我們焦急地等待了四小時之久。四個小時！法庭為什麼需要用這樣長的時間討論研究呢？難道還有萬一的希望嗎？難道今天晚上我們還能夠回到家里，和自己最親密最忠誠的親友重行聚首嗎？經過五個月的痛苦分離之後，多麼希望再享受一下家庭的溫暖，然後，又為了保衛工人階級的利益，保衛人民和法國的利益，為了實現我們的理想，明天，重又投入到戰鬥的生活中去啊！

我們每人都有靜默下來的時候。我們幻想過自由，然而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很快就回到現實中來。在法國，民主和自由已經不存在了，有的只是非法與專制。應該朝最壞的一面去著想。

我想到了我的家人，他們將要遭到最殘酷無情的打擊，而這正是因為我永遠是一個誠實的人。

只要我說一句話，表示反對我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和愛國者的最親切的信念，我馬上可以受盡恭維，而家人們將不必為目前著急，也不必為將來擔心。但是，他們將不再愛我，只會對我表示輕蔑、鄙視和憤怒。我馬上會失掉選民和朋友們的信任，失掉一切正直的人們——包括和我政治見解相反的人在內——的尊敬。我決不能這樣做。

突然間傳來了消息：法官們入庭了，現在正宣讀判決書。不久就會告訴我們，就可以知道判決的結果。時間一秒一秒

地过得很慢，非常慢，就像是靜寂的牢房里的單調的时光一样。現在，警衛長來了，站在候審室的門旁。

我們每三人一組，被帶進一間狹窄的房間，書記官和兩個助手在那兒，旁邊站着武裝的衛兵。書記官向我們宣讀判決的結果。輪到我了，我和皮佑、高納凡一道。我不動声色地听着。

关于我，法庭對審判長的兩個問題作了肯定的答复。我被判處五年徒刑，五千法郎的罰金，五年內被褫奪一切公權。

我非常堅定，神色不變，面部沒有露出一絲表情，像一根鐵柱似地直立着。我只說了一句話：“我要上訴。”然後披上大衣，將防毒面具斜掛在肩上。

兩個衛兵對我打了一個手勢。我走下一道狹窄的樓梯，進入地下走廊，頂上是法院大廈峨特式的穹窿，從蓋着鐵柵的通風口里時而有一絲微弱的光亮透進來。每隔二十公尺便有黑壓壓的一群穿着黑色披風的衛兵把守着，拿着槍，槍口上着刺刀。

四周靜靜的，只聽見皮鞋窸窣的聲音，顯得異常慘淡淒涼。我們就像是帶到刑場上去似的。

最後我們到了法院的一個院子里，被帶上一輛綠蓬的巴黎市警備部隊的大卡車。

多列士、杜克洛、蒙慕梭、拉麥特、狄戎、貝里、杜迪佑、李加爾、卡特拉，也都被判五年徒刑，五千法郎罰金，並褫奪一切公權；至於其他同志，不同的只是把罰款五千法郎改為四千法郎而已！

勃蘭、達多、讓·杜克洛、讓·雷諾等同志由於曾受重傷，被宣布暫緩執行。受到同樣處理的還有三個怯懦無恥到極點的叛徒：巴沙爾、瓦哲宜、貝沙。



加起来一共被判处徒刑二百一十二年，包括附加罰款在內，总共应付二百万法郎以上的罰款。

在回到桑台監獄的途中，我坐在司機旁邊。車門微開，可以看見大街上的景象。武裝摩托車隊的数量比以前增加了一倍，報信員用尖銳的警笛聲在前面開路。我們走過時，交通便暫時斷絕了。

在轉彎時，車在監獄門口稍微停了一下，我剛好來得及在一群等級不同的警官中，看到我的女兒馬格麗特。我向她做了一個手勢。她看見我，對我笑了。我的心跳得更快了，我將帶着這副微笑，一個孩子為她父親而驕傲的微笑走進牢房。

我走進桑台監獄，昂首挺身，傲然地在肩頭上承擔着五年監禁，五千法郎罰款以及褫奪公權五年的重擔。我毫不退縮。我所要求的不過是我的權利，我的全部權利，除此以外別無他求。我履行了自己的職責。我的家人們也將以無比的英勇，迎接在走向勝利和正義的漫長道路上等待着他們的艱苦考驗。

我將不辜負他們和我的朋友們，不辜負黨和祖國。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間我會驕傲地穿上法國軍官的制服；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九年，我會驕傲地穿上法國議員的服裝；今後我也將以驕傲的心情穿上我的囚衣。

## 第三部

### 第十七章

#### 翁热的獄中生活

五月十八日星期六，桑台監獄的一個看守匆匆到我們所住的每一個牢房來，給每人帶來一個簡短的消息和一道緊急命令：“兩個鐘頭以後出發，趕快準備！”

我們想問個究竟，看守含糊地擺了一下手。上面最近突然決定將我們遷往另一個地方去，必須馬上執行，不得延誤。最高軍事法庭已經批駁了我們的上訴，因而判決就成了肯定而不能改變的了。

晚上十點鐘，在監獄辦事員那兒依照慣例办好手續，領了存款，除一百法郎外其餘的已經全部充公。我們二十七名共產黨議員，手里提着行囊，分成兩批，坐上軍用小卡車，離開桑台監獄，開向一個不知名的地方去。

護送隊由自衛隊組成，人數和我們相同，也是二十七人。領隊是一個中尉。開到什麼地方去呢？是弗雷納？雷納？還是丰特伏洛？第一個可據以下判斷的是奧爾良城門，雖然在灯火管制下仍然依稀可辨。第二個是沙特爾飛機場。破曉時我們在一個大路旁邊停了一會。究竟到了什麼地方？自衛隊不知道。究竟到什麼地方去？他們也不知道。

我們繼續前進，早晨六點鐘又停了一次。

前面是翁熱監獄，點名了。按着姓名字母的順序，我們下

来八个人：巴列尔、巴托里尼、貝諾瓦、白利奧茲、皮佑、邦特、高納凡、高索諾，其余的人繼續前进。后来我們知道：他們分成兩批，第一批被送到尼奧尔監獄，共九人：馬戴尔、米道尔、莫盖、繆斯摩、柏蒂、普拉晒、普劳特、罗歇、杜沙；第二批被送到波亞叠監獄，也是九人：高斯德、克里士多福、克罗阿查、德繆索阿、賈武、格莱查、拉勒普、勒維、罗哲萊<sup>①</sup>。

翁热監獄是留給我們的。經過再一次詢問身份和一次絕對全面甚至有些不雅并且是粗暴的、令人作嘔的搜身后，我們被分开單獨而緊緊地鎖在一間間窄狹的牢房里。旅行袋和衣服都必須擱在門外，我們只能穿着衬衫。

孤寂的生活开始了。我們受到普通罪犯的待遇，变成了一些號碼，沒有姓名，也沒有家庭，頭髮剃光，穿上褐色的囚衣。他們檢查我們的身體，將各部特征記錄下来。他們用一支彎脚圓規來量头部尺寸，首先量鼻梁和后腦之間的尺寸，然后是頭骨兩边之間的尺寸。量过左手和左前臂的長度之后，繼而打指紋：十指分开打一次，左右手四指合併各打一次；接着量身長；正面和側面各照像一次，于是身体特征表填好了。

我們被隔离开監禁着，絕對不准交談。每人單獨关在一間白色的牢房里，牆壁和天花板都是白色的。在高处有一个小窗，朝东北方——巴黎的方向开着，上面攔着粗粗的鐵柱。

清早，一絲陽光射进来照在左面的牆壁上，不到兩個鐘头便消逝了。除兩次固定的报时标志：起床和睡覺外，無法知道确切的时间。每天接触的除了充当看守的犯人外，沒有其他的人。和外面毫無任何接触。外面正鬧得天翻地复，事变頻仍，人民遭受着苦痛悲慘的命运，而我們則一無所知。按照規

<sup>①</sup> 以上共仅二十六人，与二十七之数不符。可能是作者把后来被解到翁热監獄的法戎誤計在內了。——譯者

定，在这里应当严格保守绝对的安静。

有时也传来飞机的隆隆声，附近小学里孩子们的喧嚷吵闹以及城里的钟声。每个星期日的早晨，在监狱的广场上，一位天主教牧师在领着做过弥撒后，便进行传道；大家虽然听着，可是谁也没有听懂。

通讯被限制到最低限度。每周只准和最亲近的家属通一次信，只能谈个人私事。至于外面来信，也只限于这些最亲近的家属，只能谈纯粹有关家庭的情况。因此，任何有关政治、军事的消息，一概遭到毫不留情地审查扣留。

家属探望（包括妻子、母亲、子女、父母和祖父母）每周只准一次。这一点只不过是名不副实的規定，因为以巴黎至翁热路程之远以及旅费之贵，我们的家属决不可能经常每月筹措两次旅费。所以除了五年有期徒刑之外，又加上了与外界完全隔离以及通讯方面的严格限制。

我们吃的是和苦役犯一样的伙食：上午一盆菜汤，晚上一盆豆子汤。我们只能从食堂里额外买一些最简单的东西，因为存款不允许超过一百法郎，超过的数目都被国库没收抵作罚款了。

监狱管理总处准许每天有十分钟的放风时间，地点在一个梯形的独院里，四周都是高墙，三十五步就可以转一圈。

在桑台监狱时，我们和家人同住在一个城市里，有定期的探望，可以继续通讯，分离之苦得以略略减轻，甚至晚上还能穿着衣服和衬衣过夜。但接着桑台这种已经够苦的待遇而来的则是非人道的待遇。每天晚上六点钟，你得把全身衣服脱下来放在牢房外面；囚衣、盆、碗、汤匙，所有一切，包括贴身衬衣在内，绝对得全部放在门旁的走廊上。你得裸体睡在硬挺挺的草垫上，直到第二天早上六点起床的时候。

而控制着皮加尔、克里希和蒙巴那斯等地的下流場所、由于做人肉生意當場被捕的現代貴族們，在桑台監獄里却过着值得我們羨慕的生活。

然而，我們決不能忍受這種待遇而不提出強硬的抗議，不向政府指出其應負的責任。我們必須利用能夠利用的有限的辦法，為改善生活狀況而進行鬥爭。因為，在保衛我們個人權利的同时，也保衛了各種政治犯的一般權利，而目前在法國所有的監獄和集中營里政治犯的数量是一天天增長了。我們的抗議和請求也許會帶來報復和懲罰，使已經令人憤慨的無法忍受的情況變的更嚴重。然而，這又有什么關係！人性的尊嚴使我們不得不起來反抗加在我們身上的野蠻待遇。

我們是政治家，我們充滿了對公共福利的忠誠的光明磊落的整個生命，已經貢獻給為保衛法國、保衛共和國的真正利益所進行的鬥爭了。我們有權利要求自由，尤其有權利要求得到政治犯待遇！因此在五月二十六日我們就給司法部長和內閣總理寫了一封信。為了保證請求書能夠順利送達，我們加上了一些客套語，並且通過行政把它發出去。信的內容如下：

“我很榮幸地向您提出給予政治犯待遇的要求。理由如下：

“我和我的同志們經巴黎第三軍事法庭判處五年監禁，并經最高軍事法庭批准。我們曾經向最高法院刑事庭提出上訴，最高法院不予受理，因此第一次判決已肯定有效。

“然而，我們被控的各項事實只是屬於政治性質的活動，全部事實均見起訴書。計有：（一）按照議會組織法，組織法國工农議員團，該議員團之成立會按規定登載于‘政府公報’中；（二）以議員名義寫信給下院議長，請求議長向行政當局提出要求，召開議會。

“檢察官在起訴中，以及所有原告方面的証人在其証辭中，都一致承認上述事實發生于議會開會期間，並且發生在波旁宮內部。

“顯然，在這一點上不可能有任何分歧的意見。我們的案件完全是政治性質的。因此，在這種情形下，根據共和國的傳統慣例，我認為我們應當享受政治犯待遇。

“然而，與此相反，我們目前在翁熱監獄所受到的待遇較之在桑台監獄遠為惡劣。

“在這里我們每個人——在此共八人——被單獨監禁在一間間狹小的牢房里，受着普通罪犯的待遇。

“我們的衣服鞋襪全被剝奪，被迫穿上囚衣。每晚我們被命令脫去全部衣服，將衣服放在牢房外面的走廊里。我們現在幾乎完全被隔離監禁；而在此以前，我們曾經兩人同住一間牢房，每天放風時還有三人或四人在一起的可能。我們被迫保持嚴格的靜默。在通訊上以及為了改善日常菲薄的伙食而購買某些食品方面，受到和普通罪犯相同的待遇。

“這種嚴格惡劣的待遇和不久以前某些罪犯所受到的待遇正好成為極端相反的對比。

“為了上述理由，我代表同志們和我自己向您提出請求，要求予以政治犯待遇，並請在本問題尚在審查未作最後決定以前，立即下令將目前情況給予顯著的改善。

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于翁熱監獄。”

回答是否定的。司法部長兼掌璽官阿爾培·塞洛爾曾經下令對一切宣傳共產主義者處以死刑；他是所謂“社會黨”的一位部長，而社會黨的議員曾經要求給我們每人腦後一粒子彈，要求以斷頭台來對付我們，他們認為行刑隊的排槍對我們未免過於光榮了。對他我們還能希望有利的答復嗎？

事实上，他在四月九日曾送给共和国总统一份报告，第二天“政府公报”上便公布了一道法令，规定凡宣传共产主义的人，均依照刑法第七十五条第五款及第七十七条第一段，并参照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四日之法令，处以死刑。

这道法令声明：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九月一日、九月二十六日、十一月十八日各次所颁布的法令分量不足，因为这些法令只准使用轻罪的刑罰。

这道向希特勒学来的法令除了属于“社会党”的司法部长塞洛尔在上面签署外，同时签字的有共和国总统阿尔培·勒布兰，内阁总理兼外交部长雷诺，国防部长达拉第，内阁副总理兼统筹部部长萧当，内政部长亨利·罗阿，殖民部长乔治·孟戴尔，海军部长乔治·康潘西。

因此，一切政党，从社会党以至极右派的反动政党，都要共同对这道法令负沉重的责任。后来这道法令便同时被维希和柏林的警察用作对爱国的法国共产党员进行兽性的野蛮屠杀的法律根据。

因此，我们要求得到政治犯待遇的紧急请求，一再被这批不配领导法国的当权者们拒绝，自然是毫不足怪的事。他们曾通过翁热、尼奥尔和波亚登的监狱当局给我们发来表示拒绝的官方通知，我们在通知上签了字。

后来，对我们二十七个人实行强迫劳动。我的工作是从早到晚解开贝索诺公司所出产的大网上的网结，其余的人编制马络。日子始终如一地过去了，我们的生活从来没有任何改变。

开始时，由于待遇转变得过于厉害，我们已经亏损了的体质摇摇欲坠，需要相当的时间才能恢复平静。我一心想念着妻子和孩子们。我们离开巴黎的消息对他们一定是像霹靂一

样的打击。在前线的两个孩子毫无音讯，我急切地希望得到他们的信息。因此除物质条件不好的负担外，又加上了精神上的焦虑和不安。他们近来究竟怎样了？

六月八日星期六上午，我的妻子突然来探望，给我带来了一些消息。

我们之间的距离大约有一公尺半，隔着两道铁栅栏。一名看守坐在中间，听着我们的谈话，因此，这时应当十分小心谨慎，应当设法使对方了解自己而不被看守发觉。

自从离开桑台以后，我们完全不知道监狱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从帮助分发菜汤的杂役那兒，我们知道法戎原来关在寻午监狱，后来移到桑台，最近已经到翁热监狱来和我们在一起了。他是戴着脚镣手铐、坐着囚车被押到这兒来的。

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呢？我们只好凭空猜想。现在终于得到了消息。

我知道我的大孩子塞尔吉在博维受了重伤，他是一个医生，以他的忠勇坚强，光荣地得到了表扬。他所屬的野战医院原来駐紮在博维附近，已经被迫匆匆撤退了。

另一个孩子皮埃尔，从各方面判断，他可能已经随着他所屬的炮兵部队开往比利时北部去了，但是近半月来毫无音讯。不知道情况究竟怎样。难道在战场上牺牲了吗？或者和我在一九一四年马恩战役以及蒙米拉依战役中的遭遇相同，受了伤吗？或者和我在一九一六年香檳省梅尼尔嶺时一样，被俘了吗？

所有住在诺尔省、里尔、盧貝、土哥英、滑铁罗一带的亲友们的情形怎样？他们遭遇了什么悲惨痛苦的命运？我的妻子提到一些亲友们的姓名，使我明白了这些地方很大一部分居民被迫转徙流离，情况非常悲惨。



此后很久，我才得到另外一个消息：我的表姪安德烈·柏藍，一个年輕忠誠的共產黨員，以前在巴黎殖民學校唸過書，在聖奧麥附近，和他的未婚妻一道混雜在被希特勒飛機所追襲的難民群中被炸死了。

顯然，正和一九一四年一樣，與侵略同時而來的是恐怖、毀滅和死亡。我們在寫給下院議長的信中所作的預言竟不幸地實現了，慕尼黑政策把我們帶進了巨大的災難。

探望至多不得超過十分鐘。雖然隔着兩道鐵柵，我的妻子依然匆匆地從這些家庭情況中使我明白了被出賣的法國目前的悲慘形勢。

但是看守突然打斷了我們的談話，他以控告來威脅我的妻子，強迫她即刻離開會客室，去見典獄長。因為我的妻子鼓起勇氣，非常明確地告訴了我一些有關政治方面的情況，特別是關於达拉第和雷諾的態度。

我向看守提出強硬的抗議。他命令我離開會客室，我拒絕了。他只好把我拖回牢房。第二天，典獄長告訴我，已經將我妻子的表現報告給馬恩—羅亞爾省省長以及監獄管理總處；假使以後再發生同樣的事情，他將給我以嚴厲的懲罰，並且禁閉到黑屋子裏去。“進去以後，可別想再活着出來”，他暴跳如雷地說。

這與我關係不大，因為我現在已經明白了當前的局勢。我用犯人們在牆壁上敲擊的電報密碼，把消息傳給兩鄰的皮佑和高納凡，他們再分別往下傳，前者傳給白利奧茲，後者傳給高索諾。

所有的看守們都知道了會客室裏發生的事件，知道共產黨議員們已經對時局的嚴重情形略有所聞，事實真象再也隱瞞不住了。從牢房門上的小洞口分湯時，看守中有人低聲回

答我們的問題說：“事情不妙，他們正在向前推進！”

几天以后，看守讓我們离开原有的牢房，重新編組，轉到別的牢房里去，每三人一間。皮佑、高納凡和我三人住在一起，房間面積最多不過五平方公尺，而且只有一個草墊。

上次我們曾請求司法部長和內閣總理准許我們兩人同住一間牢房，每天十分鐘放風時准許大家聚在一起，我們所得到的拒絕是非常粗暴的。這種突如其來的決定的道理何在呢？當天我們就得到了答案：監獄愈來愈不夠用了，必須騰出地方來。

從布阿西中央監獄轉來了六百名犯人。在侵略者的面前倉惶撤退時，缺乏運送巴黎的兒童以及法國北部和東部居民的火車，然而政府居然可以撥給監獄管理總處必需的車廂，轉運六百名犯人，而他們大部分犯的都是普通法的罪行。

昨天還是靜悄悄的翁熱監獄，現在充滿了看守不斷吆喝命令的叫喊聲。他們在走道里鬧哄哄地起勁地談着，不斷傳來轟炸、撤退、進犯、驚慌、災難之類的字眼。

意大利已經向法國宣戰。隔壁學校里兒童喧嘩吵鬧的聲音停止了。教室里住滿了難民，警報一日數次。翁熱城被炸了。沒有人再來照管我們，看守們驚惶錯亂，想找藏身避難的地方。由於大家感到共同的危險，他們跟我們接近起來，向我們詢問，打聽消息，傾吐自己的焦慮和不滿。一個個都來同我們低聲耳語：“如果早聽你們的話就好了，還是你們說得對。而現在一切都完蛋了！”他們不安地思念着仍住在巴黎地區的家屬，現在音訊全無，因此愁眉苦臉，成天咒罵着那些無能和犯罪的將軍以及應當對法國的災難負責的當政者。在整個“莫明其妙的戰爭”過程中，部長、將軍、議員和記者們只對人民作戰；在他們的罪惡政策指導之下，將不設防的祖國拱手送給了

希特勒匪軍。

局勢急轉直下，野蛮的法西斯匪幫即將席卷一切。戰爭、失敗、占領、壓迫等可怕的災難重重壓在法國的頭上；然而此刻，葬送祖國的當政者們主要考慮的卻是將法國共產黨員監禁在集中營和牢獄里。為了他們自己也為了別人，企圖把我們保留下來充當人質。

## 第十八章

### 从监狱到监狱——走遍法国的旅行

我們在大路上走着，总共六百人，穿着囚衣，四人一排。將近百名帶着步槍的看守包圍着我們。我們以行軍的步伐向前行進。翁熱監獄撤退了。命令是在六月十七日星期一下午到達的：我們奉命到貨運車站去。

我們要走三公里長的一段路程，一群人帶着沮喪陰郁的面色看着我們走過去。我聽見其中有人說：“對土匪的照顧比對正直的人們的照顧還要周到，而我們却不能撤退！”我們沿着翁熱古堡前進，古堡的城牆巍然聳立，緊靠着大路的邊沿。

空中傳來飛機的馬達聲，來了一小队德國飛機。上午曾轟炸過一次，現在又來了。炸彈嗡嗡急速下降，然後轟的一聲爆炸。從空中看來，可能以為下面是正在行進中的軍隊。敵機用機關槍掃射我們。有些犯人臥倒在地，看守們用槍托趕他們起來。行進的速度減低了，終於停頓下來。

我們一群九人被放在隊伍最後，看守對我們特別注意，每人有一個看守監視着。到了貨運車站，車站已被破壞得很厲害。邊軌上有一列運牲畜的貨車，這是給我們預備的，我們最後上車。車廂指定好了，上面已經有六十來個盜竊犯、人肉販子和重罪犯。但擠一下還可以騰出地方來，容納我們九個共產黨議員。

第二天星期二，九點半鐘，我們才離開翁熱。車站附近的

汽油庫正在着火，升起一股烏黑的令人窒息的濃烟，散布在城市上空，景象非常淒慘。我們每四人領到一塊面包，五分之一塊奶酪。毫無疑問，目的地是會不遠的。

火車徐徐前進，在每一個車站都停留很長的時間。

到了索來特，火車開進車站。月台旁邊已經停有一長列載着士兵的車廂。有幾個兵士經過我們的車廂時認出了高納凡和巴托里尼。消息馬上像閃電一般傳布開來：“犯人車上有共產黨議員。”

馬上有近百名士兵圍上來。看守企圖趕走他們，但很快就被說服了：“你們到過敦刻爾克嗎？如果沒有，就別管吧！我們要和議員們談談，誰也不能禁止。”看守們看見如此情況，知道還是以不堅持為妙。

這樣一來，對於在比利時的撤退，以及軍事、政治各方面的情況我們便有了非常詳盡的了解：巴黎棄守資敵，政府逃亡，德軍正向奧爾良、南特、布勒斯特進犯，馬奇諾防綫被圍，軍隊大批被俘，大批撤退的難民在路上不斷遭受敵機的轟炸掃射。我們昨天剛離開翁熱，而現在甚至有人說在翁熱附近已經發現了德軍的前哨。

同樣的想法始終在大家的腦子里縈迴着：“我們被出賣了，他們全是混蛋，和希特勒勾通一氣。我們本來有可能進行抵抗，可是將軍們全逃之夭夭，把我們單獨拋在這兒，他們有的是汽車，而我們却得靠步行。”

聽說我們沒有東西吃，他們把自己成罐的沙丁魚、香腸、奶油、面包送給我們，並且給我們很多煙草和香煙，我們便和所有的犯人分着享用了。

在尼奧爾車站，同樣親愛友善的情景重復了一次。

直到第二天晚上，星期三，我們才穿過拉羅舍爾，沿着港

岸，到了拉巴里斯。在港岸旁一些英國部隊正登上一艘大船。到達拉巴里斯後，我們在靠近大西洋岸的鐵路綫旁下車。

然後，我們排成四人一列的縱隊，被帶到碼頭旁邊，走下一隻貨船的底艙。看守們用槍托打我們的肩膀和腦袋，強迫我們密密地擠在底艙里。

半小時後，我們坐船到了雷島，一輛游覽車立刻把我們運到了苦役營。在苦役營的一個院子里集合，檢查人數，點名，再一次點名。

我們九個人點名時排在最後，接着便被關進一間黑屋子，里面有一張矮床，一根長鐵槓，和套在罪犯腳上的鎖鏈與鐵環。我們在這裡將度過一天和兩個晚上。

二十一日星期五，我們在半夜三點鐘被叫醒，事實上我們也並沒有睡着，因為拉羅舍爾城整夜曾遭到猛烈地轟炸。天色微明，我們被帶出牢房。

帶隊的是一个副班長，十二名士兵，扛着槍，槍口上着刺刀。時間這樣早帶我們出去干什么？十二名武裝士兵正好符合行刑隊的人數，不管如何設想都不是不可能的，應當朝最壞的一面去着想。我們三人一排，然後：開步走！

走出苦役營，向右轉，再走三百公尺，到了港口。一條小船停在那裡，準備把我們運到拉羅舍爾去。

眼前是一幕永遠難忘的景象，令人聯想起阿提拉和匈奴入侵的可怕時代。

遠方，沿着海岸，在拉羅舍爾外圍，所有的汽油庫都起火了。那一帶，天空陰沉如墨，濃厚的煙霧散布在長達十公里的地帶，把大西洋岸隱藏在它的黑影里。在這幅慘象的對面，一輪光燦奪目的紅日正照耀着波浪起伏的洋面。小船左方是一片無邊無際的油污，汽油在海面上飄浮。右方遠處，香普蘭号

的殘骸正在燃燒。大火、毀滅、廢墟和死亡統治了翁熱；大火、毀滅、廢墟和死亡統治了拉羅舍爾；大火、毀滅、廢墟和死亡統治了整個法國；無處不是大火，無處不是毀滅，無處不是廢墟，無處不是死亡。

沿途的情形又怎樣呢？

用汽車把我們從拉羅舍爾解到了波爾多監獄，而從拉羅舍爾到波爾多的路上充滿了難民們淒慘的長長的行列，軍人和平民混在一起，有的步行，有的乘車：自行車、馬車、摩托車、汽車無一不有，他們毫無秩序地逃出大火與鮮血主宰着的地區。

中午，我們到了這座沿海的大城市。旅途共歷八小時。在這八小時內，淒愴滿目，所看到的只是一片可怕的逃亡景象。

幾個月後，我接到一封家信，使我對於很多法國的家庭在轉徙流離中所受到的艱辛痛苦知道得更清楚了一些。我女兒在信內寫着：

“你看看路上的那些難民，就可以想像到這四天來我們是怎樣度過的。下面我談談離開巴黎到翁熱監獄來探望你時在路上的一些遭遇，但是在翁熱監獄我們並沒有找到你。六月十日星期一，我們在我們的朋友萊翁妮家，剛得到意大利宣戰的消息，我馬上就看見太陽奇怪地變得陰暗了。天空中愁雲密布，暮色不可能降臨得這樣早，外面充滿了各種嘈雜喧嚷的聲音。實際上這是德國人強渡塞納河，向埃弗留克斯推進時所施放的煙幕。第二天，煙霧依舊，空中一片灰色。煙霧直貼在我們的臉頰上，鼻孔全變成了黑色。這一切造成一種令人緊張不安的氣氛，大家都嚇壞了。星期二，我們就乘自行車出發到了翁熱和隆格。

“还是回到我們出發时的情形吧。朋友們慷慨地借給我們兩輛自行車，我騎的是一輛男車，媽媽騎的是一輛女車。六月十一日星期二下午兩点半動身。走出巴黎时的情况可怕極了。我們經過夏廊敦門，大批汽車、自行車、三輪車、各种各样的車輛全拥在一起，妇女、兒童和老人們都徒步走着。

“当时，我很怀疑是否还能够活着走到夏廊敦桥。我們在成群的車輛中寻路前进，花的力气的确不少，特别是在下坡的时候。这还算不了什么，我們走过了聖乔治新城，橫貫塞納尔森林，然后离开麦隆大道，向高貝依前进。

“你可以看出我們繞了多么大一个弯。晚上十点钟，我們到了高貝依南边的巴朗沽。我們支起了帳幕，我們的兩個朋友也支起了帳幕。

“最后，一切安頓就緒时，刮起風来。已經是半夜了，真够苦的。我們就躺在石子上，睡着的时候并不多。帳幕靠近大路，汽車一輛接着一輛沒有完結的时候。下雨了，雨中夾着風暴。清晨五点钟我們起来，帳幕全湿透了。随它去吧，在路上它会干的。

“我在路边發現了一个水池，大家全都下車暫停。哈！水好極了，大家都感到清涼了一些。我們到了埃当坡。城外交通阻塞，汽車全停下来，排成三、四公里長的队伍，只有自行車和步行的人可以通过。我們經過伏西，然后到达江維尔。

“到江維尔时已經很晚了。天色不好，我們准备在树下支起帳幕来。

“有些妇女問我們想干什么，并且告訴我們說：‘这样可不成，眼看風暴就要来了，我們这兒已經住下了一些难民，你們就到我們的倉房里住吧。’

“第二天，我們打好行囊，重新上路，向查多登前进。路上



車輛又被阻塞住了。和我們同路的有从巴黎撤退的大工厂的工人。下午五点钟到了克莱耶，下雨了，我們只好在一个农庄里停下来。农庄的每一个角落，包括停在敞棚的大車里，全都挤满了难民。

“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們向樊多姆和夏多雷諾前进。过了夏多雷諾，看見前面有一支英国轎重部队在树林下休息。我在最后一輛轎重車旁停下来，用英文請他們替我修一下自行車。他們立刻給我修好了。这些英国兵很高兴能够跟人聊聊天。

“可是突然傳来了馬达的隆隆声，八架德国轟炸机来了，大家全往树林里乱窜，英国兵也跟着跑。我們留在路边，沒有被敌机發觉；但有一輛汽車全速开过来，上面載着一个腹部受了伤的工人。德机轟炸了难民队伍，我們真險哪！”

“最后一夜我們是在羊圈里度过的。星期六我們到了隆格。当然还有許多其他的遭遇，紙不够，不繼續写了。这不过是一些不愉快的回忆罢了：因为現在我們已經得到了你和塞尔吉的消息，只有皮埃尔还没有音訊。”

下了小船，押解我們的十二名武装士兵，把我們交給了一小队宪兵，領队的是一个副班長。

不知道为什么司机停下車来，这时宪兵給我們找来了报纸。

于是我們对当前事变發展的情况，以及圍繞着这位“偉大的”人物貝当元帅所进行的各种陰謀活动，有了一个全面了解。

到了波尔多，首先讓我們走遍全城，寻找一个可以指示如何处理这九名犯人的領导机构。

帶队的副班長往返奔走于各个參謀部、办公室和机关之間，毫無結果。而參謀部、办公室和机关之类則無時無刻不在增加着，因为随时都有潰敗下来的參謀部，粮餉一空的后勤办公室，以及与上級失去联系的机关增加到原有的機構中来。

在我們的卡車周圍聚集了一堆好奇的人群，向我們指指点点。胆大些的走近前来，問东問西。有人以为我們是德国傘兵。當我們對他們明确說明我們是共产党議員，因为曾經提出唯一可以使法国免于目前正襲击着它的灾难的建議而被判处五年徒刑时，他們全都不肯相信。

当上下院議員在波尔多市政府里，丑态百出，爭着向貝当献媚的时候，竟会有法国議員被当作普通罪犯来对待，并被迫穿上囚衣！这对他們說来簡直無法想像。只有經過宪兵肯定地答复以后，他們才相信我們确实是法国議員。

虽然如此，每当卡車停下来时候，人群便在我們四周聚集起来，他們有很多人不愿意相信。他們說：“不，这不可能。假如这是真的，那么，未免太令人憤慨了，这簡直和德国鬼子的行徑一样。真令人作呕，难怪一切都要完蛋了！”

宪兵們也同意这种看法。到处充滿着沮丧、失望、混乱的情緒和表現。这时，反而不得不由我們这批牢囚来鼓舞这些法国的男人和女人的士气，事实上他們只是表达了全国一般的輿論。但是他們以失望与怀疑的手势，作为對我們的答复。

在政府人員、參謀部人員、議員、報紙等全都表示悲觀失望的时候，我們的英勇态度以及对將来的信心使大家非常惊奇，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經過往返多次的交涉之后，終於找到了一个敢于决定如何处理这批犯人的行政首長。

他命令把我們送到波尔多近郊一所嫌疑犯集中營去。

集中營里的衛兵有一些是巴黎人，其中有一个和我同住  
在第十一區。這批巴黎衛兵全都認識我們。

他們最先提出的問題是：“吃過飯了嗎？”

“沒有！”

“那麼，這邊來吧，到食堂去。”

幾分鐘以後，給我們送來了沙丁魚，火腿，肉餅和土豆；面  
包和酒隨便吃。憲兵們自昨晚起也沒有吃過東西，坐下來和  
我們一道進餐。管理集中營的上尉也來和我們打招呼，並且  
命令給我們每人倒了一滿杯咖啡。

不論官兵平民，沒有人不對賣國賊們痛恨怒罵，他們已經  
將巴黎拱手送給希特勒，而今天在波尔多又想和希特勒講和  
和合作。在兩個多小時的時間內，我們每人得到了很多關於政  
治和軍事方面的消息。

政府曾經有意地使我們與外界完全隔離，斷絕一切聯繫，  
禁止我們知道輿論界的表示以及人民的情緒。而現在使我們  
大感慰借的是：凡是我們所遇見的法國男女，包括一切不同社  
會情況的人，全都對我們表示同情與憐惜，而對达拉第和他那  
批無能的和罪惡的議員將軍們，則無不表示痛恨唾棄。當我  
們走出集中營時，大家一致以鼓舞激勵的言語與手勢和我們  
道別。

一小時以後，我們又到達了波尔多城內，再度停下來等待  
着，再度辦理交涉。

下午四點鐘，我們在波尔多監獄的大門前停下來。

四周又有人圍集起來，提出一連串新問題！最後監獄的  
大門終於開了，讓我們的遊覽車開進去。有一位監獄管理總  
處的總視察在這裡，他是隨政府一道逃出的。他告訴了我們一

些关于德軍占領巴黎的消息。他告訴我他已經收到所有我們的抗議信，同時也清楚我們的家庭和亲友為了使我們得到政治犯待遇所進行的一切活動。

就他自己來說，他個人認為我們的請求是合理的，他說他是個共和派，不同意人們把政治家當作普通匪犯來對待。但是他不能夠作主，監獄管理總處曾經得到政府特別明確的指令，對共產黨議員應當施行嚴格的普通罪犯待遇。他告訴我們：今天晚上，我們將被解送到塔爾布監獄去。最後他請我們轉告我們的家屬，不要堅持請求，因為他擔心這樣可能使他們遭到報復。

下午六點鐘，坐上囚車，我們向塔爾布進發。車內只有八個小間，而我們有九個人，只好把我和法戎兩人同關在一個小間里。

路上走了八小時，午夜兩點鐘才到達塔爾布監獄。

在整個旅程中，我和法戎有一人必須站在另一人的兩腿中間。要花很大的氣力才能換換位置，這是非常容易使人疲倦的。

每隔五十公里囚車要停一會。司機和押車的兩個看守下車到咖啡店去，紅酒白酒狂飲一通，不久就醺醺大醉了。我們請求喝一點水，可是我們得到的答復卻是詈罵和侮辱：“小便吧，你們就有喝的了！”“口渴嗎？這兒有汽油！”“住嘴！你們這些壞蛋！”

總共只八小時旅程，這些毫無理性的爛醉的看守便整整罵了八個小時！這幾個傢伙在囚車里的走道上一面罵一面吐，吐出了多少髒東西就罵出了多少髒話。

半夜兩點鐘，我們走進塔爾布監獄看守長的辦公室，我們九人按姓名字母的順序排成一隊。

“瞧，就是这个王八蛋，”囚車司機指着高索諾說：“就是这个家伙从囚車的壁縫扔紙條出去，告訴居民說他會經過這兒，我要求严厉懲罰他。該把这个土匪关到黑屋子去！”

我們馬上一致对这些胡言乱語加以反駁，这个坏蛋即使對他們自己人說來也是一種恥辱。我們声称高索諾的行動实际上是我們大家的一致行動。我們指出，由于大家的建議，高索諾才以扔紙條出去的方法告訴大家，唯一保衛法國利益的共產黨議員現在正被押送到塔爾布。我們是正直善良的人，希望別人也这样對待我們。看守長等汽車司機發完脾氣后，用一個輕蔑的手式，叫這位告發者退下去了。然后，我們又一度被詢問身份，兩人一隊，被帶到牢房里去。

我那間牢房已經有一個犯人在里面了。他好像睡得很熟，但等看守把我們关在里面，緊緊鎖上牢門之后，他馬上在草墊上站起來，原來是阿爾培·柏蒂，我們互相擁抱，像久別重逢的兄弟一樣親熱。

他從尼奧爾來，他們這一組在囚車里是兩人一小間，在灼熱的太陽光下，又飢又渴，在車上整整呆了二十小時。但這些已經是過去的事了。

我們重新聚會在一起，從波亞疊和尼奧爾來的同志是晚上到的，他們的遭遇和我們完全一樣。

在尼奧爾的同志甚至曾經被迫穿上骯髒、油膩的蒙面罩衣。凶猛猙獰的警犬在旁邊看守着，隨時準備咬他們的腳跟和腿肚。他們算是領教過了達拉第、雷諾、龐納、塞洛爾之流手裡的現代文明。但這一切也都算是已經過去了。

我們在牢獄中共同過着忍受犧牲、限制、虐待、壓迫以及監禁的生活，然而，從桑台監獄以來，我們從沒有現在這樣高興，我們不約而同地從內心喊出了下面這句話：“我們終於會

战胜他們的！”

在塔尔布監獄我們停留了四天。

看守是一个口头嚷得很凶而心地善良的人。我們向他提了很多問題。从他那里，我們得知貝当即將簽訂停战协定。

虽然沒有把握，但我們还是給家人們發出了一些明信片。我們向上比利牛斯省省長提出請求，希望得到政治犯待遇。他回信說接到了我們的請求書，預备加以研究，轉給政府。

二十七日星期四上午，我們离开了塔尔布。晚上到达土魯斯監獄。我們二十七个人重又聚会在一間大厅里。

停留了兩天兩夜，毫未睡覺，几乎要被臭虫蚤虱吞吃掉。看守中有很多是社会党土魯斯支部的黨員。他們对社会党領袖們的态度感到羞愧，他們譴責这种态度。他們向我們發誓說他們不希望工人階級的議員受到和匪徒一样的普通罪犯待遇，他們向我們道歉。

从他們那里，我們看到了“土魯斯電訊報”中所登載的可耻的投降停战条款，停战令是由投降者貝当周圍的一伙卖国賊簽署的。

典獄長也表示同情我們，給我們每人一杯咖啡。我們住在第四層楼上。

晚上，我們聽見有人給我們打招呼，原来我們到达的消息已經在各个牢房、工地、食堂和院落之間傳开了，这是監獄里的共產黨員向我們表达兄弟般的敬禮，并表示他們对党的忠誠，以及对甘心为大資本家和希特勒的代理人服务的社会民主党的憤恨。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大家傳播着这一句話：“我們終于会战胜他們的！”

在兩天兩夜的时间里，我們对監獄內部以及对土魯斯所

發生的一切事情已經非常熟悉了。在土魯斯，我們的同志們正冒着自由與生命的危險，領導人民繼續進行着嚴酷的鬥爭。我們受盡了苦難，這是事實，然而，我們的內心充滿了快慰。

看守們和難友們同時都對我們表示同情，這使我們感到很大的安慰。

不久以前，我曾經在土魯斯的雅各賓黨人的大廳里參加過一次公開的群眾大會。會上，法國共產黨的正确政策曾經受到土魯斯優秀居民的熱烈讚揚。“不錯，我們終於會戰勝他們的！”

二十九日星期五，再度坐上囚車，開始了新的旅程。二十七人分坐在三輛囚車上。押送的衛隊是由自衛隊和後備隊組成的，他們不時遞給我們一些香煙。

他們給我們指點所經過的城市和村鎮。這一帶高斯德很熟悉，原來這是他的故鄉。在我們的囚車里，可以聽見他講話的聲音。他在向衛兵進行宣傳工作。

半夜兩點鐘到達勒浦監獄，中途在羅得斯監獄曾經停留了幾小時。瓦德克·羅歇很清楚羅得斯監獄的情形。大約十年以前，在一次遊行示威被警察驅散後，他在這裡曾待過一個時期。

在勒浦，只有一間所謂疏散備用的房間可供使用。

這是一所省轄的小監獄，包括看守長在內，一共有四個人員。我們已經精疲力竭，路上有很多同志曾經昏厥過去，但得不到絲毫救助。現在，從翁熱到勒浦這一段艱苦歷程終於結束了。也許在這裡可以停留一段相當長的時期。

我們二十七人被帶到一間僅僅能容納十五人的大牢房裡。但這沒有什麼關係，和所有的法國共產黨員一樣，我們二

十七人是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的。我們的士气始終非常旺盛，但是我們的健康已經遭受到严重的摧殘。

我的体重減輕了六公斤。柏蒂減輕了十五公斤，在吐血；勒維減輕了二十多公斤；普拉晒胸口發痛；普勞特患着胃潰瘍；罗哲萊的神經常常一陣陣發病，而高納凡随时可能死于半身不遂。

我們的身体都大大減弱了，然而却沒有人失掉勇气。大家都肯定地認為我們是正确的，对將來抱着信心，知道法国人民是会同情我們的。我們回顧了一下最近的过去，共同研究了自战争开始以来所發生的各个事件，并得出肯定的結論：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写給下院議長的信的内容完全是正确的。

如果我們的建議被採納了，法国就不会遭到如此鉅大的蹂躪和屠杀。然而卖国賊和懦夫，逃亡分子和胆小鬼，反而把我們投入了監獄。我們是忠誠正直的人，决不会为任何誹謗所中伤。虽然穿着囚衣，我們依然能昂首正視，不至于抬不起头来。

在三十多年的政治生活中，共产党員們，上自多列士、杜克洛、弗拉商、加香，下至沒沒無聞的党員斗士，我們都有权利得到法国人民的愛戴和感激。我們無所悔咎，因为我們为法国和法国人民貢獻出了我們的力量。

而另外一批人，那些把我們投进監獄把国家引入深淵的人們，他們的处境怎样呢？这些葬送祖国的人們在人民的心目中占着什么地位？从翁热到勒浦的旅途上可以看出：他們已經成为普遍憤慨抨击的对象，背上了瀆职卖国的罪名。人民無时無地不在叫罵着：“他們出卖了国家！”

然而，尽管如此，尽管已經發生的事件显然証明了法国共产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我們却依然被关在監牢里，甚至得不到



在同类案件中根据法国傳統所应得到的政治犯待遇。

一切正直忠誠的人們都不能理解为什么我們要受到这种侮辱备至的待遇。我們应当被釋放，然而达拉第不願这样做，雷諾不願这样做，貝当也不願这样做。他們仇視我們，因為我們是而且始終是共產黨員，是人民和法国的保衛者，是共和制度的保衛者。

关于这一点，我們在明天，后天，并且經常要談到。至于目前，我們全都希望得到家人和同志們的信息。我們希望接到一封信，一張明信片，甚至一句話，只要能使我們安心的都行。

犯人們渴望得到一切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东西。在狹隘的牢房里，極端細微的事物也变得非常重要。一个犯人常把一点小小的东西：一封信、一張明信片、几句話，在手里翻来复去，仔細端詳，讀了又讀，想了又想，然后放在鼻头上聞一聞，好像要从这里呼吸到它所包含的全部誠摯撫愛的气息。

这样，他就可以尽情猜測，作出各种假設，于是一縷光明便冲破陰森孤寂的牢房里的重重黑暗。这样也就会使他的囚徒生活感到充实。

然而，現在法国已經被分割为兩部分，中間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界綫，我們需要等待多長的时间呢？如果还要使我們繼續受苦的話，就讓它这样吧，因為我們知道我們完全是正确的。

## 第十九章

### 勒浦監獄中飢寒交迫的生活

我們在勒浦監獄待了九個月。這段生活有兩個主要的特点：受凍和挨餓。

第一個月還不太壞。失敗崩潰之初，一片混亂，監獄當局和它的上級尼姆中央監獄失掉了正常聯繫。上羅亞爾省省長還沒有得到關於我們被監禁情況的詳細報告。我們充分利用了這種混亂情形。

從翁熱監獄匆匆撤退時，沒能把監獄管理總處根據政府命令所作的處理我們的特殊指示帶出來。有關我們的全部檔案材料始終留在翁熱監獄，現在還不可能運過分界綫來。郵政聯繫也還沒有恢復。

在這種情形下，由於我們一再請求，並且編了一些事實上並不存在的先例作為理由，加以監獄長無法檢查，於是我們被批准和家里通訊，不受任何限制。

這時已經沒有專人負責檢查我們的信件，於是我們可以把在翁熱監獄所受到的可惡待遇以及把我們從翁熱解到勒浦時的非人道情況報道出去。法國共產黨的領導因此知道了我們的確實情況，並從而根據事實，通過秘密出版的報紙和傳單，喚起輿論界的注意。

我們對貝當、賴伐爾及其黨羽所謂的政府提出的揭發和譴責的信件被翻印出來，法國人民讀到了這些文件。

另一方面，有些住在非占領區的家屬們，有時還可以到監

獄來探望我們。瑪塞勒·高納凡、珍曼·高索諾、丹尼絲·克羅阿查、奧古斯汀·羅哲萊以難民身份用假名在勒浦一個市議員家里避難住了半個月。

她們照管着巴托里尼的小孩讓，和克里士多福的幼女索朗芝。

約塞特·皮佑帶着小女兒海倫，沒有被批准來探望她的丈夫。在社會黨人夏爾·呂西任柏杜依市長時期內，她被強制住在柏杜依。

儘管她們的探望為數有限，而且並不是定期的，但通過她們，我們和外面取得了聯繫。我們甚至被批准可以從郵局收到小包食物，以補監獄伙食之不足。但所有這些方便歷時甚短，不久全被取消了。

維希政府得知有關我們用自己的努力所造成的情況的報告後，作出決定，取消了我們在潰敗的混亂狀態下從地方監獄當局所取得的一切微小的便利。

上羅亞爾省省政府為我們建立了特別嚴格的檢查制度。和在翁熱監獄一樣，我們在通訊方面受到了嚴格限制，只允許談家庭私事，稍一越軌，信件便被沒收。於是，我們又陷入和外界隔絕的狀態。

為了打破封鎖，只好在偶爾有人來探望時，利用隱語暗喻，得到一些消息。每次探望不超過十分鐘，看守在旁邊監視着，兩排木柵橫在會客室中間，形成一條走道，我們和探望者便隔着走道談話。

我們通訊時只能在已經印好現成詞句的越境明信片上增刪組合，而且限于家庭私事。即使如此，我們終於漸漸由此得到了一些隱約模糊的消息，足夠對國內外形勢形成一個大致相近的概念。

我們創造了一套特殊的密碼和辭彙，人各不同，但都不超過被批准的家庭私事的範圍。

我自己的辦法是設法利用姑嫂姪表、伯叔親眷等人的姓名。我有一個姨姊叫做海倫娜，住在蘇聯已經有三十年了。通過對有關她的健康情況、工作詳情、來往旅行的細節等消息的報道，已經足夠使我了解蘇聯目前的情況。另外有幾個姪女叫做伊倫娜、安娜、弗蘭莎、約瑟特，借助她們便可以談到意大利、德國、法國和日本的情況<sup>⊖</sup>。

以前我在美國旅行時，曾經和“工人日報”外交政策部主任哈里·甘納斯見過面。我有一個朋友是倫敦人，叫做赫特·阿蘭。於是我們就可以利用如上方式談論英國和美國所發生的事情。

這樣一來，雖然只限於純粹私人的消息，但是我們可以通過反復組合，從而略知當前正震撼着全世界的種種事件的梗概。

這裡應當提一下：一個意想不到的機會大大便利了我們。

我們這一座最多只能容十五個犯人而現在已經容納了二十七個人的疏散備用室，由於地勢傾斜，有一半成了地下室。整個監獄事實上是建築在一座小山的斜坡上，而勒浦城則在小山的另一面。

監獄會計住在二樓，剛好在我們上面。他有一架收音機，在每天晚上開放，收聽消息。

不知道是由於疏忽還是好意，每晚他把收音機的聲音開放到最大限度，因此我們雖然不能抓住全部廣播的內容，但能

---

⊖ 這幾個名字法文是 Irène, Anne, Françoise, Josette, 其字首分別和意(Italie)、德(Allemagne)、法(France)、日(Japon)等國家名字的字首相同，因而可借以影喻。——譯者

收听到一些片断的消息。

我們用紙做了一个类似助听器的玩意，交給瓦德克·罗歇，他的听力最好，然后到最有利的地方：廁所，一直爬上鐵欄，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些零碎但非常重要的消息。

但在收听之后，需要随时把听到的消息一点点拼湊起来，以获得全貌。有时也会得到錯誤的結論，和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相符。

然而，利用所有这些方法：探望、通訊、收音机等等，我們终于得到了許多被官方所封鎖的消息。

一件完全意想不到甚至不可能預料的事件，使我們获悉了党的活动情况，党反抗压迫者的英勇斗争以及它为了使祖国从侵略者和他們的仆从維希投敌合作分子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所作的英勇斗争。

十月里一个星期日的早上，十点钟以前，值班的看守打开了我們的牢房門：

“邦特到会客室来。”

难道是开玩笑嗎？剛好这个值班看守嗜酒成性，經常沉醉不醒。也許是存心拿我們开玩笑，也許是弄錯了地址。我的家人全分散在占领区，有誰会来探望我呢？因为来訪者必須是家庭中的一員，只有近亲才准許到監獄来探望。最后，我怀着將信將疑的心情，随着看守走出了牢房。

然而，他領我走的方向不是会客室，而是通向放風場的寬大走廊。左边是一間預审推事和辯护律師專用的小房。他打开房門，并對我說：“就是這兒！”我走進房間。看守留在走廊里，將門关上。

原来是曾經為我辯护过的比利时律師讓·馮丹！我們激動得說不出話來，心跳得很厉害。像歷經苦难、久別重逢的亲

兄弟一般，我們親密地互相擁抱。

他很快地把這次冒險旅行的情況告訴了我，因為時間寶貴，一分鐘也不容浪費。他從布魯塞爾出發，越過邊界，到達巴黎，然後穿過分界綫，最後來到了勒浦。

接着，馮丹律師向我轉達了我的朋友們的兄弟般的敬意，告訴我關於監禁在集中營和牢獄里的同志們的情況，並且將法共領導方面在希特勒入侵的這段艱苦時日里所進行的英勇鬥爭作了一個詳盡的報告。

他告訴我：在五月的最後幾天，當第五縱隊正準備公開與敵人會師，軍官中的叛逆分子籌劃投降時，法共領導會通過喬治·波利澤爾向雷諾政府提出：法國共產黨認為放棄巴黎，讓它落在法西斯侵略者手里是一種賣國行為，法國共產黨並建議動員群眾起來保衛首都——法國的首腦和心臟。

法共領導會向政府指出：為了勝利地抵抗侵略軍隊，必須實現下面一些基本條件：

一、改變戰爭的性質，把戰爭變成為爭取獨立、自由的民族戰爭；

二、釋放共產黨議員和共產黨鬥士，以及數萬被囚禁或被拘押的工人；

三、立即逮捕麇集在議會、政府各部、甚至參謀本部中的敵人走狗，並予以嚴厲的懲處，以儆效尤；

四、立刻頒布動員令，激發人民的情緒；

五、把人民武裝起來，使巴黎成為一個不可攻克的堡壘。

馮丹律師詳細告訴我：當政者所採取的措施正好和共產黨的主張相反，他們不去激發人民的勇氣和熱情，反而用盡一切力量散布緊張驚惶的情緒。在疏散工業的借口下，工人們成群地被撤退了，而如何保證繼續生產卻沒有任何準備。

雷諾起用了貝当和魏剛。卖国贼邓茨被任命为巴黎衛戍司令，他的第一个行动便是宣布巴黎为不設防的城市，將首都拱手送給侵略軍。全部警務人員被動員來对付共產黨員，而由于瘋狂的鎮壓、大批逮捕和好幾個秘密印刷中心的被破壞，黨的宣傳工具大大地減少了。

然而，不論在什麼地方，共產黨員都是以勇敢和英雄主義著稱的。而人們仍然繼續迫害他們。因此被拘禁在叶島的共產黨員，意識到法國所遭遇的危難，曾兩次聯名寫信給內閣總理，第一次在五月十日，第二次在六月十日。

他們在信中說：“值此祖國危急存亡之秋，每一個法國人的責任是參加戰鬥，而我們却被監禁在這裡，不能有所作為。我們請求參加戰鬥以拯救祖國。”

這個請求始終沒有得到答復。幾天以後，他們被交給納粹了。拘禁在叶島集中營的人數達二百八十二名，其中有一百九十九位老戰士。他們之中有九十三人得過戰鬥十字章，二十七人得過軍功章，六人得過榮譽團勳章，有一百十七位被囚者的子弟現在已經應征入伍。

馮丹律師告訴我：法共曾經派出一個代表團，試圖說服逃亡到波爾多的政府以及議會各黨團，但代表團在任務沒完成前就被逮捕了。

最近雖然有大批共產黨戰士在維希警務人員和德國秘密警察的代理人的密切合作下被逮捕，然而共產黨的威信目前正一天天增長，黨利用一切方法組織了爭取法國自由與獨立的鬥爭。

我感情激動地聽着馮丹律師的敘述。但時間過得太快，看守打開小窗來看了几次。

應當告別了。我在一張小紙片上寫了几句話給我的妻子

和孩子。最后一次拥抱，最后一次握手，最后一声“再会”，最后一次举手示意，最后一次互相投以鼓励信任的目光；而在我这方面，则是最后一次谢谢，力图把我全部感激的心情毫无遗漏地表达在谢谢声里。

就这样分别了。獄中的朋友們全煩燥不安地等着我（我們只剩下十六人，上星期，十一个同志由于管制制度，健康被严重伤害，已被轉送到瓦稜薩監獄）。我把馮丹律師和我會面的情況給他們做了一個詳細的報告。

几天以后，幽迷特·法戎寄來一個包裹，里面藏着一封多烈士和杜克洛寫給我們的信，內容如下：

“親愛的同志們：

“我們最近得到了關於你們的消息，並曾採取了一些措施，以便更有效地發揮團結互助的精神，幫助你們和你們的家屬。

“不用說，對你們以及對成千上萬被關在占領區與非占領區的監獄和集中營里的同志們，我們是極端關懷的。這些同志和你們一樣，由於忠於人民的事業，忠於自由與和平的事業，毫不動搖，因而失去了自由。

“一年以來，黨在共產主義與愛國主義的鬥爭中已經寫下了光輝的一頁。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弗洛里蒙以我們全體的名義寫信給下議院議長，到現在已經一年了。這封有歷史意義的信件證明了我們的遠見，證明了我們的黨是多麼正確。

“現在，千千萬萬的法國人已經清楚地看出：法國被可恥地出賣了，而其根源正是由於對工人階級的仇視，對共產黨的仇視，以及對蘇聯的仇視。

“如何解釋法國軍備令人憤慨的劣勢？又如何解釋法國資本家和政府給予希特勒發展軍備的種種幫助呢？由於缺乏鋁，法國大批生產飛機的計劃沒有執行，而亞雷斯、弗洛杰、卡



馬格公司却得到巴斯蒂德、达拉第、阿里奥尔、柏杜司、勃魯姆的批准，將鉄矾土运給德国，并且还在勃魯姆和阿里奥尔的批准下，得到了里昂信托銀行經濟上的支持；如果不是法国有产階級企圖驅使德国对苏作战，試問这一切將作何解釋：

“正是这种階級意識，促使法国的資本家及其在政府和議會中的走狗們，想尽一切可能的办法进攻苏联（例如在芬蘭，以及魏剛在近东的布置），而毫不考虑到由于企圖發動这一战争，法国国土可能遭受的危險。

“就法国人民和国际無产階級來說，幸而苏联比过去更加强大了！

“馬內汉的白衛軍被打敗以后，立陶宛、拉脫維亞、爱沙尼亞三个苏維埃共和国加入了苏联，同时苏联和平地收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羅馬尼亞从苏联所窃取的比薩拉比亞。

“去年，一千三百万白俄罗斯人和烏克蘭人从波蘭地主和資本家的奴役下解放以后，苏联的人口現在已經上升到一亿九千三百万。

“最高苏維埃为了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生产和加强苏联的防禦能力所采取的各种措施，証明了苏联比以前更加强大，对前途充滿信心，有力量应付由于战争的延續、扩展而引起的一切可能發生的情况。

“实际上，德、意一方和在美国支持下的英国另一方之間的战争正在繼續着。

“德、意、日三国大概已經把世界重新瓜分过了。德、意得到欧洲和非洲（虽然非洲还没有被公开提出），日本則取得远东方面的广大土地。

“这不禁令人想起熊皮的故事<sup>⊖</sup>，因为事情还没有就此結

<sup>⊖</sup> 法国有一句成語：“不要在沒有把熊杀死以前出賣熊皮。”——譯者

東，英國和美國決不會自甘滅亡。

“我們認為：應當有長期作戰的思想準備。

“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應當估計到：在法國和英國的資本家中，有不少人贊成以慕尼黑的方​​式：犧牲社會主義國家，來解決他們內部的困難和矛盾。在他們執行其計劃的過程中，將要遇到日益增長的困難。

“在這種情況下，另一方面應當估計到：由於戰爭延長，人民生活日益貧困，各國人民要求在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面得到解放的願望將大大加強；在每一個被占領的國家內，反抗侵略者的民族解放運動也將得到發展。

“因此，我們正面臨着一個充滿了重大事件的局勢。

“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的統治者們正高談着建立‘新秩序’，我們自然很清楚所謂‘新秩序’指的是什麼，不過他們的苦難還在後頭。

“對於我們主要的是組織爭取民族和社會解放的鬥爭。

“這正是我們目前所進行的工作。

“事實表明，我們是領導進行解放運動的唯一大黨。我們是人民的政黨，是為爭取一個自由和獨立的法國而鬥爭的唯一政黨。所有其餘的黨派，作為政黨來說，已經全部陷於怯懦叛國的深淵中了。

“法國的大資產階級事實上是分為兩派的：

“一方面是純粹的親英派，他們所謂的愛國主義只是使法國成為英國的自治領。

“另一方面則是親德派，他們的計劃在於使法國工業破產，喪失經濟獨立，從而使法國成為一個仆從和奴隸的國家。這樣，他們就不能不引起法國人民廣大階層的反對。

“以上兩派從自私的目的出發，為了保衛他們統治階級的

特权，而把法国的前途和外国联结在一起。

“然而，在法国人民大众面前还有另一个远景，这就是民主和社会主义胜利的远景，它将给法国带来自由和独立。这就是我们对将来的看法。

“必须告诉你们：自从我们着手整顿党的队伍以来——因为全国总崩溃以后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党员中的分散——不论是留在后方或者从军队中归来的同志们的士气都异常高涨。

“同志们充满了信心，深信将来必然属于我们。

“毫无疑问，我们党的力量使希特勒侵略军和占领者大为头痛，他们使用了各种方法来对付我们的党。

“他们企图败坏我们的名誉，使人相信我们的党和占领者勾结往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曾经利用法珊和幽莲特·古布蕾两个律师。

“法珊是党员，我们马上把他开除了；后者不是党员，我们立即公开加以谴责。并立即在我们出版的小册子中把两人当作占领者的朋友和代理人来予以揭露。

“侵略者所企图达到的目的是很明显的。我们的党站在反压迫者斗争的前列，他们企图对我们加以污辱，以便借助法国警务人员，比较容易地实现他们镇压我们党的大规模行动，而不受人民行动的阻挠。

“我们已经击败了侵略者在贝当、赖伐尔的党羽协助之下所进行的一切可耻的阴谋活动。

“我们的影响正在发展扩大。

“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中，贝当政府已经愈来愈不成其为法国政府了。

“忠于贝当的记者们如德阿、庇峨之流，得到当局的批准，正在巴黎出版‘事业报’，其为敌奔走的卑鄙面貌已经暴露无

遣。同样陶里奥受命和叛徒季通一道組織一个統一的政党。然而他也只不过是另一个敌人走狗帮助之下的积极走狗而已。

“很显然，一切占領者都不得不利用一批受人蔑視的政治上的渣滓。

“在警察恐怖籠罩之下，一股强大的民族力量产生了：这就是我們的党。在群众工作中，党已經获得了相当可觀的成果，但是党还应当并且要不断地加强它的行动。

“在你們的选区里以及全国範圍內，我們已經以你們的名义，扩大着物質上和政治上的互助和团結。

“你們放心吧，大家不会忘記你們的。你們的名字在标語上、在牆壁上不断地重复出現着。

“而且就从我們給你們送来的东西上也可以看出我們在各个地区正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在失業工人的运动中，我們的組織工作已經获得成功。

“在工会中，白蘭集团虽然得到占領者和維希的支持，但仍然害怕我們。

“在繼續开工的工厂中，我們的影响是鉅大的。

“受托辣斯公开支配的政策的牺牲者小商人，對我們同样抱着很大的同情。

“此外，我們已經具备了条件在农民中扩大我們的影响。

“最后，我們新近写了一封信給一个社会党的工人，并且也写了一封信給一个激进社会党的工人。我們号召我們的同志們起来进行工作，組織統一战綫、人民陣綫，爭取自由、独立、以及复兴法国的陣綫。

“由此可以看出，在我們的工作中，我們对斗争前途必胜的信心比以往更为加强了。

“我們深深因為你們和一切遭受敵人的迫害但仍英勇鬥爭的人們而感到驕傲。

“拿出勇氣來，同志們！不過，難道還需要向你們作這樣的叮嚀嗎？你們已經充分表現出堅定勇毅的氣概了。

“我們過去所進行的鬥爭是正確的。我們保衛蘇聯也是正確的。只有我們才採取了與法國人民利益一致的態度。當此人事混亂之際，我們是一支強大的政治力量，只有這樣一支力量，才能够把法蘭西民族聯合和統一起來，並引導它走向自由和獨立。

“衷心地擁抱你們。

莫里斯·多列士、雅克·杜克洛

一九四〇年十月一日”

此外還附着另外一份文件。是法國共產黨在法國人民中散布的一份復印的傳單。上面寫着：

“我們國家目前正經歷着由於政府的罪惡政策所招致的可怕的後果。這一個無能的政府應當對失敗和淪陷負責。

“一百多萬青年人和家長在戰場上犧牲或被俘了。千百萬人離鄉背井，悲慘地流亡轉徙於道途。無數城市和村莊被破壞。傷病者在醫院中受着痛苦。成千累萬的俘虜遠離了家庭，在焦急不安中過日子。龍鍾的父母和寡婦孤兒們為他們失去的親人而哀泣。

“被統治者出賣了的法國，遍體鱗傷，正經歷着失敗的慘痛後果。

“這就是达拉第、雷諾之流的政客，在腐化與被奴役的議會支持之下，領導我們所達到的地步。

“他們並不保衛法國真正的利益，相反地，他們為財閥的利益服務，取消了公共自由，肆行恐怖統治，壓制人民。

“他們企圖把槍口轉向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而不对希特勒作战。他們把作战物資运給芬蘭白衛軍，在叙利亞組織了一支由魏剛統率的軍隊，企圖侵略苏联的領土。

“如今事实俱在：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这个政策已經澈底破产并且禍国殃民到了什么程度。

“引导法国走向灾难的人們的責任現在可以肯定下来了。

“造成这种失败的統治集团得到了一切由于从事共同卖国勾当以及由于对工人階級和共产主义的仇恨而联合起来的党派的支持。激进党及其党魁达拉第、龐納、蕭当、希歇里之流，社会党及其党魁勃魯姆、塞洛尔、富尔之流，右翼党派及其党魁佛蘭亭、劳朗、賴伐尔、霞普之流，共和社会联盟及其党魁福羅薩、孟济、德阿、馬尔盖之流，法蘭西社会党及其党魁拉克、易巴內加雷之流，陶里奧的党徒們，窃据总工会領導地位的首腦及石烏、白蘭、杜茂蘭之流，各級參謀部以及貝当和最高軍事參議院中瞞天無能的將軍之流等等，所有这些人都应当对法国的苦难負責。

“全体被出賣的法国人民对这批負失敗責任的人們一致唾罵，这就是人民對他們的報復。

“由于这些人，法国的半壁河山被德軍占領了，而且如停战协定中所規定的，法国还要負担占領費用。

“由于这些人，法国人民遭受到淪亡的恥辱，而有無家可归之感。人民同样也看得很清楚：維希卖国政府違背全国人民的意志，依靠外力来維持其政权。

“然而，不可避免地这笔賬終久將要得到清算。劳动人民要求法国屬于全体人民，他們表达了全体人民要求独立的願望及其堅定不拔的永远清除这些导致灾难的卖国者的决心。

“在狂風暴雨之中，唯有我們偉大的共产党巍然屹立，忠

于它的和平政策，起而保衛法国人民的利益。

“在战争發生的第一个月里，当迫害降临到我們的头上时，面对着一切依靠战争而获利的投机者和腐化政客們，我們曾經在一封由共产党議員写給下院議長的信里，要求召开議會，討論和平問題。

“正因为如此，这些議員被关进監獄，判处徒刑；也正因为如此，成千成万的共产党員被投入死囚牢和集中营。然而不顧監禁、槍決的威胁，我們的斗士仍然英勇地繼續进行着斗争。

“从此以后，每一个法国男女都能够看清：如果共产党所提出的明智而有远見的建議被采納实行，我們的国家也許能够避免战争及其灾禍，然而法国的統治者拒絕了共产党的建議，繼續奉行其禍国殃民的政策。

“在去年五月德国發動大規模攻势以前，法国的政客和將軍們在国内对工人进行作战，并同时破坏生产，使战車、飞机的制造陷于停頓，用法軍的全部庫存供給芬蘭的反动分子。他們毫無預見，沒有做任何組織工作，第二帝国时代軍人們疏曠瀆职的罪惡傳統在他們身上复現了。

“就是这些政客和軍人出卖了法国，他們是不配得到任何信任的。

“只有一个政党看得很清楚，只有一个政党是正确的，只有一个政党既未受騙也沒有同流合污，只有一个政党具有斗争的勇气，这个政党就是法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党。

“法国目前虽然还是血迹斑斑，然而却希望过自由和独立的生活。法国人民希望按照自己的傳統和才干，自行解决由于有产阶级的卖国行为而引起的社会、政治問題。

“法国决不願听从維希冒險分子的摆布。

“像法国这样一个偉大的民族决不会遭受奴役。法国人民將會不願一切恐怖統治，知道怎样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他們对托辣斯巨头所蓄意进行的叛国行为的譴責，并向目前当政的集团表示人民要求自由的願望。

“受国际資本主义豢养的政客和軍人們借口保衛自由，將法国人民引向战争。今天，他們厉行專制統治，因为他們不願意向人民报告其所作所为，因为他們希望富豪們因战争的失败而致富，正如他們曾經借战争而發財一样。

“这种情况不应当存在，也一定不会存在下去！

“法国决不会成为殖民地一类的国家。

“有过如此光荣历史的法国，决不会在一小撮無惡不作的走狗面前屈膝。法国人民將要英勇地为自由而进行战斗。

“法国应当复兴，而且一定会复兴。

“法国应当复兴成为劳动和自由的乐土，而不再有奴役和貧困。法国將要再度成为一个偉大的工农业国家，完全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誰能够使法国得到复兴？这正是問題所在。

“能够复兴法国的决不是战败了的將軍，腐化政客，和發战争財的投机者們。他們擅長的只是叛卖祖国。

“决不可能在腐化的資產階級中找到民族复兴的因素。

“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偉大希望只有寄托在人民身上。

“只有团結在热情的、磊落大方的、由于未来屬於它而充滿信心和勇气的工人階級周圍，只有团結在正直、光荣和英雄的法国共产党領導下的工人階級周圍，才能够建立自由、独立和复兴法国的陣綫。

“为了拯救我們的国家，把祖国从那些导向灾难以及与侵



略者合作的人們手中挽救出来，我們号召被激进党所肆意蒙騙了的农民和穷人們、被勃魯姆和保罗·富尔的政党以及总工会的叛徒首腦們所牽引而追隨大資本家的社会党工人們、受教会显貴們所进行的信任無能的政府以及向万惡的侵略者屈服的宣傳影响的天主教工人們團結起来；我們号召一切希望法国复兴、希望法国从已經准备了摧毀一九三六年社会改革的成果的灾难的資本主义鎖鍊下获得解放的正直的法国人民團結起来。

“整个国家的團結一致是完全可能的。

“应当取得整个国家的團結一致——而且这种團結是可以立即得到的，从而才能減輕我国所受到的貧困与压迫的重担。

“在城市里，在乡村中，不論在什么地方，一切善良的人們，不分男女老少，都应当團結起来，組織‘人民團結互助委员会’，从而对难民、受苦者、退伍軍人、失業者、病人、受伤者进行救济，并在食粮沒有保証的大批村鎮中組織食粮供应，以及在‘个人为了集体、集体为了个人’的原則下，在全国範圍內，树立兄弟般的團結支援的風气。

“然而，为了有足够的力量医治創伤，应当动員国家的資源，沒收一切因战争而获致的利潤，对鉅額财产征收大量的税收；应当使进行盜窃的資本家們不能再进行破坏，应当把矿山、銀行、鐵路、瀑布以及其他大企業收归国有。

“应当只考虑集体的利益，而不應看到軍火商和在維希政府諸公卵翼下的人們的龐大利潤。

“人民有权利要求：他們的劳动应当使集体受到利益，而不是为了少数寄生的資本家。人民有权利要求：对于战争販子、發战争財的人、过去和現任的部長們、卖国無能的將軍們

对所有使国家陷于不幸的人们进行清算。

“人民有权利要求控訴那些应当对战争和法国的灾难負責的人们。

“人民有权利要求釋放一切政治犯，恢复全体共产党議員的职权，只有他們曾經保衛过法国的利益、共和国的利益。

“人民有权利要求取消一切解散政治、工会、合作社、文化等团体的措施，这些团体之被解散只不过是因為它們对卖国政策采取了敌对的立場。

“人民有权利要求恢复工会自由活动的权利，要求恢复被撤消了的劳資調解委员会代表們的职权。

“人民有权利要求：一切受到人民的信任、向人民报道真理、并因而受到查禁的报纸，有出版的完全自由。

“人民有权利要求承認殘廢者、寡妇、孤兒、以及牺牲了子女的老年父母們的神聖权利。

“受到战争灾害的人们有权利起而反对貝当和他的集团，因为这些人宣布国家是不会为战争受害者办事的。他們讓那些靠战争發財的人们繼續保留其从国家盜窃来的亿万财产而毫不过問。

“但是，人民应当依靠自己的团结和行动去爭得这些权利。

“由于当政者卖国投降的罪行，法国人民付出了这样高的代价；因此他們衷心希望能够在法国真正彻底的独立下，得到公正而持久的和平。

“只有在各国人民独立的条件下，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和平。因此共产党員們宣布法国有权利得到独立，并且組織爭取独立的斗争。

“而且，法国人民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对人民的仇視，法国

的当政者们走向了战争，并且准备进攻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点可以在甘末林和魏刚两人所交换的关于轰炸巴库与巴士姆的电报中得到证明。

“列宁和斯大林的苏联，这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和过去一样，始终是世界劳动人民的希望。

“一九三九年八月，我们起来反对诬蔑斯大林和平政策的人们，完全是正确的。今天，事实证明我们要求签订法苏友好协定，正是服务于和平和我国独立的事业。

“为了使法国复兴，保证法国的独立，保证人民的权利，并将我国从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就应当赶走奴颜婢膝的卖国政府，这个政府的首脑们曾经恬不知耻地对受伤者、难民以及丧失了一切的人们说过：‘国家对你们爱莫能助’。

“追随赖伐尔政策的匪徒，斯达维斯基派激进党员萧当，社会党员李维耶，法兰西社会党员易巴内加雷，以及其他腐化政客如福罗萨、马尔盖之流，强行通过了维希的反动宪法，以便把匪徒们的专政加在法国人民的身上。

“由于这些先生们所通过的宪法，言论、出版、结社、工会活动等自由便不复存在了，老战士的抚卹金与社会救济被取消，议员不再经过选举产生，而是由部长们任命。只有一个政党是合法的，那便是赖伐尔、拉罗克、陶里奥、萧当、福罗萨、李维耶及其同伙的政党，反动的政党。

“由于激进党与社会党的合作，只当才能够被任命为独裁者；而实际在幕后掌握全权的则是他的继承人赖伐尔。

“激进党和社会党的部长们完成其扼杀公共自由权利的工作以后，立即从舞台上退出，让位给反动分子雷末里、彼叶特里以及‘时代报’主笔米洛；米洛的这份报纸，正如过去盖德

所說的，是一份‘十足的資產階級報紙’。

“這一個由臭名昭著的投機者與腐化政客共同組成的可恥政府，給法國帶來了無限的羞辱。

“法國的勞動人民和民主人士們：這就是达拉第、勃魯姆及其黨羽所奉行的政策的後果，他們早在打擊法國共產黨的時候，便為摧殘共和國的自由權利做好了準備；由於他們的協助，貝當、賴伐爾、馬爾蓋、魏剛不久以前便成了法國的主人。

“然而，法國人民是不會任人擺布的。

“在城市、鄉村、工廠、機關和軍營里，應當形成一條反抗暴徒專政的自由人們的陣綫。

“讓維希政府滾蛋！讓大富豪和戰爭投機商人的政府滾蛋！

“法國所需要的完全是另外一種類型的政府。只要全國團結一致，這種政府就可能在明天出現。它將是民族復興的政府，它將由正直英勇的人們、由體力勞動者與智力勞動者所組成，它毫不受戰爭中各種罪行與陰謀的沾染。這是一個人民的政府，人民是它的力量的源泉，而且是唯一的源泉，人民的利益是它行動的唯一依據。

“這就是法國共產黨的主張，這就是法國共產黨在目前這一悲慘的時刻向法國人民所作的呼喚。法國共產黨號召全體人民團結在每個‘人民團結互助委員會’中；永遠不要忘記，只要大家團結起來，我們就能保證法國的自由、繁榮和獨立。

“資本主義制度是製造貧困、戰爭、剝削和腐化的根源，它已經在占地球六分之一的蘇聯被消滅了。在反抗資本主義制度的鬥爭中，在爭取全國統一與獨立的鬥爭中，我們將使法國復興。

“全世界勞動人民的希望、列寧和斯大林的蘇聯萬歲！

“法蘭西民族統一万岁！”

“自由独立的法蘭西万岁！”

“法国人民的希望、法国共产党万岁！”

“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府万岁！”

这样，我們的党虽然从一九三九年九月起便被摧殘共和国自由权利的人們宣布为非法，遭受着殘酷鎮压，但却依然在最艰困的时刻里，以不可克制的力量，为了反抗法国所遭受的民族压迫，反抗为侵略者效力的卖国賊們，进行了無情的斗争。

因此，我們能够滿怀着希望和信心来展望未来。

应当对法国人民的灾难負責的人們，也就是現在將我們投入監獄而不肯釋放我們的这一批人，遭到了普遍的譴責，并以瀆职、投降、卖国等罪名公开受到控訴。

通过这种方式得来的消息，使我們增加了作为共产党员在行动中的勇气、耐心和坚毅，并且增强了終于有一天我們会得到昭雪的不可动摇的信念。

此后不久，我們又得到了关于我們党的行动的其他好消息。

不过这一次为了給我們傳遞消息，幽蓮特·法戎險些失掉了自由。

我們中間不少人生病了。

阿尔培·柏蒂吐过血。監獄的医生亞薩克，一个老法国社会党员，拒絕將柏蒂轉送到医院去，也不肯給他任何医疗照顧。普拉晒的貧血症一天天加重，白利奧茲体重減輕了二十多公斤，馬戴尔成天感到难受。

我們的伙食愈来愈坏。扁豆、米飯、豆子、番薯漸漸看不

到了，代之而来的是几叶白菜，几小片胡萝卜和紅萝卜。每天的兩頓湯事实上只是白开水。沒有肉，沒有任何帶脂肪的食物。面包成了最主要的食物。我們的口粮每天由規定的五百公分降到三百公分。

收受包裹現在是严格禁止的。我們全体餓得發慌，日日夜夜都感到飢餓所引起的生理上的痛楚，胃里餓得直抽癢發痛。大家慢慢地消瘦了，有的人甚至日見衰萎。郁闷不适和疾病愈來愈多，加以冬天来得特別早而且特別冷，因而情况更为严重。这年冬天冷得厉害，溫度始終在零下二十五度以下。

我們虽然逐級一再提出請求，然而始終得不到答复。我們的精神虽然始終很好，但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損害。最后，看守長終於准許从外面給我們送来一个药包。

幽蓮特·法戎游泳通过舍尔河，穿过分界綫，現在暫時留在勒浦。当她来探望我們的时候，答应給我們第二天帶一个药包来。

她在小包的封皮中，塞进了几張写着非常小的字体的紙条，几張秘密出版的报纸以及在本地散發的傳單。不幸这些全被發現了。如果被告發的話，她至少也得坐五年監牢。

艾蒂安·法戎被傳呼到監獄的領導方面去。我参加了他和典獄長以及會計的談話，这些犯禁的文件原来是由會計發現的。他們預备怎样处理呢？这两个獄吏会不会由于互不信任而向檢察官告發幽蓮特·法戎呢？他們兩人將我們大大訓斥了一頓。不过他們只做到这一步为止，並沒有声張。他們很清楚：告發幽蓮特·法戎就等于把她打發到監牢里去，而他們还不想干这样一樁坏事。

勒浦的总檢察官是一个声名狼籍的卖国賊，叫做貝尔納，

法国解放之后以叛国罪行被槍斃了。他是一个殘酷的反共分子。我們到达勒浦后一个月，他曾經出乎意外地來訪問过我們的牢房，当时他的反共情緒表現得非常明显。

当他走进我們的大牢房时，我們很有禮貌地按照規矩站起来，脫下帽子。可是这位長官的样子却不很禮貌。他为了引起我們的注意，叫了一声“里面的人站起来！”这一声叫喊和他职务的庄严有些不大相称，活像是古德林所写的“欢乐的騎兵队”中已經成了家喻戶曉的主角副官傅利克的口吻。他在我們中間走过，帽子也不脫，高視闊步，說話的神情非常高傲。

他大言不慚地說：“我是檢察官”，接着用不容反駁的語气加了一句：“沒有什麼要求嗎？”

我們当然有要求，既有有关監獄行政方面的要求，也有有关政治方面的要求。我們要向他提出的是政治方面的要求，因为他是維希賣国分子的所謂“政府”的官方代表。

但是，正当我們开始历述我們的要求时，他隱約表示我們应当对目前的灾难負責。我們当然不能放过这样的惡意造謠和侮辱。

如果要报复的話，由他去吧！我們自知对祖国曾尽过力量，有責任給他以有力的駁斥。我們的反駁如下：

“不，先生，你錯了。法国之所以陷入目前这样悲慘的境况，应当由你的主子們負責。他們給我們橫加罪名，把我們投入牢獄，其目的是为了轉移群众的注意力，以掩飾他們的叛国罪行。这批应当对灾禍、毀灭、屠杀負責的人已經卑怯地逃走了。他們裝滿了自己的腰包，而我們則囊空如洗，可是我們始終是正直無私的。

“他們要保衛的只是自己的特权，而不是法国的真正利

益。事实，全部事实，先生，一切已經發生的事件，先生，毫無例外地全都證明我們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政者們不但不听取并實現我們在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信件中提出的建議，反而將我們投入監獄，并且使法国陷入冒險的危險境地。

“全体議員在表決通過撤銷我們的議員資格的時候，就等于贊成了这批当政者的所作所为。先生，這就是我們的看法。你尽管去報告吧，向那些收買你的跳躍一時的人去報告吧，這對於我們完全沒有什麼關係。而且，我們還等不到你去告訴他們，我們已經把我們的看法寫給他們了，不過他們沒有答復我們。至于你，先生，我們倒想知道你到監獄來，究竟是為了視察？還是僅僅為了來侮辱我們？”

“如果是第一種情形，那麼你就有責任仔細聽一聽，把我們的要求記下來，并且把我們請求享受政治犯待遇以及恢復自由的要求轉給有關當局。如果是第二種情形，那麼我們便只有向你這種不可容忍的態度提出強硬的抗議，而且要向你這種人表示共產黨議員的蔑視。我們正是作為共產黨議員，為了堅持我們明智的愛國主義、我們的正直、以及我們英明的正確的全國性政策，才在目前犧牲了自由和健康，在身心兩方面都受到折磨。”

這位檢察官大吃一驚，簡直吓呆了，支支吾吾地不知道說了些什么：

“但是，先生們……不過，先生們……是的，終於……我們將來再看吧……”

貝爾納就這樣打了退堂鼓，退到門口，嘟囔着溜走了。

当他走出監獄時，他發現鐵路的斜坡上坐着一群人：瑪塞勒·高納凡、珍曼·高索諾、丹尼絲·克羅阿查、奧古斯汀·羅哲萊，還有兩個小孩：讓·巴托里尼，索朗芝·克里士多福。



这位令人作呕的角色向他们开口了：

“好哇，太太們！你們选了这样一个凄惨的休息地点。監獄可不是什么好選擇的地方。”

她們反駁說：“可是，先生，这是我們最好的地方，因为我們的丈夫都在这兒，就关在这所監牢里。他們都是共产党議員。”

檢察官回答說：“他們是一群流氓！”

兩個字不約而同地来到了她們的嘴邊：“混蛋！”

不用說，我們無法將这位十全十美的維希代表的流氓态度报道給外面。这位先生和他的同道以后还有和我們打交道的机会。

三月二日，一个星期日，卖国賊貝当到勒浦来。他这次出巡使省長和檢察官在全境發动了大規模的搜捕。头一天星期六，男男女女几十人被逮捕送到勒浦監獄来。应当使貝当得到保护！

卖国賊貝当首先將在勒浦大教堂受到隆重的接待。

在放風場的最高一道梯級上（放風場的形狀通常是梯形的或是直角三角形的，边長約四至五公尺，寬約二·五至三公尺），踮起脚尖来，可以看見勒浦大教堂。

再远一些，在聖密舍尔山上，矗立着一尊巨大的銅像，重八十二万五千公斤，高二十二公尺，周圍十七公尺。这尊像是聖母瑪麗亞，怀里抱着聖嬰耶穌。眼力好的人还可以看見来来往往的居民和游客。

在主教节杖的指揮下，一队教徒拿着十字架和旗帜，唱着讚美天主的頌歌，高声欢呼，到最近的一个十字路口去迎接这位祖国的头号掘墓人。主教头上戴着高冠，左手拿着法杖，右手祝福，手上戴着紫玉戒指。可是当局不讓我們看見这一队

宗教行列，并以書面命令通知監獄長，在四十八小時內，我們一概不得放風。

共產黨員們被監禁在和教堂相距一公里的地方，他們的存在使得行政機構、教堂和這個老混蛋感到侷促不安，雖然有成百上千的警察和自衛隊完全圍繞着他。

對於這一點我們頗感欣慰。因為這不是力量強大的表現，事實上這只是表明他們的軟弱：上面看來是一尊巨人，而下截却是泥土。他們所採取的這一切措施，即使是最荒唐可笑的，都給我們証明了法國共產黨的行動是有成效的。

我們受凍挨餓，但英勇地忍受了一切匱乏、一切限制、一切困難。在法國所有其他的監獄和集中營里的情況也都是如此。

丹尼埃·勒努爾從居爾集中營來了一封信，告訴我們，在那邊政治犯和人肉販子、妓院老板、各種普通犯人關在一起，但他們表現了無比的英勇气概。

勒努爾的來信說：“我們在居爾、在雄偉的比利牛斯山下這一片沼澤地帶的高原上所遭受的一切苦痛將來是否會大白于世呢？”

“最先在這裡受難的是西班牙的共和軍。他們為自由和獨立而進行鬥爭，保衛了法國的安全，而當時我們的政府卻按照希特勒的方式來感謝他們，把他們關在鐵絲網內，關在極不衛生的集中營里，在這兒他們成百成千地死去了。

“現在輪到我們了。就在這同一個營里，我們既不能被人探望，也不能放風，不能收到包裹。這裡的伙食壞透了，我們的健康因此大受影響。

“不過”，他接着說，“我們進行了反抗，我們以集体的力量反抗敵人，反抗這批屠夫。

“但願有一天，就在这兒，在这塊布滿古老的木屋、成千上万的人遭受苦难、被迫閑散的地方，劳动会使有益于人类生活的产品从肥沃的土地中涌現出来！”

“在劳动和自由中得到幸福，这是我們大家的願望。为了你，为了你們全体，为了我們全体，我們抱着这样的願望。这也是为了一切沒有参与削弱我們偉大国家光荣的勾当的全体法国男女所抱的願望，他們对法国人民以及人类的命运充滿了信心，昂着头‘走向生活’。”

面对着生活前进，在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英勇無畏的战士們一道，重新参加爭取自由的斗争——这就是我們朝夕憧憬的夢想。

为了实现这一夢想，我們努力地工作着。

有一天，是十月三十日，儒勒·杜蒙通过我們之中的一个近亲，告訴我們他到了勒浦，并且給我們送来了几件毛絨衣。儒勒·杜蒙过去在西班牙內战中曾經指揮过一个法国联队。他是我 oldest 的朋友之一。他曾是我年青时候在盧貝的伙伴。兩年以后，在一九四二年，他英勇地牺牲在希特勒行刑队的槍彈下。

通过杜蒙以及其他同志，我們和南方党的領導接上了关系。我們制訂了一个越獄計劃，外面的同志并且保證給我們援助。十六人共同越獄在我們看来似乎是一件不可能成功的事情。經過全体同意，我們指定了准备越獄的同志，并开始进行工作。

但是，一樁不由我們自主的事件突然打乱了这个計劃。三月二十五日中午来了一道出發的命令。兩小时以后，在数目和犯人相等的自衛队監視之下，我們离开勒浦，轉移到一個不知名的地方去。

## 第二十章

### 流放途中的艰苦生活

一輛被征用的大游覽車把我們載到了勒浦西面三十公里阿里尔河畔馬尼斯特罗地方的一个小火車站上。

維希当局無論如何也要設法避免我們在省会上車。毫無疑問，他們惧怕群众向我們表示同情。我們的轉移應該尽可能在不被人發覺的情況下進行。維希当局至少是这样想的。这便是为甚么他們選擇了一个小鎮作为上車的地点，并使該地实际上处于戒严状态。

所有通往小鎮的入口，所有通往車站的道路，都被成群背着槍的宪兵給封鎖了。禁令是森严的。所有的过路人都得拿出身份証来給他們檢查。只有車站区回家去的居民才允許通过。其余的一切人都被粗暴無情地赶走了。除了持有車票的旅客以外，誰也不許留在候車室和月台上。

然而，这种类似战斗的准备以及集中警察力量的行为，适足以自然而然地激起所有居民的好奇心。自从知道我們將要到来的消息以后，一大群人便会集到一个小山坡的草地上来，从那兒人們可以看到車站所發生的一切。

我們沿月台排成一行。也許在他們看来我們都是些特別危險的坏人，因为为了保护本鎮起見，竟需要动員如此大量的宪兵队。他們向我們指手画脚。他們是把我們当作間諜、杀人犯和盜窃犯呢，还是已經确实知道关于我們的消息呢？他

們交談的熱烈神情使我們相信他們已經知道了正確的消息。

我們是多麼想向他們揮手，跟他們交談啊。但這是不可能的。我們被監視得太嚴密了。車站上有幾個旅客，但他們被限制在遠離我們的月台的兩端，像要被裝運的行李包裹似的。在列車中部給我們預備了一節三等車廂。於是開車了！

第二天早上將近七點的時候，我們到了馬賽車站。幾百名自衛隊和憲兵排成雙行，持着槍，上起刺刀，穿上作戰服裝，立正站在各個月台上。沒有一個旅客。只有零零星星的幾名鐵路工人、搬運工人和值班的郵差。

我們剛走上月台，每個人便被兩名自衛隊左右挾起來。我們被押往出口，每人前後相隔約五、六公尺。到達車站的廣場上時，我們走進了一個陰森森的境地。到處都是穿黑衣服的人。數不清的密密的一群警察，有的穿着制服，有的穿着便衣；整排整排的憲兵；這些都使人相信為了執行一個非常緊急的護送上船的任务，把馬賽區的全部武裝力量都給動員起來了。

三輛小軍用卡車等着我們。他們叫我們上車，或者不如說他們把我們很快地推上車去，為的是尽可能使我們不被少數在場的群眾看見。但是皮佑是馬賽區選出的議員。鐵路工人，車站搬運工人和郵差們認出了他。他們勇敢可嘉，毫不遲疑地揮手喊叫，向皮佑打招呼。

在武裝摩托車隊前呼後擁之下，我們向海港的方向進發，經過一段坡路，到達了聖尼古拉堡軍事監獄的門口。

經過辦理移交，交卸了這批編號的貨物之後，獄門一啓一閉，我們便走進了監獄，精確一點說：走進了一個軍事監獄。成群的看守注視着這批貨物。他們中間有一個人走近我們，這是一個軍官。他向我們說道：

“這兒一切都得聽從命令！別忘記這是軍事監獄。不准反抗，否則就會夠你們瞧的！在這兒要安靜，一句話也不准講；你們只有服從。好吧，兩人一排，跟着我來！”

經過一個大院子，一扇大門，又一個院子，幾道狹窄的樓梯，一層，兩層，三層，於是我們登上了一個平台，從這兒可以看見馬賽的港口和加德聖母院。

“向右轉，看齊！把口袋掏光。把背囊掏光。不許帶小刀或其他刀子。這是甚麼，拿出來看看。把它放在地上！現在，到這兒來！”

我們跟着帶路的人走，在一所大的建築物前停下來。正是這兒，看起來像是一間會議室，室內可以容納將近一千人。最里面靠牆有十六個草墊。這是給我們的。最後一道命令：

“要特別安靜，別叫人聽到你們的聲音！”

看守離開了。一個鐘頭之後他又回轉來。我們多麼驚訝啊！和他一同來的有幾個犯人——他們通常被稱為雜役。他們是送湯來的。然而這回我們遇到的却是一些特別的雜役：他們是被囚禁的共產黨員。

背着看守的時候，他們向我們揮手致敬。看守瞧見了，教訓了他們一頓。他用力咆哮。即使在監獄的另一端也可以聽到他的聲音。

“出去！別讓我再抓住你們！”

看守和他們一道出去。當雜役走遠了的時候，他退回來並且走近皮佑，向皮佑低聲說了幾句，遞給他一些東西。然後他又重新用很高的嗓子命令我們應該安靜，不要做聲。皮佑微笑了。最後，看守走開了。皮佑打開了那些馬賽出版的報紙。

第二天，這個看守答應把我們到達聖尼古拉監獄的消息

通知我們的家里。他履行了諾言。后来把我們离开此地以及解送地点告訴他們的也正是他。他每天通过馬賽的各种报纸供給我們以精神食粮，并且使我們与其他被囚禁的共产党员取得联系。

一天，當我們在堡壘的最高处靠近堞口的地方放風的時候，我們听到了一阵歌声。有風琴伴奏着。我們張着耳朵，探着头，想找出这首讚美詩究竟是从那兒傳来的，因为听得出这是一首讚美詩。

教徒們大声地唱着：

仁慈的上帝，  
人类的保护者，  
我們用耶穌聖心的名义，  
請求您拯救羅馬和法国！

值班看守替我們解破了这个謎。

原来監獄牧师把全体最好的歌唱者集中到獄中小教堂去了，他正在那兒教他們練唱：

仁慈的上帝，  
人类的保护者，  
我們用耶穌聖心的名义，  
請求您拯救羅馬和法国！

說到仁慈，在法国講来，只不过是劫掠、監禁、判罪和恐怖而已。

說到保护，这位上帝竟讓天主的長女<sup>⊖</sup>倒下不管，而且羅馬和梵蒂岡还保护着人类兩個最大的蠢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

正是如此，他們所想要拯救的法国，他們叫囚徒們祈禱上

---

⊖ 法文“天主的長女”意即“法蘭西”。——譯者

帝加以拯救的法国，是指貝当的法国，賴伐尔的法国，合作分子的法国，劊子手們的法国。

这并不是真正的法国——不是屬於人民的、不是正在为了从侵略者和貝当的走卒們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而进行斗争的法国。

看守聳了聳肩，他用指头敲敲自己的前額，讓我們知道这些全是瘋子。他的說法是更直捷了当的。

馬賽的人民并不拥护貝当。他們忍受着貝当所給予他們的痛苦。共产党在这兒的势力还是很强的。法国共产党的口号深入各个阶層之中。人們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人們都相信共产党。負責監視我們的聖尼古拉監獄的看守們的态度便是一个例証。他們向我們表示同情，給我們帮忙不少。

达拉第、賴伐尔、德阿、貝当之徒每日無恥的宣傳，既沒有能够摧毀絕大多數法国人民的民族意識，也沒有能够摧毀他們共和和民主的情感。这是一个不可否認的事实，因为即使是在这鎮压人民的機構里，對我們也表現了这样多的善意。

在聖尼古拉軍事監獄里繼續待了几天之后，我們便与馬賽地方党的領導取得了联系。

我們在二十一日到达聖尼古拉堡，二十九日便离开此地了。兩人一排，手靠着手地帶上手銬。直到上了碼頭，我們才知道是要流放到非洲去。也許我們將被放逐到一八五二年拿破崙第三曾經流放过共和主义者的同一个地方去！

在押送我們的宪兵当中——一共有二十来个人——有些人是此次特地从馬賽宪兵队之外仔細挑选出来的。他們与其他的宪兵不同。其所以当选是由于他們的粗暴、殘忍、惡声惡气和善于折磨人。他們的首領是一位很漂亮、傲慢、粗鄙而且經常口不離罵声的上尉。他們每个人都是全副武裝：步槍加



上左輪。

我還沒有弄清是怎么回事，就已經上了西第·布拉因号輪船。我是被宪兵推上去的。他們以極快的速度把我們押下樓梯，我們全体都下到缺乏空气和陽光的艙房里。有一些被判处終身强迫劳动的普通匪犯和我們处在一起，他們同样帶着手铐，但却被宪兵們認為要比我們好得多。

橫渡地中海的航行开始了：这一段航程將經過三十六个多小时。我始終沒見過陽光，也沒有看見过海面。當我們到了大海中間的时候，宪兵上尉来看我們了。四个宪兵伴隨着他。他沒有对那些匪徒們講話，他对他們相当尊重，但却向我們粗暴地訓示道：

“喂！那边的那些共产党員們，我預先告訴你們。看看我这兒”，他从槍套里取出手槍来，“这是替你們准备的。你們中間誰要有一点逃跑的企圖，就賞他一顆子彈而不給任何警告。”

宪兵們冷笑了。在航行途中，上尉几次跑来對我們凌辱謾罵，并且每次都以挑衅性的恐吓作結束。

有一次我要大便，請求上廁所去，但却被踢着肚子赶下樓梯来。可是这位从来沒有上过前綫、也毫無疑問除了用皮鞭抽打他的馬匹和抽打因爱国罪而被囚禁的共产党人以外便沒有干过別的事情的上尉先生，却沒有估計到船上还有水手：馬賽的海員們。

一个矮而背駝的名叫多米尼格·克罗斯的船員和他的助手，假托檢查安全問題說要視查船艙。上尉知道后想加以阻止，可是他當場被狠狠地教訓了一頓，受到了作为一个劊子手所应当受到的“隆重”待遇。

“干你自己的那一行去吧，先生，我們有我們自己的事

情。”

“但是，我对这批流氓——这是这位上尉称呼我们的比较温和的字眼——负有看管责任。”

“好极了”，克罗斯回答说。“可是我要照顾整个轮船。我负有保证全船安全的使命，而没有必要接受你的任何命令。现在我要执行船长的指示。除了船长以外任何其他人的命令我都不接受。”

上尉终于退步了。这位漂亮的上尉先生虽然骂了一千声上帝也不抵事：他必须让步。他让步了。于是那位矮而背略驼的海员带着他的助手下舱到我们中间来。他装着好像是检查电线似的。

接着，他离开了我们，同时让几包香烟和一张纸条落下来：“别担心，我们就回来。”就这样，即使是在西第·布拉因号轮船底层，在舱房里，尽管黑暗重重，一缕光明也射了进来。

上尉把我们当作罚充苦役的囚徒看待，而马赛的海员们却时时用同情与友谊的言语给我们带来安慰。我们并不孤独，有人关切着我们这批共产党人。

自然，政府并没有给我们准备任何吃的东西。我们离开圣尼古拉堡军事监狱时没有丝毫给养，连一小块面包和一滴水都没有。不过克罗斯履行了诺言，他重新来过。由于他和他的助手，我们才弄到了吃的东西，甚至还可以喝到一点酒。

三十六小时的渡海航行之后，我们到达了阿尔及尔港口。全部旅客已经登陆好几个钟头了，而我们始终被关在舱房里。难道我们只是路过这儿暂时停泊一下吗？

最后，上尉下令叫我们到甲板上去。天已经黑了。我们两个两个地被手铐铐着，他让我们从扶梯下到了小艇上。这些小艇在海军司令部前靠岸。两次点名之后，我们被带到室内。

一小时过去了，开来了一輛大的游覽車。車停下来，我們爬了上去。在我們看来，毫無疑問这是开往阿尔及利亞南部去的。但是行不到一公里便停了下来，他們命令我們下車。

我們被关在阿尔及尔軍事監獄里，这兒从前是販賣阿拉伯奴隶的市場。我們被关在陰暗的房子里，这兒永远是黑暗的。在这种牢房里我們从来沒有入睡过。我們被各种各样討厭的虫子咬着：包括跳蚤、臭虫和虱子。我底足踝、膝蓋、腰部、頸子、双肩、手肘和手腕上全都起着一圈圈豆子大小的疙瘩。飲食是些坏透了的、不能入口也不能消化的东西，而且是盛在从来沒有洗过的同时在厕所里使用的生鏽的盆子里。要想吞下每一口發臭和令人噁心的菜湯，非捏着鼻子不可。这些东西引起了我們剧烈的胃病和腹瀉。我們因此而發着高烧，倒了下來。

四月二日，被囚在瓦稜薩監獄的同志們，在聖尼古拉監獄停了二十四小时之后，也來到我們这里。这时我們打聽到在監獄院子的另一边，关着一些戴高乐手下的飛行員。

一天晚上，他們唱起馬賽曲來。我們用“出征歌”<sup>⊖</sup>和“青年近衛軍”來回答他們。監獄當局非常慌張。大小軍官和守衛的士兵們都要求我們安靜下來。但毫無效果。最后他們等得很不耐煩，沒有懲罰任何人就躡走了。在這兒，也同樣地有朋友，有同情者和愛國人士。

此外，監獄里還充滿了政治犯：包括突尼斯、阿尔及利亞、甚至摩洛哥的共產黨員。我曾經在醫務所（為了給我一些簡單的治疗，獄方不得不把我抬到醫務所去）里碰到過幾個政治犯并會和他們握手。他們的情緒非常高。他們向我們保證沒

⊖ 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時代的愛國主義歌曲。——蘇聯編者注

有任何东西——他們已經受过了不少严酷的考驗——曾經使他們低过头，也沒有任何东西能使他們走向怯弱或者屈服，当然更不用說投降了。他們中間很多人还在待質期間，不久就要被帶到軍事法庭并被判处死刑。他們依旧是共产党员，忠实于自己的党，并因为自己是共产党员而感到驕傲。他們的态度給全体犯人以强烈的印象。那些戴高乐的士兵們满怀敬意地向他們打招呼。

他們將怎样处理我們呢？罗哲萊把他来到阿尔及利亞的長途旅行中的細節告訴了我們。他給我們介紹了巴柏魯斯監獄和麦宗·加萊的苦役營。他在那些地方待过很久。他認為未来的事情不妙。从我們在軍事監獄中所經歷的日日夜夜来看，前途非常黯淡。我們积蓄着勇气和精神上的抵抗力，这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們的健康早已經被勒浦監獄飢寒交迫的生活大大削弱了。两个月以前，已有一批阿尔及利亞的共产党员被关在这兒比我们更坏的囚房里，沒有空气，沒有炉火，也沒有光亮。我們同样也准备在这个古阿拉伯奴隶市場里停留几个月。但是，四月五日我們便离开了这个監獄。

我們帶上鎖練手鐐，兩人一排，乘上軍用小卡車，由一些規矩有禮甚至很懇懇的宪兵看守着，穿过了阿尔及尔。

“瞧”，罗哲萊對我們說，“我們正向胡山·岱方面行駛，那么，也許是到麦宗·加萊去。”

的确，一小時半以后，我們便来到麦宗·加萊的一大片監獄中了。自从圭亞那的苦役營撤銷之后，這兒便集中了所有的流放者。这是一所有兩層白色圍牆、白色建筑物和白色伊斯蘭教寺尖塔的大的方形監獄。前院里有花坛，花坛周圍是正副典獄長、看守長的住宅和文書室、會計室等各种办公室。

我們排成一行，經過兩度点名，大門打开了，我們走进了

所謂監獄內部。在監獄最里面，有一幢與周圍完全隔絕的房屋。一塊綠色油漆牌子上寫着下面的白色字樣：“政治區”。

我們非常高兴。“政治區”在我們看來立即成了“政治犯待遇”的同義字。看守長走在我們前面。經過一個小的院落，於是我們便進入了這個政治區：一個四十公尺長和十公尺寬的院子，在房屋的兩端，一邊有一棵樹，右邊有一座房屋。我們一共是二十七個人，這兒並沒有這樣多的牢房。他們給每間牢房里扔上兩塊草墊，如果把兩塊草墊并排擺着，就很難放下了。

有十八個人這樣安置下來了。我所屬的後九個人住在一個四公尺見方的屋子里。我們已住入“政治區”了。第二天，我們就會領略到關於所謂政治犯的待遇，那便是即將開始的苦役營的生活。

## 第四部

### 第二十一章

#### 非洲的麦宗·加莱苦役营

我們在麦宗·加莱苦役营的生活是以一次入獄檢查开始的。看守叫我們二十七人排成一行，立正站着，典獄長、副典獄長、看守長等以上級的身份远远地監視着。

我們这一部的門开了，来了一位穿便衣的先生。这是本單位的医生，名叫黎夏。他做出一副仿佛部队檢閱人員的样子在我們面前走过，就好像在正准备参加檢閱的部队前面走过一样。接着他又走回来，为的是要和我們每一个人个别談話。他說他想要知道我們的健康情况。

我們的回答势必完全相同，因为我們全都由于菲薄的伙食和疾病而憔悴不堪了。他心不在焉地听着。他很匆忙。他的主顧們在等着他。他的時間很宝贵，决不能讓人耽誤。

輪到柏蒂了。在勒浦監獄时，他曾大量地吐过血，現在瘦了很多，正患着長期的干咳症。他想把这些告訴医生，但立即得到了粗暴的回答，簡直沒有再加分說的余地：

“好了，好了，將來再看吧。不过，我老老实实告訴你，在這兒，我并不歡迎你們这批搗蛋的家伙。我認为，你們到麦宗·加莱并不是为了治病，而只是为了洗刷你們的罪名。就是这么一回事。如果你們以为可以把这个機構当作疗养院的話，那你們就錯了！此外，如果你們不了解这一点，我把它向你們

交代清楚。像你們这般东西，在德国，人們是用整个車廂往墳場里拖的！”

对于一种如此可惡的言論是不能默不作声的。它激起了我們二十七个人激烈而勇敢的連声抗議。全体看守都大吃一惊：到这兒才二十四小时，这班新来的囚徒居然表現得如此頑固！你們就会嚐到滋味的！我們嚐到了这种滋味。他們粗暴地強迫我們保持安靜，并且在一陣暴風雨般地咒罵与威吓之下立即把我們帶进了牢房。我們被当作普通犯人看待，和被罰苦役者、积犯与流放者囚禁在同一个監獄里。我們受着与他們相同的待遇。

流放者的生活开始了。我們將度过漫長的岁月，关在監獄內最偏僻的地方，与外界割断一切联系，吃着像餵狗一般的食物。我們既無刀叉，也沒有桌椅、板凳和床鋪。只有一个鋪在地上、滿是虱子臭虫的髒草垫子供我們用来过夜。

如果要問麦宗·加萊監獄的管理制度究竟如何，只需要一樁事情就足够把它的特点說出来了。犯人的实际數額是一千二百人。但是，每月平均死亡九十人。一年的工夫，全部犯人都要被死亡剿灭干淨。

离我們这部分最近的房屋是医务所。每天整整二十四小时以內經常听見的不过是一片呻吟，間或夾杂着垂危时的叫喊和喘息：麦宗·加萊苦役營簡直是死亡制造所。犯人死亡愈多，監獄当局便愈發財。有多少死人，便有多少額外收入。

为了抵銷我們生理上的亏损，我們就更需要用勇气来武装自己。我們是在敌人的掌握之中，并且要听任他們摆布。要想挽救与支持我們自己，只有求助于紧密的兄弟般的情誼、誠摯的友情和相互間的忠誠。这些东西早就有了，而且永远不会間断。我們二十七个人团結得像一塊鋼鉄。

折磨和报复除从这块鋼鐵上引起頑强反抗的火星之外，再也得不出別的结果。在这塊鋼鐵上面，从来沒有过裂痕和間隙。它是不可动搖的。

我是第一个被严重的疾病所伤害的人。这场病是从右手指头上的一点湿疥开始的。这本来算不了甚么。在平常时期，一点起碼的医疗就可以很快地制服它，使之好轉。但是，我从来沒有得到过医治。毫無衛生設備，沒有酒精，沒有乙醚，沒有消毒劑，沒有葯劑，从来不給包紮。沒有任何治疗，不管是外服还是內治，是局部的还是一般的治疗。因此，我的健康情况日趋惡化。

我的兩手和右脚都不能活动了。湿疥轉变成非常疼痛的周身性瘡疽：發臭、浮腫、靜脉發炎，且發着令人憔悴的高燒。很長的時間內我躺在薄薄的草墊上不能动弹。不能自己吃飯，也不能大小便和梳洗。只得經常靠难友們的帮助，他們的牺牲精神是沒有保留和限制的，并且是受深厚的友誼所支配的。

我向監獄当局提出了無数次的要求。他們仍然充耳不聞，一声不响。因此我决定向阿尔及利亞总督——維希卖国“政府”的正式代表提出強烈的抗議。我自己不能执笔，因此便口授我的抗議書的大綱，由白利奧茲执笔。

一开头我使用国际紅十字会活动所根据的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原則提醒这位总督。我指出直到一九三九年九月，直到宣战的时候，法国各届政府，不問其政治派別及組織成員如何，一律是不仅真誠地尊重在这一人道主义組織支持下由世界各国所一致締結的各种国际協定，并且还認為慷慨地执行各种協定的全部条款是自己的荣誉，这种慷慨精神正是法蘭西民族的特点。接着我要求总督坦白、直接、而且毫不虛伪地告訴我，是不是維希“政府”已經断然与人类文明中的法蘭西傳



統判斷了联系，以及他是不是已經決定不給予法國公民以甚至对在戰場上受傷的最殘忍的敵人尙且給予的醫療，而這些公民所仅有的罪名不过是曾經一貫地按照民主和愛國主義的光榮法則進行了活動。

“如果在你的良心深处还有一点兒人道情感，那就請拿出來吧——我們對他這樣說——并且立即給你的下屬發出必要的肯定的訓示，以便我和我的同志們終于能够得到治療，能够在經過二十個月困苦監獄生活之后，在精神与肉体备受痛苦之外、还在流放时被关在一艘挂着三色旗的船只的底艙里因而羸弱不堪和極度疲勞之后，得到必要的治療。否則，就請不加粉飾地告訴我們，說你依照你的上級的命令，已經決定采用甚至对任何战俘尙未采用的方式，讓我們慢慢地死去。”

但是總督仍然裝聾作啞，不予答复。于是我決定把健康不良的情況告訴家里。

我們當時仍然受越境明信片郵務制度的限制。我在明信片的空白處寫道：

“我患嚴重的濕疥。并無轉机。收到过你和孩子们的消  
息。高兴你从四月二日便知道了我的所在地。我們全都关在  
特別區里。伙食比在勒浦还坏。請告知我兄弟雅克。”

監獄當局通知我，拒絕將這封信寄給我的家里。并且告  
訴我所以如此決定的理由是因为明信片中出現了下面的句  
子：“我患嚴重的濕疥”，“伙食比勒浦还坏”。在這些句子下面，  
他們特別用藍鉛筆划了一條粗綫。這真正是一種專橫、無恥  
的虐待行為。因为在明信片中只包含我个人情況的实际报道，  
而且是完全与事实相符的。它只是把我自己的遭遇告訴我妻  
子和我的孩子們而已。

自从法國有了被一條分界綫所隔开的兩個區域之后，我

写过几十封像这类性质的信。都曾被各个监狱的看守长和典狱长所接受，并由他们寄发，全都到达了目的地。

但是这兒，在阿尔及利亚，在这位曾经自称“我憎恨谎言”的“国家元首”的桎梏下面，为了获得批准与家中通信，竟必须向自己的老婆孩子撒谎。这只是维希政府的可耻行为之一。而且在这一方面，这还不是仅有绝无的一次，因为在通知我说这封越境明信片不能寄出的同时，监狱当局并告诉我，有两张从家中寄来的明信片不能交给我；这两张明信片是从巴黎寄往勒浦监狱又转寄到麦宗·加莱来的。

在第一张明信片中，我女儿向我表示了她作为孩子的感情。她祝我具有信心与勇气。这已经写得太多了。监狱当局不许可一个受过“应尊重自己的义务”的教养的年轻的女孩子向她的父亲说：“我爱您并且在您受到残酷考验时用我的爱来支持您。”

在第二张明信片上，我妻子告诉我她已经知道了我动身到非洲来的消息。她向我表示她的愤怒和痛苦。她向我保证，虽然遭受了意外的打击，但作为法国人，作为妻子和母亲，她将能忍受这凄惨的别离，并且她将在思想上和我站在一起，以便协助我勇敢地战胜艰苦的流放生活。这些话也在被禁止之列。

因此，我们便无法把按照自称为维希政府没有心肝的匪帮的命令加在我们身上的苦役营的生活，告诉我们的家人。这个政府希望看着我们死亡，而绝对不让人知道。没有医疗照顾，没有有营养的食物！在勒浦监狱的九个月里，我们所吃的伙食已经对我们的健康产生了很不好的后果；而麦宗·加莱苦役营的伙食则必然会把我们中最衰弱的人完全拖垮。

一九四一年六月，米道尔果然被仓卒送往阿尔及尔监狱

医院。七月和八月里，輪到普拉晒和罗歇了，他們是用担架抬走的。当他們和我們离別时，我們害怕会永远不能再看見他們生还了。

月复一月，这种充滿痛苦的情况繼續着。我們从法国那边只能得到很少一点消息。从来沒有人来探望。我們成了被流放者，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人。我們只有完全听任目前的当政者为所欲为。他們手中操着生杀之权。

但是，我們并不是听天由命的人，也不是胆小鬼。我們曾經进行斗争：手挽着手，閉結無間，彼此由共同所受到的考驗的火焰焊接起来，有着一股鋼鐵般的力量，即使是最殘酷的打击也只能使它变得更坚强更結实。健康不良的情况、勇敢的态度、正义的要求和高尚的行为，不能不給負責看守我們的人以深刻的印像。

繼米道尔、罗歇和普拉晒之后，高納凡、德繆索阿、馬戴尔、繆斯摩、白利奧茲、柏蒂、普劳特、罗哲萊、勒維等人也一个跟着一个眼看着自己的健康情况严重起来。只是由于我們首先从情感方面着手，打动了監獄看守們的良心和人性，我們悲慘的处境才开始有了一点小小的改进。在整个我們居住在麦宗·加萊的时期，为了能够在一個像苦役营这样严格的監獄制度範圍以內获得可能的改善，我們从来沒有停止过以各种方式进行斗争。就这样，監獄当局首先同意供給我們一些桌子，接着給了椅子、板凳、叉子，甚至还有去了尖的小刀。并且供給病得最厉害的人以鉄床。

很長一段時間內，監獄当局一直拒絕延長我們的散步時間。但漸漸地我們爭取到了，並且在我們获得自由以前的好几个月中，已經得到允許，可以在起床和就寢之間到院子里去。

我們从达維拉医生那兒得到了特殊的帮助。他是接替以

前那个冷血动物的。由于他，每天盛在簡直不能摸的盆子里的骯髒、菲薄而且令人作呕的日常食物，才有了一点改善。

他充分懂得自己的职责和自己职业的崇高性，因而有勇气不顾被怀疑与告发的危险，在病历簿里写上为维持我们的生命所必须的小量补充口粮，并且甚至在办公时间以外，也趁分发菜汤时赶来考察他的指示执行的情况。但是有时他也会在监狱当局的极端顽固的面前碰壁，特别是当监狱正被很危险的流行病——赤痢和斑疹伤寒——侵袭的时候。

馬戴尔、繆斯摩和拉勒普是当时受感染最重的几个。他们躺在阿尔法<sup>⊖</sup>草垫上，得不到适当的照顾。他们一天比一天衰弱下去，瘦到了极点。拉勒普簡直成了皮包骨，从七十六公斤减到四十五公斤，繆斯摩也只剩四十三公斤了，馬戴尔则需要我们整日整夜地守候着。

他们正处在生死关头，而我们每个人都冒着被传染的危险。医生吩咐应当将他们隔离开来并赶紧送医院。监狱领导方面反对把他们送走。但是，就在同一个监狱内，对于任何普通罪犯，即使是多次的积犯，过去和现在都从来没有见过像这样反对把三个发高热的赤痢患者送往医院的顽固态度。当我们毫不留情地对典狱长指出其重大责任的时候，他回答说这只是执行专为我們共产党議員所规定的禁令。

我们断绝了一切联系，而且将这样继续下去，与外界没有任何接触。这种可卑的措施是由維希的流氓們规定下来的。正由于我们是共产党员，所以便拒绝给我们医药帮助。維希的流氓們把人質交給希特勒的屠夫，到处緝拿、搜查、逮捕、判罪和監禁那些站在反对納粹压迫者和与他们合作的同謀犯的战

---

⊖ 阿尔法，植物名，产于阿尔及利亚，用以造纸。——譯者

斗前列的共產黨員。難道我們還能夠希望從這般傢伙那兒得到憐憫、同情和慈悲嗎？不可能。他們不敢謀殺我們、槍斃我們或者把我們送上斷頭台。他們寧願採取讓我們慢慢死去的辦法。

而且，由於遭受了各種限制和飢餓的磨折以及為貧血症所摧殘，普拉晒和高納凡在從麥宗·加萊監獄獲得自由之後，便真的完全給毀了。他們在此之前已經受到了致命的打擊。

任何善良的人，當他知道有一天高納凡患了半身不遂症，血壓低到二十八，身體左半部幾乎全部不管事了，竟被認為是無聊裝病而不予送院時，能夠不義憤填膺嗎？世界上決沒有這樣的人。

在我們身上所使用的野蠻手段和希特勒式的辦法，只足以激起對使用這種手段與辦法的人們的譴責，並且引起對受難者的憐憫與同情。在苦役營里所發生的情況正是這樣。一個，兩個，三個，接着是大多數的看守們都來幫助我們了。他們中間很多人是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戰爭中的老戰士。在許許多多橫暴的手段中，其中有一個深深引起了他們的反感，那便是監獄當局通報說，根據一九四〇年四月三日的判決，杜沙身上的軍功章和作戰十字章以及一切法國獎章都應該給摘掉。

杜沙拒絕在這一通報上簽字。他的回答很簡單但也很干脆：“這些獎章是我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間，用自己灑在戰場上的鮮血換來的。雖然同樣的獎章也曾於一九四〇年贈送給投降將軍們，這種措施在叛國元帥貝當自稱為民族革命的新秩序之下是很平常的事情。我一定要保持我所得來的這些獎章。”

由於深深害怕被人告發，在一段時期內，看守們保持着疏

远而冷淡的态度，从不跟我們講話。他們遵守着命令。當我們詢問戰爭動態時，他們拒絕回答。但是，我們的勇敢、我們的行為、我們的公正、我們的態度，永遠是高尙可欽的，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引起了他們的尊敬與重視。他們又靠近我們了。

他們開始的時候只回答我們一部分問題，接着便告訴我們一些非常重要的事件，往後便把不斷變化着的局勢的最主要的細節告訴我們。

同樣他們在納粹德國的集中營里也有着被囚禁的親人。同樣他們也有時長達好幾個星期得不到親友們的信息。他們開始設法把新聞供給我們。有一個人是用下面的方式進行的：晚上當他在我們這一部分的周圍巡夜時，他從一扇開着的窗子的鐵柵欄之間扔進一塊石頭，上面包着幾張用繩子捆得緊緊的報紙。

過一會，當他第二次巡哨時，我們用同樣的方法將報紙遞還給他。這樣，我們就差不多能夠經常知道外面的局勢并據此進行活動。

通過我們與家庭的秘密的通信方式，通過擔任分菜工作的“雜役”們——他們經常與獄中每個區域的犯人接觸，因此也和新來的犯人接觸——我們也同樣得到了其他的消息。通過第二個方法，我們與被判处死刑并囚在麥宗·加萊的阿爾及利亞的共產黨員和西班牙的共產黨員取得了聯繫，使我們與阿爾及利亞共產黨地下領導機構發生了關係。

就這樣，我們在獄中的活動漸漸產生了更大的效果，因為它有了共產黨強有力的活動的支持；黨的小冊子、報紙以及地下的傳單，號召阿爾及利亞和法國的居民，以加強反希特勒德國及維希賣國賊的鬥爭，來支援被囚禁的共產黨議員。

从生理上講，我們每天当然都消瘦了一些，但是我們的精神絲毫未受影响。每當我們要對壘，要對付威脅，要提出抗議，要保衛一件既得的东西，阻止監獄当局的虐待，以及向敵人爭取某些东西的时候，我們二十七个人表现得像一塊絕對不可動搖的磐石。但有些最悲痛的消息，例如當我們知道德國秘密警察或維希走狗們對我們的家人實行報復，或者當我們知道民族的优秀兒女被納粹匪軍殘杀的时候，又会使我們满怀伤感、异常悲痛。

我們咬牙切齒，握緊拳頭，思量着將來一定要去報仇。我們的肚子是空的，但我們的心里却充滿了神聖的仇恨、可以轉化為力量的仇恨，这种仇恨使我們能够像礁石一样，在怒吼的海洋中巍然屹立：这是对压迫的仇恨和对自由的热爱，对奴役的仇恨和对独立的热爱。

光陰一天、一周、一月地过去了，我們的生活方式却永远不变。永远是同样的牢房，同样的四壁，同样的窗欄。但是偉大的解放戰爭的喧囂声却常常傳來，震撼了監獄，并輾轉傳到我們这里。

光荣的紅軍在希特勒野兽的脊梁上給了凶猛的打击。它在苏联神話般的历史上写下了自己最輝煌的胜利。有一天，因受英雄史詩般的軍隊的偉大成功的影响而被热情与敬仰所激勃了的看守們，在我們面前說出了斯大林格勒的名字。

“今后胜利是肯定的”，他們向我們說。

但是导向解放的道路仍然是很長的。我們仍然是在敵人掌握之中。我們是他們的人質。不論白天黑夜，他們随时可以處置我們的生命。但我們肉体的死亡并不足以毀灭我們。共产主义是永生的。由于把握了現在，未来一定是屬於共产主义的。

## 第二十二章

### 希特勒杀害了我们的三个孩子

光阴将永远毫无变化地一秒、一分、一小时、一天、一周、一月、一季、一期、一年地流过去。我们数了又数，算了又算，加在一起是：六百四十五天，一万五千四百八十小时，九十二万八千八百分，五千五百七十二万八千秒！

但永远是同一个地方，同一间牢房，同样的四壁，同样的窗栏，同样的牢门，同一个院子，同一幢房屋，同一个区域：六百四十五天，一万五千四百八十小时，九十二万八千八百分，五千五百七十二万八千秒！

永远是同样的动作，同样的步伐，同样的节奏，同样的单调，同样的孤寂。我们数着，我们计算着，我们结算着。

当世界正被我们所难以具体想像的巨大事件和伟大斗争弄得天翻地复的时候，我们却始终过着被迫蛰伏而了无生气的生活。当这被蹂躏的血淋淋的世界上，几乎有二十亿人过着经常不安与长期痛苦的悲惨生活的时候，我们却必须在无所事事中度过。我们过着囚徒的生活！过着苦役犯的生活！

我们有的是时间去重新回忆自己的全部生活，让它重新出现或者消失；有的是时间去沉思过去和展望将来。有时在记忆深处已经忘掉了一桩小事，已经遗漏了一个微小的细节，会无缘无故地像閃爍的燐火一样浮到表面上来，而当你想要抓住它仔细考察时，却又突然消失了。



記憶的深淵是不可測度的，那里藏着無尽的宝藏，那里有永远不会枯竭的泉源，美好而清涼的泉水，可以使我們的憂苦和乡愁归于平靜。有时我們会显得好像威尔斯小說里的主角一样：他生活得平淡無奇，但却在夢幻中过着虛構的緊張而輝煌的生活。

六百四十五天；一万五千四百八十小时；九十二万八千八百分；五千五百七十二万八千秒……我們过着囚徒的生活！过着苦役犯的生活！

“他們禁止我在城里走动”，墨斯特在他所著的“臥室內的旅行”中說，“但他們却給我以整个宇宙，永恆与無極都在我的支配之下。”

我們是在敌人掌握之中。但是只要一天他还没有毀灭我們的身体，他就一天不能占有我們的思想，而借助于思想，我們可以环巡宇宙，在無边無际的領域中漫步遨游。

我們在麦宗·加萊中央監獄里过着空虛的穷極無聊的犯人生活，在这里从来不可能也必然不会發生任何特別与动人的事情。我們只不过是一些號碼——我自己的號碼是九〇〇二。監禁生活对于我們，不只是因为陷身于牢房的四壁而难受，并且还由于缺乏一切外界經常的消息而痛苦。

我們与家中还存在着的唯一实在的联系便是我們之間从两个区域，从非洲和法国互相交換的一張長方形的小紙片——一張明信片。当然，我們無法在明信片上写很多东西。我們在这上面从事書法練習：力求写得小些，小些，再小些，以达到今天能多写下一行，明天能多写下兩行。我們后来甚至能在这塊長方形的紙片上写三十行字。更重要的是這張明信片是由我們亲手写的，我們可以在这上面給留在那边的亲友們写下一些亲切的語句。我們的亲友們正遭受着严重的苦难，

成为迫害的对象，因而不得不轉入地下以逃避秘密警察們的魔爪。

兩肘靠着桌子，俯首在一張紙片上書写着，該是多么令人高兴和快乐、多么使人感到安慰和激动的事情啊！因為我們知道它將被我們最親愛的人們一行行地讀過去，這些字句將被用高低不同的聲音念出來。啊，郵件！你是我們與外界生活之間唯一實在的聯繫。一封信收到了，它告訴我新添了個孫子讓·米塞爾，這消息像維他命似地使我們變得堅強起來。我們從這裡吸取力量和勇氣，以使用我們所能用的方式向貝當、賴伐爾和希特勒等流氓黨徒進行鬥爭。啊，郵件！你是囚徒們最寶貴最心愛的東西。

然而從維希政府直接傳來了命令，把囚禁在麥宗·加萊的共產黨議員的通信次數縮減為每月一封。

通過這種卑鄙的手段，維希英國賊對我們，而且僅僅是對我們，創造了一種特殊的限制制度；而這種制度並沒有加到關在我們監獄里的最壞的強盜們身上。

這種非人道的手段給我們以殘酷的打擊，因為它阻止我們每周向年老的父母、向妻子和兒孫們報告消息。而我們的家人由於遭受了不幸，由於慘別以及因為道路遙遠不能探望我們，已經是夠悲慘的了，因之這種手段給予他們的打擊就更其慘重。

這種無恥的手段對那些住在占領區和禁區的家庭說來特別顯得殘酷，因為我們寄給他們的簡短的明信片常常遞錯或者被沒收，因而不能到達他們那裡。所以，每月一封的通信制度就有可能使我們的家庭兩月甚至三月處於焦急的狀態，得不到我們寄去的任何消息。而這對於我們中間有兩位同志的妻子、兩位法國母親說來，在她們深重的痛苦之上又增加了多

么大的新的痛苦啊！她們已經失去了世界上最亲愛的人。她們的兒子居伊·莫盖和亨利·馬戴尔被納粹匪軍当作人質槍斃了，而今她們又眼睜睜被夺去了从丈夫的来信中获得安慰的机会。

那些失掉了母亲的孤兒們將無法再获得收到父亲信件の安慰了，而这对他們又將引起怎样的慌乱啊！但維希政府依然毫無憐憫之心，狼心狗肺，丧尽了天良！我們只因为共产党員，于是便得受尽磨折、报复和懲罰。就这样我們内心里的仇恨不断地蓄积滋長着。

我們过着囚徒的生活！过着苦役犯的生活！

但是我們从来没有失望过。我們反复哼着“青年近衛軍”中的詩句：

“大雨过后，出現了晴天！”

我們对將來經常抱着希望。即使在最艰苦的时期，我們也会突然低声唱出一些淒凉、悲慘或者愉快的曲子，一些現代或者过去的歌曲；于是我們就好像是处身在杜加斯节或者喀尔弥斯节，处身在市集里一样，欢度着节日，四周是低矮的木屋，木馬，風琴，手風琴和舞蹈。

一个人可以一方面很悲哀淒凉但却歌唱着。对于一个囚徒來說，沒有歌詞而信口吟唱簡直成了生理上的需要。歌唱和音乐是人类所不可缺少的，是使我們忘掉周圍各种打击的良葯。我們有些像洛特勒克將軍，他被囚在西班牙时，在格勒納德地方曾唱过下面这一柔美的歌曲：

对于童年时代到过的美丽的地方，

我該有多少愉快的联想。

姐姐啊，

那时法蘭西的天气是多么晴朗。

啊，祖国！

我永远不会把你遗忘。

啊，几时能再见到我的海倫，

还有那巨大的橡树和山崗，

关于这一切的回忆。

成天使我悲伤。

啊，祖国！

我永远不会把你遗忘。

我們过着囚徒的生活！过着苦役犯的生活！

当你注視当前现实的时候，你感到日子过得很慢，而当你展望將来的时候，它就过得更慢了。我們在一張紙片上用一个个記号把它們記下来。但这些日子之間彼此毫無变化。

鳥兒的宛轉啼鳴、麻雀的噉噉聲、燕子的急速盤旋、貓兒——黑的、灰的、白的、花的——翻騰跳躍、工厂的鳴笛、机車的吼叫乃至飞机發动机的隆隆声等，都会在我們經常活動着的臆想境界里引起一陣陣很大的震动。一只鷓鴣落在屋頂上，一只野鶴飞过，也都在我們被囚禁的历史中記下整整的一頁。一九四二年六月三十日夜十一点當我們被劇烈的地震所惊醒，以及几分鐘之后又受到比这稍弱的震动的时候，我們的印象尤其深刻。

冬天，我們站立在被傾盆大雨淋湿的冰冷的土地上，在溫暖的太陽下冷得發抖。夏天，干燥而又炎熱的热風吹过大地，留下一陣陣宛如暗色帳幕的旋轉的灰塵，天日無光，这时我們便在灼熱的气候下悶得要死，撒哈拉沙漠的空气燒焦了我們的喉頭。

光陰随着季节，一秒、一分、一小时、一天、一周、一月、一季、一期、一年地暗淡而單調地流过去，它逐漸削弱着我們身

体的抵抗能力，但却不能給予我們鋼鐵般的精神以任何損害。

然而有时你得日复一日地在种种殘酷的考驗中度过。我們的人——那些和我們以战斗的友誼联系在一起的人們，为了把祖国从侵略者及其罪惡的維希同謀犯的沉重枷鎖下解放出来，在战斗中一个跟着一个地倒在沙場上了。

通过曲曲折折的途徑，借助于我們已經建立的秘密通訊方式，我們打听到米塞尔、卡特拉、邓波、桑培、佛罗特、加戴特和貝里被处死了。我們得到了那些落在維希、巴黎和柏林的警察們的罗網中的英勇战士們被捕的消息。

既然我們都只是人質，誰知道会不会有那样一天，在黎明的时刻，有一个由十二名貝当軍团士兵組成的行刑队跑来將我們貼在牆壁上，用十二粒子彈轟击我們呢？沒有問題，他們可以打穿我們的胸膛，击坏我們的心臟，使我們腦漿迸裂，但是他們却無法去掉我們共产主义的信仰，共产主义的認識和共产主义的理想。

对于被屠杀、槍決、絞死、斬首这些可能發生的事件，我們都能从容正視，并不因此而胆战，但我們却不能無动于中。我們不会动摇，我們會兩眼盯着劊子手們，驕傲地昂着头走向刑場，深信我們洒出的鮮血將會灌溉大地并使之产生新的为自由而斗争的战士。但是在最后的时刻，我們一定会想起那些接到我們被处死这一可怕的消息，因而悲苦啼泣的亲人們。

因為我們知道：失去一个家人，失去一个亲愛的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种慘痛的滋味我們曾經尝到过兩次：一次是在一九四一年十月，另一次是在一九四二年五月。

一九四一年十月，院子里傳来了呼叫声：“邮差！”我們跑上前去。看有沒有一張寄給我們的明信片，只要有一句話也就够了。

信是写给巴列尔的。上面只有寥寥几行。巴列尔读了一遍，再读一遍，又重读一遍。他的目光不敢离开这张长方形的纸片。他向我们做做手势。我们走上前去。巴列尔把明信片递给我们。这是幽莲特·莫盖寄来的。上面写着：

“亲爱的朋友，

“我痛苦异常。我们的居伊·莫盖于十月二十二日和很多其他的人一道，在南特被当作人质枪决了。我所知道的只是报纸上登载的那点消息。他还只有十七岁，这真太残酷了！我不敢写信给我丈夫，只有您我才敢于委托这个转达的任务。但我仍然感到不忍。预先谢谢您并向您问好。

幽莲特·莫盖

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八日星期二。”

我们说不出一句话来。这可怕的消息粉碎了我们的心。我们的脸色苍白，接着又因为愤怒而涨红了脸。这些强盗！他们竟敢在夏多布里扬枪斃了十七岁的居伊·莫盖。他的母亲，一位地道的法国母亲，虽然由于她最亲爱的人的原故遭受了残酷的打击而伤心不已，但她在想到自己巨大的创痛之前首先却为别人着想，因而请求我们非常慎重地把纳粹这可鄙的罪行告诉孩子的爸爸。痛苦虽然深重，但她仍然是勇敢的。

现在该轮到我們鼓起勇气，到普洛斯柏·莫盖这位作父亲的人面前，去完成我们的艰巨任务了。当他看到我们，巴列尔、皮佑、法戎和我到来的时候，他预感到会有甚么不幸的消息：

“你们为甚么这样来看我，简直像一个代表团似的？给我带来了甚么不好的消息吗？”

我们没有回答。

“是关于居伊·莫盖的消息吗？”

“是的！”

我們把明信片遞給他。他讀了一遍，跟我們一樣，他再讀一遍，又重讀一遍，無法使自己的目光離開這張長方形的紙片。我們二十六個人全在這兒，全體靠近普洛斯柏·莫蓋身旁。我們圍着他，一聲不響。在這動人的沉寂之中，只發出了一聲嗚咽，僅僅一聲，接着便是：“這些匪徒！”四個字。

莫蓋手頭有他兒子的照片。他看了看照片，把它遞給我們。我們默默地看着照片：居伊·莫蓋！居伊·莫蓋！！居伊·莫蓋!!!

我們沒有講話。說幾句鼓勵的話對這位父親將會是一種侮辱。他有的是勇氣。我們也有。但願我們能夠活到為自己報仇的日子！

十五天以後，莫蓋收到了他妻子十一月四日的明信片。她說：“可憐的孩子，他表現得很勇敢，我們應該學習他的榜樣。除了報紙上所刊載的消息以外，其他甚么我都不知道。唉！我渴望着他的信和你的明信片，但是再也不能收到他的信了。最後的一封信是二十日寫的。可憐的孩子啊，才十七歲呀！我的痛苦是鉅大的，但他是經常那樣地叮囑我要勇敢些，因此我努力做到勇敢，並且我做到了。”

十一月十一日的另一張明信片上也流露出了同樣不能消除的痛苦和同樣堅定不移的勇氣：“我們可憐的孩子。從那悲慘的時候到現在已經是三個星期了。可憐而又了不起的孩子啊。他一定表現得很勇敢。讓我們仿照他的榜樣吧。應該抑制住自己的悲痛。”

十一月十九日星期日，我們又讀到：“在這悲悼的時候，我們彼此隔得如此遙遠，我們所度過的這些日子實在是非常艱苦的，可憐的孩子！可憐的孩子！在集中營里和他比較接近的一個朋友會寫信給我說，他昨天已經成了烈士。十七歲的

时候便作了烈士！可憐的亲愛的孩子。的确，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孩子，非常了不起。可是，对于我們，对于大家，这却是非常不幸的事情。他不再存在了。为他痛哭的并不只是我們兩人，而这便是我們仅有的安慰。可憐的孩子！請为我向巴列尔致以友誼的問候，因为我曾托他完成过一樁很艰鉅的任务。向你們全体問好。拥抱你。”

最后，幽蓮特·莫盖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一日的明信片告訴我們，她一直还没有获得允許，不能到她孩子的墳墓上去悼念：“这是一种多么永恆的悲痛啊！可憐的孩子。我不能相信我沒有机会再見到他了，然而，这却是可怕的事实。天啊！他安息在哪兒，我一点也不知道！我相信，他是在那兒，在原来那个地方。但是我却被剝夺了到那里去的权利。虽然受到了这种折磨，我仍然是勇敢的。你應該像我一样。可憐的孩子啊：你曾經是勇敢的，我們要學習你的榜样。讓我們亲切的拥抱你。”

直到我們从麦宗·加萊苦役营出来以后，我們才知道夏多布里揚的人質是由老賊貝当的閣員、卖国賊庇舍轉交給希特勒的秘密警察的。本来，夏多布里揚的集中营是一个所謂的法国集中营，是自从“莫明其妙的战争”开始以来，由所謂的法国政府，在所謂法国主权完全控制之下修建起来的。

也正是这个所謂的法国政府，它把一些法国人——其中包括年青的居伊·莫盖——送进了希特勒野兽的魔掌，这些法国人是我們祖国的光榮和驕傲。

总有那么一天，这个政府將要清償自己的滔天罪債的，因为它也和希特勒匪徒一样是战犯。

六个月以后，在一九四二年四月，馬戴尔接到消息說他的大兒子亨利在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九日被捕了，并在十天之后



被判处十年苦役。

报道上述簡單消息的明信片是由亨利的崇高的母亲亲笔写的，上面还写道：“这是个不为打击所屈服的真正的馬戴尔家的后代！”

馬戴尔接到这封信后大为震动。他痛苦，但是并没有失去常态。

馬戴尔的大兒子無法从監獄中把自己的消息告訴給他父亲。他說：“我情緒很好，满怀信心。”他还以亲爱的孩子的口吻补充道：

“昨天我接到了媽媽的信，虽然这对她說来是很殘酷的事情，但她沒有失去勇气。至于我，我始終沒給您丟臉，沒有失去勇气和信心”。

馬戴尔的勇气和信心也并不缺少，他的勇气并不像諾尔和加来海峽兩省矿工鑛头下的煤塊一样脆弱，而是像花崗石一样的坚强。虽然他可能在不幸的打击面前顫动一下，但却沒有东西能够毀坏他。可是打击却还要野蛮而無情地落到他身上来。

五月五日，繆斯摩在取来当天的信件后，遞給馬戴尔一張由他大兒子的未婚妻写来的明信片。也和其他由占領区寄来的明信片一样，上面只有几行字。但这些字是非常令人可怕的。

原因是，这几行字报道了他兒子亨利被希特勒野兽杀害了的消息。在这位習慣了矿工井底下的艰險劳动的工人代表和共产党議員馬戴尔的臉上，沒有絲毫顫动，但痛苦却充滿了他作为父亲的人的胸膛。他并不向任何人流露他的痛苦，但他非常难受。可是，他的灾难还没有完結，因为接着便又輪到他的第二个兒子热米納，他被希特勒槍斃了。

居伊·莫盖！亨利·馬戴尔！热米納·馬戴尔！我們这些被囚禁在麦宗·加萊苦役营的共产党議員的三个孩子被法西斯劊子手們杀害了。难道会有那样一天我們腦子里健忘的灰塵有可能把这种喚起复仇感的罪行給掩盖掉嗎？不可能，永远不可能！

就这样，父亲、母亲和孩子們为了履行他們作为法国人的义务的罪名，受到了慘痛的“懲罰”。彼此各自在監獄內，在地下，在法国或阿尔及利亞的集中营里，在德国的慢性死亡营中，受着苦难。

光陰一秒、一分、一小时、一天、一周、一月、一季、一期、一年的过去。仇恨在持續，在积累，在强化。这是对法西斯主义的仇恨，对維希卖国罪行的仇恨。庄严的仇恨，孳生不灭的仇恨，足以产生抵抗的力量，产生为目前的斗争及將来的战斗所需要的力量的仇恨。我們过着囚徒的生活！过着苦役犯的生活！

但是我們抱着爭取自由的战士的态度。他們把我們監禁在牢房里，但我們終于一定会战胜他們的。每天，我們反复地說着：“对，我們一定能战胜他們！”

## 第二十三章

### 爭取釋放的頑強鬥爭

在大海上，整夜都是可怕的風暴，雷聲隆隆響个不停。究竟發生了甚么事情呢？是攔劫护航隊還是一場大規模的海戰？破曉時恢復了平靜，我們聽見吹起了軍號，發出警報，準備戰鬥。也許是進行大規模的演習和練習大炮射擊。

十一月九日起床時，一個雜役打從我們這兒走過。他在我們耳邊輕輕說了這樣幾個字：“他們已經來了”。美國傘兵占領了麥宗·布朗施機場。英美混合部隊已經在西地·費魯克和某些海岸據點登陸了。阿爾及爾城頭上飄揚着英國和美國的國旗。

這消息靠得住嗎？雜役只能用“有人這樣說”五個字答復我們。晚上從看守那兒得到了証實。我們唱起馬賽曲來。

我們要求立即與典獄長談話。他讓我們等了很久。

當他終於肯露面的時候，我們發現他已經從扣眼里摘掉了他的斧鉞勳章<sup>⊖</sup>和貝當軍團的徽章。他的態度不再像昨天那樣傲慢和鄙視一切，而是小心翼翼了。

他稱呼我們“先生”，表現得很客氣。

我們回答他說：

“請問你的斧鉞勳章那兒去了？你害怕，不敢再戴它了。”

---

⊖ 貝當制定的勳章。——蘇聯編者注

維希已經不能再控制這兒。于是你在以苦役犯看管者的身份替他服務之後，便又想改頭換面了。關於你的禮貌，我們並不在乎。我們所需要的是立即獲得釋放。”

由於最近幾天新來的衛隊的保护，典獄長才得以脫逃，離開了我們這一個區域。

我們齊聲一陣陣有節奏地喊着：“自由”。整個監獄都沸騰起來。警衛力量增加了一倍。圍牆和塔頂布滿了屬於貝當軍團的士兵，他們持着槍，槍上裝着刺刀，腰上還佩着手槍。

晚上副典獄長告訴我們，就在這天黎明時候，他從隸屬於貝當軍團的波特里上尉那兒得到命令，叫把二十七名共產黨議員交給奉命槍斃我們的行刑隊，只是由於副典獄長的反對，由於他反復向駐軍指揮官打電話要求得到書面命令，因而便贏得了一刻鐘足以等待美國先頭摩托部隊到達的時間，因此，救出了我們的生命。

我們不相信。我們向他表示懷疑，告訴他這不過是想爭取我們寬大的一種手段而已。他解釋說關於他所講的在辦公室里有正式材料可資證明。此後在審判賣國賊的罪行時，這些證件在法庭上還被引用過。法庭以叛國罪判處這位波特里以二十年徒刑並把他的財產充公。只是到這時候，我們才搞清楚副典獄長並沒有耍滑頭，他所說的是事實。

第二天，十一月十日，我們給阿爾及利亞總督提出立即出獄的要求。五天後還沒有收到總督的任何答復，我們再一次提出立即釋放的要求，並且對於把我們關在獄中的荒謬措施提出強有力的抗議。這位阿爾及利亞的維希總督對第二封信甚至連收據都不給一個。這個曾判處很多人以死刑、勞役與監禁並且把阿爾及利亞人民的優秀兒女關在集中營里的人，繼續干着維希賣國的勾當。他害怕我們獲得自由，希望把我

們繼續關在監獄中，因為他知道我們一旦獲得自由，就會成為解放戰爭中最優秀的法國戰士。

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四，羅哲萊和巴列爾被叫到典獄長辦公室去。當他們發現曾經對貝當投信任票，並在阿爾及爾作維希政府省長的前任議員唐勃勒坐在典獄長辦公室時，他們感到非常驚訝。唐勃勒站起身來向羅哲萊和巴列爾走去，遠遠地伸出了一隻手。我們的兩位同志毫不理睬。

“不，別這樣”，羅哲萊說道。“我們不能和你握手。我們的手是乾淨的，而你的手染紅了共產黨愛國志士的鮮血。我們彼此間隔着一條不可逾越的血的鴻溝。”

羅哲萊和巴列爾接着馬上提出我們主要的要求：立即釋放。這位維希省長唐勃勒不斷地加以解釋。但我們的朋友打斷了他：

“如果你從你的主子總督那兒帶來了甚麼意見要跟我們談的話，在監獄那邊，一個與四圍隔絕的區域里，有二十七名共產黨議員被關在牢房中，你應該向他們而不只是向我們兩人作解釋。”

“好，很好，我去，請給我引路，我跟你們走。”

當我們看到唐勃勒穿着航空員式皮上衣的省長制服走進來時，我們也表示非常詫異。

我們二十七人聚集到最大的一間牢房里。這位維希的省長講話了。顯然，他感到很不安。他不也曾經是那群胆小鬼議員中的一份子嗎？這批人不容許我們分辯，便投票撤銷了我們的議員資格；現在他又來到了他的犧牲者的面前，而我們則以深深感到自己曾經不顧迫害、刑罰和監禁，完成了作為法國人的義務的心情，驕傲地緊緊地盯着他。

“先生們”，他開口了。接着他又補充一句，“我親愛的

同事們，我了解你們的痛苦，我知道你們的勇氣。請允許我向你們的忠貞、毅力和勇氣表示敬意。你們樹立了愛國主義和正義的榜樣。我到這兒特地來了解你們的情況並告訴你們，總督正在研究你們的請求。請給我們一些考慮的時間。”

“唐勃勒先生”，我們反駁道，“絲毫沒有甚么值得考慮的地方。我們始終如一，從來不朝秦暮楚，我們過去始終如一，將來也永遠始終如一。歷史證明了道理是在我們這邊，證明了我們的政策曾經是而且仍然是正確並且符合法國的利益。你应当向我們道歉。今天所需要考慮的只有一樁事情，一樁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把我們立即從這個苦役營中釋放出來，維希政府是在你的支持與同意下把我們流放到此地來的。趕快釋放我們！”

“我回到阿爾及爾時立即轉達你們的請求。”他回答說。

“我們記下你的諾言，但在等候回音的期間，請你立即下令給我們以政治犯待遇。給我們送些報紙來。並且公開宣布我們即將獲得自由。”

這位維希省長唐勃勒在離開我們之前，從口袋裏拿出了兩張阿爾及爾的報紙遞給我們：“快訊”和“回聲報”。

我們如飢如渴地看着報紙。這正是在斯大林格勒作戰時期，正是史詩般的蘇聯軍隊取得光輝勝利的時期。第二天，我們便可以買到這類報紙，並滿懷熱情地跟隨着蘇聯的巨人們進攻的步伐前進。他們將以沉重的打擊，摧毀人類有史以來最強大的戰爭機器。

十一月二十九日，我們又向唐勃勒省長提出我們的要求。

十二月七日星期一，唐勃勒省長重新來拜訪我們。他告訴我們他正在與阿爾及利亞總督交涉，並且說我們要求釋放的事情正在研究中。我們對其拖延釋放的行为提出了強烈的

抗議。

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二，唐勃勒省長來告訴我們，如果我們肯簽署一個等于背棄我們底愛國行為的宣言，我們便可以獲得釋放。

我們的答复是：請唐勃勒省長告訴他的上級：我們認為這個建議對於建議人來說是可恥的，而對於受建議的人則是一種侮辱。而且我們還堅持要他告訴他的上級，如果再向我們提出這類荒謬建議，我們將只用一句話“康布洛內的回答”<sup>⊖</sup>來表示拒絕。我們將把這幾個字用白紙黑字寫下來，向他表示我們的鄙視和憤怒。

十二月二十四日，海軍上將達爾朗被年輕的博尼·德·拉·夏柏爾所暗殺，因此這時在阿爾及利亞沒有高級專員了。

當時最高的負責人是盟軍北非部隊總司令艾森豪威爾將軍。時間已是聖誕節的前夕，這是美國人特別喜歡慶祝的節日。因此我們決定向他交涉。我們給他寫信說明我們的情況並且對於仍把我們關在監獄一事表示驚訝。

我們始終沒有得到過回答，甚至連為了表示客氣和禮貌的收據也沒有收到過。當然囉，因為我們是共產黨人！

美國當局是偏袒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積極同謀犯維希混蛋們的，因為他們代表着反動勢力，因為他們是听命于托辣斯巨頭的。只有一個共同的願望鼓舞着夏德爾、貝格列特、達爾朗、麥克米倫、墨菲和艾森豪威爾之類的人們：盡量將所有的共產黨人在監獄和集中營里多關一些時間。

英美軍隊登陸已經兩個月了，但還沒有有一個政治犯獲得

---

⊖ 康布洛內，十九世紀法國將軍，曾率少數近衛軍被強大敵人圍于淪陷處，敵人誘降時他答以“去你媽的”。後來便以“康布洛內的回答”或“康布洛內”一語表示輕蔑與堅決的拒絕。——譯者

釋放。他們把我們關在獄中并且存心把我們繼續關下去；因為他們知道，一旦我們被釋放了，我們將要求懲罰賣國賊，並將為爭取法國與阿爾及利亞的民族和社會解放，為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而進行鬥爭。

他們知道我們將是盎格魯—薩克遜托辣斯實現統治阿爾及利亞和北非計劃的一個阻礙。對於英美反動集團說來，反對希特勒的戰爭只不過是一樁生意而已。在各國人民爭取自由與獨立的戰爭中，他們所看到的只是發財致富以及奪取落到他們手下的戰利品的機會。美國資本家覬覦着北非的資源，垂涎這一未被法國殖民者充分開發的富於礦產與石油的土地。他們想把這塊土地變成“新世界”在非洲的一塊大好殖民地。

倫敦帝國主義集團也替英國抱着完全相同的打算。華盛頓和倫敦的代辦及其特務們會面了。

但是他們雙方都想在經濟上、政治上奴役非洲。為了進行活動，他們雙方都依靠由殖民者富豪家族所組成的各個反動階級。

而共產黨人則是阿爾及利亞和法國人民自由權利的唯一真正的保護者。這便是他們為甚么還被關在集中營、監獄和苦役營中的原因。但是為爭取我們獲得釋放的運動開展起來了。到處——甚至在法國本土——對於仍然監禁我們的這種荒謬行為，掀起了極為強硬的抗議。

在英國和美國發出了一天比一天增多的呼聲，要求釋放我們。在阿爾及利亞，矛盾和鬥爭尖銳到深入了資產階級統治集團的內部。達爾朗被刺了。聯邦最高委員會任命吉羅德將軍繼任。他成了法國駐法屬非洲的高級專員。我們只有向他提出請求。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我們向他提出了如下的請求：

“法國駐法屬非洲高級專員吉羅德將軍：

“在今年新年同時也是你榮膺法國駐法屬非洲高級專員的時候，你曾經在一九四三年一月二日的報紙上聲明，為了團結一致，決定釋放某些因政治問題而被監禁的人們。

“自從這一消息發表以來，一個星期已經過去了，但還一點沒有兌現。現在一切仍然還只是具文。愛國人士的希望已經落空了。

“就是這樣，在自由的軍隊到達非洲領土兩個月後的今天，成百成千的法國愛國者，堅決反對希特勒的人們仍然被關在北非的集中營、監獄和苦役營里。在那兒，他們因為曾經履行了作為法國人和自由保衛者的義務，正對這種‘罪行’付出慘重的代價。

“由於反法西斯的堅定信仰，由於對所謂‘法國元首’在蒙多瓦地方所開始的禍國殃民的通敵政策毫不妥協地加以反對，由於對德國侵略者及其卑鄙的同謀犯，破壞了各種人民組織和共和國全部自由的維希賣國賊們所作的英勇的鬥爭，他們被投進並且一直還被關在集中營、監獄和苦役營里。

“他們，法國解放戰爭的先驅者，保衛自由的先鋒戰士和今天的階下囚，兩個月以來不斷的要求重新獲得在自由戰綫上進行鬥爭的權利。

“但是關於我們爭取釋放的一切請求，我們所得到的回答只是使人噁心的討價還價的企圖。這種企圖對愛國志士說來簡直是一種侮辱，而對懷着這種企圖的人講來則是卑鄙無恥；我們所得到的回答還有一些口頭建議，勸我們作可恥的變書。這種建議是不能為任何誠實的人所接受的。我們輕蔑地拒絕了這種建議。

“由此可見，阿尔及利亞的政治情况呈現了一个悲剧性的对比。

“一方面，如同在希特勒屠夫的統治下一样，法西斯野蛮行为的敌人，始終忠实于馬賽曲中所歌頌的‘可爱的自由’这一理想的男男女女們，在集中营、監獄和苦役营里过着非人的監獄生活。

“另一方面，那些过去的通敌分子，那些以書面和口头热心宣傳从占領者那里販运来的罪惡卖国理論的人們，那些‘德意征募委员会’的馴服的助手，那些替德、意在昔蘭尼加的军队忠心筹备軍需的人，那些在希望德国获得胜利的卖国賊賴伐尔手下当走狗的人們，那些曾下令向我們登陸的盟軍开火的人們，他們却仍然是自由的，而且有人仍然窃据权势，担任着領導职务。

“难道这便是解放后阿尔及利亞的法国当局，对于处在德国殘酷的压迫以及維希卖国賊法西斯恐怖統治的双重枷鎖之下的法国人民所想要揭示的自由与胜利的神聖面貌嗎？

“难道你們在和胜利了的盟軍一同到达法国以后，將讓那些曾首先向侵略者高举解放法国的旗帜的囚徒們依然被关在集中营、監獄和苦役营里嗎？

“难道你們將讓賴伐尔和布里农之徒，第五縱队的流氓以及所有那些曾向侵略者出卖自己的祖国并应对惨遭蹂躪的法国所受的灾难与痛苦負責的人們仍然担任原来的职务嗎？

“你的答复只能是否定的，因为你在从阿尔及尔到达喀尔去之前，你曾經明白表示过一个願望——这同时也是我們一貫的願望：你曾向一位美国記者声明：

“‘今天新生的法国军队底唯一願望，是要胜利地恢复淪陷已經兩年多并被有计划地把財富搶劫一空的領土，同时也

是恢复被極权主义宣傳所慢慢腐蝕与窒息了的理想，而有不少法国人是經常以書面或口头的罪惡卖国論調为这种宣傳服务的。

“你并且还用下面的口吻強調說：

“‘如果我們的国家贊成从占領者那里取运来的理論，而断然抛弃我們馬賽曲中所歌唱的“可爱的自由”的話，那么法国的面貌就沒有人会辨認出来了。’

“以上所說的都是真理，我們热烈地表示贊成。

“从这时候起，按邏輯講来，为了各个联合起来的国家的民主自由的共同理想，为了祖国的最高利益，就应该結束目前尙在北非流行的扼杀民主自由的希特勒式的各种手段。

“解放后的阿尔及利亞的法国当局应该成为公平、正义和自由的榜样。

“阿尔及利亞的法国当局再也不能够讓法国的爱国者和反希特勒人士長時間地留在北非的集中营、監獄和苦役营里，这些人一直就是站在法国反对血腥的法西斯斗争的最前列的。

“应该立即为了这些勇敢的爱国者的父子兄弟和亲戚朋友們，把集中营、監獄和苦役营的牢門打开；这些爱国者們一直是跟随着光荣的苏联的英勇游击队员以及巴尔干各国勇敢的义勇軍的步伐前进的。

“繼續拘禁反希特勒人士的情况，將和过去一样，仍然意味着在那些公开的宣言和談話中所作的关于团结一致以及爭取解放的号召的彻底的破产。这种情况也意味着对于在法国被占領区，冒着生命危險，給胜利的盟軍帶來有力支援的法国爱国志士的英勇行动的否認。

“你在达喀尔發表的談話中曾說过，你‘了解德国对法蘭

西的無恥虐待’，你‘知道法国本土上的人民、囚犯和人質的命运。’

“這話是真的，因为你曾經到過占領區并且曾目視希特勒的野蠻和恐怖。

“我們正是以這些法國人，以這些囚犯和人質的名義，要求立即釋放在北非全部因反希特勒而被捕的人們。

“對於這些法國人、囚犯和人質，我們也一樣了解得很清楚，因為他們是我們的自己人，因為他們是我們為之貢獻出整個生命的那個民族的兒女。

“我們家中的每個成員都曾經飽受德國秘密警察和‘法國’司法部門的磨折、搜索和迫害，原因就在於他們是被捕了的法國共產黨議員的近親。

“我們中間有八個人，他們的妻子、兒子、女婿、姑嫂、或者妻舅被判处勞役，被投進監獄，被關在集中營內，被管制，或者按照德國鬼子的命令充軍到德國去了，原因是他們曾起來反對踐踏蹂躪祖國的人們。

“我們中間有兩個人，巴黎的議員莫蓋和諾爾省的議員馬戴爾，他們的兒子被希特勒匪軍殺害了。

“這兩位年輕的自由戰士，十七歲的居伊·莫蓋和二十一歲的亨利·馬戴爾，由於反抗德國侵略強盜而被捕。他們拒絕叛變自己的父親，拒絕叛變自己求得政治上的解放與社會解放的崇高理想。

“他們在德國行刑隊的槍彈下犧牲了，他們像巴拉一樣，像法國大革命時代的青年一樣，高呼着‘法國萬歲’，英勇地倒了下去。

“我們有三個最親密的朋友，曾經表現了法共議員是多麼了解應該如何為了法國的生存而犧牲自己的生命。這便是我

們的战友：亞眠的議員卡特拉，他高唱着馬賽曲走上斷頭台；巴黎的議員米塞爾和塞納—瓦斯省的議員貝里，他們被卑鄙的維希賣國賊交給希特勒強盜及其間諜亞貝茲，在沖鋒隊的槍彈下犧牲了。

“此外還有九十名人民選出的共產黨員代表，共產黨員市長和省議員，例如塞納省省議員兼鐵路工會書記瑟馬以及加戴特、弗羅特、勒加爾、羅塞朗、加里烏和傅勒利等塞納省的省議員，也都被希特勒殺害了。

“我們正是用他們全体的名義，用犧牲在希特勒槍彈下的寫在祖國長長的烈士名單上的全体同志的名義，要求釋放我們和全体因反對希特勒而被捕的人。

“而且我們還有其他的理由要求釋放，因為正如阿爾及爾省長來到麥宗·加萊監獄看我們時自己所承認的一樣：‘你們對自己的愛國主義和忠誠正直提供了種種證據。’

“我們的愛國主義和忠誠正直的證據，是記載在我們為了人民的事業而犧牲的全部忠忱的生活之上的。

“這些證據上有我們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間在戰場上所流的血跡。這上面刻着我們的創傷的疤痕，裝飾着我們的迂鼻，我們的榮譽團騎士十字章、軍功章、作戰十字章以及我們所得到的嘉獎。

“我們光榮而忠實地完成了法國人民所委托給我們的議員任務，這也是我們的愛國主義和忠誠正直的證據。

“我們在社会生活和私生活各方面都經常盡到了作為一個法國人的義務，我們因此而感到驕傲。

“我們有權利獲得自由，因為你曾經說過：‘為了保證祖國的解放，凡是有這種願望的人們，不管在甚么地方，都應該團結起來。’而我們正是你所說的有這種願望的人們的一部分。

“你曾經向訪問你的美国記者正式宣布过：‘这种包括一切可以作战的力量的团结一致，是我们所最需要的。’

“我們和我們的党一贯所执行的就是这种团结一致以求得解放的政策。这正是我們所一直宣傳与貫徹的政策。也正是因为这种政策我們現在仍然被关在監獄里。

“反希特勒人士准备用他們的全力参加他們在戰場上和生產戰綫上的战斗崗位、参加解放法国与爭取胜利的斗争；他們曾經以下面的話作为自己的座右銘：‘大家起来参加神聖的解放战争！’

“他們的願望是：

“捉住丑惡的法西斯野獸，打倒它，并且置之于死地，同胜利的美、英、苏及其盟国的部队和人民并肩合作，爭取自由在全世界範圍內的胜利，建立持久的和平。

“解放法国，保證它的独立，使法国人民置身于自由的能够独立决定自己命运的世界各民族的前列。

“因此，为了言行一致，为了証明沒有欺騙和謊言，應該毫不迟疑地把因反对希特勒而被囚的人釋放出来，因为在最殘酷的考驗面前，他們表現了大公無私的精神和对复兴和解放法国的使命的不可动搖的信心。

“要想法国能自由、独立而幸福地生存下去，就应该使整个法国团结一致。

“我們相信，你会用心促使这种团结的完全实现并下令立即釋放我們和所有其他爭取自由的战士的，这些人从集中营、監獄或苦役营向一切爱国者伸出了友誼的手，并号召他們为保衛祖国而并肩战斗。”

一月十八日唐勃勒省長亲自来告訴我們最近即將有獲得釋放的希望。

終於，在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七日，吉罗德將軍叫我們派兩位代表到他那里去。皮佑和米道尔負起了這一使命。

一輛汽車把他們載往夏宮。夏宮過去是阿尔及利亞總督的官邸，現在成了民政與軍事高級專員的所在地。有幾個警官陪同他們前往。皮佑和米道尔的來臨在夏宮的院落和走廊里引起了不少猜測。警衛增多了，檢查很認真。必須帶着規定的證件；這些證件都被仔細地加以檢查，因為一個月之前，达尔朗就在這裡被人暗殺了。

吉罗德將軍並沒有要他的“客人”等候，立即接見了他們。他的辦公室壞了。昨天晚上有過一次轟炸，一枚炸彈投中了夏宮。吉罗德將軍把我們的朋友請進他那窗玻璃已被震碎的臥房去。

“這麼說，”他說，“我現在接見的原來就是囚犯了。”

他說他絲毫不知道我們，對於我們的事情毫不了解，雖然我們已在寫給他的信中向他詳細解釋過了。他要求把我們被捕、判罪、流放和獄中生活情況加以說明。皮佑和米道尔把我們的事情，我們的案件，中間的各種變動以及我們監獄生活中的各種事件說了一遍。

然後吉罗德將軍也解釋了一下自己是誰，擔任什麼職務。他敘述了自己在德國被監禁的情況，越獄時的情景，以及如何來到北非等等。接着，他接觸到了本題。

“我不過問政治，”吉罗德將軍說。“我是一個軍人，只希望作戰。我只有一個目標：獲得勝利。為了這，我願意得到全體法國人的幫助和支持。”

我們的代表回答他道：

“這一切對我們說來真再好沒有了，但還應該說得更加精確些。說老實話，我們認為為了集中一切愛國力量，首先應該

清除維希政府及其黨徒。然而，維希的勢力依然在北非存在着。很多的愛國者一直被關在集中營和監獄中，其中大多數是共產黨人。維希政府的罪惡滔天的法律一條也沒有被廢止。共產黨和工會組織依然沒有得到承認。它們不得不長期在非法的狀況下存在着。維希政府的人員還依然留在自己的崗位上。”

阿尔及尔省長唐勃勒便是一个例子。阿尔及利亞總督維希分子夏德爾的繼任則是一個曾擔任維希部長和駐阿根廷大使的維希分子柏魯東。貝格列特將軍也仍然官居原職。

“你是剛從阿伊發會議歸來的。請問那邊發生過一些甚麼事情？團結法國一切力量難道是不可能的嗎？你能不能告訴我們戴高樂將軍為甚麼始終留在倫敦，不肯到北非、到阿尔及尔來？此外，我們還希望知道一些有關你準備怎樣處理對蘇關係這方面的情况。我們同樣也希望知道：關於組織一支可以有效地參加爭取自由的戰爭並且能真正有助於取得勝利強大的法國軍隊，你的看法是怎樣的？最後，我們認為應當首先着眼于法國被占領的地區。請問你準備怎樣去援助愛國志士們的鬥爭？”

吉羅德將軍的回答是：

“我不過問政治。我準備釋放一切像你們，像你們的朋友以及其他可能有的被囚禁的人們。對於凡是在我周圍的人，我不願意過問他們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以前到底作過些甚麼。既然他們努力參加戰鬥，我便別無他求了。我們將和戴高樂取得協議，不過這並不很容易。俄國士兵的勇敢和愛國主義是可佩的。我們應該與俄國取得協議。至於我們的軍隊：我想立即建立十個師。這是可能的，我們有人。但應該說服美國人給予我們物資，因為我們一無所有。我們的部隊在



突尼斯打得很好。我將援助在法蘭西的法國人，但他們應該作些甚麼？我們又應該替他們作些甚麼呢？無論如何，應該想盡一切可能的辦法打擊德寇，我將從多瑙河向麥次進發，然後法國就可以為所欲為了。”

然後輪到皮佑和米道爾發言：

“你想作戰，好極了；這對於我們說是主要的。我們準備贊助一切願意驅逐希特勒侵略者的人。不過，我們認為你的談話中有相當部分是應該加以明確的。”

說到這里，談話變得更加活躍，更加快速了。談話行將結束，並且要作出結論來。

吉羅德將軍：“我即將釋放你們，但我希望你們能簽署一份擁護我的政策的宣言。”

皮佑和米道爾：“這絕對不可能。我們並不是請求而是要索還我們的自由。從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八日以來，我們仍然被關在監獄中，這已經是夠荒謬的了。你已經說過你並不搞政治，那末你怎麼能夠讓我們贊成你的政策呢？至於我們的政策就是為解放法國而鬥爭。”

吉羅德將軍：“至少你們得給我們許下諾言。”

皮佑和米道爾：“在我們看來這樣的建議簡直是對我們的榮譽的侮辱。”

於是我們的代表便把曾向唐勃勒省長、夏德爾總督和海軍上將達爾朗所作過的強硬的回答向吉羅德將軍說了。

吉羅德將軍：“好吧，告訴你們的朋友們，三天之後他們將得到自由。”

皮佑和米道爾：“關於共產黨議員的問題我們記下了。但是所有其他尚在集中營、監獄和苦役營里的人，他們將怎樣呢？我們希望他們也能像我們一樣，在同樣的條件下被釋

放。”

吉罗德將軍：“他們也會得到自由的。而且我知道一旦當你們獲得自由的時候，你們就會要求不讓你們的任何朋友被關在集中營、監獄和苦役營里。”

談話結束了。

吉罗德將軍把皮佑和米道爾一直送到他的臨時辦公室的門口。他與他們握手，說了聲：“先生們，再見”，便告別了。

一小時以後，這次難忘的會談的忠實報道便傳到了關在麥宗·加萊的全體議員們那里。

但是，儘管有了莊嚴的許諾，我們仍然不放鬆行動。我們通過地下關係，把吉罗德、皮佑、米道爾談話的細節告訴了阿爾及利亞的共產黨領導，阿爾及利亞共產黨加強了爭取釋放我們的活動。

終於，在一九四三年二月二日，唐勃勒省長來拜訪我們。他向我們說：

“你們的釋放已經正式決定了。不會很晚的。快了，就快了。”

我們要他詳細解釋，但是毫無效果。唐勃勒省長堅決默不作聲。他無論如何都要保守秘密。

假如我們出獄的消息能夠及時傳出，阿爾及爾、胡山·岱、麥宗·加萊和麥宗·布朗施的勞動人民就會大批到苦役營門前來等候我們。而這正是軍政當局所不願意的。

## 第二十四章

### 欢呼自由

一九四三年二月四日下午七点半，典獄長、副典獄長以及麥宗·加萊監獄的會計來告訴我們：第二天上午我們將無條件地獲得釋放。

我們唱起馬賽曲和國際歌來。

我們請監獄當局拿點酒來，以便為我們和全體犯人的自由而干杯。獄方立即答應了。

跟着我們便收拾行李，很快就整理好了。几件衬衣，几本書，和几个筆記本，很快就被收拾到旅行袋和包裹里。

這是一個失眠的夜晚。我們終於要得到自由了。

第二天，二月五日起來後，我們集中到院子里來。時間一秒、一分、一小時地過得很慢，簡直好像等了几世紀似的。我們的眼睛注視着大門。十一點半門開了，典獄長在他最接近的下級人員的陪同下來到我們跟前，他向我們說道：

“議員先生們，你們已經獲得自由了。”

十一點四十分，我們在出獄登記簿上簽字以後，越出了麥宗·加萊苦役營的大門。我們自由了。

阿爾及利亞共產黨的同志們在等着我們。好些天以來，他們在監獄門口守衛着，他們兄弟般地擁抱着我們每一個人。

接着我們立即到烈士紀念碑下去吊唁并宣讀我們歡呼自由的宣言，這份宣言是我在前一天受同志們的委托起草的：

## 欢呼自由

——一九四三年二月五日从麦宗·加莱中央監獄被釋放的二十七位法国議員共同宣言

“我們二十七位法国議員今天終於从麦宗·加莱中央監獄被釋放了出來。在這兒，我們在維希投降部長的命令下，以愛國和忠于我們的自由與人類解放的理想‘罪名’，被監禁了二十二個月之久。

“在越出監獄沉重的大門之後，我們首先想到的便是對於死難的同志們深深的悼念，他們是被賣國賊們送到侵略軍的斷頭台上和行刑隊的槍彈下的。

“這些為法國事業而殉難的烈士，媚顏事敵的禍國殃民政策的犧牲者，他們的光芒在希特勒野蠻的使人窒息的黑暗統治下，照亮了解放的道路。

“為了保衛法國的各種自由，他們英勇地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他們高唱着馬賽曲，慷慨就義。

“為了使被蹂躪的法國能夠復興強盛，並且自由獨立而幸福地生存着，他們英勇地倒了下去。

“祖國將永遠感激他們。

“祖國將把他們的名字寫在自己光榮的歷史上。

“法國世世代代的男女同胞們將虔誠地把對於他們的懷念，像保留在神龕里一樣地保留在自己的心里。

“法國人民將把他們和土倫的勇敢的水兵們的名字聯系在一起，這些水兵繼承了他們先輩的光榮傳統，在進行過英勇抵抗後，寧願與擊毀了的軍艦一同沉入海底，而不肯把船交給敵人。他們向全世界顯示了法國人民高尚的勇氣。在玷辱法國土地的納粹黨徒及其走狗面前，他們表現了全體法國人民

追求独立自由的不可动摇的意志。

“光荣归于这批人民的儿子，祖国的骄傲！”

“光荣归于他们的同辈、归于可以和苏联游击队员以及巴尔干爱国志士媲美的土伦兵工厂里暴动的工人们，光荣归于冶金、建筑、采矿、铁路和农村里的劳动者们，他们在法国的各个地区，在布列塔尼、诺尔省、巴黎、里昂和马赛，不愿由德国和维希联合组成的警察力量的无情镇压，从被占领之日起，就起而对法西斯饥饿与奴役的政策进行了不断的反抗。

“我们这些被流放的议员，现在把我们感激的目光从地中海的彼岸转到美好的法国土地上来，这块土地现在正被残忍的侵略者的铁蹄践踏，被我们英雄们大量的鲜血染得殷红。我们向他们遥远的坟墓脱帽致敬。我们宣誓要替他们报仇，并且要求自己表现得无愧于这些伟大的英雄。

“我们向英美部队致以热烈的敬礼。

“我们向法国的士兵，各级军官，向工人，向全体法国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他们一开始就与我们的盟军进行了兄弟般的合作，并且当盟军在英国海军有效的掩护下辉煌地进行艰苦的登陆战时，曾给予他们以种种便利。

“我们对于以保卫者的姿态出现在北非领土上的英美军队表示敬意。

“我们认为登陆北非是彻底毁灭轴心强盗，以及使美、英、中、苏及其盟邦取得完全胜利的道路上一个有战略意义的重要步骤。

“光辉的胜利早已写在我们兵团的军旗上、我们艦队的旗帜上和我們空军的机翼上了。

“即使是最艰苦的黑暗的日子里，也从来没有过任何足以影响我们情绪的疑虑。

“在我們的心坎中，我們始終懷着對勝利的不可改變的強烈的信心。

“今天，自由的勝利已經馬上就要到來了。

“行將到來的解放的希望，使得在外國占領下由於殘酷的折磨而憔悴消瘦的面孔發出了光彩。

“如果說民主必勝的絕對信念已經在被壓迫的民族中深入人心的話，首先應當歸功於光榮蘇軍的史詩般的戰士所進行的英勇的抵抗。

“在列寧格勒和莫斯科城下，在從北冰洋到黑海和高加索山脈的廣泛的戰線上，在各個季節里，在酷暑嚴寒和狂風暴雨中，他們建立了英勇頑強的不可摧毀的磐石般的障地。

“由於蘇軍粉碎了歐洲法西斯全部聯合部队的無數次瘋狂的進攻，由於把斯大林格勒——巨人們在斯大林親自指揮下所保衛的偉大的凡爾登——變成了民主力量防衛和勝利反攻的活生生的標志，這就使得組織和實現強大的非洲登陸戰成為可能，並為高加索、頓河、沃龍涅什、威里基·盧基及列寧格勒的勝利作好了準備，而這些勝利是各國人民新的努力和普遍勝利反攻的序幕。

“我們向這些傳奇般的步兵、水兵、飛行員和突擊指揮員，向這些英勇的游擊隊員和義勇軍，向這些將軍和元帥，向這些在草原上、森林中和山地里以其頑強的勞動支援前線的農民，向這些大炮、軍火、飛機、坦克製造廠的工人，以及向他們的最高領袖致以兄弟般的敬禮。

“雖然維希政府採取了嚴厲的手段和周密的禁令，使我們絕對與外界隔絕，完全不了解軍事和政治方面所發生的事件，但是蘇聯人民的光輝勝利所發出的雖然被削弱了的回響，仍然穿過牢房的牆壁，使我們感到快樂，使我們因為能夠為他們

以極端頑強的精神所保衛的神聖事業奮鬥感到驕傲。

“我們深深受到他們的犧牲精神的鼓舞，懷着一顆不可動搖的決心，走出了監獄，決心要為解放法國，解放所有在血腥的法西斯主義野蠻恐怖下受壓迫的各國人民而繼續貢獻出自己的生命。

“謹向曾經以頑強的精神忍受了別離的痛苦和憂愁，並且因為是我們的親友而遭受了警察的迫害與管制和關在集中營與監獄里的我們的家人、我們的妻子、兒孫、兄弟姊妹、父母和祖父母們，

“謹向我們兄弟般的戰友們：多列士、杜克洛、弗拉商、加香以及數不清的為反對侵略者而冒着生命危險進行非法鬥爭的同志們，

“謹向落在我們共同敵人手中的為自由而奮鬥的戰士們，向關在集中營、拘留所和監獄里的政治犯們，向一百五十萬在秘密警察監視下處於奴隸狀態的被囚禁的人們；向被流放到德國兵工廠中去作強迫勞動的男女工人們，

“謹向那些因遭受永無止境的征募劫掠而處於飢餓狀態的城鄉居民們，

“再一次表示我們莊嚴的誓言，我們決心以畢生的力量永無休止、永不鬆懈地為我們的祖國和人民服務。

“作為法國議員，我們為了堅持不渝地忠實於我們對於社會解放與人類團結的共產主義理想，毫不屈服地忍受各種迫害，這就是我們向勞動人民提供的有關我們的誠實、忠貞、正直和愛國主義的多方面的證據。

“人民知道他們將永遠可以在為公共利益而奮鬥的道路上的最前列找到我們。

“為了保衛祖國，我們向具有各種不同見解的法國男女愛

国者們伸出友誼的手。

“我們号召他們在爭取自由的尖銳斗争中，手挽着手前进。

“只有一个共同而且根本的任务應該勇敢地加以完成：

“瘋狂的納粹主义野兽正在蹂躪、破坏、勒索、搶劫、屠杀和毁灭着欧洲。

“我們一定要追捕这个丑惡的怪物，打倒它，并且置之于死地！

“一定要消灭法西斯的野蛮統治！

“不團結一切后备力量，要取得自由在全世界範圍內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只有当法西斯第五縱队的間諜与卖国賊不再能为非作歹，只有当法国爱国人士所受的使人愤怒不平的非法判决、荒唐的撤銷代表权的处分，專橫的免职与解散等全部加以取消，对这些丑惡勾当的負責者給予严厉的制裁，并且在完全恢复法国人民神聖不可侵犯的各种权利之后，这一團結才更能得到巩固和發展。

“法国的男女公民們，讓我們團結起来！

“法国的男女公民們！

“讓我們發起一次高尚的竞赛，使工厂、田园、工場、碼頭、办公室、机关、学校和實驗室里的工人、农民、手工業者和知識分子的爱国主义热情百倍地兴奋起来！

“讓桑普勒—繆司地方志願軍的牺牲精神，馬恩河不可抗拒的英勇气概和凡尔登不可摧毀的頑强精神，鼓舞我們的陸軍、海軍和空軍。

“法国的男女公民們！

“讓我們的軍隊和英、美、苏、中及其盟友的胜利的軍隊联



合起来。

“前进吧！把侵略者从法国赶出去！”

“前进吧！争取法国民族的独立！”

“前进吧！让我们的国家站在自由国家的最前列！”

“前进吧！让我们的人民置身于自由的、能够决定自己命运的世界各民族的前列。

“法国的男女公民们！”

“前进吧，为了胜利而一致行动起来！”

“法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自由、独立而幸福的法兰西万岁！”

几天之后，我很荣幸地在阿尔及尔广播电台前广播了这篇宣言。

我并且很高兴地听说这篇宣言被我们留在法国的已经转入地下的亲友们收听到了。

从这一天起，事实的发展证明了全体都始终是忠于这一誓言的。我们履行了这一誓言，我们现在和将来也将永远遵守这一誓言。

## 譯 后 記

本書是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議員、法共中央刊物——“新法蘭西周刊”主筆弗洛里蒙·邦特所寫的，內容系敘述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三年法共議員在議會、在法國監獄和非洲苦役營的英勇鬥爭情況。

本書有三種版本，我們根據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一年法文版譯出，並根據法國聯合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版將蘇聯版刪節的某些地方補上，此外也作了一些小的刪節。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